

北京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2017.11-2018.01)

文研通讯



2018 年第 1 期
总第六期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院通讯

2018 年第 1 期

总第六期

主办单位：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刊 名：《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刊 期：总第六期（2017 年 11 月—2018 年 1 月）
执行主编：杨弘博 韩笑
编 辑：周诗雨
编 务：陈天传
特邀摄影：刘学红等
装帧设计：杨宇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 5 号 北京大学静园二院
电话：010-62768010
传真：010-62768010
邮箱：ihss@pku.edu.cn
网址：<http://www.ihss.pku.edu.cn/>



微 信 公 众 号

目录

01 文研学术

（一）北大文研讲座 02

- [62] 毛里奇奥·维罗里：共和自治的理念——安布罗乔·洛伦泽蒂的“好政府”壁画 02
- 毛里奇奥·维罗里：马基雅维利的共和式自由理论 05
- 毛里奇奥·维罗里：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国家救赎的演说 08
- 毛里奇奥·维罗里：现代政治思想中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 12
- [63] 彭慕兰：清代中后期中国的领土与人民之新定义 16
- [64] 彼得·诺兰：中国与西方长期发展中的趋同与趋异 20
- [65] 木村清孝：佛教研究的意义与方法——基于华严思想研究的思考 23
- [66] 范德康：时间之魔轮与佛之涅槃 27
- [67] 沈卫荣：语文学、东方主义和未来语文学 27
- [68] 金鹏程：何谓早期中国的历史 27
- [69] 黄克武：由圣人凡 以人胜天 ——《天演论》与近代中国知识转型 36
- [70] 赵敦华：根本恶 伪善 平庸恶 39

- [71] 孙庆伟、田亚岐：皇天后土 44

（二）未名学者讲座 48

- [24] 李力行：关于中国国有企业下放的研究 48
- [25] 张新刚：修昔底德论城邦内乱 51
- [26] 吴天岳：西方哲学中的人文主义传统？——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哲学史反思 55
- [27] 刘淳：图像中的叙事——会讲故事的古希腊陶瓶画 58
- [28] 秦岭：资源、技术与早期信仰 ——由良渚谈中国史前文明形成的基础 61

（三）北大文研论坛 66

- [55] 李孝聪、刘未等：读城——考古、历史与地理 66
- [56] 马戎、张志强等：文明的共处与汇通 70
- [57] 罗泰等：东周时代经济考古的一些问题 75
- [58] 周建波、李楠、孙圣民等：交叉学科视角下的经济史学 79

（四）文研汇讲 83

- [01] 林晓光：文本扭曲镜像中的汉魏六朝文学 83
- [02] 华喆：图像·文本·理论——礼图与礼学研究 85
- [03] 胡鸿：林间自在啼——在物质环境中理解文本 87
- [04] 刘未：考古学视野下的晋东南宋元村落 89

- [05] 陈波：家屋社会与中国研究 91

- [06] 孙圣民：对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哲学思考 93

（五）文研读书 95

- [04] 民国北京的城市书写与历史记忆——《重写旧京》研讨会 95
- [05] 长城内外是家乡——《从大都到上都》研讨会 100
- [06] 全球史视野中的明清史研究——《火枪与账簿》研讨会 103

（六）静园雅集 107

- [14] 邓淑苹：赏玉、识玉——谈玉品与玉质 107
- [15] 赵慧萍：木版水印技艺与其当代价值 112
- [16] 王辛敬、陆宗润：书画装裱与修复 115
- [17] 萧梅：谁的呼麦——亚欧草原寻踪 118
- [18] 徐芄：京剧的民国唱法及其现代性 121

（七）菊生学术论坛 123

- [08] 七至十六世纪信息沟通与国家秩序 123

136 文研纪念·专题展览

- [01] 纪念与传承：涂尔干逝世一百周年纪念研讨会 138
- [02] 张政烺先生纪念座谈会 142

- “张政烺先生学行展”专题展览精选 148

- [03] 回顾与展望——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 90 周年纪念论坛 154

- “北京大学与丝绸之路——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九十周年纪念展”专题展览精选 157

162 静园学术

- “共和主义与现代政治”学术圆桌会议 164
- “仙道与鬼道”学术工作坊 167

172 文研回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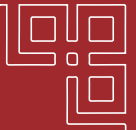
-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召开“张政烺先生纪念座谈会” 174
- 人文社会科学院举办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 90 周年纪念论坛 176
-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邀请学者项目第三期圆满结束 176

182 文研纪事





文研学术



（一）北大文研讲座

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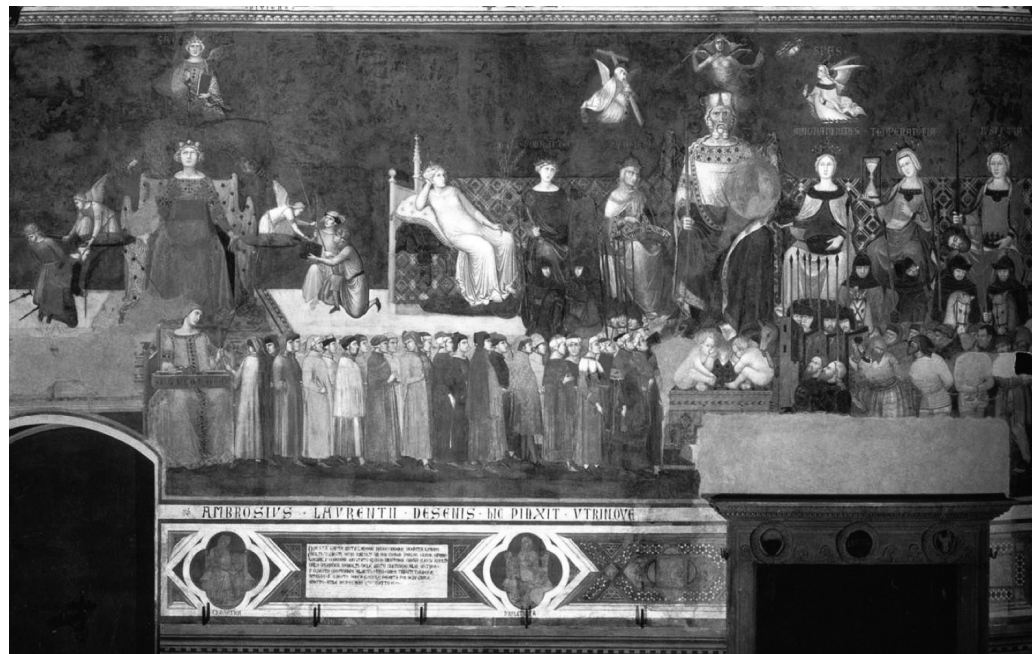
毛里奇奥·维罗里：共和自治的理念 ——安布罗乔·洛伦泽蒂的“好政府”壁画

2017年11月3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六十二期第一场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1报告厅举行，主题为“共和自治的理念——安布罗乔·洛伦泽蒂的‘好政府’壁画”。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荣休教授毛里奇奥·维罗里（Maurizio Viroli）主讲，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强主持。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段德敏、历史学系张新刚出席本次讲座。

讲座伊始，维罗里教授表示，在迄今近三十年的著述生涯中，他一直关心着一个核心问题：生活在自由之中意味着什么？免于支配（free from domination）且不受制于他人专断的意志，这是政治理论中共和主义传统的核心观念。这一传统起源于古罗马，在西塞罗、李维和撒路斯特的著作中有所体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得到阐释和发扬；之后又在英格兰、美利坚、法国和荷兰等地展现出新的篇章。这一理论传统的核心问题是，我们如何能共同生活在自由之中（live together in freedom）？

在本场讲座中，维罗里教授以一组画作分析这一传统的“文本”（texts）。安布罗乔·洛伦泽蒂（Ambrogio Lorenzetti）于1339至1341年间创作了这组壁画，位于锡耶纳市政厅九人议会室（Sala dei Nove）。“九人”指锡耶纳行政机构“九人议会”，由九位选举出的官员构成。在任期之内，他们被允许的最长任职期限为六个月，且两个任期之间须间隔两年。锡耶纳共和国之所以对官员的任期作出如此严格的限制，是出于对僭政（tyranny）的恐惧，即某人可能在手中积聚巨大的权力，从而在实际上成为共和国的统治者。

维罗里教授进一步解释了他选择“画作”而非“文本”加以解读的原因。在他看来，这幅画作就是文本。洛伦泽蒂借由图像表达了自己是如何理解好政府的基础和原则的。洛伦泽蒂希望我们注意两点：其一，好政府是什么？第二，好政府的对立面是什么？（即僭政）以及，好政府如何堕落至僭政？维罗里表示，关于好政府的理论主导了意大利十四世纪的政治论述。



“好政府”壁画全貌

洛伦泽蒂创作的壁画位于三面墙上，中间部分便是“好政府”壁画，两侧分别是“好城市”和“坏政府与坏城市”。维罗里教授最关心的依然是“自由”概念在其中的体现。锡耶纳是一个自治共和国。壁画的委托者，也就是九人会议，为了使画作的寓意更为显白，让洛伦泽蒂在画作下部用文字留下了一些讯息。好政府壁画下方的拉丁铭文写道：“在神圣美德（正义）统治之地，她使许多灵魂联合起来，他们因之将公共利益作为他们的主人”。洛伦泽蒂显然将正义这一神圣美德视作好政府的基础——拥有了正义，便拥有了团结。通过考察好政府的对立面，这一讯息则变得更加清晰。如果正义是好政府的基础，那么恰是正义的缺失造就了一个坏政府。洛伦泽蒂写道：“无论何地正义若被捆绑，

便无人遵从公共利益；他也不会行为正直；僭政会横行。”

维罗里教授接下来转而考察图像。在好政府壁画左半部，“正义”呈执政官姿态端坐，其头部环绕着拉丁文字“DILIGITE IUSTITIAM QUI IUDICATIS TERRAM”，意即统治世界的人应爱正义。在“正义”之上则是“智慧”——她给予正义灵感。好政府壁画中，“正义”双手托着天平的秤盘使之保持平衡。左侧秤盘之上的天使正在施加赏罚，喻指“分配正义”；右侧秤盘之上的天使手持钱币进行商品交易，喻指“交换正义”。而在坏政府壁画中，正义被置于僭主脚下，被捆绑着并且神情痛苦。

从“正义”天平秤盘的下缘延伸出两条绳索，为“和谐”（concordia）所握持，

喻指在正义城市中会产生和谐。“和谐”则将绳索传递给画面中的二十四位公民。绳索用来捆绑，捆绑在拉丁语中是 *ligare*，而该词又与 *lex*（法律）相关联。这一源自正义并为公民所持有的绳索，最后结束于画幅右边的统治者的右手上。洛伦泽蒂由此所传达的便是，在一个正义、和谐的城市中，公民掌控着法律，是设立法律的人；行政权力为

法律所限制，政府官员并不居于法律之上而可以为所欲为。而在关于坏政府的壁画中，僭主的右手则丝毫不受束缚。维罗里教授指出，由此我们获得了好政府的第二个要件，即公民掌控着法律，并且要确保执政者的双手受到了限制。

画幅中间偏右的统治者形象，在整幅壁画中占比最大、最显眼。有些学者认为，这个形象代表了国王（king）。而维罗里教授则认为，在一幅赞颂共和国的画作中不可能也不应该出现国王的形象，因此这种解读是错误的。洛伦泽蒂在壁画中留下了线索，统治者形象的头上环绕着四个字母——C.S.C.V.，意为“锡耶纳共和体，圣母之城”（Commune Senarum Civitas Virginis）。洛伦泽蒂试图告诉观者，这个形象代表了锡耶纳共和体，是其自治政府最高权力的象征。这个形象之所以呈现为一个男性长者，或许因为锡耶纳其名（Siena）便源自拉丁语中的老人（senex）。这位长者所着长袍呈黑白色，是锡耶纳城



毛里奇奥·维罗里教授

的典型色彩；他的脚边有一对吸吮母乳的婴孩，代表锡耶纳的建城神话。

为了使最高权力出于公共利益而统治，并防止僭政的产生，洛伦泽蒂在壁画中阐发了一种关于政治美德（political virtues）的共和理论。这一理论直接源自西塞罗和塞涅卡的著作，讲的是一个人若想成为真正的政治领导者，胜任统治并施行好的统治，则必须具备一套美德。在壁画中，这些美德以拟人化女性形象都端坐于长者两侧，从左至右分别是和平、勇敢、明智、宽宏、节制和正义。“宽宏”强调领导者要有宽广的心胸，勇于追求卓越的事物，为共同体的公共利益服务；“节制”的右手指向左手持有的沙漏，意在告诫统治者审时度势的重要性；“明智”是唯一的老人，她手指一捆卷轴，寓意通过熟习历史来增进明智。

接下来，维罗里教授对位于统治者形象头顶的三位天使形象进行释读。其中一位天使代表“希望”（spes），正注视着

基督；另有一位天使代表“信心”（fides）；而在国王头顶正中间位置的是“慈爱”（caritas）。“慈爱”被描绘成红色，象征着激情、爱欲和引诱性，因而必须着以薄纱。她右手持矛，意喻着爱能刺穿一个人的心；左手则拿着一颗燃烧的心，希望献给基督。她的头发似乎被风鼓动了起来，身体也呈现出一种迷人的姿态。为了准确理解这一形象的含义，维罗里教授认为，我们必须采用一种语境语义的方法，即回到洛伦泽蒂所处的时代考察人们持有的宗教观念。通过简要考察同置于锡耶纳市政厅且创作于该壁画前后的另外几幅画作，维罗里教授指出，在锡耶纳存在这样一种基督教传统，它关注尊崇正义的重要性。在这一语境中，“慈爱”被视作对祖国的爱的基础。洛伦泽蒂试图告诉我们，这种爱的对象是锡耶纳，与情欲爱同样强烈。而正是这种强烈的爱，使人们将公共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

讲座最后，维罗里教授简要分析了画作中描绘的好政府所施加的影响——

带来和平及庇佑着人们免于恐惧。在东墙“好城市”壁画的中间部位，一群男性舞者表现出源于自由心灵的幸福。而在他们的服装上，密布着一些昆虫的形象。在中世纪语汇中，这种昆虫是象征着抑郁（melancholy），它们通过啃噬人的心灵使之变得干枯、冷漠而不再热爱生活。而在这幅壁画中，昆虫浮于服装表面。借此，洛伦泽蒂意在指出，在一个具备好政府的城市里，人们将不受抑郁困扰且感受到富足。

交流环节，维罗里教授对听众的问题进行了积极的回应。对于在好政府壁画中两次出现的正义形象，维罗里教授指出，长椅最右边的“正义”代表了对领导者个人的德性要求，而最左边的“正义”则意指共和国的基本原则。“正义”出现了两次，或许恰好应对柏拉图《理想国》中城邦正义和个人正义的观点。

（撰稿：欧阳火亮、陈浩宇）

毛里奇奥·维罗里： 马基雅维利的共和式自由理论



2017年11月6日，“北大文研讲座”第六十二期第二场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

B102报告厅举行，主题为“马基雅维利的共和式自由理论”。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

普林斯顿大学荣休教授毛里奇奥·维罗里（Maurizio Viroli）主讲，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段德敏主持。

讲座伊始，维罗里教授便指出，马基雅维利属于那种“其生活对于理解其政治思想至关重要”的思想家。作为一个爱国者，他曾声言“我爱我的祖国胜过我的灵魂”，就连写作也为了救赎国家。马基雅维利希望使佛罗伦萨获得自由，而此间“自由”的意涵则是共和主义式的。

维罗里教授首先阐明，马基雅维利著作中的“自由”即“不依赖于其他人”。需要注意的是，他并没有提到“压制”一词，也就是说，在言及“不自由”时，他并没有将其理解为他人的压制和直接的干预。而相对的，处于他人专断意志之下便意味着依赖，也就是不自由。进一步而言，具体在什么情况下会产生这种“依赖”呢？维罗里教授指出，君主统治之下便有依赖，其中的人们是不自由的。

那么，在何种条件的下人才算生活于自由之中呢？维罗里教授认为，马基雅维利给出的答案是共和政府。在共和政府下，主权归于公民，共同善（相较于在君主国和寡头制中）有可能抵御特殊的利益。而这也恰是马基雅维利在谈及人民时所持的观点。他认为，人民比君主更审慎、更稳健、更能作出合宜的判断，“人民的声音就如上帝的声音”一般。故此，若要自由，便应将权力蕴于法律之中，将最高权威置于公民而非少数寡头和君主手中实。关于这些，马基雅维利在《论李维》第二卷第二章中作了详尽的阐述。在共和国中，法律反映所有人的利益，共同善能够不为有

权力者所挟持，个人能够不居于私人利益的控制之下，从而得以保障自由。

在此之后，维罗里教授转而阐述共和主义式自由的对立面——专制。《论李维》第一卷第十章中，马基雅维利将宗教的创立者视为最值得称赞的人，共和国的奠立者其次。而与他们的所作所为相反者，也就是破坏宗教、推翻共和国的人则施行专制，也即自由的对立面。

接下来，维罗里教授讨论共和国采取何种类型的制度才最能维护共同善。他指出，马基雅维利对此的回应体现在《论李维》第一卷第二章。在这一章中，罗马共和国的混合政体受到推崇，被视为共和政府的最佳形式。在这种政府形式中，公民（多数）、贵族和行政官（类似于君主）占据一定的位置，从而使得一人的力量、少数的力量和多数的力量之间形成了制约，即三种原则都能得到展现。维罗里教授强调，马基雅维利绝非如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他甚至几乎从未提及“民主”一词。在他看来，纯粹的民主制是错误的，因此在唯一一次谈到雅典民主时也采取了批评的态度。梭伦将全部权力赋予雅典民众，但雅典的民主制仅维持了四十年；而采用混合政体的罗马共和国，却维系了四百年之久。维罗里教授提醒我们，虽然在今人看来，民主与共和已然被画上了等号，但这绝不是马基雅维利的观点。

维罗里教授指出，混合政体中三种力量之间相互提防和制约，但人民是自由的守护者，具有最后的决定权。对于捍卫自由而言，人民的权力最为重要，因为他们

与贵族相比更不愿意侵害自由。权贵对于自由的威胁来自于他们害怕会失去已有财富。出于这种恐惧，他们会谋求更多的财富，从而便可能滥用权力及伴随而来的人民的报复。维罗里教授认为，马基雅维利深知“金钱即权力”，即通过用金钱施加恩惠可以获得荣誉和权力。不过，这是一种私人性的方式，是一种腐化，与之截然相对的则是公共性

方式——通过为共同善作出贡献而获得荣誉与权力。故此，在《论李维》第一卷第五章中，马基雅维利强调要把对自由的卫护置于普通公民的手中，因为他们更加明智、更不具危险性。

维罗里教授称赞马基雅维利是一个思想上的勇敢者，同时，也正是这种勇气使得当今的政治理论家们持续对他进行关注和讨论。他勇敢地挑战了所处时代里最受尊崇的信念，其中之一便是“共和国若要优良便需保持和谐，也即是社会的和平与统一”。而马基雅维利作出了与这一信条截然相反的论断，他在《论李维》第一卷第四章中就写道，正是社会的冲突使得罗马共和国强大和自由。通过公民们的对立和反抗，法律得以体现全体罗马人的利益，如此，自由才能得到保障。当然，社会冲突的方式应主要体现为协商和争论，而非沦入内战。此外，社会冲突在一群人放弃协商而力求完全支配其他人时会变得危险。在这种时候，会出现两种情况，或者权贵



回答观众提问

摧毁人民的自由，或者人民摧毁权贵们的自由。马基雅维利认为，佛罗伦萨的派系冲突导致了后一结果。

接下来，维罗里教授接着讨论了马基雅维利思想中的“扩张”（expansion）。有些人控诉马基雅维利支持帝国主义式的扩张，但需要注意的是，他之所以对凯撒持批评立场，是因为在其治下罗马人的自由终结了。维罗里教授申明，马基雅维利以在《论李维》第二卷第四章中强调共和国要扩张领土，是出于共和国自身的弱小将导致它被征服的考量。不过，维罗里教授在比较了共和国的三种扩张方式后，认为现代人所应效仿的是古代托斯卡纳式，即若干独立、相邻的共和国结成一种没有支配的、平等的同盟。它们既没有被征服之虞，也不会贸然扩张，每个共和国都获得自由和尊严。

在处理完扩张问题之后，维罗里教授进入最为棘手的话题，即共和国的建立。在马基雅维利看来，共和国的建立需要由

奠基者或者领导者来实现。这种伟大的领导者也可被称为救赎者（redeemer），他把国家从压迫和腐化中解救出来，重新恢复自由以及自由的生活方式。虽然共和国在建立后需要将统治赋予多数，但奠基事业须为奠基者一人单独完成。

随后，维罗里教授讨论了宗教问题。宗教提供意义，因而共和国需要宗教。而当共和国的人民拥有同样的宗教信仰时，他们也就更能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此外，宗教使公民更为良善，它所宣扬的价值也有利于共和国更好地抵御腐化。但是，何种宗教最能实现这些目的呢？马基雅维利在《论李维》第一卷第十二章对罗马教会进行了批评。他认为正是教会、教皇和教士们的“邪恶”导致意大利人缺乏真诚的信仰，从而使意大利缺失宗教。马基雅维利提出的解决之道是古代的基督教美德，即怜悯、同情之爱等，而这同样需要一个伟大的领导者来实现。马基雅维利写作《君主论》正是在吁求一个这样的救赎者，他能把国家从腐化、奴役和压迫之中解救出

来。

提问环节，维罗里教授就听众的问题进行解答，其中包括：霍布斯设想的主权者之下的自由与马基雅维利意义上的自由之间的区别、卢梭提出的公民宗教与马基雅维利关于宗教理解之间的殊异、马基雅维利将美第奇家族视作意大利可能的救赎者的原因、马基雅维利对于人民的评价与定位、领导者所具有的特质等等。

最后，维罗里教授强调以下观点：其一，在共和国的基础奠立之后，它的权力便是开放的，政治秩序从建立转向了维持，而这是理解公民自由的重要前提；其二，卢梭所要建立的宗教是完全的、新的宗教，而马基雅维利所要进行的则是改革现有宗教；其三，人民与环境关系密切，随着所处环境的变化，人民会展现出不同的特质；其四，好的领导者与好的人并非是一回事，好人要做好事，而好的领导者必须学会在必要时不做好事。

（撰稿：张旭）

毛里奇奥·维罗里： 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国家救赎的演说

2017年11月8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六十二期第三场在北京大学第二

体育馆B102报告厅举行，主题为“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国家救赎的演说”。

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荣休教授毛里奇奥·维罗里（Maurizio Viroli）主讲，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主持。

维罗里教授在讲座伊始便指出，本次讲座将提供一种非传统的解读视角。不同于通常的误解，本次讲座所谈论的《君主论》不是一篇政治科学的文本，而是一个先知性的文本（a prophetic text），是关于国家救赎的演说。它所提供的最重要的信息是关于政治救赎的、强有力的政治预言（political prophecy）。

首先，维罗里教授回顾了名篇的创作背景。马基雅维利（1469年—1527年）所生活的时代被历史学家描述为意大利历史上的“先知时代”。所谓先知（prophet），是指一个谈论自己所处时代并通过启示和促进其同胞行动的力量来表明救赎可能性的人；是一个提供启示、给予力量、进行动员的人；是一个声称自己受到上帝的启示，并因此启示他人的人。马基雅维利时代的先知是严厉批评道德败坏且能够激发战胜败坏并引起全然不同的新时代的人。而他本人就与最有名的先知——多明我会的僧侣季罗拉莫·萨沃纳罗拉修士（Brother Girolamo Savonarola）生活在同一时代。

马基雅维利亲眼目睹了萨沃纳罗拉修士在罗马教会的审判之下被绞死和焚烧的场景。萨沃纳罗拉于1494年说服佛罗伦萨人创立共和制政府，他的声音是先知的声音，也是动员佛罗伦萨人建立共和制政府的声音。马基雅维利在其中担任高级秘书一职的佛罗伦萨共和国正是由一位僧侣才得以建立，他见证了预言和先知性语言的



为读者签名

力量，也见证了这位先知的结局。萨沃纳罗拉说服佛罗伦萨人建立共和制政府，但在四年后又被他们杀死。

在马基雅维利的时代，诗人通常也是先知。克里斯多佛罗·兰迪诺（Cristoforo Landino）写有《〈神曲〉评注》（*Comento sopra la Comedia, A Commentary on the Comedy*）一书。但丁是佛罗伦萨人的偶像，其作品及其评论者的作品被广泛阅读，自然也包括这本书。兰迪诺强调，真正的诗人与先知一样都是被神启示的，因此二者有很强的相似性。诗人既可以解释自己所处的时代，也可以预见未来。

马基雅维利以成为一名诗人而骄傲。在《福灵之歌》（*Canto degli spiriti beati, The Song of the blessed Spirits*）中，他写有以下诗句：

愿世界回到那最初的年代；
通向天堂的路
将对好人开放……

这是一则用诗歌形式表达的预言，是

人们所能够设想的最清楚的预言。

马基雅维利于 1514 年创作了一首历史诗歌——《十年纪第二》（*Decennale secondo, The Second Decade*）。他在诗中说，自己要歌唱意大利在过去十年（1504–1514）所发生的王国、帝国与国家之剧变，而这些，早已被神的旨意预先注定。故此，马基雅维利像先知一样言说，意大利的政治事件是被上帝的旨意（God’s counsel）所决定的。

马基雅维利在 1523 年前后创作的《佛罗伦萨史》（*The Florentine Histories*）一书中叙述了 15 世纪一场破坏了托斯卡纳的大风暴。这只是一个平常的故事，但他却将其解释为上帝的意志：“上帝似乎亲手拿起了武器……无疑，上帝要恐吓托斯卡纳，而不是惩处它。要是风暴像它通过稀稀落落的橡树、榆树和房屋中间那样进入房屋栉比、人烟稠密的城市，它无疑将造成人的心智所难以推测的毁坏和痛苦。但上帝希望，只是这样轻微灾难的例子就足以使人们重新记得他的力量。”在这里，马基雅维利像先知一样讲述预言，并解释上帝的行为。

对马基雅维利而言，但丁是一位现代作家。他在《神曲·炼狱篇》中同样传递了先知的信息。当祖先对但丁说话时，他邀请但丁控诉佛罗伦萨同胞的败坏、恶毒和罪行。而这么做，必然会使他们感到不快——先知常因其严厉苛刻而被自己的同胞所厌恶，且承受着被同胞杀死的风险。比起解放（liberated），人民更喜欢确信（certitude）；比起改变，他们更喜欢不受控制的自由。

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但丁的忠诚门徒，马基雅维利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对佛罗伦萨乃至意大利同胞给予了严厉的批评。在《君主论》第二十六章中，马基雅维利如此描述意大利：“比希伯来人受奴役更甚”“比波斯人更受压迫”“比雅典人更加分散流离”“既没有首领，也没有秩序，受到打击，受到劫掠，被分裂，被蹂躏”。作为一篇演说，《君主论》中含有大量的隐喻（意大利被形容为一位受到侵犯与羞辱的女性），意在激发读者对意大利的同情。但是，这番对自身所处时代的分析、对祖国悲惨境况的控诉又是在为另一个先知性例子作准备。

马基雅维利的演说包含了两个方面。意大利的境况虽极为悲惨，但它又处在艰难的先知的时刻（prophetic moment），即救世主可能到来：“现在考虑了上面讨论过的全部事情，并且自己思量：意大利在此时此刻是不是可以给一位新的君主授予荣誉的吉日良辰……我觉得许多事情合在一起都对新君主有利，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比现在对君主的行动更合适。”换言之，意大利的救赎时机已经成熟。先知想要激励人们行动，便总是说时间是有利的——这也是先知的典型表达方式。另一位伟大的先知是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他在《我有一个梦想》中三次使用“现在是……的时候了”这一句式。

马基雅维利控诉意大利的悲惨境况，又称时机已经成熟，这正是人们所能设想的最为典型的先知语言。他的杰作正是《君主论》的结论部分，即佩脱拉克（Francesco Petrarca, 1304–1374）的诗句：

反暴虐的力量，将拿起枪，
战斗不会很长！
因为古人的勇气，
在意大利人的心中至今没有消亡。

维罗里教授再次表示，对马基雅维利而言，诗人就是先知。“战斗不会很长”则表明这里的诗句就是预言。在意大利被外国军队入侵的时候，马基雅维利见证了罗马被洗劫，但他仍满怀希望地告诉读者：救赎是可能的。

这也印证了本场讲座开始时提出的论点：以诗歌结尾的《君主论》并不是一篇政治科学文本。维罗里教授认为，《君主论》是一篇演说（oration），用来说服读者采取行动的文本。演说通常被分为几个部分。首先是关于自己的言辞，这样能够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并获得其信任。《君主论》开篇部分便写有一封梅迪奇（Lorenzo de’ Medici）的书信，马基雅维利也在其中介绍了自己。第二部分与将要谈论的问题相关。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开头部分便表明自己不讨论共和国而讨论君主国（principality）的态度，并对后者进行了分类。第三部分为组织论证。第四部分通过反面论证支持论点。最后则是总结部分。

除此之外，一篇好的演说还需要用修辞激发听众的激情。对马基雅维利而言，如果想要使其同胞反抗侵略，就应当触及对意大利的同情及对入侵者的仇恨，而这正是马基雅维利所做的。结论是听众最容易记住的部分，所以，作者应当把最重要的内容（也就是预言）放在结尾。因此，《君主论》作为一篇演说，它所提供的最重要

的信息就在结论部分——而它的结论是一个预言。马基雅维利作《君主论》的意图也在于此。

维罗里教授在此回应了一些批评者的观点。《君主论》第六章比较了持武装的先知与不持武装的先知：“假使摩西、居鲁士、罗慕路斯和提修斯不曾拿起武器，他们就不能够使人长时期地遵守他们的制度，正如季罗拉莫·萨沃纳罗拉修士在我们这个时代的遭遇一样。当大众不再相信他的时候，他就同新制度一起被毁灭了。因为，他既没有办法使那些曾经信仰他的人们坚定信仰，也没有办法使那些不信仰的人们保有信仰。”“所有持武装的先知都将获得胜利，而非武装的先知都失败了。”故此，有些批评者认为马基雅维利轻视预言。

而维罗里教授认为，马基雅维利所说的有武装的先知都将获得胜利，并不意味着他厌恶预言。相反，这恰恰说明他希望先知能将说服、启示的能力与军事力量相结合。事实上，马基雅维利真正的偶像是摩西。摩西既使用先知力量，又在必要时使用武装力量，并成功地将埃及的希伯来奴隶带往应许之地。而马基雅维利则认为，过去曾发生的事情有可能再次发生。以萨沃纳罗拉为例，先知必须在预言的力量之外加上武器的力量。同时，两种先知的比较是马基雅维利的典型表达方式，这也再次印证了他完全不是政治科学家的现实。

《佛罗伦萨史》可以佐证马基雅维利对先知的态度。书中记录了斯特凡诺·波卡里（Stefano Porcari）的故事：他是罗马贵族公民，想要做出诸如摧毁教皇权力、

恢复罗马共和国等值得纪念的事情。马基雅维利写道，因为“神职人员放荡不羁的举止，还有罗马贵族和人民的不满，激励着他寻找他的事业的愉快的终点”，波卡里被认为有能力获胜。但实情是，波卡里的自信源自佩脱拉克的诗句——他能感知诗人神圣的、先知的灵魂，所以判断出在那首抒情诗中所预言的事情必将来临。也就是说，波卡里被诗人所启示，而诗人与先知非常相似。

维罗里教授重述了马基雅维利就先知这一主题得出的结论，即过去发生过的事情有可能再次发生。《论李维》第一卷第五十六章如是写道：“我虽然不明究竟，然而观览古今之事可知，某城某地每有大的事变发生，不会没有预兆，它或见之于占卜和神启，或来自奇迹和其他严重的征候。”而只有先知才能够辨认这些迹象，因此，先知有可能到来。

先知能使人们产生对自由和解放的向往；先知能赋予人们力量，并使人们斗争抵抗，克服伤害、失败与失望。对马基雅维利而言，没有先知就不可能获得社会与政治上的解放。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马基雅维利还在为意大利被外国力量压迫而忧虑，他如此写道：“我爱我的祖国甚于爱我的灵魂。”正如爱一个人就会希望她（或是他）自由、幸福、受尊敬，马基雅维利也希望意大利能够如此。

讲座最后，维罗里教授说道，马基雅维利成为了一位失败的先知。当他在撰写《君主论》的时候，没有人听从他的言论，也没有人拿起武器。到了1870年，意大利得以完成独立统一大业。

马基雅维利的预言虽迟到了几个世纪，但终究还是实现了。

（撰稿：孙宇辰）

毛里奇奥·维罗里： 现代政治思想中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

2017年11月10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六十二期第四场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2报告厅举行，主题为“现代政治思想中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

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荣休教授毛里奇奥·维罗里（Maurizio Viroli）主讲，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强主持。

维罗里教授首先简述了以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为话题的缘由。在美国、欧洲和亚洲，民族主义的话语变得越来越强劲，而最近的一些政治事件已经充分说明了这点。作为政治理论家，维罗里教授坚信，其职责在于理解所处时代的各种问题并提供可能的应对方案。我们必须明了自身时代的动向，不然就有可能遭遇极为严峻的后果。而维

罗里教授的著作《关于爱国》（*For Love of Country: An Essay on Patriotism and Nationalism*）则是第二个原因。

在人们一般的观念中（甚至在一些权威的词典中），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并没有区别，二者都被径直地解释为对祖国的爱。但实际上，从历史的维度上来讲，两者的意涵非常不同。爱国主义源于拉丁语中的patria，即fatherland，也就是祖国。民族主义则源于拉丁语中的这natio，即nation（或birth），意为民族或者出生。对古罗马人来说，对两者进行区别非常简单。patria意指共和国，一种公民在其中拥有最高权力并保持独立的政治生活。因此，它是一个政治概念，并与政治自由这一观念紧密相连。而natio所标识的是一个人的出生地，它提示我们从某个特定出生地所获取的具体内容（如口音、心态、记忆等）。我们仅仅由于出生在某个地方便自然而然地具备了这些特征，因此，它是一个文化（或说种族）的概念。



维罗里教授在讲座现场

在作出这一基本区分后，维罗里教授进一步深入到历史文献中阐明两者的区别。对于古典拉丁作家来说，只有自由的共和国才是真正的祖国。如果一个人未能生活在自由之中，他便不能宣称自己拥有一个祖国。同样，在现代政治哲学领域最重要的文献中也可以发现这一观念。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开篇部分便指出，出现在该书前四章的“美德”（vertu）一词，意味着政治美德（vertu politique），而非基督教美德或是伦理美德。

维罗里教授认为，孟德斯鸠与马基雅维利一样，将对祖国的爱理解为对保护公共自由的法律和制度的爱。热爱平等就是热爱公民平等，即平等的政治权利和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对祖国和平的爱能使公民将共同利益置于过度的私人利益与派系利益之上，这种政治美德构成了自由的基础。孟德斯鸠写道，美德的天然位置“是与自由在一起的”。相反，当政治美德最致命的敌人——野心和贪婪，构成了公民们的



主导激情时，他们便无法继续生活在自由之中了。因此，公民必须勇于保卫他们的自由；而为了保卫自由，他们必须具备力量和激情，也就是一种生发于对祖国的激情。

维罗里教授在此列举了另一部重要政治文献，即启蒙运动时期由狄德罗和达朗贝尔编辑的《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在这里，政治美德被定义为“对祖国的爱”（*amour de la patrie*）、对法律的爱、对国家福祉的爱；而这种爱在民主制的关照下变得格外强烈。如同孟德斯鸠所说的，这种爱将公共利益置于私人利益之上，是一种对个体自我的摒弃。它是一种激情（而非哲学推理），因此，所有人都能获得它。它也是一种灵魂的活力，赋予最软弱的人以力量，并使他们能够“为了公共善做出

伟大的事情”。

而对于 *patrie* 在《百科全书》中的涵义，也并非意指一个人的出生之地。相反地，它指的是“自由国家”（*etat libre*），即个体作为其中一员且被法律保护着的“我们的自由和我们的幸福”的国家。祖国（*patrie*）与“共和国”及“自由”同义。在专制政体之下，皇帝或是君主掌握了绝对权威，将臣民视作他的奴仆；处于专制君主支配下的民众，没有政治自由，也便没有祖国。因此，在专制主义的枷锁下，不存在“祖国”的概念。

接下来，维罗里教授考察了卢梭的观点。卢梭凝练地指出，“没有自由，祖国便不能存续；没有美德，自由便不能存续；没有公民，美德便不能存续”。卢梭热爱日内瓦，常骄傲地将自称为日内瓦公民。但在 1764 年，他却决定放弃日内瓦公民的权利。在他看来，祖国的构成要素并非城墙或是民众，而是法律、道德、宪法以及建立在这些事物之上的生活方式。祖国存在于国家及其成员的关系之中，一旦这些关系产生变化，国家就会变得更为暴虐，祖国也便不复存在。在卢梭看来，日内瓦日益为一小部分人的僭政所主导。这也是他决定离开那里、放弃公民权的原因。

这种情况曾在历史上多次出现。维罗里教授设问道，当你的祖国变得暴虐、不再正义，当它侵犯基本的人权和人的尊严，你该选择离开还是留下？即使无法脱离祖国，是否至少该在道德层面上选择离开它？一个人能这样做的原因就在于，“祖国”并不是一个物质性概念。法西斯政权治下的意大利，许多反法西斯主义者都面临着

这样一个两难困境：你能继续留在这样一个对内压制、对外侵略的法西斯国家中做一个意大利人吗？

在爱国主义的历史中，除了政治自由，社会平等也是一个重要的构成要素。维罗里教授提到了 19 世纪的意大利政治理论家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并对社会平等作出了清晰的说明。在马志尼看来，祖国是一种由自由且平等的个体构成的民主联合，并非一个由若干部分以等级制形式构成的有机体。

“一个国家是一种由朝向单一目标的协作一致所联系在一起的自由、平等的人的同胞关系……国家并非一个集合体（*aggregation*），而是一种联合。如果没有一致的权利就没有真正的国家。在这种权利的一致性被等级和特权侵犯的地方，没有真正的国家”。马志尼继续写道：“一个国家并不仅仅是一片领土：特定的领土只是其基础。国家是在那一基础之上出现的观念；它是一种爱的情感，是将那片领土上的所有儿女联系起来的同胞情谊。只要你兄弟中还有一人在国家生活的发展中没有为他自己的投票权所代表，还有一人没有受到教育，还有一人虽能够且有意愿工作但却因为缺少工作而在贫穷里沉沦，你便没有获得一个应有的国家，即属于所有人并服务所有人的国家。”马志尼还将爱国主义和人道精神联系在了一起，他表示，一个爱国者不仅要热爱自己的祖国及其自由，同时也必须尊重其他民族的自由。国与国之间的边界并不能用来为道德冷漠辩护。维罗里教授还引述了阿奎那的观点，即对祖国的爱建立在仁慈之上，是对遭受

苦难或是弱小之人的爱。它赋予我们力量，使我们将公共事务置于私人利益之上。

接下来，维罗里教授转向讨论民族主义。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于 1774 年的《关于人类教育的另一种历史哲学》中最早使用了“民族主义”一词。他写道：“如果在朝向特定形式民族幸福的特定民族倾向的发展过程中，民族间的距离日益增大，我们发现偏见便会产生。埃及人憎恨牧民和游牧民族，蔑视轻浮的希腊人。类似地，每当两个民族关于幸福的倾向和范围发生冲突时，偏见、大众的判断和狭隘的民族主义就产生了。但是偏见在其所处的时代和地点是有益的，因为幸福或许会从中产生。它督促民族聚合在他们的核心周围，使他们更紧密地与其根源相连，使之更为繁茂，并使他们在其倾向和意图方面更为热忱，也由此更为幸福。”

在赫尔德看来，民族主义意味着在精神上集中并扎根于某个特定的民族文化，意指一个人对自己民族文化的排他性依附，而这种依附应该针对普世主义和文化同化而得到保护。成为一个世界公民并不会使一个人幸福，因为这会使他失掉生活的中心，身份认同层面也充满不确定性。民族意味着同一性（*oneness*）——建立在历史、语言、宗教、艺术和科学之上的民族文化统一体。这种统一体将民族形构为一个个体，一个有着它自身精神灵魂、才能和力量的单一实体。尽管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难以言传的“个性”，但每个民族都以它自己的方式成为一个整体，即每个民族都是“一个拥有自身民族文化和语言的民族”。它组成一个自身的小世界，并

在这个小世界中蕴涵幸福的核心。

本场讲座的最后，维罗里教授梳理了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区别。在赫尔德看来，国家是自然的产物，是上帝的造物。爱国主义对祖国的关切偏向于政治制度层面，其所能设想的最大罪恶莫过于国家被专制制度笼罩或是被别国征服。而相比较下，民族主义则力求护卫一个国家在语言、文化、风俗等方面的统一性。二者坚守着不同的价值序列。对于爱国主义而言，政治自由是第一位的；而至于民族主义，语言、文化的统一性则居于首位。爱国主义并不会粗暴地拒绝或阻拦一般民众要求归属特定文化、族群的欲望，它承认这种欲望和

认同是强烈的，并力求对这种欲望进行改善和丰富，使它与对政治自由的向往和归属紧密相连。

维罗里教授表示，通过考察历史、辨明含义，我们可以发现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是两种不相容的道德和政治事业。法西斯统治时期的意大利历史提供了一份证据：法西斯政权自称为民族主义，而非爱国主义；而那些最卓越的法西斯政权反对者则从马志尼那里汲取了灵感，将自己视为爱国主义者。

（撰稿：陈浩宇）

63

彭慕兰： 清代中后期中国的领土与人民之新定义

2017年11月4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六十三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1报告厅举行，主题为“清代中后期中国的领土与人民之新定义”。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加州学派”代表人物，芝加哥大学校级杰出教授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伯重主持，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田耕评议。

本场讲座的主要内容来自于彭慕兰

教授正在撰写的书稿——《中国为什么这么大》（*Why is China so big?*）。两千多年以来，中国几乎始终占据着地球近四分之一的人口与巨大广袤的疆域，且中国的领土扩从未像俄罗斯、美国、巴西等其他领土大国那样受益于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所说的“生态帝国主义”（ecological imperialism），即通过病菌和病毒攻克殖民地原住民。两千年间，即使曾经历过外来者入侵，也并没有像莫

卧尔王朝、奥斯曼帝国那样四分五裂。可以说，今天的中国依然继承了清朝的基本疆域。围绕这一现象，这本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清代中后期的统治者如何在前清开拓的边境地区建立秩序、维持统治？且为何衰落以后的统治者（尤其是汉人）依然没有放弃对这些地区进行统治？

彭慕兰教授的研究焦点在于当时的统治精英对待新疆和西南地区的观念变迁。他结合当时的社会和政治因素展开分析。如何看待边疆地区，既是一种国内政策，在“天下一家”的意识形态上也涉及到对家人的期待——比如边疆地区人民的职业、家庭以及他们与祖先的联系。费正清曾说道，中国传统的国家观念并非现代国家的主权论，而是天下观。这意味着中央统治者并不需对很多地区直接施以控制，且即使其无法维持持续的影响力，这种观念也给现实政治提供了弹性空间。伍德赛德（Woodside）认为，“天下”清晰定义了中央，却模糊了边界；中国统治者所在意的是人，而非地理上的领土；统治成功的标志是远人的归附及四夷向华夏文明的靠拢；在中国的传统政治观念中，中国政治所追求的是“域民不以封疆之界”，故此，清晰的边界往往意味着穷兵黩武。

彭慕兰教授表示伍德赛德的总结过于简单化了。他认为，天下观本身受到了现实的限制。在那些农业无法得以发展的地方，游牧民族没有固定居所与固定财产，无法符合天下观念中对可开化人的期待。这种认为蛮夷无法教化的观念体现在《史记》《汉书》等一系列著作中。《汉书·匈奴传》就曾提到“是故圣王禽兽畜之，不



彭慕兰教授

与约誓，不就攻伐；约之则费赂而见欺，攻之则劳师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人不可臣而畜也”。这种观念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读书人，人们只将农业人口看作可以教化的对象。所以，从历代王朝的历史来看，北方的边界比较清晰，南方却很模糊——南方虽然地形不便却依然可以从事农业活动。

清代的开疆拓土（尤其是对新疆等中亚地区的开拓）打破了这种只有农业人口才能被教化的共识，因而对旧有的天下观念造成了极大冲击。历史学界曾一直认为，十九世纪以后的西方入侵和对边疆地区矿产资源的需求激发了中国的边界意识。但彭慕兰教授则认为，从清朝开始关于边疆问题起就发生了内部的思想变化，可以说，这是一股完全独立的思潮，而这种观念的转变正来自于1759年对准噶尔部的平定以及在阻止沙俄扩张的军事外交斗争中。

在准噶尔部被平定后，朝廷上下曾讨论过新疆的处理问题。大部分文臣都表示要舍掉新疆，因其维持成本高昂，

且已经教训了叛乱的蒙古部族。七十年后，张格尔（Jahanghir Khoja）发动叛乱被平定，同样的问题再次摆在了朝廷面前，此时的汉人士大夫却无一人表示要放弃新疆。不仅不放弃，龚自珍认为应当在新疆投入更多的财力物力，并将人口迁移过来承担守军的军费。

观念发生变化有着深刻的背景原因。首先，知识分子在文章中将所有领土都等同于“中国”，清廷也在内外文书中明确认定新疆属于中国领土，这就逐步奠定了新疆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定位。此外，观念的扭转还发生在对“流民”的认识转变上。清朝从明朝所继承的诸多地区并不适宜农耕，因此，统治者难以施加直接的统治和教化。1720年至1730年间，政府实施的改土归流政策引发了一系列的叛乱，而在之后的六十年中又出现向土司管理回归的迹象（通过官僚体系减少独立意识并增加认同感）。

传统观念来看，边疆地区只能提供矿藏和其他资源，并不适合进行直接统治。即使当地矿工的生产能力赶不上汉人，朝廷也不愿意引入汉人矿工。矿工、伐木工收入较低，很难成家立业，又因流动量大无法登记在籍而受到管制。所以，在统治精英看来，这种“流民”就是“良民”的堕落，而传统的政策是要减少这些人群的数量而不是让他们恢复到正常生活水平。因此，在雍正、乾隆时期，迁往新疆和西



李伯重教授（中）主持，田耕助理教授（右）评议

南地区多为罪犯，那些无法娶妻的流民则为此地区所排斥。

观念真正发生变化是在1800年以后。当时的学者沈垚就曾提出向新疆迁移贫困人口，此举既能充实新疆，也能使这些人有机会提高生活水平并通过保甲制组织起来成为“良民”。1820年左右，龚自珍也提出应当向边疆迁移流民，让他们从事农业或者其他工作，完成个人身份转变的同时巩固大清的统治。上述想法在二十年后进入了政策讨论阶段。道光皇帝认为，巩固新疆的第一选择是迁移内地的移民，其次才是穆斯林；军机大臣穆彰阿也认为，内地流民是最佳的选择。总之，当时的统治者开始接纳这些曾被排斥的群体。对于边疆地区而言，依赖当地土司统治则被视为不得已之策——在前两种移民无法实现的前提下才可以接受。这种观念和政策的变迁消解了天下观念中对非农业区的排斥，而这种观念也被清代意识形态打上了烙印，因为满族人、蒙古人很早就被纳入了这个天下与教化体系中（他们历史上也极少从

事农耕活动）。

西南地区的变化同样也侵蚀了农业与文明的对应关系，南方的白莲教起义和滇西叛乱迫使官员寻求安定之策。清初的朝廷曾设想使这些地区保持蛮荒的想法不再切合实际，西南地区需要外来人口填补，以防叛乱“死灰复燃”。但是朝廷与当时的学者都反对在这些地区进行开垦，因为玉米和马铃薯的种植会对植被和生态造成破坏。清地理学家严如煜则认为，可以支持矿工、伐木工这样的“流民”通过稳定的矿场、伐木场等商业组织固定下来成为“良民”，并经过入籍安家成为清朝的好百姓。

在云南的铜矿产地等地区，政府通过实施各项措施来支持商业的发展，并帮助矿工、伐木工安定下来。如云贵总督吴其浚所指出的，西南地区的匪患往往起源于苗族的核心小群体，而与汉人流民无关。这些矿工、伐木工反而成为防治匪患的重要力量，矿场、伐木场等场所则成为治理百姓的重要依赖点。

上述思想都是突破性的。通过非农业组织治理百姓是对千年以来农耕社会家族式治理的突破，这也解释了为何在1895年之后，开采矿藏资源的工人能成为国家的先锋力量。越来越多的官员认识到，现有的农业资源已经无法满足快速增长的人口需要，必须通过其他产业来安顿。

事实上，在当时的话语中已经体现出明显的转变。《清实录》中，“流民”一词在18世纪使用得非常频繁，而“难民”、“贫民”、“穷民”等词则用得比较少；19世纪，“流民”一词的使用率逐渐降低

且在之后彻底消失，而“难民”等词却慢慢地被频繁使用。这种现象的发生也意味着带有同情心的态度转变。

华夏文明接纳非农业地区的观念转变有着深远的影响。虽然知识分子没有回到孟子所设想的、原教旨的天下中，但是人们对此的反思将三皇五帝、尧舜禹汤以将的天下观与清代广袤的领土紧密地联系起来。这不仅为后来的民族主义奠定了基础，也帮助清廷解决了有限民族与广大帝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详见本尼迪克特《想象的共同体》中的“官方民族主义”）。

彭慕兰教授表示，他更为关心的是这一观念的短期效果。从之后的历史往回看，若缺少这一观念的支持，西方入侵后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是汉民族主义思潮的壮大和汉民族从整个疆域中脱离，而非中华民族的统一。这种观念不仅催生了官员和矿工头脑中的民族主义，还孕育了其在20世纪的进一步发展。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国家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未走向分裂，反而实现了更强有力的一体化。

讲座结束后，田耕助理教授进行总结。他指出，清代在中期以后一直在处理盛世阶段遗留下来的疆域稳定问题。彭慕兰教授所讨论的其实是内地治理形式扩展到边疆的过程，也是清代政教意识形态的转变过程，更是清代在平衡农业与非农业的关系后有序扩展边疆秩序的过程。同时，他也就甘肃地区回民宗教领袖与保甲制的结合，那彦成对内地流民的批评等问题与彭慕兰教授进行探讨。

（撰稿：包培含）

64

彼得·诺兰：
中国与西方长期发展中的趋同与趋异

2017年11月6日晚，“北大文研讲座”第六十四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中国与西方长期发展中的趋同与趋异”。剑桥大学耶稣学院中国中心主任、崇华中国发展荣休教授、发展研究中心创始主任彼得·诺兰（Peter Nolan）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伯重主持，剑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研究员张静出席讲座。

讲座伊始，诺兰教授提出了这次讲座的核心问题——在中国与世界都处于“新时代”且面临种种重大挑战的背景下，如何避免“各种文明的冲突”，并使得全球范围内普遍和谐发展成为可能？诺兰教授的答案是：只有深入地审视过去，才能更好地了解世界文明长期演化的可能方向。他援引哈佛大学历史学家赖肖尔（Edwin Oldfather Reischauer）与费正清的论述来说明，和谐的世界关系不仅需要西方世界理解中国，也需要中国理解西方，且这种理解应当建立在可靠的认知之上。

诺兰教授对世界从远古时代以来的历史进行了梳理，将历史分为四个时期——中国与西方历史上的发展分别出现了两次趋同（convergence）和两次趋异（divergence），而当下正处在第二次趋同的阶段。诺兰教授认为，理解中西方历史的四个时期才能够理解历史，才能够理



彼得·诺兰教授

解十年以后的世界。他表示，虽然当前两个世界正在趋同，但是过去漫长的历史中积累了显著差异，这些差异既可能会导致冲突、暴力和不稳定性，也可能以良性的方式融合，从而有助于为全人类创造一个可持续、和平的未来。而在未来，这一差别的关键点在于两个世界是否均能够以正和思维参与世界发展，寻求力量平衡，促进世界和谐。

诺兰教授谈道，中国与西方历史上第一次趋同是远古时代，为期约两千多年。在夏商周和秦汉时期，贸易发展、货币使用、新阶级出现、战争不断等因素促进了人们对人类社会和政治本质的研究。政治研究的共同主题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即必须追求天下大众的利益，这种主题的

典型代表是孔子的“仁”、大众福祉、统治的道义基础等观念。秦代则实现了中国主体地域的统一和度量衡的统一，并开辟了人类历史上最为长久的政治制度。汉代建立了成熟的官僚制度，经济一体化与和平稳定的环境促进了经济与技术的大发展，官府主导的水利设施促进了农业发展、降低了运输成本，纸张、瓷器、农具、冶炼等技术都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平——而所有的这些，欧洲直到18世纪才赶上。

与汉代在同一时期的西方世界，雅典人在击败了波斯人之后，同样在贸易、城镇化以及货币使用等领域发展到了较高的水平。大规模的奴隶制使得统治阶级从劳动中解放出来，战争与繁荣同样也促进了有关人类社会的研究。亚里士多德就认为，道德范畴内“正确”行为的本质是仁爱，对财富的追求是“违反自然的”，捍卫团体利益更加高尚。同一时期的地中海地区被统一到罗马帝国之中，大量的公共建筑和实施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所有人均处于罗马法律体系的约束之下。本时期的西方和中国在思想和政治上表现了很高的相似性，也均在统一之中实现了和平安定、经济和社会的繁荣。

第一次趋异是从公元四世纪罗马帝国灭亡到19世纪初期，中西方文明彻底分道扬镳。中国沿着远古时代建立的基础演化，而西方则沿着一条与远古时代道路完全不同的道路前行。中国在隋唐时期发展出了发达的科举制，通过富有伦理内涵的考试选拔在各方面具备良好素质的文人加入各级政府。依靠官僚体系，中国维持了辽阔的疆域、保障了市场繁荣、建设了大量水

利设施、预防和救济了灾害损失、保护了居民财产权、稳定了市场价格。这一时期的经济领域，民间商业推动了大量的技术发明与进步，造船、航海、运输、冶金、印刷等技术得以广泛运用；经济的繁荣则促进了城镇化的进程，提高了居民识字率，推动了文化的成熟和开明；土地的私人所有制和租赁制度则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契约的保护下变得非常普遍。

同时期的西方则随着罗马帝国的瓦解形成了许多分散的准国家，为了土地和资源持续发生零和博弈。这一时段的早期，以农奴制为基础的封建制度与黑暗时代的政治混乱是西方世界的主要特征，而这种混乱也带来了技术的倒退。基督教精神深刻地影响了中世纪的政治和文化，许多无休止的作战都与人们对骑士制度和服务上帝的观念不同有关。随着时间的推移，农奴制被地主佃农制度取代，伊斯兰教的崛起也使得欧洲的主要矛盾变成了地中海沿岸基督教与穆斯林教群体之间的冲突。到了中世纪后期，政治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国会在绝对主义时代发挥了重要作用，部分国家以军事和航海技术开启了欧洲最早的海外暴力殖民。

在这一千多年中，西方与中国的技术差距在13世纪晚期达到极端。直到后来，欧洲各国市场的发达、资本主义的竞争才推动了技术进步。而在中国，技术革新成果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中亚和欧洲，为欧洲“迟来”的技术进步做了基础性的贡献——工业革命中许多具有创造性的基本部件都孕育自中国的技术。因此，诺兰教授认为“没有单独哪一个人或哪一种文明是‘蒸汽机

始祖’”。

欧洲的快速发 展使得中西方进入了第二次趋异的历史阶段。中国在这一时期人口快速增长，陷入到了马尔萨斯困境之中；朝代衰落带来的腐败问题与政府软弱等因素诱发了内乱；西方各国的侵略进一步加速了清朝的衰败。清王朝灭亡之后，军阀战争、日本侵略、内战则进一步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此时期，资本力量无法发展。短短一个世纪的时间，中国就从世界前沿掉落成为“不发达国家”，各项技术水平远远落后于西方。1949 年之后，国家进入了计划经济阶段，强调市场重要作用的观点落了 下风。至 1970 年代末期，中国 GDP 占世界的比重下降到 2.3%、国际贸易份额不足 1%。大部分技术陈旧过时，与世界技术进步脱节。

而西方在 1800 年之后通过工业革命迅速改变了全球经济与军事力量的面貌，两次工业革命使得工业化的浪潮席卷全球。至 1913 年，欧美国家 GDP 已经占据世界的 54%。二战之后，发达国家主导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进一步使得高收入国家 GDP 提升至 70%。军事技术的快速发展大大提高了武器的致死率，这让少数国家征服世界成为可能，也让工业化国家之间的战争变得更加残酷、恐怖。在这一时期，西欧及其附属国家不仅占据了世界经济、军事的主流，政治方面，二战之后建立起来的全球管理机构的领导权也掌握在工业化国家的手中。

诺兰教授所指的历史上的第二次趋同，则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使得中国回归了一贯的务实风格，政

府在“市场失灵”的地方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以实用主义的方式在“看不见的手”（市场力量）和“看得见的手”（监管）之间寻找最佳平衡点。中国占全球 GDP 的份额（以不变购买力平价计算）从 1980 年的 2.3% 增长至 2016 年的 17.8%。在民生福利的各个层面，包括饮食、住房、供水和供电、交通、教育、健康以及文化生活等，与 70 年代相比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中国的繁荣发展使其对全球经济政治发挥出强大的影响力，这也是重返历史地位的起点。

但在这一阶段，中国与西方都面临着重大的挑战。国民平均收入不高、人口老龄化、环境污染、高科技企业乏力、对外投资份额较低、国企改革复杂、国际环境极具挑战等等都是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而对于西方而言，金融危机暴露的监管扭曲、国家收入不平等进一步扩大、工人议价能力下降、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长乏力等都显现出了一种“西方衰落”的时代迹象。

诺兰教授总结道，通过回顾中西方过去千年以来的演进与过去几十年的深刻变革，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其在未来世界面临的共同挑战。这些挑战既来自自然环境破坏、气候变化、不平等、商业权力集中化等问题，也来自金融体系的监管问题。当前，由西方少数国家主导全球的时代走到了尽头。对于西方来说，直面衰落的心理恐惧易引起政治上的民粹主义；根植于“零和”思维的西方政治与国际关系理论则在应对当前局面时显得更加举 止失措。

而自古以来，中国的政治学说都体现了“正和”的思维模式，以及非意识形态的、实用主义的治理哲学。面对未来，中

国这种“正和”的思维与寻求力量平衡和 谐的思维传统，可能有助于与西方建立合作关系，以应对全人类所面临的深刻挑战。这种选择，可能标志着人类社会在未来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将进入一个新的黄金时代，同时，这也是一个“没有选择的选择”。

讲座最后，诺兰教授与在场同学就如何选择书籍、如何形成批判性思维进行了讨论。他认为，人们需要认真选择书籍，并选择数量有限的书籍进行反复阅读。当

前，很多人放弃阅读传统书籍，转而在微信中浪费时间，诺兰教授对这种现象表示了忧虑。在回答“21 世纪是否是中国的世纪”时，诺兰教授坚决否认了这种说法。他认为，世界是全世界的，不是中国的。正如康有为在《大同书》所谈的那样，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中国的意义在于对世界的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撰稿：包垚含）

65

木村清孝：佛教研究的意义与方法——基于华严思想研究的思考

2017 年 11 月 10 日上午，“北大文研讲座”第六十五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佛教研究的意义与方法——基于华严思想研究的思考”。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日本印度学佛教学会前理事长木村清孝教授主讲，北京大学佛教研究中心主任姚卫群教授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魏道儒教授评议，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张文良教授翻译。本场讲座中，木村教授结合自己在佛教学术道路上的人生经历，从华严思想研究的角度阐述了佛教研究的意义与方法。

一，求学经历与思考

木村教授出生于熊本县天草市的寺院家庭。该市也是日本基督教传播时间最早且较有影响力的地区。幕府镇压基督教之后，为防止其复兴派遣众多法师建立寺院——木村家族便是其中之一。数百年与佛教密切相关的家族历史使得木村教授选择以佛教研究为己业。

小学之时，木村教授从九州搬迁至北海道函馆市。该市于明治维新之前因与俄罗斯关系密切，因而建有著名的教堂，教授便感觉到寺院与基督教之间亦有不可思议的缘分。木村教授认为，少年经历是促使其深入思考世间万象，也是后来主要从哲学层面研究佛教的重要契机。



讲座现场

高中毕业前，木村教授接触到禅宗的思想。“人间禅”是居士佛教团体，居士们精进认真地修行，以获得开悟作为最终目标。日本居士禅不似中国那般具有悠久传统，但日本居士对禅宗的热情心持续至今。当时，受“人间禅”指导人东京教育大学芳贺幸四郎教授的劝导，木村教授前往该校（即筑波大学）学习，并选择了哲学系伦理学专业。选择这个专业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按照日本习惯，长子该继承家业；二是木村教授本人对所继承寺院的社会关系与功能以及对“万物实相”这样玄妙的问题十分感兴趣。

木村教授在学习伦理学之余，广泛阅读了德语哲学原著。出于继承寺院该对佛教及东方文化进行深入了解的考量，木村教授集中阅读大量佛教入门书籍备考东京大学从事佛教研究。东大的导师玉城康四郎教授是日本天台大家，亦是坐禅求道派，兼治华严。木村教授听从恩师的建议，决

定了自己研究的方向，也就是华严研究。

木村教授选择华严宗第二祖智俨的思想研究作为具体题目，原因如下：一、学界缺少对智俨的系统研究；二、对华严宗思想起点感到好奇；三、资料虽少却可准确把握智俨思想。经过几年不懈努力，木村教授对智俨的思想有了初步的了解。

从方法论上讲，木村教授遵循的是思想史方法，即将人物思想放在思想史、社会史等大背景下来考察其起承转合与逻辑演变。他还发现，智俨思想的延展性很强，包括了多重层次且具有较强的立体性——正如其与印度、中国、韩国思想之间的联系那样。木村教授还意识到，应该将中国思想家放在整个东亚大背景下考察才能准确把握其思想实质。之后，木村教授撰写的一系列论文从华严出发，上溯到印度，下延至日韩，在思想关联中展开华严学研究。

二，以华严研究角度阐述佛教研究意义与方法。

第二部分中，木村教授从“佛教”的基本概念谈起。众人常说的“佛教研究”本身就具有极为丰富的内涵。与其他围绕几部原典展开的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等）相比，至唐代，佛教经典的数量已达六千多卷。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曾有人提出批判佛教，意图恢复以佛教原典来考察佛教的实质。但木村教授并不认同此观点，与其让佛教研究回到最初，不如考察其展开的过程与思想演变的历史背景，这也许可以归为综合的文化学（studies of integrated culture）。要考察释迦牟尼佛的思想原貌，我们应该在历史演变中从不同的侧面来趋近其思想。

近年来，佛教研究不仅包括文献学、思想史的维度，还包括宗教学、宗教社会学、宗教美术史、心理学等不同视角。关于使用何种研究方法，则是个人选择问题——但文献学是一切方法的基础。木村教授还认为，单纯的文献学研究是不足的，还需叠加思想史的研究，才更能趋向真实。每个人都应找到自己的方法，并将其做到极致；其他人以不同方法研究，最终形成合力以形成相对全面正确的把握。

木村教授当下的研究方法是其一直以来所坚持的思想史研究方法以及比较的哲学研究方法。相对于西方文化，东方文化从影响力上无法与之相比，属弱势文化。若要彰显东方文化的意义，就需要通过对比使之找到在世界思想文明史上的定位。所以，除了文献研究，此种比较研究方法也是不可或缺的。

每个人在研究过程中，都会发现有意思的问题，之后就会找到有效的方法。比如说，中国佛教史上曾出现一大批被称为“伪经”的典籍。它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普通民众的精神需求。以往来看，真伪价值判断存在重大问题：其判断标准是经录作者认定典籍是在中国成立还是印度成立——印度为真经，中国为伪经。但是，印度这个概念本身弹性很大，古今印度不尽相同，且有很多大乘经典是在西域地区编撰的。这个地方能否称为印度，这也是很大的问题。所以，仅以地域划分真伪具有局限性。在中国、日本成立的许多经典从内容上更符合佛教教义与释迦牟尼的思想，却被视为伪经排除，这就不能正确认识思想发展的历史。木村教授回忆起自己写博士论文时就曾提及，伪经在某些方面恰恰反映了释迦牟尼佛的思想实质，我们需要给予学术关照。因此，要考察《华严经》思想，就不能将伪经完全排除掉。

接下来，木村教授讲述了华严研究的意义。思想是“活”的思想，而“活”包括思想本身的发展过程、为活着的人展开这两个方面的含义。考察思想之时，不能将其视为抽象的教条，而应该与具体社会背景及思想展开结合。木村教授深切感受到华严思想至少拥有两方面的现实意义：其一，让我们的心灵更丰富深刻；其二，启发人对世界宇宙人生的实相之了解。人们通常在区别出自他、善恶等基础上进行思考，而华严从圆融的角度出发，将宇宙及个人看成相互关联的整体。这种思考方式是华严思想中非常宝贵的思想资源。

现在的科学研究已证明，每个人都是



木村清孝教授

宇宙的凝缩、宇宙全息的点，华严采用直观的方式方法，描述了与科学研究类似的内容。若从此原则出发再思考人的价值与尊严等伦理学、哲学的问题，可带来一个全新的视角。在考察现代世界共有的核心理念“和谐”、“宽容”之时，华严思想可以提供某些理论支撑及思想资源。

三，评议环节

姚卫群教授指出，木村教授以深入浅出的语言讲述了佛教研究路径、学术研究起始及方法论等重要议题，自己深受启发、收益良多。

魏道儒教授则谈及三点心得体会。第一，中国学术界起步阶段的前辈已受到了日本学界的影响；上世纪中期产生了几十年的学术断层，改革开放后，学术迈上正轨。在佛教研究方面，来自日本学者的影响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木村教授的学术影响在日本学者中非常突出显著。不仅于学术著作，更在中国留学生培养上做出重要贡献。

第二，木村教授讲述了自己的人生成长历程、学术成长历程及精神完善历程，并将学术研究与人格完善结合起来。故此，本次演讲比单纯的讲述学术问题、书籍、人物等更有意义。阅读书籍只能看到一个“平面”的木村教授，但是今天，我们能够感受到的是立体的、能动的木村教授。此外，我们还能深刻体会其学术成就与学术观点的由来——来自于何处，又扎根于何处。“大道无门，千差有路”，木村教授不仅可以启迪我们获得学术成就，可启迪我们获得圆满的人生。而这些，都显示出了其在选择学术道路之时表现出的尊师重教与对真理的孜孜追求。

第三，每个人天赋不同，后天条件亦有差异，最后取得的成果一定会千差万别。但是，在追求人生、学术的完美方面，一定会有相似之处，正如刚才木村教授讲述的华严的学说价值。

随后，魏道儒教授还提出了三点研究佛教需要注意的地方。

第一，佛教是人类历史上出现的社会现象。在研究历史悠长、影响极大的社会现象之时，与研究其他宗教、人文社科、乃至数物化都非常相似，即从已知推求未知。研究客观社会现象，开始即要认识到这是一条求真之路，寻找其规律与认识其本来面目。

第二，与其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相比，佛教具有其自身特点。我们所研究的是会发挥巨大社会功能的宗教现象，其中定会蕴含伦理色彩，需要做出正误、善恶的判断。因此，我们的研究应该是追求善的过程。

第三，我们的研究是要有利于社会、

他人，需要尽己所能将研究成果以最优美的形式呈现。

综上所述，佛教研究应是一个追求真善美的过程。纵使历程艰辛，需要学习多种语言、掌握多种方法、熟悉各国哲学等等，但若将学术视为追求真善美的过程，即使

面带疲惫之色、劳倦之容，但定会有一种勃勃朝气来面对困难。

（撰稿：闫磊）

66

范德康： 时间之魔轮与佛之涅槃

2017年11月12日晚，“北大文研讲座”第六十六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2报告厅举行，主题为“时间之魔轮与佛之涅槃”（The Magic Wheel Of Time and the Search for the Date of the Buddha's Nirvana）。美国哈佛大学西藏与喜马拉雅研究教授范德康（Leonard W. J. van der Kuijp）主讲，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王邦维教授主持，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沈卫荣教授评议。

范德康教授首先指出，对于佛教而言，一切皆为无常，佛法本身亦不例外。佛教



范德康教授（左）主讲，王邦维教授（右）主持

与印度其他宗教一样认为世界最终会“坏灭”（pralaya），而其教法的毁灭即名为“末法”（saddharmavipralopa）。二者都是以佛陀的涅槃日来推算的，但是对于具体的年份，佛教内部持不同意见。范德康教



现场听众

授先后列举了寂护（Śāntarakṣita）、莲花戒（Kamalaśīla）、阿底峡（Atiśa）对于佛陀涅槃日和末法时间的说法。

随后，范德康教授通过引述大量相关藏文文献，系统介绍了西藏本土对佛涅槃日的不同观点。首先，他列举了以廓译师·循努贝（'Gos Lo tsā ba gZhon nu dpal）所著《历算除谬》（*rTsis la 'khrul pa sel ba*）、《寻求历算树之根》（*rTsis kyi ljon pa'i rtsa ba tshol ba*）以及朗杰扎桑（rNam rgyal grags bzang）、白莲花（Puṇḍrīka）等人著作所代表的不同传统，继而以《时轮》的历算传统为核心加以探讨，并着重介绍了扎普巴·伦珠嘉措（Grwa phug pa Lhun grub rgya mtsho）、索南孜摩（bSod nam rtse mo）、萨迦班智达（Sa skya Paṇḍita）、达玛坚赞（Dar ma rgyal mtshan）依据《时轮》而对佛涅槃日所进行的不同推算。

对于这些分歧产生的原因，范德康教

授将关注点引向了《时轮》的文本本身。他介绍了《时轮》的核心文本，包括佛陀为月贤王（Sucandra）宣说的《时轮本续》（*Kā lacakram ū latantra*）、白莲花所造释论《无垢光》（*Vimalaprabhā*）以及具种王妙吉祥称（Yaśas）所集《时轮略续》（*Laghukā lacakratāntra*）。依据廓译师的说法，《时轮略续》共有二十个不同译本，分别出自包括吉觉译师（Gyi jo Lo tsā ba）在内的二十位译师之手。

《时轮》译本多，源于其文本本身的复杂难懂。《时轮》的历法以六十年为一轮，与中国古代以六十年为一甲子的历法相类。该历法可能起源于中亚，根据木星围绕太阳公转的周期而定的。中原的历法很早就传到了西藏，在敦煌文本中即有 *me mo yos*（阴火兔年）这样的写法，此类历法被称为汉藏历法体系。除此之外，西藏也流行印藏历法体系。其原因在于翻译成藏文的梵、汉文本中使用了不同的历法。《时轮》中，六十年中的每一年都被赋予了不同的名字，第一年即佛陀入母胎之时。由于该续典在藏土历经多次翻译，因此这六十年的名字有不同的译法。

此外，印度存在两种以六十年为一轮周期的历法，分别流行于北印度和南印度，二者之间存在两年的“时差”。通过对比分析，范德康教授指出，《时轮》所依据的是北印度的传统。汉土传统的历法元年比《时轮》体系的元年晚三年，这种差异也给藏土学者带来不小的困惑。

范德康教授总结道，《时轮》续文的晦涩艰深是造成译本丛生、术语不统一的重要原因。而更重要的是，其中有关历法

的第一品本身就有残缺，这使得其提供的历法体系并不完整，并最终导致了后世藏土学者在该文本基础上，难以就佛陀的涅槃时间给出一致的推算结果。

评议环节，沈卫荣教授点明了范德康教授在藏学研究上的治学特点。在此，沈教授援引美国著名藏学家小唐纳德·S·洛佩兹（Donald S. Lopez Jr.）的话，即历史学家不懂佛教，佛学家不在乎历史。而范德康教授既懂佛教，又在乎历史，是个例外——其研究可靠精深，对非专业人士而言也就格外难懂。

接下来，沈教授对讲座中涉及的重点问题作了相应的补充和解说。他表示，本次讲座的前半部分讨论的是佛灭的年代问题，但涉及的内容可以说是一部西藏的佛教思想史。这部分不仅介绍了赤松德赞、寂护和莲花戒等人对佛灭时间问题的看法，还介绍了西藏历史上众多经典作家（廓诺·迅鲁伯、布敦、萨班等）对此问题所进行的详细讨论。《时轮本续》的不完整，导致有关佛灭年代问题最后并无定说。加

之印度佛教本身对于历史年代问题就不予以重视，使得这样的讨论与西藏佛教发展本身的历史相关联。

随后，沈教授对该讲座的后半部分进行了评述。他首先介绍道，《时轮》是无上瑜伽部的一部根本续，高于“父续”、“母续”之上的“无二续”，因而在藏传佛教里非常重要。如范德康教授所述，《时轮本续》译本众多，遗留下的问题很多。因此，人们需要做更多、更精细的文本研究才能对其所传义理做出可靠的诠释。在此，沈教授再次强调，范德康教授对于藏文佛教文献的了解深入度几乎无人可敌，所以，他的讲座及其为数众多的长篇小说总是能给观者提供新的、有启发意义的信息。

最后，在主持人王邦维教授的组织下，现场听众就讲座的相关内容积极提问，范德康教授详细而深入地予以解答。

（撰稿：索朗卓玛）

67

沈卫荣： 语文学、东方主义和未来语文学

2017年11月16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六十七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

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语文学、东方主义和未来语文学”。清华大学人文社会

科学高等研究所教授沈卫荣主讲，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陆建德主持，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出席并参与讨论。

首先，沈卫荣教授介绍了语文学的发展现状。从历史脉络上看，“philology（语文学）”传统悠久，是与“philosophy（对智慧与思辨的热爱）”相对应的概念。它起源于古典时代对《圣经》等宗教文本的解读，本意为对言语和学问的热爱。萨义德就曾指出，东方世界的语文学传统要早于西方。

随后，沈卫荣教授对语文学在近现代的发展情况进行了回顾。他认为，近代一切人文学科以及部分社会学科溯其源头，都可归结为语文学。从现代人文科学形成以来，语文学便打破了神学、经学的霸权。詹姆斯·特纳（James Turner）在《语文学：现代人文主义学科的被遗忘源头》一书中提到，哲学家与思想家由解释上帝、阐发自己的思想逐渐转向哲学思想史家的工作。这就是要求把学术研究建立在科学和文本研究的基础上，如收集《圣经》的各种版本并进行编辑对照、分析思想的起源和发展等。从这个角度看，语文学是现代人文科学的来源与基础，是“一切精神科学之王”。现代的学术研究是解释的学问，而不是神祇、先知的学问。

与东方学相关的“东方文本语文学”涵盖了汉学、中亚学、佛学等范畴，其基本方法为对各种文本进行收集、校对和阐发。以“世界第一号汉学家”伯希和为例，作为中亚语文学教授，他擅长辨读汉文献中出现的非汉文词汇，并借由音译的撰写规则解读文本。西方早期的东方学研究都



沈卫荣教授

是文本语言的研究。由此，沈卫荣教授进一步区分了语文学家和语言学家的定位与功能。

但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语文学急剧衰落。沈卫荣教授对这一现象发生的原因进行了分类。首先，学科分类的精致化使它们各自形成一套规范，语文学被当作相对于语言学的“他者”构建起来；文学研究愈发人文化、理论化，对社会、道德与历史现实关注得更深，并将同样具有实证性质的语文学视作可崇拜的“他者”。其次是意识形态对语文学家的影响。语文学家一度犯下反犹太主义等“历史错误”，在否定希伯来语学术精英地位的同时相对提升印欧语系的地位，并创造了雅利安人种的概念。在萨义德东方主义兴起之后，语文学原有的精英地位受到了冲击。此外，学术化、理论化的趋势也使语文学家备受攻讦。七十年代后，语文学被视为迂腐保守的学问，几乎从大的学科领域中消失。

在这样的局势下，保罗·德曼（Paul de Man）等“当红理论家”开始呼吁让语

文学回归。沈卫荣教授在此援引这位文艺理论家与耶鲁结构学派代表人物的论断：

“转向理论即是对语文学的回归”。保罗认为，文学的精髓在于对文本语言结构进行分析，它关心的是文本的意义被传达的方式，而非探究文本在历史和人类经验等一般语境中的意义。萨义德则认为，文学批评充满了不着边际的大话或行话，文学研究失去了明确主题和发展方向，而失焦的原因是职业训练中语文学的衰落和缺失；只有悔罪式地回归语文学，文学研究方可获得新的整合，以归正道。沈卫荣教授认为，萨义德“为古董学科高调背书”的重点在于如何在研究中与作者保持距离。这些不同的意见引起了学界的争议和迷茫。

随后，沈卫荣教授回顾了自己对萨义德东方主义理论的几点体会。首先，他肯定了这套理论作为“批判武器”所发挥的作用：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前半叶，欧洲语文学的学术选题和成果与意识形态紧密相关，服务于西方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到了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后殖民时代，在“东方主义”的“清算”下，语文学本身严格的学术性乃至以其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东方学研究受到了严重质疑。学界开始意识到，伯希和等理论家的研究成果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诸多东方研究由此被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其理论和道德均受到严重质疑。但沈卫荣教授同时提出，若轻率地作出这一时期西方学术成果没有价值的判断会导致研究本身无意义，由此一来会对学科构成重大打击。唐纳德·洛佩兹（Donald Lopez）曾表示，西方构建的藏传佛教并非真正的藏传佛教，

其与西方意识形态有关。后人由此对萨义德提出疑问：如果非西方的知识被殖民化，那么学习这些知识是否还有意义？而至于萨义德，曾一度怀疑是否存在“真实的东方”，并在晚年提出了“重回语文学”的论调，算是部分肯定了西方学界中东方研究的价值。

沈卫荣教授介绍道，除了萨义德，另有一批学者也在号召语文学的复兴。美国学者波洛克（Pollock）发表系列文章，组织部分学者一起努力，尝试着让语文学重回世界人文学术中心。他们强调语文学的重要性，并认为“语文学是一种普世形式的知识，而非一种伪装成普世知识的特殊主义的或者是一种区域性的知识”。“未来语文学”的理想形态是成为二十一世纪世界性大学里具有独立学科地位的显学。沈卫荣教授在对“未来语文学”的框架设计进行归纳后指出，语文学针对所有的文本，以解读和诠释为目的，并建设为一个具有独立自主性的学术家园。有别于传统语文学，未来语文学的重点在于历史主义、传统主义和当代主义这三个维度。

随后，沈卫荣教授援引理论家杰弗里·高特·哈芬（Geoffrey Galt Harpham）提出的新问题：萨义德所期望的回归所指向的是“哪一个语文学”？虽曾一度消亡，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语文学却依旧存在。文学研究的不确定性导致学者对具有科学实证性的语文学保有崇敬之态，但语文学并不能拯救或取代偏离轨道的文学研究。

接下来，沈卫荣教授回顾了理论家对“未来语文学”与“重回语文学”言论的

批判，并质疑了萨义德等人利用东方主义清算德国语文学等行为的政治性意图。而部分理论家则认为，西方种族优越论、反犹思想与古印度文明研究的卓越成果并存，不能因其政治意涵就完全否认学术成就。语文学并不仅指东方的语文学范畴，西方的宗教与文学研究同样沿袭了语文学的方法。若它未曾衰落，“重回语文学”也就缺少前提。

在“未来语文学”和“语文学的未来”二者的区分问题上，沈卫荣教授进行了语文学意义上的详尽分析。他指出，德国学界自身也存在定义模糊与误解的问题。尼采曾被讽刺为“未来语文学家”，他对待语文学也产生了从轻蔑到赞颂的变化。

讲座最后，沈卫荣教授充分肯定了回归语文学的重要性。语文学并非只是研究文本意义传达方式的学科，同时也是要求理解文本意义的学科。研究者需要回到正确阅读、解释文本的基础上。换言之，离开了基本实践的语文学是没有意义的。

随后，陆建德老师发言。他表示，语文学不仅要求语言的知识，还是一门比较的学科。东方学对复活逝去的文化以及整个人类的文化记忆有着重大意义，但我们需要防止过度简单阅读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也要避免直接将其理解为对西方的否定和驳斥，更要避免超越历史进程的本质主义误区。

交流环节，林晓光副教授谈道，目前从事上古、中古研究的年轻学者存在回归文本学的迹象。语文学在等级层面跨度较大，而高层次的语文学又存在普及问题；但若仅从基础层面观望，其难度将会显著

下降。从学科设置角度看，我们可否认为语文学自始至终都属于显学，或存在成为显学的可能？对此，沈卫荣教授表示，学界目前对语文学的定位依然存在问题。语文学要求的是对文本本身进行研究，并领会文本的意义。它不仅是一种学术方法，也是一种生活哲学。东方主义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不仅是东方的产物，也与西方相关。在解构西方对东方的解释时，需要避免对东方自身进行解构。

同时，渠敬东教授也分享了自己研究思想史的体会。他认为，语文学沿着实证路线达到高峰是合理的。在对文本的重要程度进行鉴别和排序时，思想史传承的位置、现代人自身的观感和对生活的理解都不能偏废。但现在的问题是：学科在分化时，人们容易遗忘最基础的文本。语文学的首要意义是朴实地思考，并知晓自身理解的界限。语文学的本质应当是思想性而非技术性的。研究者需要避免本质性的判断，越是秉持“原教旨主义”，文明的包容性和转化性越差。对此，沈卫荣教授表示，语文学不完全是技术性的，语文学家应解决的关键问题是思想问题。

（撰稿：陈洁樱）



68

金鹏程： 何谓早期中国的历史

2017年11月21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六十八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何谓早期中国的历史”。宾夕法尼亚大学金鹏程教授（Paul R. Goldin）主讲，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陆扬主持。

金鹏程教授主编的《劳特利奇早期中国历史手册》（*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Early Chinese History*）一书将于明年出版。导言部分，他根据自己的研究回答了“何谓早期中国的历史”这一问题。基于这篇导言的内容，金鹏程教授在本场讲座中分别解释了三个含义复杂的关键词，即“早期”（early）、“中国的”（Chinese）与“历史”（History）。

“早期”是最容易解释的。传统的理论认为，这一时期随着东汉的衰落而结束，标志性时间就是公元220年曹丕自立为帝。在社会经济、政治、思想等方面，东汉末年同样是一个时间节点。这之后的六朝时期，社会动荡、政治分裂、佛教和道教盛行，和此前的光景大不相同。但是，很难说清“早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因为在这时，就连“中国”的含义还不明晰。北京人、元谋人在中国境内留下的遗存可以追溯到很久之前，但并不能将它们视作中国文化的开端，况且今天的中国人也不一定是这些种群的直系后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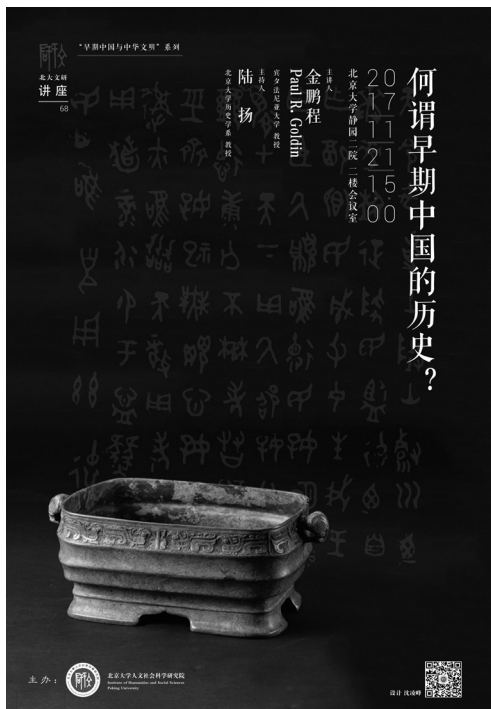
《手册》一书中的早期中国历史是从



金鹏程教授

新石器时代写起的，并建构了一个“新石器时代的中国”（Neolithic China）概念。尽管新石器时代的人所使用的语言不一定是汉语的远古形式，且他们在种族及文化意义上都还不是中国人。但是，新石器时代的中国可以指代出当今中国疆域内出现过的多个复杂的文化现象，这些文化现象通过互动产生了汉语书面语及传统中华文明的其他特征。可以说，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含义远远超过时间概念本身。

若要解释什么是“中国”（或“中国的”）则稍显困难。“中国”（China）这个词可能起源于“秦”。秦国曾统治过中国西部，中亚和南亚的旅客在进入中国时首先来到这里，所以“秦”也就成为这些外国人对中国的称呼。这个称呼沿用到秦朝灭亡以



后。可以看出，“China”的第一个音节读起来就像“秦”。汉语里的“中国”是中国人对自己所在地的称呼，字面意思是位于中央的国家。在古代，“中国”指的是多个国家，也就是中国人在黄河下游河谷控制的地区，靠近王室所在的落地。然而，它更多的是一个文化概念，而非地理概念。在《左传》中，“中国”和蛮族（barbarians）相对，区分蛮族的标准不是他们的民族特征，而是因为他们未开化的行为。相应的，“中国人”就是品德高尚、行为端正的人。

那么，“中国”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一些中国学者认为，这个词最早在何尊的铭文中出现。何尊在周成王在位期间（公元前1042至1021年）铸成，所以中国的概念也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但是，金鹏

程教授介绍了另一种观点。他认为，用来表达“位于中央的国家”含义的词，在青铜时代的文献里可能写作“中邦”。到了汉朝，出于避讳的需要（避讳汉高祖刘邦讳），它们才全部被改写成“中国”。因此，在古文中常有“邦风”、“邦家”的写法。“国”字本身指的是城堡（citadel），在古文中与“野”相对；“国人”则是“首都的居民”，而非“国家的国民”。此外，“国”也有区域的意思。但无论是两种含义中的哪一种，“中国”都只是一个狭义的地理区域，而不是王国或者文化意义上的中国。

正如《左传》所体现的，“中国人”或者“中国的”则是一个文化概念，而非地理概念。中国人对自己的称呼往往带有美好的寓意，例如“华”、“夏”二字（在语音上类似于“雅”）。中国人区分出“夷夏”，就是要说明蛮族具有破坏性，而中国人则是优雅有秩序的。“华夏”最重要的特征是能够诵读、书写古代汉语。公元前五世纪，汉语成为了中国唯一的书面语言。从此，中国的文化、历史、民族认同都和汉语结合在一起。在中国，文明的另一个重要的准则是礼。中国古代思想家重视礼之于中国的意义，何休就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者，仪礼之国也”。今天，各大博物馆展出的礼器也证明典礼仪式内涵丰富，但是，我们对它们的了解还太少。

伴随着文化特征的确立，“中国人”的地理特征建立起来了。中华文明总是和华北地区腹地（也就是中原地区）联系在一起，所以，才在空间上出现了“中国”的划分。中国，指的是位于整个世界中央的领土，而非人们按照他们应该达到的行

为准则行事的地区。强调人们的生活地区与生活方式之间联系密切是一种地理决定论的观念，而这种观念在中原人和草原游牧民族的交往中加强了。金鹏程教授认为，一些中国文人由此对于人的天性提出了严苛的划分：上天创造的人类本就是互不相同的，而认为所有人都能文明开化是一件愚蠢的事。

早期中国一直处于中国身份的形成、建构和反复协调的进程中。但是中国文明仍然有七个延续的基本的特征，它们分别是：一，崇拜祖先、尊重长者；二，汉语书面语为通用语；三，相信中国文化的优越性并以此同化外族；四，缺少本土的民主传统；五，偏好教化（而非军事）进行统治；六，容许帝国之下的宗教自治权威和宗教多样性；七，精英阶层的一夫多妻制加剧了性别比例失衡，产生大量男性未婚人口。

至于“历史”，最初在汉语中并不存在，因此在早期中国的语境下充满争议和质疑。与现代语境中“历史”含义最相近的词是“史”，最初指记录历史的官员，但又不限于此。东汉时期，“史”可以代指影响力巨大的历史学者，他们真实地记录国家事务，而这点对于公正地评判统治者、从过去学习经验至关重要。

但是，“真实地”又是什么呢？《左传》里记载的董狐和崔杼的故事，说明为了弘扬道德上的真实可以牺牲事实上的真相。赵盾的族弟弑君，赵盾没有尽到保护君主和讨伐弑君者的义务，董狐就以此记下“赵盾弑其君”；崔杼没有亲手杀死齐庄公，但是设计了杀死齐庄公的圈套，由此史官

记下“崔杼弑其君”。孔子也会为了教育读者而留下一些与事实不符的历史记录。现代学者认为，这些做法都是为了指导政治家。而这样做也给现代人带来了麻烦：在阅读历史记载时，我们无法判断哪些事情是历史学家亲眼看到的，哪些又是他们在心中编造的。

更复杂的一点是，《左传》中的这两个故事可以被看作元史学（meta-historiography），也就是历史学家记载历史学家如何书写历史的问题。因此，我们要对以下问题进行思考，即董狐等历史学家为什么被选用来记录这样一场混乱的刺杀事件？历史学家们又以怎样的方式为后代呈现这个可以提供指导的事件？

对此，金鹏程教授表示，在早期中国的历史文献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文辞上的模仿，而非事实的记录。前现代读者对这种做法比我们更熟悉。但在二十世纪以来，人们可以用考古发掘的成就来补充事实的部分。这些新发掘的成果中，不仅有此前未知的文献更有已知文献的未知版本，以及有关居住、社会组织、工艺、贸易等不可或缺的实物证据。安阳的发掘成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证明了商朝的存在，还使上千块甲骨重见天日。但在一些领域，我们仍然缺少足够的材料。例如，甲骨文记载了王室宗教、占卜过程、宇宙观念等方面的细节，却几乎没有普通人的生活记录。我们可以接触到的历史资料越来越多，但其中大多数仍只反映上层精英的生活。

（撰稿：刘小雨）

69

黄克武：由圣人凡 以人胜天 ——《天演论》与近代中国知识转型

2017年11月27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六十九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由圣人凡 以人胜天——《天演论》与近代中国知识转型”。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特聘研究员黄克武博士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欧阳哲生教授主持。



黄克武研究员

黄克武博士首先指出，“由圣人凡，以人胜天”的转变是了解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把钥匙。“由圣人凡”指的是人和宇宙关系的变化，体现了近代中国思想的巨大转折，这种变化渗透并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简单来说，近代化进程就是祛媚化的过程——从愚昧、崇神的世界到科学、无神的世界。最为直接的表现是宇宙观的变化，即宇宙从人类价值的神圣源头变为客观凡俗的存在。中国传统以经学为基础，以阴阳五行根据，加之儒家“天生德于予”的观念，人们认为天和德之间存在直接联系，而“德”是其联系的基础与纽带。这样的宇宙观则在近代变为科学的、无神论的宇宙观。与此同时，历史观、时间观、群己观、地理观与政权合法性基础也随之剧烈变动。经此一变，中国踏上了广

义上的现代化的历程，其核心概念就是“以人胜天”——人们相信通过人为的努力可以彻底改造世界。

接下来，黄克武博士谈及近代中国的几大转变。其一，从“天下”到“国家”，由神圣到凡俗的宇宙观的变化是其关键。中国由文明中心转变为万国之一，华夷秩序被消解。黄克武博士引入许纪霖教授的观点，强调从文明和文化的分离中看近代中国的转变，即在华夷秩序之下，文明和文化结合在一起，而当“天下”转移为“国家”后，中国文明不再是一种普遍性的存在，只有中国文化继续保持其地位。其二，从传统史观到线性进化史观。传统中国流行的历史观有三：一为三代历史观，即认为夏商周三代是黄金

时代，并将人类的理想放在遥远的古代；二为历史循环论，即认为历史是“一治一乱”的过程；三为《公羊》“三世说”，即认为人类社会是沿着“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进行演化的。但迈入近代以来，随着严复翻译《天演论》开始出现线性进化史观。其三，从“天人合一”到“人定胜天”，这种人能征服和改造宇宙的信念正是由严复译介《天演论》和达尔文主义的传入所带来的。其四，政治合法性的转变。从传统中国的王权依天命而治，到近代以来崇尚人民主权、依赖公理与公例而治。其五，从经学知识到科学知识。黄克武博士强调，这里的“知识”不仅仅指知识的内容，而是“knowledge”（justified true belief），即合法的、可以证验的信仰。近代以来，从经学到科学的转变见证的就是这种“知识”的转型，其结果是新兴学科的出现，以及从传统的“四部”（经、史、子、集）到“七科”（文、理、法、农、工、商、医）的学科分类变化。

黄克武博士认为，上述重大改变的原因，可以从西方科学的传入来着手考察。科学的传入亦是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国传统的视域影响了我们对西方科学的吸纳，在受到巨大冲击的同时，中国人以自己的独特方式诠释这些科学，而《天演论》的译介就是最佳例子。黄克武博士指出，《天演论》传入中国后所造成的重大影响及中国人参与缔造“后严复”时期凡俗世界的方式关乎着中国现代处境的形成。这些问题又连带着知识的转型问题，而问题的核心产生于历史学、社会学、宗教学与迷信学等领域。这几个领域在共同思索着“什么是科学，什么不是科学”，由此，科学范畴的犹疑性在知识建构的过程中

出现。

对于西方而言，与科学发展相伴的是世俗世界的形成。黄克武博士在此特别提到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的《世俗时代》（*A Secular Age*）一书，该书主要讲述从公元五百年到两千年，西方世界如何从完全的有神论到将无神论视为一种选择的过程。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曾敏锐地指出，随着科学地位的提升和世俗世界的出现，道德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兴起，西方社会面临着无神或没有其他取代神的伦理原则出现的境况，由此一来，人类有可能会陷入“戡天役物”、“天下无不可为之事”的危险。黄克武博士表示，自由的范围与人类的界限开始模糊，怀疑主义引发的“道德相对论”成为西方俗世化的核心命题，这些也是从“由圣人凡”产生的。黄克武博士引入查尔斯·泰勒的“大脱嵌”（the great disembedding）说法，“传统社会的现实世界与意义世界镶嵌在宇宙、自然、社会的系列框架之中……（而至于）个人的行动和生活的意义，只有置于这样的框架之中才能得到理解并获得价值的正当性。”这里的“正当性”来自世俗化之前（即“大脱嵌”之前）的那个神学的、伦理的世界。近代以来，人类社会经历了从这个框架中脱离出来的过程。

黄克武博士介绍道，许纪霖教授运用查尔斯·泰勒的理论得出“中国从清末开始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的结论。“自我摆脱了家国天下的共同体框架，成为独立的个人”，“传统家国天下的秩序经过重整，以去中心去等级的方式而建立具有普世价值、和而不同的新天下主义”，而这个世界就是一个环

绕着个人的价值理想与实践的现代世界。黄克武博士认为，“大脱嵌”的动力是西方宇宙观的改变。自哥白尼天文学理论与牛顿万有引力定律的出现，现代宇宙观的权威逐渐建立，并与宗教权威发生冲突。而 18 世纪后进化观念的出现逐渐取代了《圣经》“创世纪”的说法，认为生命的起源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人类与其他生物一样从低等动物逐渐变化而来。19 世纪中叶，达尔文的《物种原始》一书又提出演化史观，强调“适者生存，自然淘汰”，并演变为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将达尔文的理论用来说明人类社会的发展。

清末，这一宇宙观与历史观由严复引介至中国，由他翻译的赫胥黎《天演论》在近代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有趣的是，严复并没有直接译介达尔文，而是翻译了很多斯宾塞的作品，并选择了赫胥黎的《进化与伦理》（*Evolution and Ethics*）。黄克武博士认为，“伦理”无疑是吸引严复译介此书的字眼——演化过程中伦理的角色与价值为何是严复毕生思索的议题。该理论在传入中国后发生了变化：中国人在学习西方理论的同时带有自己的选择性偏倚。达尔文的理论偏重于西方生物学因而难度较高，严复选择赫胥黎的《进化与伦理》并将其翻译为“天演论”——这些都是选择性策略。黄克武博士讲道，严复在翻译《天演论》时引用了很多中国古典的句子，甚至将荀子等历史人物都搬上了这本书。这些明显在原书中不可能出现的字句和人物后由桐城派大师吴汝纶删去，但由此可见，以中国之观念来译介的痕迹依然明显。

黄克武博士特别强调，赫胥黎原书中的伦理原则才是严复所重点思索的。严复肯定

伦理原则，反对优生学，强调“损己益群”，并认为“人治可以对抗天行”，最终得出了“自强保种”的结论。同时，不同于丛林法则的“弱肉强食”，人类社会以伦理为原则为基础，要“以物不竞为的”。严复刻意对社会达尔文主义进行稀释，并保留伦理的可能。《天演论》之外，严复还译介了其他思想观念，主要有有以下四个范畴：以天演论为中心的新宇宙观、自由主义政治学说、资本主义经济学说及以逻辑为基础的哲学思想。

可以看出，严复的《天演论》和有着“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是联系在一起的。这在国际关系上体现为反殖民主义和弱肉强食，提出公理公例，“有权而不以侮人，有力而不以夺人”。胡适在 1914 年 7 月 28 日的日记中曾藉美国以工程技术凿制筑桥之事写道“以人事之仁，补天行之不仁，不亦休乎！不亦仁乎！”由此可见，严复把“人治”和“人择”看成伦理性的“补天之不仁”的过程，而胡适所谓“以人道主义对抗强权主义”，以“人择”对抗“天择”，这些都是中国特色的“天演论”。孙宝瑄读《天演论》，认为“要在以人胜天”等观点保留了伦理的价值和信念。这点可与日本“天演论”思想的传播过程形成对比，加藤弘之等人大谈优生学与进化论，强调社会达尔文主义，完全不重视伦理价值的面向。

近代中国由严复翻译《天演论》而引发“由圣入凡，以人胜天”的社会变迁是否也属于西方的俗世化进程？而西方的俗世化是否为普遍的历史进程？黄克武博士介绍道，按照余英时教授的说法，“内在超越的中国文化由于没有把价值之源加以实质化、形式化，因此也没有西方由上帝观念而衍生出来

的一套精神负担”。中国的超越世界与现实世界并非泾渭分明，而是不即不离。因此，进化论对中国的影响并不如西方那么强烈。况且，中国儒家本就是现世主义的，有着鲜明的俗世化倾向，西方近代从“超越”到“内涵”的俗世化过程不适合来理解近代儒家思想的转变。

《天演论》的出现使得具有伦理价值的宇宙观发生改变，随之发生的是群己观念的重整。一方面，它切断了和传统的天的关联；另一方面，则发现了个人与社会。发现个人即个性自由解放，严复强调即使拥有个人自由也不可忘群体福祉。中国传统文化中其实并没有“社会”的观念，严复在翻译《群学肄言》与《社会通论》时将现代的“社会”观念引入中国并在五四时成为核心概念。随着群己关系的重整，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有了新发展，取代了宗教的地位。在历史学、社会学与政治学之外广泛讨论最多的则是灵学与超心理学。灵学即心灵学，及对心灵感通、催眠术、妖怪与鬼物等进行研究。灵学的发展一方面与中国的宗教传统有关，另一方面又与以新的科学方式研究内在心灵和死

后世界有关。科学观念的传入引发了将科学与宗教、迷信加以区隔的趋势，于是，探讨科学边缘的学问也开始出现，而宗教学与迷信学就是其中的代表。科学作为一种知识范畴，从西方经由日本传译到中国一直是多元的、模糊的、游移的过程，并与宗教、经济、哲学、医疗和占卜等活动交织互动。

讲座最后，黄克武博士总结道，《天演论》的传入带来了新的宇宙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它带来的实际上是知识的重整。中国对西方科学的译介本身就带有传统的视野，最具特色的便是严复直接翻译为“天演论”。因为他认为，伦理（Ethics）本身就在进化(Evolution)之中。本次讲座所探讨的，一方面是《天演论》对中国思想界的震动，另一方面则关注新科学观念的建立及思想观念、知识结构与新兴学科的换代更新。随后，黄克武博士、欧阳哲生教授与在座师生就严复对伦理的看法、社会达尔文主义与中国基督教的内部调整等问题展开了深入交流与探讨。

（撰稿：陆敏秋）

70

赵敦华： 根本恶 伪善 平庸恶

2017 年 11 月 28 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七十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根本恶 伪善 平庸恶”。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赵敦

华主讲，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黄裕生主持并作评议。

“根本恶”即康德提出的心灵的恶劣与败坏，“伪善”即黑格尔提出的坏良心对善恶的曲解，“平庸恶”则是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讨论的法西斯之恶。本次讲座，赵敦华教授将联系康德和黑格尔对阿伦特的“平庸之恶”进行全面的解释。

首先，赵敦华教授介绍了这三种“恶”所涉及的哲学史背景——传统哲学和后奥斯维辛哲学。赵敦华教授指出，传统哲学总是指向“如何过善的生活”，但哲学家们总是不可避免地讨论恶。在古希腊，苏格拉底说“无知即罪恶”，即人们作恶只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在中世纪，奥古斯丁把恶归于“缺乏因”，一切存在皆为上帝所造，而全善的上帝不可能创造出恶的东西，因此恶不可能“存在”；到了近代，笛卡尔将人类犯错归因于心灵的某种缺陷——人的意志超出理智范围后无法对分辨不明的对象进行明晰的判断，于是错误就产生了，而按照错误的判断去行动就会产生恶；之后的莱布尼兹认为恶的存在是为了彰显整体上永恒的善，换言之，恶仍然是附属于善的目的的。

可以看出，在传统哲学中，恶总被哲学家们当作处于某种“缺乏”的状态，恶本身不能独立存在。但在奥斯维辛（二战）之后，哲学上的讨论不得不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奥斯维辛以无数犹太人的鲜血向人们宣告，上帝既不在乎人类也不在现实中起任何作用，相反的，现实的、主动的恶在我们的世界大行其道。奥斯维辛向人类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如果上帝不是现实的存在，恶是现实的存在，那么在面对这个充满恶的世界时，



赵敦华教授

人生还有什么价值？以善为目的的哲学又有什么价值？对于这个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给出了一种可能的答案：“如果上帝不存在，人就可以做任何事情。”萨特进一步解释了这句话，他指出，如果上帝不存在，人类就再没有任何借口自欺，必须为自己的每一个选择（无论后果是善是恶）负绝对的责任。但是，萨特的解释并未能解决奥斯维辛之恶背后更可怕的问题：如果恶是自觉的、主动的，而不像传统哲学所设想的那样存在某种过失或缺乏，我们还能给恶人定罪么？这也是汉娜·阿伦特在纽伦堡法庭上面对战犯时必须回答的问题。阿伦特在回答时引用了康德的“根本恶”和黑格尔的“伪善”来说明自己的“平庸之恶”。因此，为了理解阿伦特的回答，我们必须先回到康德和黑格尔那里，去看这两位处于传统哲学向后奥斯维辛哲学转折之关键时刻的大哲学家是如何思考这个问题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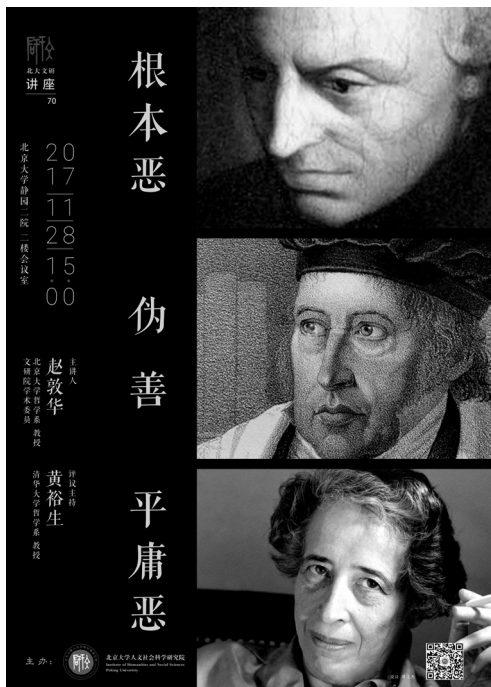
接下来，赵敦华教授开始解释康德的“根本恶”。他认为，康德在两个层次上讨论人的道德。在《实践理性批判》和《道德形而

上学奠基》中，康德讨论的是抽象的、作为理性存在者的人。人的善良意志是摆脱了一切经验束缚的实践理性，人们应当遵守的道德律令则以绝对命令（直言命令）的形式呈现。而在《纯粹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中，康德则在经验世界讨论人的道德问题，他从人性论出发，指出人既有“善的原初禀赋”又有“趋恶的倾向”。这里所说的“趋恶的倾向”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人心的软弱、人心的不纯正、人心的恶劣和败坏。“败坏”就是康德所说的“根本恶”，意味着人心的颠倒——人在自己的心灵中把其他准则放到了道德法则之上。康德借用英国议员常说的一句话来解释这种恶：“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身价，谁的出价高出价快，我就把我自己卖给谁。”可以看出，与传统哲学对恶的理解不同，康德所说的“根本恶”已指向的是自觉、主动的恶了。而针对这种内在于人性中的“根本恶”倾向，康德也提出了解决办法——“思想革命”。“革命”即“翻转”之意，就是要把颠倒的东西再颠倒回来。康德将思想革命分为三个步骤（见《判断力批判》附言部分）：第一步是依据知性原则的“自行思维”，也就是启蒙运动中要求的“勇敢地运动自己的理智”；第二步是依据判断力原则“在每一他者的位置上思维”，指向审美判断力的基础，也就是通感；第三步是依据理性原则的“任何时候都与自己一致的思维”，即要求人的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相一致。当然，即便康德告诉了我们思想革命的进行路径，对于普通大众来说，实现它是十分困难的。所以，我们还要参照黑格尔解决“根本恶”的办法。

黑格尔和康德一样将道德放在人的内

在主观性中去讨论，但黑格尔的“道德”（Moralität）不仅是某种内在的主观性，还包括受到法权约束的道德行为。因此，“Moralität”更为精准的翻译其实是“道德法”，这个道德法也可以称作“良心”。“良心”是主体内在的法，也是主体最高的法，在这个意义上，它和康德所说的“道德最高法”其实是同一个东西。“良心”是自我意识最完善阶段的产物，但是黑格尔同时指出，道德的对立面（恶）也恰恰在这时才会产生——人类只有在达到良心的层面后才会产生坏良心。但恶作为道德的反面，毕竟无法用道德来解决，因此，这个无法被道德克服的恶就表现为“伪善”。伪善将恶曲解为善，将善曲解为恶，且伪善者（恶人）也自知具有这种“曲解”的力量。也就是说，善恶对于伪善者来说是绝对主观的东西。黑格尔也把这种伪善称作“坏良心”，“坏良心”与我们常说的“没有良心”不同，它以“良心”（道德主体的最高法）的名义自行判断善恶。因此，“坏良心”不仅外在地完全脱离了道德法的管辖范围，内在已经颠倒的心灵也自然无法受到道德自律的约束。

黑格尔借用帕斯卡的一句话解释说：“地狱只收容那些知罪的半罪人，但不收留那些率直的、彻头彻尾的坏人，他们因欺骗魔鬼而委身魔鬼。”道德法无法靠其自身来克服自己最高阶段的反面，因此，它必然要过渡到“伦理”（Sittlichkeit）。伦理在法权层面表现为伦理实体，共分为三个阶段：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黑格尔认为，“伪善”的问题在第二阶段（“市民社会”）就已经解决了。因为有了“市民”（Bürger），我们就可以谈论“人”（Mensch，在德语



中和 B ü rge 近义)，人之为人必须有受到法权制度保障的自由人格和尊严；而发展到了国家阶段，伦理则表现为公民层面的权利与义务与国家层面的君主立宪的统一，人在这个阶段更加进步，并可获得各个方面的具体的自由。但是，历史向我们展现的世界进程并没有像黑格尔设想的这样乐观。一战中容克贵族的军国主义和二战中残酷的法西斯主义都在向我们展示，即便到了国家阶段，伪善依然存在。赵敦华教授对黑格尔的这个“误判”给出了一种可能的解释：黑格尔所谓的“国家”是“良俗”和“良法”的结合，他不会想到一个国家如果是“恶俗”和“恶法”结合会呈现出怎样的状态。黑格尔的辩证法永远是向前走的，所以他也根本无法想到在市民社会阶段已经解决的伪善还会在国家阶段卷土重来。

接下来，赵敦华教授将话题转入阿伦特。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讨论了法西斯之恶产生的三个原因。其一，道德堕落成“恶俗”。阿伦特认为，法西斯之恶早在十九世纪中叶就已经作为“恶俗”发展起来了，而之后的国家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也都在这个恶俗的环境中成长，所以，它不是在希特勒上台之后才出现的。其二，法律堕落成“恶法”。法西斯统治期间，“国家紧急状态”完全被肆无忌惮地当成了“一切手段都可以采用”的制度。在“恶法”之下，“国家力量”“国家理性”已经不再受法律（良法）和道德的约束。其三，“恶人”出现。恶人便是“坏良心”，他们的罪行在我们看来没有任何可理解的动机，因此他们既不可被饶恕也无法被惩罚，就其自身而言他们也不需要谁的宽恕或惩罚——其实就是康德所言的“根本恶”。在阿伦特看来，“根本恶”是恶俗、恶法和恶人的结合，它只能和一个制度同时出现。在这个“恶制”中，恶人既践踏别人的自由和尊严，自己也不享有任何自由和尊严。

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阿伦特以艾希曼为例具体描述了被她称作“平庸之恶”的“根本恶”（或者说“伪善”）。艾希曼是德国纳粹党卫军中一位中层领导，在二战中，他负责看管运输犹太人的铁路线路。二战结束后，他成了战犯，在纽伦堡法庭以“反人类罪”接受以色列当局的审判。阿伦特作为一位从集中营中逃出来的犹太裔思想家，也出席了当时的审判，她在现场惊讶地发现，艾希曼这样一位把无数犹太人送向焚尸炉的“恶人”，竟然在整个庭审中表现得异常冷静和理智。阿伦特在书中说，艾希曼

看上去“完全就是一个文质彬彬的君子”“和别的有教养的德国人没有什么差别”。

艾希曼在法庭上理智地为自己进行无罪辩护，他说，自己只是在认真地执行上级给出的命令。他的职责是分管运输，只对这一环节负责，至于这些人被送到集中营后有什么后果与他无关。可以看出，艾希曼深知自己亲手送走了无数无辜的生命，但他没有任何良心上的不安——“坏良心”便是如此了。艾希曼在法庭上还强调，他本人对犹太种族没有任何仇恨，他也有很多犹太人朋友，他对犹太人的“无恶意”并不妨碍他去严格履行上级派给他的任务。最后，法庭还是找到了一条艾希曼无法用“职责”推脱的罪行。1945年3月，苏联红军已经攻打下布达佩斯，当地还有三万犹太人因运输系统遭破坏未来得及运走，这时，艾希曼向党卫军首领建议，可以将这些犹太人转移到奥地利的集中营杀死，以彰显纳粹的铁拳。显然，这个“建议”不属于艾希曼的职责范围，法庭可以凭此来判定艾希曼有罪。

那么，艾希曼的“恶”由何而来呢？阿伦特使用了“平庸之恶”这个词。我们可以设想，如果艾希曼的所作所为属于“国家行为”，那么他和他的上司（甚至包括希特勒）都无法被任何法庭审判——没有比国家法庭更高的法庭了。此外，阿伦特还写到，艾希曼自诩为严格实践道德律的康德主义者，甚至在法庭上还可以准确背出绝对命令的定义，但其实他正是康德所要革除的“心灵颠倒”之人。艾希曼遵守的绝对命令是希特勒所领导的第三帝国的绝对命令（“你要按照可能会得到元首赞同的方式来行事”），而非康德的绝对命令（“你要按照能使你的准

则成为普遍法则的方式来行事”）。因此，赵敦华教授指出，当艾希曼把希特勒的准则放到道德法则之上时，他就已经是康德所说的“人心恶劣和败坏”之人了，他在这个颠倒准则下的所作所为就是“根本恶”。

因此，比照康德和黑格尔对“恶”的理解，赵敦华教授对阿伦特的“平庸之恶”提出了两点质疑。首先，阿伦特以“平庸之恶”命名法西斯之恶，似乎倾向于把这种遵从“恶制”的恶仍归于人性的软弱。也就是说，在阿伦特这里，康德所言的“根本恶”可以用“平庸性”来自辩，而这又倒退回传统哲学对恶的看法了。其次，阿伦特提出的“平庸之恶”回应了后奥斯维辛时代哲学所面临的挑战，但就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时她只给出了一个很“平庸”的方案——语词革命。与康德、黑格尔的“心灵革命”“伦理实体”等策略相比，这种解决方式略显肤浅。阿伦特并不能单凭语词革命就从根本上解决奥斯维辛之恶。

最后，黄裕生教授进行评议。他在回顾报告内容后对赵敦华教授引入康德和黑格尔来解释阿伦特“平庸之恶”的新思路表示赞赏。随后，黄裕生教授补充道：黑格尔所谓的进入市民社会以克服伪善，其关键在于市民达到了对普遍法的认识，有了普遍法我们才能克服各种“主观的善”。因此，国家的关键不在于“君主”而在于“立宪”，这个“宪”也不是任意一部法律都可以，克服伪善要求共同体只能“以普遍法为法”。此外，阿伦特引用康德的“根本恶”来说明“平庸之恶”其实也意味着“平庸之恶”和“根本恶”一样是不可推卸的，在康德的人性论中，“恶的倾向”确实存在于人的“天性（Natur）”

之中，但这里的“Natur”指向的不是个人层面，而是指向作为一个“种”或“属”的人类，也就是说，就每个人都“属于人类”而言确实具有恶的倾向，但在“Natur”中具有的只是“倾向”，个人的恶仍然是自己招致的，因此，恶倾向即便是“根本”的（某种意义上难以克服的）也依然要由自己来承

担责任，根本恶是不可推卸的。

最后，赵敦华教授和黄裕生教授回答了在座学生的提问，针对具体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讲解，讲座在热烈的讨论中圆满结束。

（撰稿：孔博琳）

71

孙庆伟、田亚岐：皇天后土

2017年12月16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七十一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皇天后土”。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庆伟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秦汉研究室主任、研究员田亚岐主讲，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田天主持。文研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文研院访问教授、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邓淑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袁靖，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唐晓峰，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等出席。本次讲座由两个主题报告组成。

一、殷周鼎革与周原亳社

讲座伊始，孙庆伟教授以“殷周鼎革与周原亳社”为题作主题报告。他首先对“周原亳社”这一概念进行诠释。殷周鼎革之际，周人靠“武王克商”赢得了统治地位。初到

统治阶层的周人深感“居安思危”的重要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稳固政权——“亳社”便是其中的一项。“亳社”，有“亡国之社”之意，是周人建来防止殷人“反周复商”用的。“社”，即祭祀土地神的地方。古人十分重视祭祀土地神，因此这一传统延续至今。但是，一直以来，我们对于古人（三代之人）的“社”只是见诸于文献。文献资料表明，“社”的主要建筑有社坛、社主，可能还有社宫。且由于天主阳地主阴，“社祭”也以“阴”为主。因此，为了连结天地，社祭场所一般是露天而建。但是，如果没有出土文物作为参照，我们依然无法说明那时的“社”究竟是什么样子的——而2014年发现的周原亳社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

孙庆伟教授继续介绍道，周原是西周的宗教和文化中心。1976年，北大师生在此发掘出了岐山凤雏甲组宫殿墓址，出土

了13000余片甲骨；2014年，北大周原考古队又前往当时的发掘现场继续勘察，发现四十年前出土的墓址只是整个遗址的“冰山一角”。经过完整挖掘后，遗址总面积达到了2800平方米，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西周遗址中面积最大的单体建筑，这便是“亳社”。亳社社宫总体呈回字形，顶部被人为遮盖——这也是其与一般的社的最大区别。亳社作为亡国之社，不能通天地之气，故时人专门建造了宫顶以阻断上下沟通。除了这一点，另有其他证据可以说明此建筑专为商人而建：其一，周人的建筑朝向一般是北偏东，该遗址却是北偏西；其二，遗址的礼仪中轴也位居建筑中轴之西；其三，在遗址中发现一块明显为人工切割而成的“亞”字形社主（周代的社主一般是长方形，而殷商时期的建筑、墓址中多用“亞”字形）；其三，随亳社出土的20座墓葬中有16座腰坑墓，考古队从中挖掘出刻有商人名字的青铜器。除此之外，1976年发现的微氏家族青铜器也为2014年周原亳社的判定提供了线索，即有铭文记载殷遗民迁往周原。

孙庆伟教授指出，周原亳社的发现具有重大意义——它提供了新的材料。以前，通过文献记载得知，周原就是周当年的“岐下”所在，周原亳社恰好为这一论断提供了可靠的文物依据。亳社墓址出土了19件刻字陶片，在这些陶片上共发现21个“周”字陶文。“周”字相当于今天“商标”，而如此多的国家标志表明此处遗址必是周代重要的国家礼仪场所。联系1976年挖掘出的商人甲骨上，我们可以推测这些甲骨是商人从安阳带过此地的。因此，这一挖掘成果也为日后考察殷人迁岐提供了重要线索。



孙庆伟教授

报告结束后，孙庆伟教授还通过短片展示了2014年周原考古队的第一线考古现场。之后，田天老师在简要总结后指出，“社”不仅仅是考古工作者的重要研究对象，也是历史学、人类学的重要命题。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研究成果，都是考古工作者们一铲一铲努力发掘得来的，我们要感谢他们的辛勤工作。

接下来，田亚岐老师向大家报告了雍城考古队的新发现——“雍城血池遗址”。该遗址是2016年十大考古发现之一，为秦汉研究提供了新的重要材料。

二、雍城郊外秦汉祭天遗址考古新发现

首先，田亚岐研究员简单介绍了雍城血池遗址。2016年，雍城考古队确定了血池遗址是战国晚期到西汉初年间秦国设在雍城郊外的“畴”。畴是秦汉时期特有的祭祀场所，当时的国君来此祭祀天地。

雍城是秦国史上置都时间最长的正式都城，见证了秦国从弱到强、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雍城的发掘工作从民国时期就已经



田亚岐研究员

开始了。历经八十年左右由点到面的持续考古，整个雍城基本上已经发掘完毕。雍城正处于盆地之中，周围地形北高南低。这是一座水上城市，几条大河提供了天然城防，城池内的小河也为城市交通、市民生活和农业发展提供了便利。城市布局也受此影响，宫殿在早期建造时既非正南也非正北，呈现出“顺水势而为”的形态。城市发展壮大后，秦人也开始改造自然：在大河上修建大型水坝，让城外的水流入城内的小河；又改造了山上的溪流，以便在枯水期仍有上游来水注入大河之中。雍城遗址总面积达 11 平方千米，但并非一开始就占地如此之广，秦人在这里生活的三百年间在不断地扩建城市。

当时的扩建顺序可划分为三个时期。最早的雍城在东南方向，占地 1 平方千米，从形式上看和在周原凤雏发现的宫殿遗址很像。几十年后，以马家庄为代表，雍城开始向西向北扩展到了 7 平方千米——当然，此时的雍城依然没有城墙，只是依靠两条大河以及人工挖出的壕沟来围住城池内的建筑。到第三个时期，也就是建城约 200 年后，雍城成为大型国都，拥有自己的城墙。城墙

的修建受到了国际环境的影响：当时，周王朝分崩瓦解，各个国家都在修建自己的都城、广围城墙，秦国自然也不甘落后。此时，雍城的各项城市功能已趋于完善。在已经发掘的遗址中可以看到有很多大型宫殿区、工匠区等等，甚至还发现有一些别国的窖藏遗址（或为使者区）。此外，出土文物中还发现有很多秦国特色花纹的陶片及其制作工艺与流程。

2016 年新发现的血池遗址则是雍城郊外的祭祀场所——“𪛗”。“𪛗”的祭祀活动大约持续了 750 年，是秦汉时期非常重要的国家级祭祀活动。据文献记载，秦人共建有四𪛗，汉人在此基础上追加成五𪛗。当时，秦人初到关中，担心自身地位不被其他六国认可，便打着周国的旗号建𪛗来“替周王祭天”，以此来提升自身的国家合法性。另外，关中地区本是以周文化为主，秦人迁来后不得不考虑本土人的风俗习惯。

𪛗祭的发展过程可以分为六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初置阶段，秦人设置了很多祭祀场所，各有不同的祭祀对象；第二阶段为秦始皇时期，始皇规定雍城祭祀为全国规格最高的祭祀——他本人于公元 328 年来此地祭拜天地，进行加冕仪式；第三阶段为西汉初期，汉人在秦四𪛗的基础上又增加一𪛗，但未对具体环节、仪式进行调整；第四阶段为汉武帝时期，祭天地点从雍城迁至甘泉宫，两地交替使用；第五阶段为汉成帝时期，汉成帝在长安城设祭祀坛（正式取代了甘泉和雍城的祭坛），雍五𪛗在罢废后由于经学家的反对多油反复；最后一个阶段为王莽时期，𪛗在经过改革后彻底消失。

以上为历史记载中的𪛗，考古工作正是

依据这些文献线索进行的。田亚岐研究员表示，在发掘初期，大家总认为“坛场”（地面上的大型土平台）应是𪛗最明显的特征。但其实，这种露天场所经过长期的风雨侵蚀，很难保持原貌。因此，考古队又转换思路，寻找围绕主会场（坛场）的配套设施，如祭祀坑、皇帝的斋宫、𪛗维护人员的住所、通往山上的道路等等。后来，考古队在发掘工作中将这些可作互证的线索一一落实。

随后，田亚岐研究员解释了判断血池遗址即为“𪛗”的依据。其一，所有的遗迹都在山体的正阳面，可据此推测这是一次规划而成，并非随意建造。其二，坛场位于“高山之下，小山之下”，与雍郊山头遗址所在的地形正好一致，由此可见，其选址与文献相符合，且也有文献中所说的“为坛三垓”地貌。其三，从遗址的剖面图可以看出，围绕坛场铺设有一道壕沟——这也是秦人常见的做法。其四，羽阳宫青铜器铭文中也有记载雍郊祭场的盛大规模，这些青铜器也应是用来专门运往雍郊祭祀的铜器。其五，在血池遗迹发掘出了一些马骨，经检验，殉葬的马匹在六个月至两岁之间，符合文献记载的“马驹”殉葬习俗。其六，遗址的建筑材料有明显的分层堆积痕迹，由此可以判断，祭场应在山上修建且容易损耗，故不同时期祭祀时会重新修一番。最后，雍山的道路系统在发掘时和行宫一同显露了出来，在雍城周围修建的大道主要出于方便皇帝出行的考量。而在雍山遗迹现场，有一条大道正好通往雍山山脚下。这条路可作为互证，既提供了寻找𪛗的线索，也为确定遗迹身份提供了参考。

血池遗址的发现对于接下来的考古工

作和历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首先，继礼县鸾亭山“西𪛗”相关遗址后，血池遗址是首次在雍城郊外发现的“𪛗”，同时也是截止目前发现年代最早、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𪛗。（据田亚岐研究员推测，雍郊的𪛗很可能就是文献记载中的“北𪛗”）。在发现血池遗址后，雍城的面貌也更加完整，可为相关研究提供实际的场景支持。其次，祭祀坑中出土的诸多马骨是重要的研究材料，科技考古工作者们可据此对古马的年代、种属等议题开展新的研究。再次，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血池遗址是信史与补史的重要参照——我们既可通过文献来寻找文物，也可通过文物来证实文献。

最后，田亚岐研究员以“祭天之秩，如月之恒”作为结尾，再次重申祭祀在历史传承中的重要意义与价值。随后，李零教授、袁靖研究员和邓淑苹研究员就雍城考古工作中的一些细节问题与主讲人进行了探讨。

田天老师援引《左传》中晋国臣子对秦穆公曾说道：“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实闻君之言。”由此可见，古人的祭祀不再是单纯的祭祀活动，还关联到一系列的历史事件与材料。这些关联会在考古工作中清晰地展示出来，并在被运用至各学科时彰显了丰富的价值。

（撰稿：孔博琳）



（二）未名学者讲座

24

李力行： 关于中国国有企业下放的研究



李力行副教授（左）主讲，张亚光副教授（右）主持

2017年11月7日晚，由文研院主办、兴全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二十四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2报告厅举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李力行作题为“关于中国国有企业下放的研究”的演讲。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董志勇评议，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张亚光主持。

本场讲座主要以李力行副教授与清华大学黄张凯老师、中国人民大学马光荣老师及世界银行徐立新老师合作的论文——

《哈耶克、本地信息与战略制高点：关于中国国有企业下放的研究》（Hayek, *Local Information, and Commanding Heights Decentralizing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China*）而展开。李力行副教授首先介绍了这项研究所涉及的理论背景与现实背景。就理论背景而言，二十世纪最为重要的经济事件之一便是计划经济的出现、扩张和下滑。自二战后到苏联解体，奥地利学派与市场社会主义论者进行了长期的辩论，使得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领域争论不断。哈耶克作为奥地利

学派的代表人物，主要就激励与信息提出了两个论点：其一，对私有产权的保护赋予了人们更强的生产积极性；其二，信息的有效利用是经济运行的基础。有关第一种观点的研究文献早已卷帙浩繁，而对于第二个论点则缺乏相应的实证检验——这也是李力行副教授的研究出发点之一。

实际上，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那场著名的“计划经济大论战”开始，关于计划经济体制的争论持续至今且热度不减。支持计划经济体制者认为，政府部门的计划者可以借助于更高效的计算机体系进行精确计算（包括市场商品价格和劳务价格），并有效地配置资源，从而替代市场机制。特别是在当今大数据、云计算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的时代背景下，有关计划经济有效性的讨论被再次点燃。

然而，根据哈耶克的思想，信息难题不能完全靠技术来解决。信息采集得再多，最终也需要人来理解、来决策。因此，管理中的委托代理、信息不对称等都是人的激励问题，在本质上又是机制设计问题。许多微观个体通过无处不在的价格信号进行理性决策，而在经济管理，只有少量微观经济主体才能掌握广泛存在的大量的本地信息。若要充分利用这些信息，需要某种程度上管理权限的下放，从而使得那些掌握着丰富本地信息的人来做决策。这也是哈耶克在其经典论文《知识在社会中的应用》（*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中所持的观点。

而就现实背景而言，李力行副教授对中国国有企业这几十年的改革历史进行了回顾，并对国有企业在管理中出现的“一

收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收”现象进行了描述，进而引出国有企业管理的层级问题。

结合理论背景与现实背景，李力行副教授介绍了本项研究的概念模型和研究假说。按照“哈耶克逻辑”，为了充分利用本地信息、提高效率，就有必要对国有企业进行分权管理。李力行副教授采用了一个直观地度量本地信息的方法——物理距离。经济学中有一系列阐明物理距离、交通距离和文化距离等对信息和企业内部组织结构进行研究的文献。但很少有文献如哈耶克那样从本地信息以及企业整体监管权力转移（非企业内部组织架构）的角度出发研究中国国企改革问题。

政府距离所控制的国有企业越远，就越缺乏对于企业自身信息的直接观察。若将控制权下放到距离近些的下级政府，就能更有效率地利用本地信息。并且，企业绩效异质性越强，本地信息就越重要，距离与下放的正向关联就越强；同比，信息沟通越困难，本地信息就越重要，距离与下放的正向关联也应该越强。这是本项研究的主要假说。

但分权也要有限度。哈耶克的观点并不代表企业就应该被下放。是否下放取决于集权管理国企（从而充分利用正外部性）与下放国企（从而充分利用本地信息）之间的权衡关系。更重要的一点是，中央政府还会出于控制经济命脉的目的不愿将特定行业的企业放权于下级政府，如国防、钢铁、铁路、船舶、公用事业、通信等战略行业。这也就是列宁在1922年提出的国家要掌握“战略制高点”的思想。这种现象，

哪怕在发达国家当中也普遍存在,如法国、德国、日本政府等都曾采用类似的“国家冠军”政策。按照这种逻辑,对于那些由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战略性的国企而言,本地信息在分权决策中变得不再重要,因为政府更偏向于集中管理这些企业。

接下来,李力行副教授构建了一个简单而有效的概念框架:一个包含上、下级两层政府的经济体,每一层都可以拥有国企的控制权,并从中获得好处。这种好处包括税收及国企利润、对国企战略决策的自由裁量权、可任命人员至关键岗位或高薪岗位等。但同时,每一层也需要承担成本(如亏损补贴等)。上一级政府在决定是否将控制权下放到下一层政府时需要作三方面的考虑:绩效、效率(哈耶克本地信息假说)和战略(战略制高点假说)。

李力行副教授随后简单介绍了本项研究的实证检验结果,即以上两种假说在解释中国国企下放改革中成立,并且这一结论在一系列分样本回归、安慰剂检验、排除替代性假说和工具变量法中都是稳健存在的。需要补充一点的是,本次研究运用了Probit二元选择模型,并使用了中国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李力行副教授的文章主要有以下两点贡献。其一,他第一次对哈耶克本地信息在国企下放的重要性观点进行了实证检验。以往研究仅讨论市场经济下企业分散与本地信息的关系,至于国有企业的集中、下放的问题也仅限于激励措施与所有权方面。而这篇论文既补充了当地信息的重要作用,也提供了有关“战略制高点”的经验证据。其二,这篇文章也对国有企业改革方面作

了补充。目前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国有企业私有化问题上,而下放的情况却更加得现实与普遍。在许多国家,地方政府在国有企业改革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讲座最后,李力行副教授从组织结构与信息成本的角度梳理了国有企业改革的逻辑。他表示,产权改革可降低国有企业组织成本;向下级国资管理部门分权可降低信息不对称;放权给企业决策者可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压缩国企内部层级管理可提高信息传播效率。

评议阶段,董志勇表示,李力行副教授从经典文献入手,构建了简洁直观的理论模型,将国有企业下放这一问题的来龙去脉讲述得畅晓明白。同时,李力行副教授就国有企业改革能否在大数据技术蓬勃发展的今天呈现新的逻辑与特征等问题一一作了回应。最后,张亚光副教授对本场讲座进行了总结。

(撰稿:宋光祥)



25

张新刚： 修昔底德论城邦内乱

2017年11月21日晚,由文研院主办、兴全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二十五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2报告厅举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西方古典学中心助理教授张新刚作题为“修昔底德论城邦内乱”的演讲。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吴增定评议,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彭小瑜主持并作引言。

本次讲座共分为五部分:城邦内乱议题在古希腊历史和思想史研究中的重要性、修昔底德的战争与内乱书写、修昔底德的内乱模式、雅典帝国与政体以及雅典内乱与五千人政体。张新刚老师首先讨论了城邦内乱(stasis)在古希腊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他指出,内乱和战争是希腊城邦世界的政治现实,而古代作家倾向于将关注的焦点放在城邦内乱上。我们可以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政治著作中清晰地看到这一点。特别是在《法篇》中,柏拉图在对话伊始部分便将问题聚焦在城邦立法的目标究竟是对外战争的获胜还是防止城邦内乱。对此,他给出的答案是后者。

这一主题对修昔底德来说同样适用。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以下简称战争史)的导言处,修昔底德在阐述自己所记述的这场战争给希腊带来的巨大灾难时说道,“过去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城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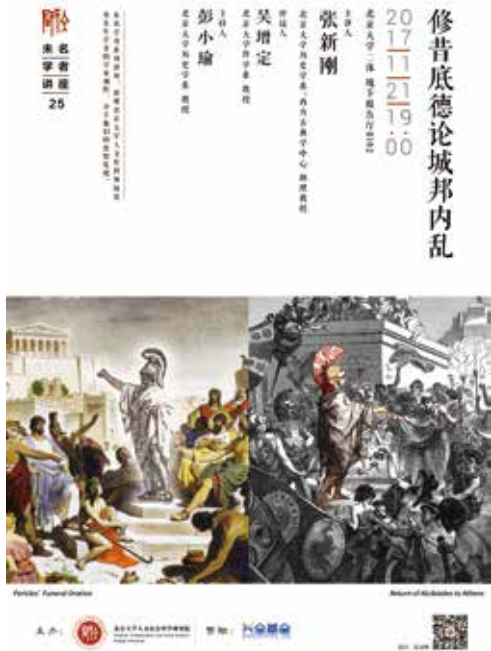


张新刚老师

被攻陷和破坏——有些是被野蛮人摧毁的,有些是由内部冲突造成的;也从来没有过这么多流亡者或被杀害者——有些是因为战争本身,有些则是由于内乱。”基于这一表述,张新刚老师提出,在修昔底德看来,以斯巴达和雅典为首的两个集团之间的战争与诸城邦内乱造成了希腊世界近三十年的灾难。修昔底德所撰写的是战争史,也是内乱史,将这两者结合才是全书的撰述要义。

若进一步研究《战争史》的内容和结构,我们会发现,修昔底德确实如开篇所言将内乱作为战争的平行线索来指引整部书的写作。据统计,在公元前429至413年间记有逾30次内乱;公元前413年至前410





年，共记有 20 余次内乱发生；全书使用 stasis 一词（意指内乱）共有 51 处。而详细记述内乱主要分为四个阶段：第一卷为战争缘起，第三卷为科西拉内乱前后，第四卷为尼西阿斯和平前以及第八卷的雅典与萨摩斯岛。

战争爆发的一个重要导火索是埃庇达姆努斯内乱所引致的科林斯和雅典的冲突，普拉提亚的内乱则导致了斯巴达对阿提卡的入侵。科西拉内乱也对战争进程具有深远意义。首先，修昔底德在对科西拉内乱的进行评述时将其从单个城邦的冲突提升为希腊城邦的普遍性现象。自此以后，内乱在城邦间播散，并且更加残忍。其次，科西拉内乱为战争实质性增添了新的因素，也就是将城邦进一步分裂为民主派和寡头

派的斗争。

修昔底德记述科西拉内乱的一个主要动机在于这场大战为城邦内乱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背景，战争也由两个头领城邦的冲突进一步深化为每个城邦内部的斗争。至于后果，在修昔底德对伯里克利死后雅典政局演变的评述中写到，西西里远征实际上是后伯里克利时期雅典内部斗争的毁灭性结果，这一决定以及期间的一系列错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城邦内部权力斗争导致的，而整场战争又是以雅典内乱的自我毁灭而告终。从这个角度来看，修昔底德在详述公元 411 年雅典内乱时便已经看到了雅典失败的命运。更为重要的是，真正决定战争结局的是雅典自身。

在阐明城邦内乱在希腊历史以及《政治史》中的重要性之后，张新刚详细讨论了两个核心议题，即是否存在“修昔底德模式”的内乱？以及雅典帝国是否遵循“意识形态”的考虑主动推行民主制？关于第一个问题，张新刚老师回顾了学术界的核心争论。《政治史》中的内乱叙述究竟是遵循了社会－经济因素主导的埃庇达姆努斯内乱模式？还是树立了以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主导的科西拉模式？对此，学界通常的看法是，城邦内乱在古风到古典希腊历史进程中发生过一次重要的变革。

从早期基于土地和财富争夺以及贵族权力斗争为主导的内乱模式向意识形态化（特别是民主与寡头出现）的内乱模式过渡，修昔底德在这一过渡时期起到关键作用。民主与寡头的内乱模式的确在大战过程中频繁出现，并且成为主要形式，但通过辨析修昔底德的术语使用情况我们可以发现，

民主与寡头这类政治术语并不能保持稳定的指涉关系。简言之，在变动的政治局势下，传统的政治符号和话语已经丧失了表征意义。

从萨摩斯岛内乱的过程来看，唯一不变的是实力基础上的城邦统治权，掌握城邦权力的人被称作掌权者 / 强者（hoi dunatoi）以及最强大的人（dunatotatoi）。在战争期间发生的城邦内乱，根本原因在于城邦统治权，而不是社会经济因素。民主派或寡头派不再具备稳定的政治认同或阶级立场，民主派领袖在获得权力后，也会轻松摆脱民众的身份，甚至与民众为敌。力量或是权力（dunamis）成为内乱新模式的核心，在城邦权力核心周围围绕的，是许许多多欲将之据为己有的派系团体。只不过在多数城邦中，这些团体披着民主派或寡头派的面纱出现，一旦掌权后，他们会无一例外地成为“最强大的统治者”。对于早期希腊所呈现的内乱模式，张新刚老师表示，应该将内乱置入战争的视野之中，辨析战争前及战争不同阶段对城邦内乱的影响，并避免采用单一或静止的模式来分析和套用《战争史》中出现的每一个案。

在澄清了其他城邦内乱的实质之后，张新刚老师开始从雅典的角度审视其是否有意在盟邦中推行民主制。从表面上看，雅典帝国盟邦中民主制城邦的确占据多数，但若稍做具体辨析就会发现，在战争开始前，雅典在处理盟邦内乱或者决定与新的城邦结盟时，政体或意识形态因素并不突出。萨摩斯和科西拉都是带有明显寡头制倾向的城邦，但这一点并没有影响雅典的对外政策。

雅典政策的转变主要发生在第三卷克里昂和狄奥多图斯的辩论中。狄奥多图斯明确提出应该和盟邦中的民众团结起来维系帝国。而在此之后，修昔底德对雅典推动民主制以及小邦的民众寻求雅典帮助建立民主制的叙述明显增多。对此，张新刚老师解释道，伯里克利已经在最后的演说中将雅典帝国的困境揭示清楚了，即“因为你们维持帝国靠的是一种暴政；过去取得这个帝国也许是错误的，然而放弃这个帝国一定是危险的。”至此，雅典已经失去了维系帝国统治的合法性，但是雅典民主制却无法离开盟邦的供养。帝国在伯里克利时期达到繁盛顶峰，而这也是危机开始的时候。不幸的是，伯里克利只能延缓这一危机的进程，无法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到第三卷，狄奥多图斯赋予了雅典延续帝国的新方式，也就是将打交道的对象由盟邦改为盟邦中的民众。此时，意识形态不过是个幌子，背后的实情是尽可能长地延续雅典的帝国体系——而维系帝国就是维系雅典政制和雅典人的生活方式。

《政治史》以详述雅典公元前 411 年的内乱收尾。修昔底德罕见地肯定了雅典变更的五千人政体，他说道：“现在，雅典人似乎首次拥有了一个好政体，至少在我的时代是这样的。因为它使少数人和多数人的利益混合，这使得城邦在历经劫难之后，能够重新恢复起来。”与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相比，修昔底德并不是最佳的政体论者，但在整部书中，他只对斯巴达和最后雅典的五千人政体表示过肯定，而这两个政体都能够有效避免城邦内乱。

讲座的最后，张新刚老师表示，本场

讲座海报的设计者准确地把握了修昔底德的思想。在修昔底德笔下，伯里克利是一位心系城邦的政治家，故而在海报中，伯里克利是黑白的，城邦是彩色的。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阿尔喀比亚德。他心中所系只有“我”，似乎游离在城邦之外，故而在海报中，阿尔喀比亚德是为彩色的，而整个城邦黯然失色。一个好的城邦，需要政治家以城邦为最高利益，而不是自我一时的得失或是权力与荣誉的僭取。

评议环节，吴增定教授指出，无论在古代史研究领域还是政治理论研究领域，城邦内乱都是非常重要的题目。他继而提出几个问题：对一个国家或政治实践来讲，是内乱还是对外战争会成为决定性问题？讨论这些为什么对研究历史非常重要呢？我们在理解古希腊历史的时候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即我们到底该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理解为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还是一场内乱？

这两种说法自有理由。说它是战争，是因为希腊城邦由独立的政治实体组成且互相征伐。因此就有了修昔底德陷阱的说法，即两个国家欲避免战争却又出于对战争的恐惧而走向了战争。这是典型的国际政治的解释，从这个角度出发，修昔底德被看作现实主义或权力政治的先驱，并与黎塞留、俾斯麦齐名。说它是内战，是因为战争因内政而起最终又返回到内政。对此，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有较多论述。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说道，希腊对野蛮人的冲突是战争，但只要是希腊人就都是兄弟，所以，内部冲突是内战。

这两种解释模式不仅对理解战争非常

重要，也对理解政治理论同样重要。也就是说，对理解人类政治现象而言，我们首先需要考虑的是一个国家的政体优劣还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考虑政体优劣即偏向内政，也就是古典思想家的思考方式。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就是偏向国际政治模式。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所关心的是如何获取和维持国家政权的问题，他认为，国家首先面临的是生存问题，因此，在国家间相互竞争的格局之中谈一国政体是没意义的。

吴增定教授表示，城邦的内部冲突多种多样。首先是经济利益冲突（也就是埃庇达姆斯模式），即穷人与富人的斗争；直至后来内乱形式改变，它演变成科西拉的模式，也就是城邦内斗的两派互相寻找外部援助——但这并没有改变内乱的根本模式。而雅典的五千人政体的优势则在于统治者和民众以集体利益为重，不会因为一己之私就借助外部力量推翻城邦。

随后，吴增定教授充分肯定了将政治理论与政治史结合起来研究的思路，即可以相互印证、相互参照。只关注政治理论会变得抽象，最好的办法是带有比较好的政治理论视角看政治史。这样，研究时就不再局限于单纯的事实描述，而会带着强烈的问题感回到如何理解希腊历史、希腊思想和希腊政治等基本议题上。

吴增定教授最后指出，我们今天仍要阅读两千年前古希腊作品的原因是，它不仅是给同代人写的，也是给后人写的——作品中提出的问题仍可以再度思考。随后，三位老师与现场听众就雅典民主制性质、古现代世界中的内乱与战争类型、希腊城

邦内乱的历史演变、历史与哲学、政治理论等学科关系、希腊内乱与罗马平贵斗争及共和国后期的政治斗争关系等议题进行

了热烈讨论。

（撰稿：李振宇）

26

吴天岳：西方哲学中的人文主义传统？——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哲学史反思

2017年11月28日晚，由文研院主办、兴全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二十六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2报告厅举行。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吴天岳作题为“西方哲学中的人文主义传统？——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哲学史反思”的演讲。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沛评议，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辉主持。

讲座伊始，吴天岳副教授引入了《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上的一场围绕哲学本性的争论，即哲学究竟属于（或近似于）自然科学还是人文学科？这在不同哲学传统的学者眼中存在分歧。按照罗杰·斯科拉顿（Roger Scruton）和伯纳德·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的观点，哲学活动与我们的主体性状态或历史处境具有密切关联，其背后是同样见诸于其他人文学科的一种强调人的尊严和独立价值的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理念。

然而，哲学是否内在地包含人文主义传统呢？“人文主义”这一术语本身具有



吴天岳副教授

含糊性，它既可指一场以复兴古代文化为旨归的历史运动，也可指一种强调人的尊严的基本立场或价值观。概念上的含糊导致众多思想迥异的哲学家被划入同一人文主义阵营，而在何种意义上存在着内部统一的、连续的人文主义传统却并非不言自明。克里斯特勒（Paul Oskar Kristeller）与海德格尔对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批评提示着我们，对于人文主义与哲学之间是否

存在内在关联需要更深入的反思。因此，我们有必要返回人文主义传统滥觞的文艺复兴时期从哲学史的角度审视早期人文主义者的历史活动，并在哲学自身实践的历史中考察人文主义如何演变成一种现代性的迷思，从而尝试对哲学和人文学科的关系这一宏大问题进行推进。

吴天岳副教授首先从词源的角度出发，他谈道，“人文主义”最早被追溯到19世纪的德国教育学家尼特哈默尔（Friedrich Immanuel Niethammer）。他在反对德绍博爱中学过分推崇体育和实用教育时提出了这种与博爱主义思潮相对的、源自西塞罗“人文研究”理念的人文主义教育。这种教育强调通过研习古代人文经典来培养公民精神。“Humanitas”一词出现在西塞罗和奥卢斯·革利乌斯（Aulus Gellius）的著作中，指通过文化教育获得和培养高贵品行和人文素养。但在拉丁语的日常使用中，亦可指无差别地、友好地对待他人的博爱。发展至15世纪中叶时，“人文研究”被进一步明确为文法、诗歌、修辞、历史和道德哲学这五门基本学科，并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教育体系。

1859年，德国学者福格特（Georg Voigt）在《古典时代的复活或人文主义的最初世纪》一书中第一次将“人文主义”作为历史学术语引入文艺复兴研究。一方面，他认为彼得拉克等人对古典文化的重新发现深刻地改变了未来的欧洲教育；另一方面，人文主义者对古代的刻意模仿以及用非母语的拉丁文写作实则阻碍了意大利民族文化的自然发展乃至现代心灵的形成。福格特之后，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

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明确否认了人文主义的价值仅仅在于模仿古人写作和复兴古典文化。他强调，人文主义运动的真正价值在于人文主义者们通过自身所推崇的人文教育，实践了一种带有更多自由意愿和主观意识的生活方式。这种带有强烈自我意识的个人主义文化，与中世纪强调社团认同的基体文化形成鲜明对立。由此，一种崭新的、独特的现代个体概念形成，一种新的、人的哲学产生，即布克哈特所谓的“人的发现”。

吴天岳副教授表示，以上叙述强调了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与现代价值体系间的紧密关联，并将作为历史运动的人文主义同作为价值观的人文主义结合起来。人文主义运动被塑造成现代的历史开端，而这也是现代人文主义迷思的开端。之所称迷思，是因为它不仅在概念上混淆了作为历史运动的人文主义和作为价值观的人文主义，且从后者出发重构前者的历史发展过程，将人文主义呈现为指向现代个人主义的一个必经阶段。因此，这是一种进步主义史观下的时代错乱。

吴天岳副教授继而指出，20世纪以来，以克里斯特勒为代表的英语学界人士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研究中掀起了一股批判和反思布克哈特式人文主义迷思的潮流。克里斯特勒通过大量考察后指出，“人文主义者”专指一群以讲授古罗马经典为业，并热衷于修辞和雄辩的职业教师。在触及开启哲学革命的一些人文研究论题上，他们往往采取保守的立场。因此，克里斯特勒断定人文主义运动实质上是西方文化中修辞传统的一个特殊阶段。而在晚近的研

究中，美国学者维特（Ronald G. Witt）延续了克里斯特勒对人文主义者的职业和修辞事业的关注，并将人文主义运动界定为一种思想和表达风格的转变。这种转变体现在早期人文主义运动特征的私人写作和与中世纪诗歌紧密相关的文法研究中。在维特等人的推动下，学界开始广泛接受人文主义只是一种表达风格的历史转变，语言是其工作的首要对象，修辞的雄辩是其首要目的。根据美国学者蒙法萨尼所区分的文艺复兴四阶段，这一历史运动肇始于中世纪的意大利，并逐步扩展至全欧，随后在近代早期走向衰落。而在其历史演进过程中，学者们倾向于认为，它早已超出了单纯的修辞变革范畴，影响到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

接下来，吴天岳副教授以灵魂不朽的论证为例，考察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与同时期经院主义的哲学成就。如同克里斯特勒在研究中所揭示的那样，二者几乎同步发展，且意大利经院哲学与人文复兴有着同样的世俗起源基础。由此，吴天岳副教授从课程体系、研究内容和文风三个方面对二者进行了整体比较，突出了人文主义教育体系对修辞的重视及其功利性的实用取向。随后，吴天岳副教授对比了斐奇诺（文艺复兴时期柏拉图派代表）与彭波那齐（亚里士多德派代表）关于灵魂不朽的哲学论证。他指出，前者的论述中充斥着未辩护的形而上学论断、大量修辞性的问句、折中主义式的求证和缺乏逻辑依据的推论；后者则延续着经院哲学一贯的、流畅且精炼的问答式语句——这些语句准确地描述和刻画了哲学问题。

最后，吴天岳副教授总结道，就历史运动这一角度而言，哲学并不存在人文主义传统。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延续的是西方的修辞传统。修辞未必与哲学对立，但通过理性辩护的方式求知求真始终是哲学探索的第一要务，而说服和改变人心并不是哲学语言所追逐的终极目的。就价值观这一角度而言，我们也同样会得出否定的答案。不管人文主义被如何界定，人文主义立场的哲学家往往倾向于假定某种先天给定的价值及人的本性的定义。他们缺乏对人的生存条件及其行动规范性来源等问题进行深入反思。并且，这种价值观先行的实践方式会给哲学反思造成伤害。对于一门人文学科来说，最为根本的主观视角和历史意识需要通过哲学加以界定。只要还有权反思这些根本概念以及其他学科基本预设的合法性问题，哲学就只能是自成一类（sui generis）的知识。

评议环节，张沛教授补充道，广义的文艺复兴是人类历史上长期的、相互关联的一系列思想文化取得进展的活动或进程。因此，它不仅包括14–17世纪发生在意大利的历史运动，还包含此前发生的铺垫性历史事件，如加洛林文艺复兴、北方文艺复兴等。而“人文”（humanitas）一词也在一个累加的话语空间中被使用：从古希腊罗马时期的“一个自由人的博雅技艺”到中世纪的“七艺”体系，再到现代的人文学科与人文研究。

（撰稿：吴天岳）



27

刘淳： 图像中的叙事——会讲故事的古希腊陶瓶画

2017年12月5日晚，由文研院主办、兴全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二十七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012报告厅举行。北京大学英语系副教授刘淳作为题为“图像中的叙事——会讲故事的古希腊陶瓶画”的演讲。北京大学古典学中心助理教授程炜评议，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高峰枫老师主持。

讲座伊始，刘淳副教授概述了古希腊陶罐在实用功能之外的价值。古希腊陶罐被广泛地引用在古希腊生活的方方面面，除存贮水、酒与橄榄油之外，还出现在各种私人及公共场合。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手工作坊中的画者在陶罐上绘制装饰图案，产生了很多精美的作品。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表现了古希腊神话故事，至今仍是讨论的焦点。那么，陶罐上的瓶画是如何“讲故事”的？是否形成了一系列的方法？又达成了怎样的成就？

接下来，刘淳副教授简要追溯了瓶画的发展过程。考古发掘的陶罐最早可追溯至爱琴文明时期与青铜时期，不过，早期的陶罐装饰以简单重复的动、植物图案为主，很少有人形。公元前十一世纪，某个出土于迈锡尼的战士瓶（warrior vase）展现了一队战士从左向右行进、一名女性在画面最左侧向他们告别时的场景。可以



刘淳副教授

说，这是绝无仅有的、早期叙事的例子。直到公元前八世纪，也就是希腊几何陶时代晚期，人与动物的形象数量才慢慢多了起来，并逐渐成为装饰的焦点和主题。在这个意义上，瓶画有了“叙事”。约公元前755—750年，几何陶安法拉罐（Dipylon Amphora）成为了其中的杰出代表。陶罐上，见有很多重复性的动物装饰，人的上身是具有“几何”特征的简单三角形，且易被忽略。不断重复的图案似乎要填满每一个空白之处，但这确实已成为一种叙述了。我们可以看到，一位女性死者躺在这里，周围满是撕扯着头发的人群——这是哀悼死者时的做法。

大约公元前七世纪，也就是所谓的“东

方化时代”，绘画者对神话故事题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一个原始雅典风格的安法拉罐上，刻画有珀尔修斯斩杀美杜莎及奥德修斯刺瞎独眼巨人这两个神话故事。这时，黑绘的技巧还未成熟，空白的地方仍有几何风格和东方化风格的装饰，但主题是大胆而明确的。

一般认为，在公元前700年前后，科林斯发展出了黑绘技法；约一百年后，黑绘技法引入了雅典，并被运用在大尺寸人像叙述性场景中。技法成熟后，画匠们不断试验新的方式，并逐渐演变成红绘技法。刘淳副教授在此简要介绍了雅典人用“三步烧制法”来制作陶罐瓶画的过程。烧制过程中，该地区土壤的矿物构成则是影响陶罐艺术的重要前提。

一般认为，黑绘稍显程式化，人物的动作与表情也比较僵化；而红绘则更细腻自然些。公元前530年之后，红绘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总体来说，在黑绘形成的一个多世纪，瓶画中见有较多神话题材的叙事。至公元前440年之后，日常生活类题材多了起来，而带有叙事的装饰画到公元前三世纪之后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

接下来，讲座内容聚焦在几件神话题材作品的故事技巧与特点上。此外，刘淳副教授还讨论了瓶画与文本之间的关系。一个常见的错误便是过度强调传世文本中的故事，只将瓶画看作文学作品中故事的佐证，默认二者紧密而对应的联系，并把文本作品作为研究中心。实际上，我们很难确知陶罐作坊中的画家、画匠通过哪些渠道了解到这些作品并将他们当作自己创作材料库的。古代世界的陶工、画工以及

这些陶罐的购买者和使用者，更可能通过口头传播的方式了解神话故事的。而他们的版本既可能与现存文本一致，也可能存在较大出入，甚至还可能是我们并不知道。不过，存世的文本仍对我们理解和研究瓶画有着重要的意义。最明显的层面上，文学故事所保留的资料，让我们在欣赏瓶画的时候拥有更大的解读空间与欣赏分析能力。在有限的空间中，画工只能展示有限的图像与文字信息，了解与画中人物及事件相关的故事有助于观者欣赏场景的选择和表现方式。此外，也有学者认为，某些文学作品中所运用的方法也可以被类比和运用到古希腊瓶画中。

一个常见的叙事方法便是采用“程式化”的属性和构图，这种方法被一些学者与口传文学的方法相类比。在荷马史诗中，就有很多程式化形容修饰语，如“白臂膀的赫拉”、“捷足的阿喀琉斯”等。这些程式化形容修饰语未必与上下文有着直接的关联，有的还可能让今天的“读者”感到莫名其妙。我们今天读到的史诗是在一个传统中进行创作的。所以，一个人物的某个故事或某种特点，一旦得到流传和接受就会固定下来，并出现在上下文没有直接关联的场合。瓶画上也会有一些刻画形象的程式化属性，最初被创造时，可能是为了帮助读者快速确定人物身份。当然，与口传文学的情况相似，瓶画中有反复出现的因素和构图和主题，一旦被接纳，就会被重复、加强，直至成为传统。瓶画重一些程式性的表现方式，就像荷马史诗中的程式化形容修饰语，有时跟上下文没有关系，但可能指向关于这个人物的过去和

传统故事。故此，能够和当下的场景产生共鸣。与史诗一样，某些重复出现的属性，并不一定只是简单的重复，而会带来叙事和主题上的突出效果。一个例子便是黑绘安法拉罐（black figure amphora）中描绘的场景——重复出现的盔甲似乎将几个英雄的命运和死亡联系在一起。



听众聚精会神

瓶画中另一个突出的特点体现在画匠对时间的选取和控制上。由于绘画区域的限制，时间点的截取和安排就显得尤其重要。画匠可能在同一画面中融入多个时间点发生的行动，典型的例子便是公元前六世纪中期的黑绘基里克斯陶杯（black figure kylix）。在描述刻尔克与奥德修斯的故事时，画匠将几个前后相关的人物和行动同时刻画在一个画面里。画匠还会选取展现故事高潮（或者最关键的行动）之前的一刻，安法拉罐（Boulogne Amphora）便表现了英雄埃阿斯自杀前的场景。有时，画工会在瓶画的两面叙述同一事件，希望观者也将两个场景联系在一起作为一个事件来理解。在这种安排下，时间有时被延长，场景在瓶画两面的分割带来了悬念，也让我们对将要到来的事件有更大的期待；时间有时又被缩短，瓶画两面通过相关场景，浓缩了较长时间中的故事。

此外，讲座人还讨论了不同作品在主题、手法、人物形象上的重复，而重复中的细微变化可带来特别的效果。例如，埃

克塞基亚斯（Exekias）在埃阿斯与阿喀琉斯对弈这一被反复展现的题材时，通过细节的不同，微妙地突出了阿喀琉斯的形象。主题和构图的重复还可以通过戏仿达成幽默和意外的效果。

在讲座最后，刘淳副教授重回标题中的问题：瓶画是不是很会“讲故事”呢？另一个问题则是，瓶画中的叙事可不可以称作一种艺术？就地位而言，瓶画在古代不仅比诗歌弱得多，可能也低于雕塑和壁画等艺术形式。陶罐并不纯粹为审美而造，其装饰风格、生产流传等都受到市场的影响。刘淳副教授也简要概述了约翰·毕兹礼（John Beazley）对瓶画研究的贡献和对今天的影响：他借用对文艺复兴绘画的研究方法对瓶画进行研究和分析。在他之前，只是瓶画中的少数高质量高作品进入人们的考量范围；在他之后，瓶画整体似乎被提升到了艺术鉴赏的高度。而针对其的主要批评也在于，他忽视了绘画与瓶画之间的区别和差异。

评议阶段，程炜老师就两个方面进行

讨论。其一，关于叙事的概念，程炜老师重点论述了亚里士多德和莱辛的理论。他表示，在莱辛看来，诗歌是不自然的语言，是时间范畴内的。而绘画是自然的语言，属空间范畴；它只有展现，没有时间上的延展，故此没有叙事。其二，就绘画与文本之间的关系，他概述了不同学者的不同

观点。问答阶段，艺术学院贾妍老师补充了经济因素对陶罐制作和发展的影响，她还特别提到一些学者将陶罐视作金属制品替代品的现象。

（撰稿：刘淳）

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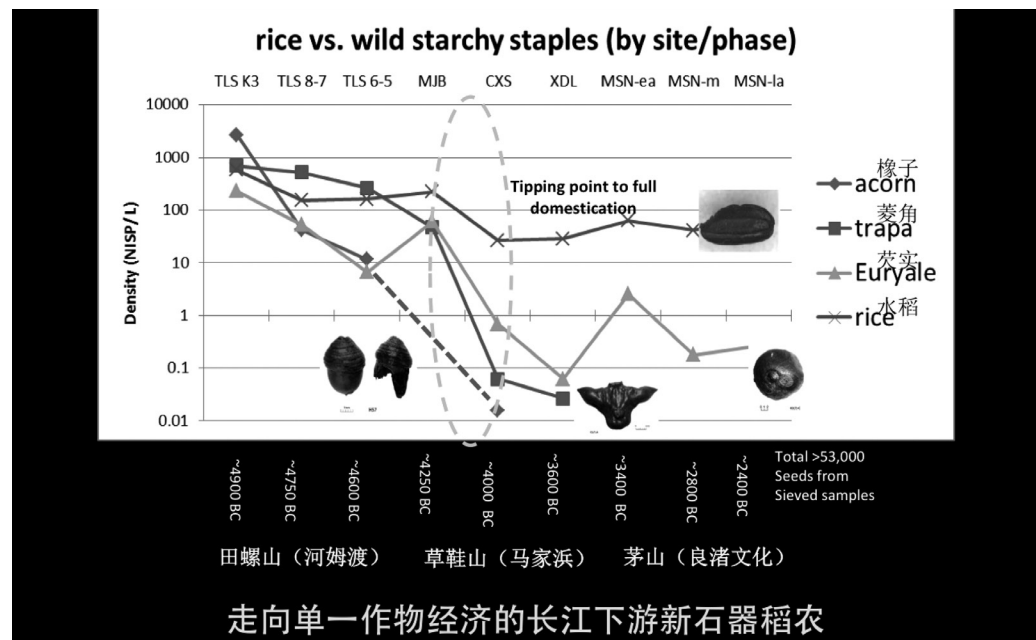
秦岭：资源、技术与早期信仰 ——由良渚谈中国史前文明形成的基础

2017年12月12日晚，由文研院主办、兴全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二十八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2报告厅举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秦岭作题为“资源、技术与早期信仰——由良渚谈中国史前文明形成的基础”的演讲。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评议，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邢滔滔主持并作引言。

讲座伊始，秦岭副教授阐释了以良渚为切入点的原因。在以西方文明发展史为主轴的世界中，良渚文化能够突显中国史前文明发展进程中的若干特殊性。这些特殊性体现在如下几点。首先，在新石器末期，各地区纷纷迈入城市文明进程的区域文化（无文字系统与冶铜技术），良渚所在的环太湖地区成为了发展程度最早且物质成

就最高的代表——东亚早期城市文明的兴起有助于我们反思和理解由近东及欧洲研究所得的农业到城市革命理论和文明演进脉络。其次，就目前所见，只有良渚文化是以单一水稻经济作为支撑的早期文明，因此，它成为了理解稻作文明特质的最重要途径。最后，中国文化传统缺乏西方纪念碑式的建筑和艺术形式，而“藏礼于器”这种通过特定物质载体来表达、实践观念与秩序的方式，早在青铜礼器出现之前便已在良渚文化的玉器及其使用上初见端倪。

要通过考古学研究良渚这样一个无文字记载的史前社会，不妨着眼于“古城”、“古国”和“古玉”几个关键词上。从资源、技术和早期信仰的角度出发，本场讲座分别讨论了良渚文明兴起的几大重要基础：



淡水资源和稻作技术、玉石资源和制玉技术以及良渚玉器纹饰与早期信仰。

一、淡水资源和稻作技术

虽然近海，良渚文化却未利用海洋资源。从河姆渡—马家浜阶段开始，该地区的农业发展经历了如下过程：从同时利用林地和淡水资源开始，到以利用淡水资源为主，最后逐渐走向单一的稻作经济。

过去一般认为，收割工具的发明促使作物驯化并成为了农业起源点。然而在良渚文化中，我们见到的则是作物、水田和农具共同进化。在马家浜晚期，水稻已完成驯化，且与水田同时出现。然而，完整的农业工具套却迟至崧泽晚期到良渚时期才出现。水田技术促进水稻同野生祖本的区隔生长，也增加了单位内的劳动力投入

需求，并产生了更高效的收割和土地管理方式。在这之后（良渚晚期），大规模的水田开始出现。至此，稻作农业发展已到达了一个节点——在铁质工具出现之前，石质工具和水田技术已无太多革新。

作为唯一的作物资源，水稻促进了社会的发展。水稻不仅产量高，且要求稻农在同一地方反复经营耕作，并形成了一种固定的土地利用方式。这种方式使得人口增长，水田经济文化由此走向精耕细作而非向外扩张；在一个区域内，劳力组织与管理也被持续强化。同时，单一的稻作农业具有较强的季节性，这也为整个区域社会在农闲时期促进劳力的分工分化和进一步发展手工业经济提供了保障。总而言之，水稻资源和水田技术的发展给社会带来了两种新的资源——日益增长的人口和在一

个限定的区域空间内相对稳定的聚落与社会关系。

二、玉石资源

凌家滩文化（公元前 3500 年左右）是长江下游最早的玉文化中心，在这一时期，已经出现了“玉石分野”。玉，专指软玉，不再仅仅是“石之美者”。在此之前，“石之美者”的价值更多地在“工”（制作技术）而不在料。最早使用的玉髓质玉饰品多为打制成坯再磨光加工的技术，其制作技术同一般石制品没有本质区别，制作目的在于将漂亮的材质转化为特定的装饰物——材质本身作为资源的价值并不突出。软玉的集中使用同“线切割”“片切割”等技术的发展紧密相关，这些“制玉技术”则彰显出对玉材价值的珍视。“玉石分野”的出现，表明人们开始真正理解软玉的价值；而玉器的意义，则体现为特定材质、特殊技术及纹饰形态所承载的观念价值复合体。此外，将玉石器视作一种身份标识物的观念在凌家滩文化阶段也已完成，人们开始用玉石器的器形和纹饰来承载自己的精神世界。

某个角度讲，良渚的兴起可被理解为继凌家滩之后继续寻找玉石之路的过程。从凌家滩到良渚早期，环太湖地区发现有多处良渚早期高等级玉器做随葬品的墓地遗址。这可能是贵族手工业团体为了寻找可使用玉石资源而不断寻找新的落脚点的例证。同时，最好的玉石资源和制玉技术均体现在贵族墓葬当中。从瑶山反山开始确立良渚遗址群的中心地位到后来逐步建立的良渚古城，这个特殊的区域中心同资

源、技术有着紧密的联系。在良渚文化玉石资源流动的网络中，它不仅承担了集中分配的功能，更成为最主要的资源、技术和消费中心。

与此同时，石器制作也产生了分化。钺被单独选作礼器，进而分化出石钺和玉钺等不同制作技术和使用方式。其他的稻作农具则越来越专业化，体现在特定材质和功能的相关性上。由凌家滩继承而来的玉石器制作技术不仅加速长江下游“玉器时代”的崛起，也推动了农具的发展，从而进一步推动了稻作农业的发展。这样一来，又可以反哺贵族手工业者，使他们控制更多人口，营建更大的中心。推动良渚“古国”形成的最重要因素便是神像和玉琮——这是控制社会资源和产生共同信仰的基础。在进入良渚时期后，玉器发展开始变得秩序化，良渚人对玉资源和技术的管理同信仰相结合。

三、玉器纹饰与早期信仰

要探索良渚文化的信仰，就要从纹饰和玉琮入手，并考察其在社会中的使用与流通情况。良渚玉器的纹饰主要有神人、兽面、龙首和鸟纹四个意向。从表现手法来看，它们具有同源性。

神人兽面纹是兽面纹的另一种变体。在良渚信仰体系的实践过程中，图像不断变得复杂，但其精神内核却是始终一致的。

良渚文化的玉琮和后世认为的天圆地方并无直接关系。刻意将器壁做成弧面以获得最大化的视角观看兽面纹，可被理解为通过特定器形来更好地承载和展现纹饰的力量。良渚晚期，人们开始普遍使用高

节琮，其上只能见到非常简化的神人纹；而在同时期，漆器和象牙器上却能见到完整的神人兽面纹饰——因此，我们应该从资源和技术角度的变化为出发点，来考虑晚期玉器纹饰和器形的变化。由于原有玉料资源枯竭，晚期偏阳起石的深色玉料已不再适宜刻划细纹。于是，玉琮开始用“形”来承载自己的信仰体系。

良渚社会发展的特殊性在于，没有直接证据显示它仅凭借基本生计资源（即农产品的交换和分配）获取社会权力，并达到区域内的社会整合与文化认同。整个长江下游高度统一的物质文化更多体现在了玉器上，这说明，良渚文化存在高等级社会关系网络，而这一网络是通过玉器的分配、交换与使用为基础构建的。良渚古城遗址外的区域中心均使用琮、璧、钺这样一种制度化的葬玉习俗来体现社会身份，同时，又不乏良渚古城外的区域玉石器生产中心——这反映了良渚文化在分布范围内具有高度统一的信仰体系。因此，良渚的社会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玉石资源的掌控以及对玉器所承载的信仰体系的建设和实践。

长江下游自给自足的淡水资源和水稻技术是社会得以复杂化的基础条件，却非社会权力赖以集中的基础。良渚贵族集团和高等级社会网络均是基于稀缺资源以及相配套的专门化技术所产生的。无论是玉器、象牙器还是漆器，它们都是复合技术



秦岭副教授在讲座现场

体系下产生的非实用产品。这就意味着，若要获取它们必须有能力去集合各类资源与技术。凭借着庞大的资源与技术体系，这些产品的价值得以体现。这样的手工业经济及其承载的信仰体系既是良渚社会权力的来源，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传统社会权力来源的主要表现。

若在更大范围内以资源和技术视角考察中国新石器晚期区域文明的产生，我们会发现，它们之间具有相似的宏观节奏。这些区域包括：凌家滩与良渚、澧县城头山城址与江汉平原屈家岭—石家河城址、大汶口与山东龙山文化……当一个区域在既定的资源、技术条件下发展到了一定水平后，会发生转换。这种转换可以表现为在同一资源、技术体系下的地理区位中心的转移（如长江中下游）。再以大汶口—山东龙山为例，这种转移在同一个大的空间范围内发生，并存在资源技术与信仰的内在切换。中国的新石器时代区域文化似乎必须以这样一个转换的过程作为动力，在下一阶段进一步发展。

若将视野放至整个旧大陆，我们会发现，西方的新石器革命和城市革命都与资源和技术这两个因素有关。东亚和西亚的不同点在于，前者的陶器早于农业出现，而后者相反。这种差异导致了烹饪方式、作物选择甚至是社会制度的差别。资源技术体系具有“路径依赖”的特点，即一旦认定某种资源和技术，就会不断对其加以利用、改造。而无论是陶器技术还是玉石器技术，对整个社会的影响都是极其广泛且深远的。

农业二次革命（secondary production revolution）常被用来解释新石器时代向城市革命演进的动因。提出这一学说的安德鲁·谢拉特（Andrew Sherratt）认为，奶制品、毛织品、犁、轮子等“二次产品”的出现使生计资源转化为劳力（畜力）资源，从而使农产品从基本生计发展为经济作物和日用品。二次产品的转换和使用，推动了日用品贸易网络的形成与扩大，从而促使城市和青铜时代得以出现。然而在中国并没有发生这样的农业二次革命，因此，城市革命需要被放在不同的资源技术体系下进行比较和理解。在二次革命的基础上，西方的社会权力来源于对日用品贸易网络的控制；相较之下，中国的社会权力则来源于不停使用新的稀有资源技术来创造高等级社会网络和社会秩序。进入青铜时代后，中国仍在不断改造和利用西方传入的资源与技术，并创造新的关系网络和社会秩序。

讲座后，赵辉教授在评议环节表示，考古学的研究应转移至古人类社会和文化的研究上。在理论方面，考古的西方有塞

维斯酋邦理论、农业二次革命等理论构架作支撑，中国则建树不多。若我们单纯地相信并接纳西方理论，就会忽略中国自身社会的特点。史前社会中，不同地方在发展方式上各有特点，我们需要对其进行总结，来探讨不同区域以怎样的方式汇合成中国的。与西方文明的比较中可发现，中国的文明核心是礼制——维系社会成员的血缘关系放大至国家层面则变成了国家的体制。

（撰稿：戴伟）



（三）北大文研论坛

55

李孝聪、刘未等： 读城——考古、历史与地理

2017年11月20日上午，“北大文研论坛”第五十五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读城——考古、历史与地理”。文研院访问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刘未作引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孝聪、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包伟民、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杭侃、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钟翀、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郑嘉励分别作报告，日本中央大学教授妹尾达彦、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出席并参与讨论。

论坛伊始，刘未副教授对论坛缘起、与会学者的研究方向与研究成果进行了简要介绍。第一位发言的是郑嘉励研究员，他从第一线考古工作的体验和思考出发，对城市考古的相关议题进行评论。他提到，自己从事考古的三项工作分别是墓葬、城市和手工业遗存。三者之中，城市考古的意义最难解答，甚至会使研究者产生焦虑和迷茫。按照传统做法，城市考古的基本目标在于平面布局的复原，并在此基础上讨论规划等问题。而一些更为极端的说法



刘未副教授作引言

是，城市考古的终极目标就是绘制出古代城市的平面图。但回顾以往浙江城市考古的成果，考古发掘所得资料的学术价值和意义相当有限，在城市复原方面发挥的作用非常次要——城市复原的基本手段仍是历史文献和历史地图的解读。

接下来，郑嘉励研究员对城市考古的发展空间展开了进一步讨论。他认为，虽然浙江很多城市存在古今重叠的情况，但只有持续进行数十年的考古工作才有可能取得真正突破性的成果，并且该过程要求

巨大的人力物力投入。但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就会发现，也有很多古城并非古今重叠。以形成于宋代的台州章安镇为例，过去长期以为宋代与汉代是同址重叠的，事实却不然。唐代章安城已遭废弃，并在旧城以东一公里新建。这一情况的揭示，缘于一次窰井挖掘的意外收获。当时，工地上出土了大量东汉至南朝时期的筒瓦和纪年砖，研究者根据这些遗物的分布情况绘制出六朝时期章安城的大致范围，并证实当地不存在古今重叠。这个实例提示研究者，对于非古今重叠城市来说，恢复其城市形态是具备条件的，也有捷径可走。明代卫所城市“蒲壮所”的实例也体现了复原古代城市真实面貌和格局的可能性，并证明了在江南地区也能做出真正具有价值和示范意义的城市考古。

郑嘉励研究员认为，城市考古并不是一个“缝缝补补的事业”。在古今重叠城市开展考古工作有两个要点，分别是“平面找布局”和“纵向找沿革”。他以嘉兴子城考古为例，通过对城墙和中轴线上各部分建筑基址的发掘，以及从规制、工艺以及功能方面的分析，证实了即使是古今重叠城市，只要田野工作做得细，也能从细节入手来追寻城市早期的重要信息。

随后，杭侃教授也就城市考古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指出，虽然古今重叠型城市考古方法还存有争议，但是目前考古学界还没有能够通过发掘来复原一个完整的隋唐时期城市。在回忆了学生时期的研究经历之后，杭侃教授肯定了城市复原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认为，城市考古是一个“蚂蚁啃骨头”、“拼七巧板”的工作，

要求持之以恒，将成果一代代地积累起来。谈及未来的城市考古工作方向时，杭侃教授提出，应该将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的工作结合起来。宏观层面上，要理解一个城市，其历史地理研究非常重要；中观层面上，要分析一座城市的平面布局 and 纵向沿革；而在微观层面上，考古工作者们要保持充分的研究意识，对出土文物和城市剖面给予足够的重视。除去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的工作，还需从城市史的角度进行中外城市比较。

接下来，钟翀教授肯定了本次论坛的积极作用，并表示城市复原研究需要三个专业的学者相互协作才能共同走出一方天地。随后，他分析了当前城市史地研究面临的问题，指出在许多具体个案分析中，普遍存在重文字描述、轻图上作业的倾向，以致在相关研究中，系统的历史形态学考察难以展开。

延续城市形态学的讨论，钟翀教授对康泽恩学派的理论进行了归纳。康泽恩的做法对西方城市规划和城市保护理念产生了重大影响，不仅建立了城镇形态研究的基本框架，还形成了一套标准的术语和概念体系。康泽恩认为应该把城市的混乱状态拆分成几个定义清晰的不同方面进行分析。康泽恩提出“平面类型单元”作为基本分析单元，通过这个概念，发现了城市中两个非常值得去研究的亚区域：城市核与城市边缘。

随后，钟翀教授介绍了他所主持于2012年开始的“城市历史形态学研修班”相关工作。研究人员以图上作业为基本手段，从聚落发生学的角度追溯城市肌理的



现场气氛热烈

生长与形塑历程，厘清历史本底。通过这样的分析，会得出一些新颖有趣的结论，有时甚至会推翻之前的某些定论。钟翀教授还提出了中国城市研究的两个关键词，即物理空间和逻辑空间，这套概念也为外国学者所接受。接下来，钟翀教授通过无锡古城门结构的“形态框架”遗痕、江南古城濠郭配置中的“夹城作河”形制、16世纪初筑城前上海“县市”形态与规模等研究案例，详细解释了实地考察和历史地图分析的过程以及这项工作的重要性。

接续以上讨论，包伟民教授从方志研究入手，对唐宋坊市制度、坊巷等边界问题发表了看法。他提到，地方志关于整个内部城区的描述通常由“坊”展开，但它究竟代表什么则一直存疑。从唐代存在坊墙的坊市制城市到宋代的厢坊制城市，坊，变成了一种居民区。从《临安志》的记录

可以发现，坊存在不同性质的内容，但古人对这种差异性并无任何区分意识，将其归在同一个类目之下。经过归纳，包伟民教授认为，坊存在着三种形态：坊区、街巷、纪念性建筑。地方志编撰者出于政治目的对坊和街巷进行区别对待（如避开描写街巷“俗物”），使得研究者产生误解，以为坊才是城区构成的最主要的景观。

包伟民教授指出，历史学和考古学之间是相互利用、相互支持的。他认为，将考古学与历史学分开是很糟糕的做法，前者本来就是后者的一部分，并为历史学研究提供资料。但考古学绝不是历史学的附庸，若前者发现了历史资料中缺少的部分或提出一些新的问题，那将在资料层面具有更大的意义。他最后表示，城市考古和历史地理研究不能局限于地方志记载，对唐宋城市的研究需要认清坊不是城市肌理

的主要内容，回到街巷为中心的思路。

综合前面四位的报告，李孝聪教授指出，城市考古与城市历史地理拥有不同的研究视角，方法也不尽相同，工作不能急于求成。他认为，城市历史地理重点需要关注的地方，一是城址与地形的关系，二是平面布局与制度的关联。他还强调了文献的史学基础地位，以及地图和考古材料的重要性。最后，在中外城市比较的问题上，李孝聪教授表示，研究者应寻找中外城市发展中的共同性，不一定要非找出东西方的相互影响关系、跨文明的差异性等问题的答案。

接下来，与会学者对报告内容进行充分的延伸讨论和交流。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在对先前的讨论进行总结后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她表示，在跨学科的研究过程中确实存在学科关注点不同的现象，但这些同属历史领域范畴的学科应互为支持、互为依托；将断片式的材料进行合理的拼装则要求研究者的长期积累才可以完成。随后，妹尾达彦教授也对当前考古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状况发表了看法。

论坛最后，刘未副教授对讨论成果进行了总结。他指出，虽然与会学者之间存在观点上的出入，但大家都是在历史学科这个大的思维框架下去考虑问题的。同时也需要对对方学科的学术史有所了解，以便从方法论的角度展开对话。他还就城市考古“研究方法的能与不能”、“城市布局的变与不变”两个问题进行了分析和阐述。前者在于明确古今重叠型城市考古复原方法，整体性是其优势所在，推测性、粗略性是其局限所在。所以复原只是起点

不是终点。局部的考古发掘作为解剖手段，可以走向细读。另外，平面复原的基本要求是共时性，必然在历时性方面有所牺牲。局部发掘的优势恰恰可以以更细小的时间尺度体现变迁，也就是城市遗址的形成过程。后者的关键则是重视城市过程中的人为改造，以及超越物质形态的“无形之变”。以往的研究往往忽略忽略“重叠”部分的变化，即：城市主体框架不变与局部肌理变化，城市平面结构不变与建筑实体变化，城市物质空间不变与人为再结构。

最后，刘未副教授表达了自己对城市考古的期望：历史地理、城市史、建筑史等学科本来都应该构成城市考古研究的基本参照，只有充分了解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才能真正推动城市考古向前发展。

（撰稿：陈洁樱）



56

马戎、张志强等：
文明的共处与汇通

2017年12月7日下午，“北大文研论坛”第五十六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文明的共处与汇通”。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马戎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张志强评议。文研院访问学者、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胡鸿，文研院访问学者、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陈波，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研究员春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扎洛，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王娟，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嘎尔让出席并参与讨论。

首先，马戎教授对论坛选题背景进行简要介绍。他表示，中华文化的构建应与中国各方面的发展相对应。中华民族内部本身就存在多元文化，其内涵和外延呈现出复杂、多层次交融又各具特色的格局。而在现代化发展的今天，区域间差异并未缩小，地方性的文化体系受到了外来的文化的冲击。结合中央“一带一路”的倡议，文明的共处和汇通问题牵扯到国际间文化交往，使得这种讨论具有必要性。接下来，与会学者就不同议题分享自己的研究与体悟。

胡鸿副教授以“中古华夷关系的理想与现实”为题，从历史学视角对华夷关系进行分析。首先，胡鸿副教授就“华夷的理想”展开论述。他认为，这一理想的实

质是“一部分人的理想”。在多民族国家、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古代历史中的族群关系以及国家如何处理民族问题一直备受关注，人们也能从通论记述中了解到中国的主流传统。但在政治理论中，不少美好的理想化论述是服务于宣传需要的。而在古代真正处理民族关系问题时，采用的措施更为复杂。胡鸿副教授阐明，他所讲的以华夏为中心的华夷秩序主要基于华夏一方的建构与想象，并在一定程度上为非华夏族群所接受，但这并不意味着后者完全认同这套秩序。

溯其演变过程，胡鸿副教授介绍，华夷秩序思想学说的主干形成于战国时期。具体而言，经由春秋直到战国时期，诸夏联盟获得一定优势，人们在全新的背景下开始了一种对华夷模式的全新想象。后来的五服制、九服制结构以及“天下共主”模式，都在战国时期首次形成，且基于特殊的历史背景，仅停留在思想家的构想和文本上。随后，这些想法逐渐投入到礼仪与制度实践中，并在两汉魏晋时期维持以华夏为文明中心的关系模式。胡鸿副教授表示，十六国、北朝时期，草原征服者虽然占据了中原的核心，但他们并没有推倒既有的观念，而是接受了这一套秩序，将自己放在华夷秩序的中心。隋唐时期重新统一之后，这套华夷秩序不仅没有消失，

反而进一步扩大规模。

接下来，胡鸿副教授陈述了学说和现实之间存在的互动和张力。这部分内容主要分为三点，分别是：圈层结构在何种程度上塑造并影响当时的现实操作，共主观念在实际的历史行为中如何得到体现以及华夷关系是否属于君臣关系。

为了解释这些问题，胡鸿副教授援引《国语·周语》等历史文献的叙述，详细介绍了五服制度下的臣服结构以及君臣之间的义务关系。由“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原则进行延伸，最终的目的在于“天下合一”的理想状态。同时他也提到，在文献中所设想的圈层结构放到实际历史中的华夷空间关系，其建构性和不合理性显而易见，但这种思想模式一直存在，且影响深远。“共主”强调了在理想的华夷关系模式之下蛮夷的不可或缺性。胡鸿副教授以王莽模仿周公并诱西羌献地为西海郡为事例说明了这一点。而在“臣与不臣”的问题上，他分析了呼韩邪来汉朝觐见皇帝的历史事件，以汉朝对其所用礼仪的变化过程，生动说明了在现实情境下如何将思想转变为适当的执行策略。

接下来，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春花以“同文之盛——清乾隆帝敕修多语合璧辞书”为题，集中介绍了乾隆皇帝在民族语言方面开展的实际政策。乾隆时期，正值清朝盛世、文化繁荣的阶段，满蒙联盟、满汉联合使得整个中原地区乃至蒙古部落、西藏和回疆先后统一，并最终形成多民族大一统的局面。乾隆皇帝在文化方面实施“同文之盛”的做法，在康熙《御制清文鉴》基础上编纂多语合璧词典。从满蒙合璧开



张志强研究员担任评议

始，增加了汉文、藏文、维吾尔文条目，陆续编撰了《御制满蒙文鉴》、《御制增订清文鉴》，后又根据实际需要编撰了《五译合璧辑要》。

春花研究员摘录了几部敕修词典中的具体内容以说明这些现象，如《御制满蒙文鉴》和《御制增订清文鉴》。入关前，满人提倡学习汉文化，入关后也继承了明朝的体制，故康熙时期的辞典吸收了较多汉语内容（如汉语音译）。而到乾隆时期，为了应对入关满人的满语水平下降的情况，开始对许多词语陆续进行规范。《西域同文志》则是应平定西北之后，编排战争中来往文书的需要产生的。

此外，春花研究员援引御制诗、私人笔记等史料，介绍了乾隆自习多种民族语言的情况。乾隆自幼学习满语、汉语，为达成缔结联盟并与当地高层巩固关系，他还学习蒙古语、藏语乃至嘉戎语、维吾尔语。《满蒙话条》、《满蒙汉字书》等文献也证明这点。春花研究员得出以下结论：

乾隆皇帝熟练掌握多种语言，并下令编刊众多合璧词典，其目的是借助藏传佛教对蒙藏民族进行有效统治，从而达到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实现民族大一统的目的。

扎洛研究员演讲的题目是“喜马拉雅版的宗藩体制：灵活性与局限性”。他首先简要介绍历史上喜马拉雅周边各邦国的情况，指出

西藏西南地区的一些小政权实体有着较长的历史。清朝时期，这些彼此之间具有错综复杂关系的邦国被视为藩属，是清朝整体对外关系体制下一个特殊的次层区域。

十二世纪以后，藏传佛教逐渐越过喜马拉雅山向南发展。这些在不同时期与藏传佛教某个教派保持着紧密联系，甚至构成了母寺和子寺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有时候带有政治隶属的性质——朝圣就是用宗教包装的政治过程。在当时，西藏保留着干预邦国内政的传统，最常见的便是通过调停纠纷介入其中。随着清朝在西部的控制力量逐渐伸向远方，中央王朝对外关系的理念和体制（如设立封号）也自然而然地移植到这些地区。扎洛研究员提到，《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象征着清朝的对外关系体制的移植达到最完整的程度，规定西藏对外事务统归驻藏大臣管理。由此，中央朝廷对喜马拉雅地区的宗藩关系逐步实现了规范化。

尽管如此，西藏地方与这些“藩属”的交往还是受到诸多传统的影响，具有鲜



马成教授主持论坛

明的地域特色。扎洛研究员总结了宗藩体制的几个特点：其一，除廓尔噶进京朝贡以外，其余各邦国都委托驻藏大臣、西藏地方进行管理，这造成朝廷对沿边情况信息模糊，并导致决策屡屡失误；其二，宗教仍是彼此交往中的核心因素；其三，从强关系向弱关系转变，导致到后期彼此关系日渐疏离。

扎洛研究员还表示，针对英国在喜马拉雅地区的殖民扩张，清朝也对僵化的宗藩体制进行了调整。首先，册封的级别开始提高。朝廷为加强情感联络增加了对各邦国的物质赏赐。但这种调整依旧具有局限性。僵化的等级制使得清朝在礼仪和文书上都处在被动局面；且朝廷始终过度地以自我为中心，一味强调藩属的义务，但同时又回避自己的义务。其实质是综合实力不济。最后的结果则是，清朝在喜马拉雅山区与英国进行外交博弈中全面落败，藩篱尽失。扎洛研究员总结道，目前，该地区仍广泛地使用藏语，信仰藏传佛教，也与西藏自治区维持着商贸和朝圣活

动——西藏地区对他们仍保持着强烈吸引力和影响力。

王娟助理教授以“历史书写中的文明汇通：汉藏文献中的文成公主叙事”为题分享了自己作为社会学者的研究和思考。首先，王娟助理教授对社会学在面对“文明”问题时的失语状态进行了分析。她认为，社会学的经验研究特别擅长处理的是能够进行“逻辑”分析的问题，因此，社会结构、权力关系等就是经常被讨论的议题；而相对来说，“文明”则是一个较难以经验研究来触及的领域。在回忆了自己对康区地方近代转型的研究时，王娟助理教授表示，自己的研究成果实际仍处在政治社会学的框架之下，几乎没有涉及文明的层次，希望借助这次论坛的机会来尝试一条以社会学的视角来探讨文明问题的途径。

王娟助理教授选择从“民族史书写”的角度来切入这个问题，她认为，一个文明体对自身历史的书写，呈现了其对该文明之特质的理解，而“民族史书写”往往涉及对多个文明体之间的互动关系的叙述，就可以呈现其对一个多文明体系的理解。接下来，王娟助理教授就以汉、藏两种文字的历史文献对“文成公主”这个人物及相关事件的不同叙事为例，来分析汉、藏两个文明体系构建彼此间的政治、文化秩序的不同模式。

《旧唐书·吐蕃传》遵循了华夏史书“四夷传”的典型笔法，其中关于文成公主和蕃一事的记录，主要内容包含吐蕃赞普亲赴河源迎亲、执子婿之礼、叹大国服饰礼仪之美等，核心在于确立唐、蕃间的政治、文化秩序。

后弘期的藏文史籍则遵循了以佛教为中心的叙事框架，因其成文于与其他文明接触之后，因此，史书所描述的世界构成就是多文明体系，而吐蕃并不处于世界的中心。在这个体系中，“文成公主”是构建汉、藏间秩序的一个核心环节。王娟助理教授展示了藏文史籍和民间传说中文成公主叙事的细节，尤其是由释迦牟尼替身像的流转所构成的因果链条，指出这些故事情节构建了唐、蕃间“文明的传递与超越”的秩序模式。

王娟助理教授还特别分析了藏、汉文献对于调和两种文字之记录差异的努力。藏文史书以佛教“三重视界”的手法调和了汉、藏文献的不同记述。民国时期汉语世界对“文成公主”形象的重塑则基本排除了佛教史观，而有选择地接纳了部分民间故事的情节，尤其强化了书籍与生产技术的重要性。最后，她总结道，对比两部《唐书》与近代汉语世界关于“文成公主”的叙事，尽管二者都致力于构建以华夏为中心的唐—蕃秩序，但两部《唐书》所构造的秩序具有明显的文明视野，而近代汉语世界在“国族建设”背景下重新构造的汉藏秩序则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之上。基于技术的科学主义和进步观念在解构神话的同时，丧失了文明汇通的能力。

嘎尔让副教授则以藏传佛教再度东渐为例，论述互动互通中的多元构建问题，并将讨论重点放在了汉藏关系在民间信仰层面的互动。近二三十年来，藏传佛教恢复了向内地传播。嘎尔让副教授对这一过程进行了总结，并归纳出两种主要形式：藏地喇嘛和堪布到内地传教以及内地佛教

徒到藏地学习。传播趋势的主要特点为：一，信教人数增长快；二，影响范围广；三，对民族关系而言，积极作用与负面效应并存，需要积极引导，发挥其正能量。

以放生活动为例。他认为，在这一过程中，族群、文化、语言等诸方面的差异被生命裂变之间的关系淡化，佛教轮回因果的框架逻辑得到了体现。人和金钱的关系也在特定情境下发生了变化，被一种新的关系和秩序所替代。嘎尔让副教授表示，在内地弘扬藏传佛教是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藏族僧人之中素食主义的兴起、学习内地文化习俗、现代科技应用等现象都体现了汉藏之间的文化认同大大增加。另外，他还对佛教被狭义民族主义绑架提出了质疑。

陈波副教授以“文明当中的共主经验”为题，将讨论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世界诸文明的范畴。他首先探讨尔干以其社会理论所描述的共主概念，即把他所理解的社会种谱系树上不同的社会种聚集为一体的“帝国”，并由此回溯欧洲历史上的帝国演变。古希腊以后，城邦国家到帝国的发展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概念，“帝王”之称谓具有明显的军事化特征。欧洲与中国对朝贡品的定义也存在税务性质和自愿性质的差异。其次，陈波副教授引用了莫斯所研究的礼物馈赠案例，尤其是印第安人的夸富宴，说明了礼物馈赠中具有两种关系类型，即媲美关系和竞争性关系；在竞争性关系中，部落酋长在比拼和消耗富有的过程中打败对手，成为诸部公认的首领。

接下来，陈波副教授提出，中国的共

主体系首先强调的是天下的不均质性。在“天下万国，草根为王”与“诸侯并立，天下共主”这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中，朝贡体系之下的赏赐行为体现了共主必有的一些内在逻辑。而在二十世纪东南亚地区的印尼，因历史上泛灵论的文化底蕴渐次包容印度教、伊斯兰教和马克思主义，形成了剧场式国家的共主秩序建构；类似的有谭拜雅所说的中南半岛上的星系政体共主模式。陈波副教授最后介绍了利比亚部落冲突与昔兰尼加教派作为诸部落共认的代理人，在与外来者交涉过程中成为诸部落代表的案例，他认为，利比亚在昔兰尼加教派之下，在于欧洲的民族－国家意大利打交道过程中，最终将自己塑造为一个民族－国家，这同样属于共主的方式。

最后，张志强研究员总结评议。他指出，民族问题、边疆问题及其与整个现代性知识的对话问题需要回到传统当中寻找资源。最重要的理论问题是包容，即如何将差异包容在一个体系当中，将不同族群包容到一个政治体系当中，将不同的文明、宗教包含在一个文明体系当中。以佛教为例，张志强研究员表示，需要对藏传和汉传佛教重新梳理，找到汉藏融通的新的可能性。而汉藏文明的共处、交流与汇通是中国非常重要的文化政治资源，并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

（撰稿：陈洁樱）



57

罗泰等： 东周时代经济考古的一些问题

2017年12月14日下午，“北大文研论坛”第五十七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东周时代经济考古的一些问题”。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罗泰引言，文研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李零主持。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苏荣誉、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王睿、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钱益汇、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韩建业、李梅田参与讨论。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出席。

罗泰教授首先介绍了自己的著述内容与研究方向，并以面向美国学生开设的“先秦时期中国的美术、技术与经济”课程为线索，陈述了其东周时期经济考古的理解。罗泰教授从这一课程的具体内容出发，介绍了在具体教学实践中，自己如何引导学生就考古学的相关问题进行思考。对史前文化的考古学遗迹进行梳理后，他提出如下问题：考古学文化能否等同于一个古代民族和社会团体？罗泰教授表示，考古学界不能简单地从这些物质文化推理得出这样的结论。西方考古学界学者曾就此



李零教授主持

进行实验，考察非洲地区的物质文化因素分布是否与当地的少数民族分布对应，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无法直接判断二者之间的相合度。

对此，罗泰教授认为，可以将考古学文化诠释为经济现象，即某一种物质文化产品的交流范围。但他同时提到，具体的运行方式还需根据经济学理论进行深入分析。这样的现象在青铜时代仍然存在。根据夏商周时期的考古学遗迹，人们可以初步复原出古代人的经济体系，其中就包括了中心文化和地方文化。以陕西遗址等实地研究为例，罗泰教授提到，这些居留遗址曾是当时的政治、宗教等活动的中心，且能够通过陶器、陶窑群的分布情况复原那时的生产制度与交易关系。



罗泰教授作引言

接下来，罗泰教授又援引有关交易制度的人类学研究成果。他表示，这些特殊的交易制度可以被视作中国早期经济情况的参考模式，并告诉我们重新分配的经济制度在实际情况中的运行情况。在商代，其经济制度已远超出原住民时代，且送礼、进贡成为了青铜器等产品的交易运行模式基础。罗泰教授介绍，他曾在教学中引用详细数字，推算出商代青铜器生产时使用的青铜、煤炭资源的数量。

基于这些基本考量，罗泰教授进一步对中心地区与外围地区之间的经济关系进行分析。他导入经济学领域的世界系统论，并援引一位经济学家的观点：中心地区和外围地区之间的交换关系中，还存在着半外围—半中心区域；外围地区向中心地区提供材料和劳动力，中心地区的成品则向外围和半外围地区扩散——这便构成一种循环。类似的例子还有：商代的长江中游地区曾发现红铜与青铜器、硬陶等工艺品交换的痕迹。

罗泰教授认为，近现代的西方世界之中，这种系统往往是不稳定的，外围地区会被中心地区所吞噬。但商周时期的中国则不同，这种交易关系维持了较长时间，存在情况也比较稳定。以重庆盐巴遗址为例，当地制盐工具留下的痕迹从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延续到东周时期的地层。后代研究者则根据器物遗存初步计算了当时的生产量，并认为当时的盐需求量较大，巴人还将其出售到楚国等长江中下游地区。但生产这种资源的社会团体和种群并非中心地区人员，而是现在被称为少数民族的群体。考古人员曾在靠近中坝遗址的长江边发现楚式墓葬，并由此得出以下推论：楚人从楚国到此经商，抑或是巴人从楚国带回了当地的文化现象。

随后，罗泰教授谈论了西周晚期在中国社会史上起到的重要作用。早期的青铜器专家曾表示，该时期的青铜器发生了较大变化，这些变化反映了当时的社会体系和礼制体系情况。对此，罗泰教授认为，与之相对的还有经济上的变化，且这种变化关系可从考古材料中得到确证。可由北大考古队在山西曲村的发掘成果推算青铜的铸造数量——西周晚期的青铜器产量大大增加，宗教的改革也为当时的经济生活提供了推动力。

对于东周时期的城市文化，罗泰教授也分享了自己的一些看法。罗泰教授认为，中国的城市文明真正形成于东周时期。其时，城市数量迅速增加，功能发生变化——以政治宗教为中心转变为以经济活动为主；非首都的地方性城市也演变出了新的管理体系。此外，早期的城市基本属于同一族团，

但自东周以降，城市范围内的居民成分更加复杂。不同背景的人群在城市中混居，共同从事经济活动。

城市经济背景下的商业化催生了以货币为标志的都市文化。罗泰教授介绍，按照日本当代著名汉学家江村治树的研究结论，货币的流通在春秋晚期以后更加普遍；最先发行货币的是各城市的商人集团，而非国家。江村治树还绘制了不同货币的分布图，反映了其功能方面的差异：一些货币可被用作长距离贸易，另一些则限制于一个国家之内，还有专门适用于军事经济者而非现代意义的通用货币。战国时期丰富的文字遗存（如陶文等）也为研究者提供了都市经济管理等考古现象的信息。

东周时期的都城文化中已出现了大批生产的现象。在此，罗泰教授应用了考古学家从人类学理论延伸到工艺生产专业化的论述，并认为这一论述的重要之处在于它创立了相关方面的专业化词汇，这些词汇可在分析经济现象时使用。以青铜器生产为例，模具开始应用于生产有几个重要原因：如市场经济的发展、青铜宗教意义的转变及青铜器制造技术的进步等。青铜器不同使用者的需求，也反映了经济发展的倾向。其中，铜镜作为一种奢侈品，已开始大批生产，并进入交易市场——这体现了经济生活 and 精神文明的重要变化。

罗泰教授进而分析了墓葬所体现的社会体系。他表示，我们能够根据棺槨制度、随葬品组合乃至殉人数量判断墓主人的地位。墓主的死亡年龄，也能够反映各自的经济能力，及由此体现出战国中晚期社会平民化程度。相当一部分随葬品包含

了金属器物，即平民可使用的小件金属器。由未受到禁忌和限制这点，可推知战国时代也许已产生以消费者为焦点的市场经济——而这与以礼制为焦点的经济生活不尽相同。

最后，罗泰教授简要说明了丝绸之路正式出现前的长距离贸易这一重要的经济现象。目前，学界认同这样的观点，即游牧民族社会也存在农耕现象。在狭义的丝绸之路开通之前，中国的丝绸已开始外销。而对于秦和波斯帝国之间是否存在影响关系，考古学界曾有热烈的讨论，罗泰教授也对这种可能性持肯定态度。

接下来，与会学者就报告内容先后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并进行热烈讨论。孙华教授表示，罗泰教授更多地研究上层建筑的内容，却未离开经济基础，并构建了有关经济考古的系统化研究体系。在世界经济体系理论中，中心地区虽然获得了原料，但获得的对文明其作用的动力因素反而较少，不是输入而是输出文明。

苏荣誉研究员也分享了自己的看法。他以侯马和安阳地区未发现青铜器的原始模具为例，对罗泰教授提出两个问题：西周和战国时期的铜器是集中生产还是于不同地区生产？春秋时期是否打破了古代青铜器的生产垄断？对此，罗泰教授表示，现在可通过经济人类学等科学方法证明物品的生产地点；当时存在不同地区定做青铜器的可能，但由于研究材料匮乏，相关研究有待发展。

李梅田教授肯定了罗泰教授对未来研究的具有启示性论述。同时，在考古遗存的阐释问题上，他认为应抛弃“考古遗存

就是文化本身”的观点，并从经济现象等多个角度对遗存予以思考与阐释。罗泰教授关于城市问题的认识也给他带来了很大启发。过去，对于中国古代城市的研究存在一些误区，城市内部作坊和商业贸易的重要性被忽视。这要求研究者逐渐消除误区并思考经济因素在城市生活中的重要性；在思考历史时期的文化时也应注意秦前与秦后的重大差异。罗泰教授表示，他将经济基础视作重要部分，同时也注重文字、青铜器使用等上层文化对经济生活的影响——二者同时存在且互为补充。

韩建业教授同样肯定了东周时期的特殊意义，他表示，过去研究过于重视商代或之后的丝绸之路而忽略了这一时期的重要性。提及当时的中西交流，韩建业教授介绍了该时期的重要历史背景：东周时期伊始，北方出现半农半牧的游牧民族。南北之间的对抗使信息交流达到前所未见的高度，中原文化的衰落也使得当时的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另一方面，先前划定的文化圈还有待进一步商榷，不能仅用经济因素代替综合性的文化考量。对此，罗泰教授表示，他刻意把研究焦点放在社会层面上，就是为了避免将其与政治、经济因素混淆，出现模糊不清的局面；仅透过经济的角度也能得到整个古代中国文明的全体印象。

随后，钱益汇教授陈述了考古学研究视角的变化。他表示，东周时期经济学考古要求综合性研究，即出土文献、历史文献以及考古遗物的精细化研究；从经济学角度出发可从微观领域扩展到贸易的驱动力问题研究上。同时，他也认为，中心和

边缘的理论未必适用于所有的生产门类。王睿研究员则表示为，从经济角度来研究社会可能是一个最重要的途径——最能触及社会制度也是社会制度最直接的体现。考古工作者换一个角度对盐业考古进行系统考察，赋予新的可解说的材料，能够就此说明更加深刻的问题。

最后，罗泰教授回应了王睿研究员提出的有关商与周的对比问题。他举出了近亲结婚到同姓不婚的制度变化，认为这便于构筑族群之间的团结体系，是政治上的睿智做法。另一关键区别则在于宗教仪式的改变，且西周晚期的礼制改革可能对青铜器生产起到动力作用。由此，原有的特权限制被逐步取消，庞大的政治政权已无法制止市场经济逐渐发展的步伐。

（撰稿：陈洁樱）



58

周建波、李楠、孙圣民等： 交叉学科视角下的经济史学

2017年12月20日下午，“北大文研论坛”第五十八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交叉学科视角下的经济史学”。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张亚光担任主持，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周建波，文研院访问教授、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楠，文研院访问教授、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教授孙圣

民，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管汉晖，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郝煜出席并参与讨论。

论坛开始，张亚光教授介绍了与会教授历史学与经济学交叉的学术背景，以及他们在经济史学领域取得的成就。张亚光指出，经济史学家往往存在一些困境。在很多其他学科的学者看来，经济史学家很难划分到某一个阵营当中，既有历史学背景出身的经济史学家，也有经济学背景出身的经济史学家，彼此之间也存在隔阂与误会。张亚光教授希望能够借本次论坛的机会，充分讨论，使这一学科得到更多人的理解和关注。

周建波教授率先做主旨报告。周建波教授指出，人们通常以为交叉学科更容易



论坛现场

出成绩，但它的劣势在于其并不容易被两边接受，要被两边所接受，学者需要付出相当多的努力。一般来说，学历史的需要懂史料，史料强调不能孤证，说明一个问题，起码要三条史料论证。然而到经济学这边写文章，经济学家会说一条史料就能讲明白问题，不需要那么多史料。甚至史料都不需要，用大白话或者完全用数学表达。所以经济学领域的文章十分抽象，理论性很强。但在历史学看来，经济学这边就是模型和计量，没有史料。历史学的文章往往强调从小事入手，强调来龙去脉。经济学的文章强调制度的制定和绩效。

周建波教授强调，两个学科应该相互借鉴。历史学最大的优点在于史料丰富，弱点是理论性不够强。经济学最大的优势

在于极度抽象，但缺乏史料论证是它的不足。两个学科的结合并不容易，各有侧重点，只能发挥各自的优势。而经济思想史是在这交叉学科之中最为边缘，人文色彩最浓的。换言之，在经济学的百花园中，经济思想史最孤立，也最难发表文章。同时，周建波教授认为做经济思想史不容易，天文地理什么都得懂一些，比如要做游牧民族南下给汉民族制度变迁影响的课题，就要求懂气候、地理。这个学科对学者的知识结构的要求高，做出成果不容易，所以说它有它的乐趣，也有它的难度。

管汉晖教授以怎么看待经济学和历史学这一问题为切入点，谈及这两个学科的性质。在管汉晖教授的理解中，历史学兼具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属性，更多具有社会科学的属性，需要找到人类发展背后内在的规律。从这个角度讲就产生了分歧。经济学讲资源配置，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后来有了制度经济学，科学属性会弱一点，更多需要吸收文化、制度这些方面，但总体仍是一门社会科学。回到经济史学，经济史到底算是经济学里的社会科学，还是算是历史学里的人文学科，也存在分歧。

管汉晖教授提到，他在经济学院教经济史，都从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出发。经济史是经济学里面核心的分支学科，并不冷门。比如在研究货币传导机制上，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是大萧条。大萧条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经济衰退，几代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对大萧条产生的原因进行研究，得出了共同的结论，是因为金本位。金本位出了问题，货币危机通过金本位在不同国家之间传导，这是规律和科学。要研究

长期的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类似于经济增长、人口转型、收入分配，经济史是必不可少的。

李楠教授引用经济史大家吴承明先生的观点，指出史无定法，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但在处理历史问题和分析历史问题的时候，可能针对不同的研究问题，采用不同的研究范式。研究范式基本分为两类，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

人文学科视角属于传统的历史性研究，强调考据。比如研究王安石的经济思想，不能直接进行量化方法，首先需要处理文集、笔记这些材料，这是传统人文学科的研究范式。社会科学研究范式下，学者不是要刻划历史事实本身，而是要针对具体问题，从历史事实当中去解释问题。所以社会科学范式处理经济史的时候，需要提出假设，除此之外还需要有一些证据来证明假设是对是错。这一过程中可以采用收集数据的量化方法，也可以通过一些史料进行论证。但不管用定性方法，还是定量方法，这都是一种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

然而近年来研究范式产生了进一步的转化。从社会科学研究范式来讲，从上世纪末到现在一直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真正的经济学研究早期集中在历史学的范式之内，并没有摆脱整个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研究的视野。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开始一场新经济史革命，开始在经济史的研究中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和统计学方法，实现经济史研究的科学化。到2000年前后，对经济史研究来说，特别是历史计量学，其研究范式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变化主要集中于研究目的。早期经济史研

究目的是出于解释历史，但从上世纪末到现在，历史计量学的目标是为了发展整个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理论，为整个学科的理论范式服务。从具体的研究方法来讲，也与过去单独使用序列数据，进行简单的统计分析和回归分析，也存在很大不同。现在主要强调系统化数据的使用，侧重因果关系的识别。

很多人对历史计量学存在认识上的偏差，可能由以下几个问题导致。首先一个问题在于概念上的混淆。李楠教授对容易产生混淆的三个概念，历史计量学、历史经济分析、量化历史进行厘清。其次重要的争议根源是史料的使用逻辑。李楠教授认为，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水火不容，研究范式不是最大的障碍，而是怎么去认识研究材料和研究素材的问题。

最后，李楠教授认为，经济学家做经济史应关注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中国是非常特殊的。另一方面需要关注比较研究，中国实际上是整个大的研究范式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孙圣民教授在报告伊始呼吁加强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特别是经济哲学的研究，这对经济学的发展是非常有意义的。如果在经济学科内部以科学性和人文性划分坐标，可以看到，其中科学性最强的学科毫无疑问是理论计量经济学和数理经济学，科学性最弱的就是经济学方法论和经济思想史。现在经济学内部被经济学的主流方法逻辑思维接管，还出现了很多冲突。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我们需要考虑两个层次。第一，人文社会科学终极目标是什么；第二，人文社会科学的手段是什么。

首先，孙圣民教授引用马克思·韦伯的观点，认为人文社会科学阶段性目标是寻求科学性和规律性，总体目标是追求人文情怀，获取具有特殊性质的文化现象的知识。反对观点会质疑，经济学寻求规律科学性，那么人文情怀及其特殊性体现在哪里。这牵涉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经济理论和经济实现的分裂。经济学本身是社会科学，如果其目的要回归到经济学初创时期所强调的增长人民福祉，增加国家财富这个状态，后两个层次的人文考量就无法避免。在实践中，如果用纯粹实证科学的结论去指导经济实践的话，只有两个结果，第一是理论或结论失之毫厘，实践谬之千里，第二则是经济学家会被骂得一塌糊涂，是纸上谈兵。人文社会科学在哲学层面上有很清楚的阐述，科学和人文之间应该有一种张力，丧失理性追求的人文情怀可能会走向偏执，丧失人文的科学也会走向自己的负面，这是历史发展中表明得很清楚的。这一点在哲学上没有争议，但在经济学里面还有忽视的地方。

其次，回到科学哲学和方法论的问题上，孙圣民教授认为当前中国的经济学需要在西方经济学，和传统中国经济思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间寻找到一条可行的道路。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在经济学方法论和经济哲学上思考，当前西方经济学分析工具和思想深度的冲突。在经济学当中，如果强调的是工具理性，是能够找到规律。然而实际上一个理论或方法特别强调理性的时候，往往会丧失其思想深度、忽视个性的方面。一个理论如果它确定性越强，其思想深度可能越弱，因为确

定性强的时候，有普世性道理，但往往信息含量更少，对解释个案没有价值。理论的普适性和实践性之间的矛盾，应当从方法论的多层次来解决，而不仅是空谈，也可以落到实地，做具体案例研究。孙圣民教授指出，工具理性是一个难以跨越的障碍，追求规律是经济学的重要任务，但同时也需要对科学和唯科学主义进行区分，我们可以追求科学，但不能脱离具体的文化和伦理特征，走向唯科学主义的极端。

孙圣民教授继续往后推，思考因果关系的讨论是否真的是客观的，这种因果关系的客观性和主观性体现在哪里。孙圣民教授认为，计量经济学和数理经济学本身可能没有主观，但当学者把这种工具用作经济现象分析时，必然带有主观视角。另一方面，做因果关系判断之前，就已经有价值关联存在。比如逻辑实证主义基础上的经济学数理模型被很多学者批判到，其缺点就在于它所有的结论已经在其假设中包含了，推导过程只不过是把它的假设抖落出来而已。孙圣民教授总结，西方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可能不是完美的，但中国经济学也无法完全抛弃西方经济学而再做一套东西、另起炉灶，而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属于西方经济学的一种。因为在西方科学哲学内部也在批判并发展逻辑实证主义，但目前西方经济学还没有找到更加完善的科学哲学基础来完全替代逻辑实证主义。我们还必须在这一基础上继续推进，但特别要重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和“知行合一”的实践理念。

郝煜教授分享了姚洋教授写的文章《经济学的科学主义谬误》，认为这段话很大

程度代表了他的价值观。经济学和历史学的差别在于，经济学考察小尺度的历史，而历史学考察大尺度的历史。历史学可以忽略个体层面或者短时期内的因果关系；经济学则不然，它的主要任务是解释个体层面和短时期内的因果关系，它的方法论因此就必须提供一定的推理能力，以便对因果关系做出明确无误的判断。这样做的后果自然是经济学理论的片面性。在片面而趋于深刻和全面而流于肤浅之间，经济学选择了前者。他为读者构造一个故事，并用经济学的语言把它叙述一遍，这个过程就是经济学的证明。证明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能在更加接近现实和模型的可操作性之间取得平衡。

郝煜教授认为，经济学和历史学本质上都是在讲故事，只不过使用的语言稍有不同，因此也不需要期望经济学就是科学，它就可以去预测所有事情，这不是经济学的目的，经济学做不到这一点，这不能成为对它的批评。

张亚光教授最后进行了简短的总结，他指出：经济史学在中国学界的现状是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与“救亡（发展）压倒启蒙”两大思想脉络撞击融合的延续。经济史学的未来既要强调中国的本土性，也要接纳西方学术成果的合理性，应当更加重视经济哲学和经济史学方法论等元问题的讨论。

（撰稿：张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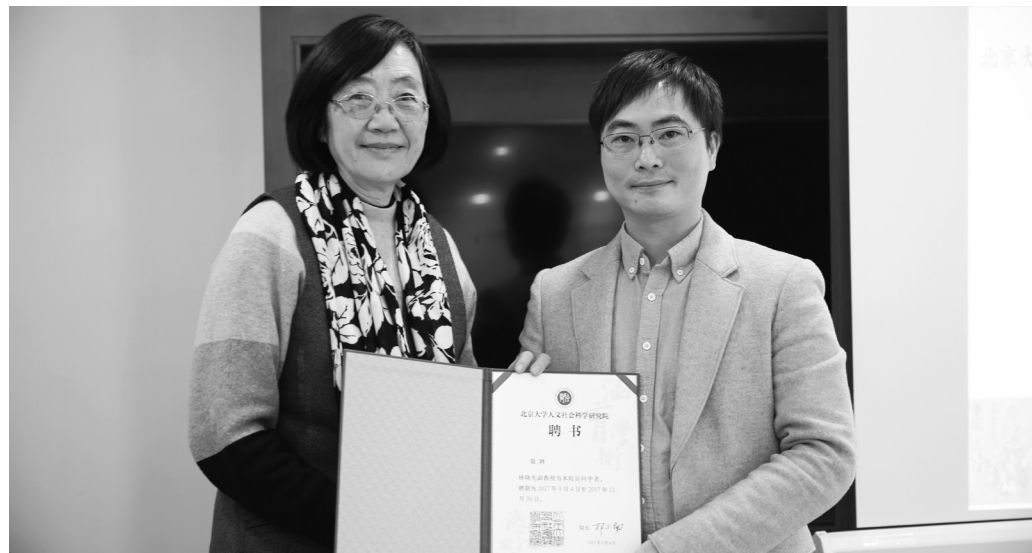


（四）文研汇讲

01

林晓光：

文本扭曲镜像中的汉魏六朝文学



院长邓小南为林晓光副教授（右）颁发聘书

2017年11月7日，文研院第三期期邀访学者报告会（第七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访问学者、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林晓光以“文本扭曲镜像中的汉魏六朝文学”为题展开报告。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访问教授邓淑苹、李楠、孙圣民、肖瑛，访问学者陈波、陈志远、华喆、胡鸿、唐雯，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高峰枫

教授参与讨论。

在本次报告中，林晓光老师通过两个典型案例进行分析，阐述了汉魏六朝文学的面貌受文本保存状态影响，文本扭曲镜像误导后人解读文学的情形。林晓光老师指出，应充分反省文本生成机制，纠正作品与文学史的误读行为，发现被历史遮蔽的面相，并重新思考汉魏六朝文学的性质、功能与评判标准。

林晓光老师首先以曹植名篇《洛神赋》为例，并介绍这是一篇含“兮”字骚体句式与不含“兮”字六言句式相混杂的作品。这种现象在汉魏六朝赋中十分常见，往往被学者认为是赋家探索体式多样性的表现，并从文学创作的角度加以解释。曹丕《柳赋》与应瑒《灵河赋》均属此类。

但是，汉魏六朝文学的现存文本，大多数都并非由作者个人创作出来后，以原生态面貌保存至今的。与现代文学以作家个人手稿为第一手文献进行发表、出版不同的是，唐代以前，文学文本的这一生成阶段已被湮没在历史时空中。我们能够获得的最早文本，大多数是通过中古总集、六朝正史和唐宋类书保存下来的。其中尤其以《艺文类聚》等类书的保存数量为多。在那之后，又经由明代以后的历代学者从早期文献中辑佚编撰，重新编成系列性作家别集及通代性的总集。因此，在这一领域，上述这些总集、正史和类书才是能够追溯到的最原始文献。

带着这样的意识分析，我们就会发现《柳赋》《灵河赋》这类骚体、非骚体混杂作品的产生，实际上是由于其片段被分别编录到不同类书中造成的——有的类书保存了“兮”字，有的类书则将其删去。当这些片段被后代学者重新辑佚拼合起来后，相互重合的部分中，含有“兮”字的句子便覆盖了不含“兮”字的句子；而不相重合的部分，“兮”字已被删去的句子便暴露出来，从而形成了这种混杂的体式。换言之，这是一个应从文本在后世流传接受角度解决的问题，而非作家主观创作角度。

回到《洛神赋》，通过将收录于《文选》的文本与王献之书“玉版十三行”的片段进行对勘，同样可以发现类似的现象。看来，对“兮”字句的这种传抄编选脱落早在六朝时期便已开始了。

在这种文本对勘的基础上，林晓光老师对早期赋史中骈赋、律赋的流行阶段以及骈赋与骚赋的分合等问题进行了反思。进一步跳出赋史，林老师介绍了汉魏六朝文学研究在这个方向上加以扩容深化的新潜力。在承认这一时期文学文献已难以完整且近真再现的前提下，学者开始走向文本中介研究，即通过梳理作品文本在各种抄本、刻本、选本制作流传过程中的动态文本生成史，来确认其研究基础。宋元以后，学者无须凭借文本中介便可直接面对作品原初面貌，汉魏六朝文学研究则与之有着研究范式上的差异。这种文本生成研究，一方面超越了对现存文本作线性排列的博物馆展品式文学史叙事，走向“层累”式的、前后联动的文本建构史；另一方面则通过归纳文本生成原理及类型，反推现存文本中已不可见的部分，致力于复原中古文学的疆域全像。

但是，这一研究方向目前引起了一种忧虑，即“文本学”是否会摧毁“文学”研究？林晓光老师表示，“文本学”恰恰能为古典文学研究建立更可靠的文本基础，在这一基础上，最终仍能落实、也仍将回归到作品解读上，甚至可能由此展开重写文学史的工作。他在此展示了另一个案例。

曾被鲁迅称为陶渊明“摩登”情书的《闲情赋》，实际上在《艺文类聚》中还收录了一系列的汉魏亲缘作品。以王粲《闲邪赋》

为例，由于类书的删略，这些作品的文体被遮蔽，叙事被歪曲，不同人物的声音被张冠李戴地拼凑到一起，从而引起后世的误读。在将这些作品片段一一对照《闲情赋》落实到应在位置后，可以发现，这一系列作品从属于同一个谱系，共享一致的主题、文辞与书写模式。而这一谱系又与汉魏六朝文学的另一重要谱系——《神女赋》谱系交织、互文。

在以上实证性讨论的基础之上，林晓光老师最后转入对汉魏六朝文学世界的整体思考。那是一个共享基本写作程式，并以是否具有学习、获取这一程式的能力为文学标准的时代，具有与书画音乐等纯艺术相似的性质。在这样的世界中，“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往往不如“这套文本”与“那套文本”的关系来得更直接有效。与“抒情”“个性”等作者个体可控因素相比，那个时代的作者更像是被特定传统及资源规定的书写传递者。从这些角度看，文学作为一种基于特定文化传统和社

会资源的书写能力，直接作用于政治、社会运作，并成为表达个人及家庭社会地位的符号系统。正是这一基本功能承载着中古贵族文学的兴盛展开。

主题报告之后，各位学者就如何评价程式定型的关键人物、著作权的成立、变异文本的出现时代与复杂性、东西方抄本的文化性质与具体表现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探讨。在林晓光老师看来，这些前沿问题正是在目前工作基础上需要进一步探索的。例如，构造性的程式得到分析理解后，大文学家是如何跳出这种程式创造新声的？新变又是如何被再度纳入程式中的？在过去，评价张衡、蔡邕等名家一般基于现存文本及古人评论，但在文本生成研究的基础上，其枢纽性作用又将得到怎样的展现？这一方向上的许多问题正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来予以解答。

（撰稿：林晓光）

02

华喆： 图像·文本·理论——礼图与礼学研究

2017年11月14日，文研院第三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八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访问学者、

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副教授华喆以“图像·文本·理论——礼图与礼学研究”为主题展开报告。文研院院长邓小南、



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访问教授邓淑苹、李楠、孙圣民、肖瑛，访问学者陈波、陈志远、胡鸿、林晓光、唐雯参与讨论。

华喆老师首先从研究例证出发，导入了本次报告的主要问题，即礼图的出现对于理解礼学的意义何在。华喆老师在撰写博士论文的过程中发现，关于《论语·乡党》中“疾，君视之。东首，加朝服，拖绅”一句，郑玄的注释与何晏《论语集解》所引包氏注的结论正好相反。若将二人的注说用图示的方式进行复原，可以较直观地理解双方各自的用意所在。郑玄更多地从礼学的意义上考虑，严格遵循了《仪礼·士丧礼》的经文以及礼学的内在逻辑，着眼于经典中明确规定的内容，不随便以日常生活经验左右对经义的判断。而包氏则依赖日常的生活经验，所以才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

由此可见，图示对于理解礼学家的经说来讲具有直观有效的特点，而礼图在中国历史中也有着非常久远的绘制传统。广义的礼图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丧服图、礼器图与仪节图。

第一类是丧服图（又称服制图）。目前我们能看到的最早的丧服图是马王堆3号汉墓中出土的帛画丧服图，其与后世丧服图（如元代龚端礼《五服图解》）的基本架构没有很大的差别。第二类是礼器图，主要代表是北宋聂崇义的《三礼图》以及陈祥道的《礼书》。主要的根据是三《礼》及郑注构拟了礼仪中的器物样式，但与实际考古中发现的古器物存在较大出入。最后一类就是华喆老师目前正在关注的、对于理解礼学有直接帮助的仪节图，其代表是南宋杨复的《仪礼图》与清代张惠言的《仪礼图》。它们都将《仪



华喆副教授

礼》中的礼仪场景及过程通过“文字—图像”的转换，以更为直观的方式呈现出来。故此，自清代以来，杨复与张惠言的两部《仪礼图》一直是学者研治《仪礼》时倚为左膀右臂的参考书。

华喆老师指出，杨复《仪礼图》的出现，在礼学史上具有特别的意义。在朱熹的启发下，杨复绘制《仪礼图》，福建书坊以此取代《仪礼注疏》并使之退出了十行本系统。不仅如此，杨复《仪礼图》的出现使得《仪礼》学者的经说中出现了一股“图示型”经说的风潮，即学者普遍通过礼图的辅助对《仪礼》进行思考。其中的代表便是元代学者敖继公的《仪礼集说》。华喆老师通过列举四种不同的例证来说明这种“图示型”经说的发展趋势，它们分别是《仪礼·士冠礼》“主人升，立于序端”、“适东壁，北面见于母”、《士昏礼》郑注“饌要方”及《乡饮酒礼》“乃席宾、主人、介”。对比郑玄立足于文本的思考，杨复、敖继公乃至清代以后的沈彤、张惠言、胡培翬、黄以周等学者，无不

试图在礼图上落实一些礼仪活动的细节，使得《仪礼》的解释呈现出不同于郑玄的走向。由此也可以看到，礼图既可有助于我们阅读《仪礼》，又可因其具象化的表现手法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们对于郑玄经说的理解。

主题报告之后，与会学者就如何看待和理解郑玄、礼仪空间及经学史的范式转变问题展开了深入而热烈的探讨。

（撰稿：华喆）

03

胡鸿： 林间自在啼——在物质环境中理解文本

2017年11月21日，文研院第三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九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访问学者、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副教授胡鸿作主题报告，题目为“林间自在啼——在物质环境中理解文本”。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邀访学者邓淑苹、陈波、孙圣民、李楠、肖瑛、华喆、刘未、陈志远、林晓光、唐雯参与讨论。

胡鸿老师首先总结了当下“历史书写”研究的两种常见路径：其一是追寻一类文本普遍的书写模式，另一种则注重溢出一般模式的叙述策略研究。对于文本的物质载体而言，要么被忽略，要么只在第一种

路径下研究一类物质载体的共性特征——很少见到对其进行“叙述策略”分析。至于出土文献，历史学者若仅根据录文进行研究，则会在不觉之中错失很多重要的信息。本次报告，胡鸿老师以鄂尔浑古突厥碑铭和溪州铜柱为例，对后一种研究路径做了初步尝试。



胡鸿副教授

接下来，胡鸿老师介绍了鄂尔浑突厥碑铭的历史背景，以及古突厥鲁尼文在阿拉美系文字谱系中的位置，并由此引出对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突厥文书写顺序的讨论。阿拉美系文字（如作为突厥鲁尼文直接母型的粟特文）自右向左书写，自上而下换行。若旋转九十度刻到碑石上，则该自上而下排列，再自左向右换行。噉欲谷碑遵循了这样一种书写传统，而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的换行顺序则是自右向左的，这一点非常不自然。如果考虑到换面顺序，阙特勤碑采用了南－东－北－西（从左到右）与东北－东南－西南（从右到左）的换面顺序。其中，主要的三大面的切换顺序正好与面内的换行顺序相反，这在阅读时引起很大的不便。

这一矛盾在毗伽可汗碑得到调整，它采用了北－东－东南－南－西南－西的连贯顺序，同时也是自右向左的顺时针方向，这就与各面内自右向左的换行一致了。然而这样的顺序与噉欲谷碑所代表的自然书写传统彻底背离。毗伽可汗碑影响力大，此后的鲁尼文碑铭全部都袭用了它的文字书写顺序。在突厥鲁尼文和粟特文合刻的塞富莱碑上，有两种同源的文字在同一碑面上相向换行，并最终汇聚于中线。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变化，应是受到同一碑上中文刻写的影响，两种书写传统在碑石上的交汇背后是两个政治体间的文化权利博弈。文字书写顺序之外，此二碑还有一个特别的现象，即其龟趺的朝向都是头西尾东，也就是以背面正对着墓园的入口。这一奇特现象并未引起充分注意。胡鸿老师推测道，这大概是出于两

种要求相妥协的结果——御制中文碑文位于碑阳（即龟趺头部方向）以及需将突厥文朝向墓园入口。

第二个案例是五代时期马楚政权所立的溪州铜柱。该铜柱因刻有长篇铭文而受到前贤关注，但其物质形态以及铭文文本结构并未得到深入讨论。就物质形态而言，前人多据铭文便认定它有意模仿东汉马援铜柱。而胡鸿老师则从汉唐有关马援铜柱的记载入手，认为这些记载大多来自穿凿附会的传闻，并对马援铜柱的存在表示怀疑。但文本的力量让它成为不容置疑的事实。隋唐时代有多人声称发现或复立马援铜柱，这一倾向又与唐代树立金属柱并刻铭的风尚相结合。以上情况成为五代溪州铜柱得以铸作的文化与技术背景。

由于文本缺少对马援铜柱的准确描述，溪州铜柱在设计过程中很可能参考了佛教经幢的形制。符号式模仿与实际操作中的技术性模仿必须加以区分看待。另一方面，溪州铜柱的制作是马楚政权与以彭氏为首的溪州势力斗争与妥协的结果。铭文中既有昭示马楚功德的记与颂，也刻有保证溪州权益的誓文，呈现出纪功碑与会盟碑的结合形态。五代后期至宋，又以铜柱上的“誓”为基础形成了都誓主和誓下州的体制，卢陵彭氏藉此从外来王朝官僚转化为蛮酋之首，成为溪州铜柱背后的最大受益者。

主题报告之后，与会学者分别从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佛教史的角度对两个案例提出质疑并进行热烈的讨论。

（撰稿：胡鸿）

04

刘未： 考古学视野下的晋东南宋元村落

2017年11月29日，文研院第三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十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访问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刘未作主题报告，题目为“考古学视野下的晋东南宋元村落”。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世瑜，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访问教授邓淑苹、李楠、孙圣民、肖瑛，访问学者陈波、陈志远、胡鸿、华喆、林晓光、唐雯参与讨论。

刘未副教授首先解释了研究晋东南宋元村落问题的缘起。2006年，他随赵世瑜教授组织的第四届历史人类学研修班赴山西晋城进行田野考察，寻访村、庙、碑。以府城玉皇庙为个案，他试图对寺庙的外部空间（即村落联合体）与内部空间（即建筑及图像布局）进行复原分析。同年秋季，他在参加由徐怡涛教授组织的晋东南早期木构建筑调查时，补充了村落寺庙建筑史的分析视角。他还意识到，不同学科在晋东南研究中所关注的对象与视角存在较大差别。如今，刘未副教授试图以晋东南宋元村落研究为主题，整合碑刻、建筑、塑像、壁画、戏曲、仪式等研究素材，进行一项新的历史考古学研究尝试——在中等尺度下开展短时段区域性研究，重点讨论各类材料所反映的空间性、时间性以及物质性问题。



刘未副教授

对晋东南宋元村落进行考古学研究，自然离不开回溯历史人类学和聚落考古学的相关研究。以空间因素而论，需要考虑的有1980年代以来华南研究中的仪式联盟、信仰空间问题，1970年代台湾研究中的祭祀圈、信仰圈问题，1960年代施坚雅的市场体系理论以及1930年代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等。自1950年代戈登·威利在秘鲁进行聚落形态研究以来，通过系统性区域考古调查进行空间分析在史前考古范畴得到了广泛的发展。但是，能否将其历史考古领域仍待探索。

接下来，刘未副教授试图以以空间性分析为例，从三座庙宇材料出发引出晋东南村落研究的基本问题。由此，他也将其所处的长治盆地西部设定为初步的分析区

域。该地区属长子县东部与屯留县东南部的浊漳河（南源）流域，面积约 600 多平方公里。第一座庙宇为长子西上坊成汤庙。刘未副教授重点讨论了金正隆二年碑阴题名记所反映的“县—乡—管—村”结构。结合《长子县志》收录文庙元至元八年碑阴所载钦崇、漳德、义风、神义的近 150 个村落名称，可大体复原金元时期长子县所辖四乡的地域空间。第二座庙宇为屯留东酪余三峻庙。刘未副教授侧重讨论元至大元年碑所反映的崇仁乡李高管空间复原，他还表示，可将庙宇附近所发掘的同时代家族墓地纳入分析范围。第三座庙宇为长子小关三峻庙。在此，刘未副教授关注于金贞元元年碑所反映的钦崇乡小关管空间复原，并将其与同庙传世赛社写本反映的仪式传统相联系。

通过以上个案分析，刘未副教授指出，首先我们要从宋元村落的社会空间问题入手开展研究。为此，他对长子县村落及寺庙进行了为期一周的田野调查，并在地理环境体验、碑刻资料补充、木构建筑编年、村民工匠的访谈等。由此，他对已有研究资料进行整合，并对宋元村落的社会空间问题重新加以思考。刘未副教授表示，要考虑不同时代碑刻“书写”的差异及“存亡”的影响，并留意以往研究中“七社十八村”、“六庄七社”、“八庄五社”这些“典型”案例在古今重叠、历史延续方面的特殊性。考古学区域调查结果显示，从共时的角度出发，村落社会空间类型多样与范围交错提示我们要对寺庙背后的村落网络关系做更复杂的考虑。而从长时段的视角看，用材料丰富、结构完整的晚期经验去缀合材

料有限、结构残缺的早期图景有可能出现偏差。

除了对社会空间进行分析，刘未副教授还提出村落的地理空间问题。克里斯塔勒与施坚雅理论建构了“州城—县城—市镇—村落”的六边形级差体系。该模式的形成主要基于观察近代材料的基础之上。从长子县的个案来看，中心市镇的形成时间比较晚近，这暗示着早期村落空间格局可能存在另外的模式。受古今重叠型城市考古启发，并借助于民国时期地图乡村路网来分析长子宋元村落的空间关系，由此，刘未副教授提出了一种村落间十字形无级差体系的可能性。

发言结束之后，赵世瑜教授对报告内容进行评议，其他与会学者也从各自研究领域角度对报告所涉及的问题展开了充分的讨论。

（撰稿：刘未）



05

陈波： 家屋社会与中国研究

2017 年 12 月 5 日，文研院第三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十一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文研院访问学者、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陈波作主题报告，题目为“家屋社会与中国研究”。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访问教授邓淑苹、孙圣民、李楠、肖瑛，访问学者华喆、胡鸿、刘未、唐雯参与讨论。

首先，陈波副教授将该题目置于中国古代儒家典籍对婚姻的观念之中来考量。《礼记·昏义》有言：“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这短短一句话里，将后世人类学所研究的婚姻、继嗣、神圣性、社会性等因素不可分地联系起来，给人极大的启发，并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后世的中国人人类学家（如吴泽霖等）。吴氏根据当时的功能主义人类学观点，整合儒家思想，提出以下几点：其一，生理上讲，结婚纯粹是个人男女受着性欲的逼迫，寻觅一个或几个异性，过共同的生活；其二，复杂的社会层面，在宗法制度之下，育儿生子或许更为重要；其三，婚姻可用来促进宗族的利益；最后，婚姻另有一个目标——防乱。



陈波副教授

基于既有的继嗣观念，人们常会提到父系继嗣与母系继嗣。根据陈波副教授在尼泊尔洛域的实地研究，父系继嗣的某一代人中只有女性，这时若招赘上门，延续的依旧是父系。更突出的例子是某一代在采用各种可能的措施（包括婚姻）后，依旧绝嗣，不得已从外面收继不同种姓的女婴来延续家。这个时候，家屋的概念就明显地呈现出来了。在福建、四川等地也有类似情形存在。它们为人类学的亲属关系研究提出新的议题——这便是列维—斯特劳斯倡导的“家屋社会”（sociétés «à maisons»）。

世界各地皆发现或曾经发现有一妻多夫的现象，地点遍布北美、南美、亚洲、欧洲、非洲……其中，非洲数量较少。聚焦至亚

洲，则包括南亚的斯里兰卡、印度，中亚，东亚的中国（古代）等地区。在青藏高原上，根据亲属关系（婚姻和继嗣）的不同，可以分为内区和外区。它们各自二元互补，但相互作用时则是结构倒置。在不同地方，一直有一部分人将一妻多夫现象视为“道德败坏”、“社会落后”。但值得注意的是，当人们批评同性恋时会被认为政治不准确，为何批评一妻多夫现象不会引起人们的反诉呢？对此，我们只有越过现象，深入各地的社会－文化逻辑，才可以明白上述各地践行的一妻多夫，并不能视为同一种“婚姻形式”，而是各有各的社会－文化理由——这些理由也跟家屋有关。

列维－斯特劳斯将家屋视作一种制度，指的是“一个法人（personne morale），拥有一笔用物质的和非物质的财富构成的产业，沿着真正的或虚构的世系传承其名号、财富和头衔而永续下去。只要这一延续能用亲属关系或姻亲，且常常是同时用二者来表达，这个世系就是合法的。”它往往包含各种冲突性的原则：如父系与母系，本地人与外来人，高攀婚与下嫁婚，远婚与近婚（如与堂兄弟姐妹结婚），世袭与选贤继位等。

列氏考察的主要是无文字、“无差别”的社会：如美洲西北海岸、加利福尼亚的印第安土著部落，非洲，太平洋岛屿，日本十至十一世纪的王室以及欧洲中世纪贵族等。但对于他的定义，学界在理解层面上存有相当多的歧义。譬如，家屋概念是否只限于贵族家屋？在这方面，对列氏的探索不应离开其博士论文《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

简单社会中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分为两种：一是限制性交换，一是一般交换。家屋社会所涉及的则是从简单社会到复杂社会那一刻的交换结构。据列氏所言，政治－经济利益没有自己的语言，基本结构的亲属关系便成为家屋社会的语言。原来的单一继嗣概念无法解释这些新的社会现象。青藏高原藏文明区域的丰富案例，可以为我们进一步思考家屋社会概念提供助益。

这些研究让我们看到，中国古代的婚姻观有其局限性，但也因此获得拓展；而欧洲－西方的人类学亲属关系理论，也因之而得到修正。

（撰稿：陈波）



06

孙圣民： 对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哲学思考



院长邓小南为孙圣民教授（右）颁发聘书

2017年12月12日，文研院第三期访问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十二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访问教授、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孙圣民教授作主题报告，题目为“对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哲学思考”。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访问教授邓淑苹、李楠、肖瑛，访问学者陈波、陈志远、胡鸿、华喆、刘未、林晓光、唐雯参与讨论。

此次报告的选题缘起于当前国内经济学存在的诸多争议之一，即经济学的假设脱离实际，不具备现实意义和整体解释力。鉴于以上争论，孙圣民教授从历史和方法

论的双重视角出发，在经济学假设与经济学适用范围方面做出回应，以期更好地解决在中国经济实践中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学所遇到的一些问题，来实现“原汤化原食”。

纵观学科发展历史，经济学曾经在很长时间内被历史学、社会学所“奴役”，后历经亚当·斯密、凯恩斯、罗宾斯等一代又一代经济学家的努力，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现阶段，经济学日益呈现向外帝国主义，向内专业化分工加速的特征。

在经济学基本假定“经济人”上，历史学派坚持人性的多样性和易变性，认为

不具有适用于各个国家的、同一的人性。因此，“经济人”假说并不可靠。但对于经济学而言，逐利是影响经济行为的第一动机，其他动机的影响都是散在的、不确定的。将人放置于经济关系中，将人抽象成“经济人”是完全合理且必要的。

经济学上所做的另一重要假设即理性假设，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合理的。人类行为在具有经济意义之前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合乎理性的，即“有目的的”。

在经济学假设与经济理论的关系上，有意义的假说所包含的一些“假设”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现实的不准确的、描述性的表述。假设的重要性在于它在阐述模型时呈现出的简洁性、直观合理性特点，而非努力逼近现实。由此，得出一个理论不应用其“假设”的“真实性”来加以检验。

经济学假设与理论的哲学基础是经验和认识。我们可从经济人假设和经济现象获得相关知识和理论，而两者的相互促进发展也保证了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占据比较优势。

正如社会学、历史学所描述的那样，经济活动和其他社会因素存在相互影响。然而，将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并孤立于其他社会问题进行研究是必要的。经济学家若坚守中庸之道，不划分确定的边界，将被实际现象的复杂性所困扰。因此，经济学家应该遵守专业化的道路，并保持经济学的独立性。

和其他科学一样，经济学也包含潜在的错误，并不断努力寻找具有逼真性的知识。现有理论的批评主要针对理论假设和现实世界存在差异。然而，判断的标准是

预测能力，而非上述差异——预测能力更强才是理论的进步。

经济学的意义在于帮助我们了解所做选择的含义而非直接代替我们进行选择，我们通过经济分析了解这复杂社会中的行为选择。经济学从来不假设各个目的的和谐一致，而是正视各个选择之间的冲突。经济学家往往持有悲观论，这是由于其基础假设建立在各种人性预期中的下限。

在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这个问题上，罗宾斯认为，经济学研究的是人类行为在配置稀缺资源手段时所表现的形式。在该定义下，涉及稀缺性的人类行为都被纳入经济学的范畴。这也使得经济学不可避免地走向抽象思维，弱化了对经济事件的指导意义。

孙圣民教授指出，布坎南认为应当将“市场理论”（而非“资源配置理论”）置于核心地位，且罗宾斯对于经济学主题过多的劝告性描述将阻碍学科的进步。因此，布坎南主张经济学家应成为“市场经济学家”，集中注意市场制度或交换制度。他还劝告经济学家不要过多尝试翻越个人（或个人单位）与“社会”集体之间的桥梁——个人行为难以通过加总计算得到社会行为的模式。

（撰稿：孙圣民）



（五）文研读书

04

民国北京的城市书写与历史记忆 ——《重写旧京》研读会

2017年12月4日下午，“北大文研读书”第四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民国北京的城市书写与历史记忆——《重写旧京》研读会”。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化所研究员季剑青担任主持并作引言。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唐晓峰，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岳永逸，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所长王建伟，文研院访问学者、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袁一丹，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建筑系讲师刘亦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赵益民出席并参与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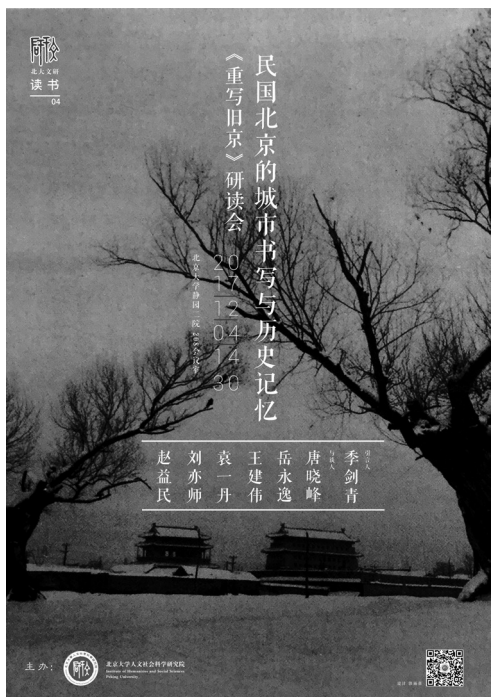
论坛伊始，季剑青研究员便表示，从中国近现代城市史的学科角度来看，北京研究相比于上海研究是较为薄弱的。上海研究的学者往往从现代化视角来考察上海的现代转型，北京研究也多少受到这一范式的影响，并将讨论焦点集中在市政建设、公共卫生、都市犯罪等社会层面，多为社会史的研究。在这样的视野下，北京的独特性表现得并不是那么突出。

撰写《重写旧京》一书的过程中，季剑青研究员逐渐意识到，北京的特殊性恰恰可以提供新的视野来突破或挑战这种主



季剑青研究员

流研究范式——不是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北京的特殊性，而是将这种特殊性提升为一种新的、不同于已有城市史研究的视角和范式，即“以北京为方法”。北京特殊性的一个重要方面便在于其拥有的漫长的都城史和丰富的历史遗产。在现代性展开的过程中，人们如何对待和处理这些遗产（或说“旧京”）是本书的一个核心问题意识，这个问题在民国时期北京表现得尤为突出和典型。但在中国，很多有历史积淀的城市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所以它具有普遍性。但在探讨如何处理过去的城市、过去



的遗产等问题时，可有不同的视角和途径作为切入点：如文物制度、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等。

季剑青研究员选取的角度则是从各类城市书写的文本材料中讨论民国时期人们对“旧京”的记忆，以此来突出“人”的位置，考察人们的主观情感和态度。城市史研究往往只关注社会、经济、建筑空间等物化的层面，而忽略了人的生活经验。实际上，人的日常经验才赋予城市以生命。在现代文学研究中，文学与城市的关系也是一个颇受关注的话题。通过文学文本考察现代人的都市经验的缺陷在于，这种都市经验往往是当下的、瞬时的，侧重于大都市的流动性，且所选取的文学文本常带有现代主义色彩。城市经验以及对过去的城市、对遗迹的怀旧和追忆之情则成为本书讨论

的核心问题。故此，本书在材料的选择上并未局限于文学文本，而是将历史著作、笔记、旅游指南、城市规划方案等通通纳入进来，成为了广义的“城市书写”。《重写旧京》采用了跨学科研究范式，涉及历史地理、城市规划、建筑等不同领域。

讨论环节，唐晓峰教授首先发言。他表示，北京的近代是一个很重要的很有趣味的话题，现在关注的人也越来越多了，这是早就应该出现的事情。北京城近代经历了历史巨变，这些变化让北京城有点不知所措。清室退位的时候北京是一个样子，人们有一种想法。1927年首都一搬走，底气一下就没有了，然后打文化的主意，要把北京定性为旅游城市，北京那时候就提出了旅游城市的口号。日本来了，又是一个变化，日本人在北京做了很多大动作，还改了名字。当时有一个名称的对立，伪政府的人称北京，持抗日立场的人依旧称北平，这是一个大的原则性问题。解放初，北京的口号是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所以认为看见一片烟囱是好事，这很自然。文革以后北京取消了生产城市这个词，当时大家一齐赞成。今天的北京发展要体现三个“风”，一个是历史风韵，然后是首都风范，第三是现代风貌。近代以来每一场变化都是在特定的时代环境中产生的，而在人的头脑当中也相应产生一些印象，于是被书写出来。当然，政府也在进行书写。

这是这个城市的一大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说，近代北京城始终是一座在讨论中的城市，里面涉及的问题都不是可以一下子简单得出结论的东西。北京要承受的东西也是太多，古今中外都不能少，而那个

最合适的“度”又在哪里？这本书从“书写”的角度切入近代北京城，实际上是触及了事情的本来面目。就是那些街道建筑，书写则展现出复杂性，如果这本书所引征的“书写者”的范围再宽一些的话，会更加有趣。有机的多样性，嵌合的多元性是北京的特点。在侯仁之先生指导下，我们用30多年的时间编了一部《北京历史地图集》（3卷），包括近代，内容够丰富了，但限于形式，还只能是静止的图面。如果把那些图面和丰富的“书写”结合起来，北京城的历史、地理、文化面貌会进一步活起来。学术工作是互相补充的，互相支持的，我们需要从各个领域来研究北京城。

随后，岳永逸教授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这本书选取不同的题材，诠释出了旧京的厚重与凝重。而相较之下，上海总体来说还是有点轻盈的，且选取的路线相对单一。通过这本书，我们既能看到北京的沉着，也能通过不同章节感受到作者与书写者之间的共鸣。唯一的质疑点在于文本的选择。有关旗人书写，为何选取罗信耀的《小吴历险记》而非金受申的作品？为何没有提及齐如山、邓云乡的作品？为何西方人的摄影作品占据的篇幅较多而本地材料（如北京风俗画）少？岳永逸教授表示，这本书的意义在于开创了从不同角度书写北京城的可能性，且对民国时期北京呈现除了丰富的内容。

此外，北京城的相关资料众多，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该赋予它怎样的意义或价值？拥有居庸叠翠与蓟门烟树，作为帝都的北京城见证了从“燕京八景”到“燕京二十四景”的转变。这其中有一个城和乡

的关系问题，而本书则主要将北京视作一个城市、一个都城在描述。当下，我们的做法是斩断北京城跟乡村的关系，使其更加都市化——这个问题值得我们继续思考。

王建伟副所长表示，根据以往的阅读经验，本书呈现出来的形态与想象中的略有出入。经过取舍，作者围绕“书写中的历史与记忆”这一主题展开描写，并有意地对历史与记忆进行区分。他删去了很多繁琐的考证，呈现出来的文字是清浄的。王建伟副所长还谈到，城市研究涉及多种领域，呈现出了千姿百态而又复杂的风貌。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有关北京的城市史研究并不算少，但其研究成果与城市地位不太相称。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北京史的相关研究进展明显，一个突出的表现便是文学领域学者对北京史的研究。此举不仅扩大了研究边界，还在方法论上进行了突破。本书作者以一种平缓的语调冷静地审视这个城市。书中提到的一批我们称之为“北洋旧人”的人，与晚清渊源颇深，且与国民党关系冷淡。沦陷时期，这些人的政治选择和行为方式并未体现出太多的矛盾与冲突，这点同国民党出身的人截然不同。故此，王建伟副所长认为，作者对笔下人物持有警惕的态度，这点非常重要。

接下来，袁一丹副教授发言。她的博士论文以“沦陷北平”为题，关注的是读书人的境遇。袁一丹拒绝将自己定位为北京研究者，她希望能将“城”的问题转化为“人”的问题。梁启超在《过渡时代论》里高度概括了近代性问题。无论是近代中国还是近代北京，二者都处在“两头不到岸”的状态——依稀能看到一个隐隐的对面，

但往哪里走却不清楚——即梁氏口中的“迷复循环”。当时的人们觉得，那时的北京比现在拥有更多的可能性。从这一点出发，袁一丹副教授认为，该书有一个相对明确的论述方向，即“博物馆化”。博物馆化是一种认知模式，或说是一种对待过去和传统的隐喻。也有一些其他的隐喻来更好地说明近代北京人与空间的关系，比如琉璃厂。琉璃厂在近代北京读书人的文化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它代表了一种流通形态，一种“活着”的传统——不同于博物馆化那种被冻结的“死”传统。袁一丹副教授还提出了几点自己的疑问：是否可将琉璃厂从一个具体的文化空间提升到一个相对抽象的角度，来摸索出我们在近代这个时段处理传统和现代而更为灵活的方式？博物馆化是否可以成为现代主导的方式？作为本书的论述方向，它还有没有可以修正的地方？

另有一个问题关乎文学在城市研究里的承受力（或说穿透性）问题，特别是新文学和白话文在书中的位置。作者在本书中分析了俞平伯的《陶然亭的雪》，并认为它宣告了旧文学形态的覆灭和新的写实主义的出现。俞平伯本人跟陶然亭的关系更加复杂：1932年，他在《大公报·文学副刊》上发表了一首在陶然亭上题壁诗唱的旧诗；而就在八年前，他在撰写《陶然亭的雪》时未提及这首题壁诗。若只观后者，可以说出现了摆脱历史负担的新文学。但为何俞平伯在三十年代又回归了唱和的传统？这就是袁一丹副教授所表述的在近代北京书写中新旧之间的不确定性问题。

袁一丹副教授还搜集了一些伪政府（特别是建设总署）有关北京城设想的资料。他们在文物保护（包括整个城市规划）上有一些新的方案，部分已经付诸实践。然而，新旧之间的不确定性问题非常不好处理。因此，瞿兑之的文本难以评判。若单独处理这个问题，我们该考虑的是，它应该在一个什么层面上、以怎样的分寸进行讨论。

随后，刘亦师老师发言。他认为，有几个概念需要澄清。城市史主要是城市建设史，城市规划史则是城市规划的历史，后者主要关注法规的演变及规划思想的演变。该书不是传统经典意义上的城市史，涉及文学、城市规划等多种学科资料，令人深获启发。同样讨论陶然亭，刘亦师老师以五十年代北京城市公园绿地系统的建立过程作为研究对象，并将苏联的文化公园理论付诸实践，获得成功。不同学科学者在撰写城市史时，会在选材的取舍方面面临标准化差异。刘亦师老师还注意到有关北京的书写并未用到档案，而是文本。这与历史学家的做法不太一样，他们会使用大量的档案素材。

刘亦师老师还提到时间框架的问题。他表示，既要打破1937年至1945年日本占领北京这一区间的时间框架，也要打破1949年这一时间框架。除了断裂之外，还需关注那些仍在延续的事物，如技术标准、留用人员等。此外，我们还需关注1949年前后城市的形态和面貌表现出了怎样的连续性。

现代性也是该书的一个主要关键词。同上海模仿西方不同的是，北京呈现出了左右摇摆的状态。从何时开始北京以“自信”

建立起一套自己的体系呢？刘亦师老师认为，可能要追溯至五十年代以后。那时的北京，先背离西方，后又摆脱苏联。就这样，城市规划体系慢慢建立起来了，并形成了一套建筑设计院的制度，走出了自己的路子。如今，我们现在沿用了很多毛时代的遗产。

季剑青研究员在谈及营造学社时认为，梁思成主要推崇的是以《营造法式》为代表的宋式建筑。对此，刘亦师老师表示，梁氏《清代工程做法则例》一书早在《营造法式》之前就已经出版了。明清建筑虽不及唐朝建筑气魄宏大，却有着自己的价值。因此，并非梁氏人为明清建筑不重要。

赵益民以北京的绿化隔离带为研究对象，但对1958年至今变化过程中的权力关系与政治动态更感兴趣。赵益民表示，该书对“旧京”这一概念实现了时间与空间的双重把握，且现代性在这个分析框架中占据了核心地位。该书既从空间的维度解读历史，又以历史的视野重新解读城市空间。我们因而意识到，城市本身所具有的时间性对于理解空间意义重大。赵益民表示，以时空融汇的方式解读北京城有着特别的意义——旧京不仅有政治制度层面的彻底变革，还有社会革命。只有将时间纳入到视野中，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空间。

接下来，赵益民提出两点看法。其一关乎城市空间的概念化。现在的人文地理理论中流行这样一种思路，认为城市空间是一个比较“纯”的形式，是由人民之间的关系塑造出来的。为了理解这种形式，我们需用比较多维的视角来定义空间。以

城市书写为例，《重写旧京》一书以实践入手，展现出了以身份认同和记忆构建为基准的日常生活层面上的空间。在“旧京”这一概念下，这些空间被客体化了。但在民国时期，客体化的空间依然是人们生活着的北京。以一个更全面、更彻底的视角来把握空间，这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其二关乎现代性的内涵。现代一词内蕴着时间性，但我们也可扩大对它的理解。以往有关现代性的社会学讨论中，大家纷纷将源头定位于康德的《什么是启蒙》。该文的核心观点便是，今天一定比昨天好，明天一定比今天好。以这种视角定义现代性，便是断裂了过去和现在，这是一种进步的感觉。《重写旧京》一文对现代性也进行了界定，关键点在于对救亡的关切。因此，我们一直在追赶。五十年代的口号是将北京由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八十年代则要北京在变为古都的同时成为国际性大都会。当今的一些社会现象（如清退低端产业等）就是按照某种预想的方案提升空间质量。可以说，这是一种进步的线性时间观。该书另提有“新北京”、“古都”二词：“新北京”即让北京变成更新的城市；“古都”则令我们意识到历史遗存对于现代城市的面貌构成是有意义的。赵益民认表示，这两个词都可以放在追赶的现代性视角下讨论。若将现代性的内涵扩大一点，或许就能更好地把握整个城市空间的演变。

（撰稿：唐晓峰）



05

长城内外是家乡——《从大都到上都》研读会

2017年12月11日下午,“北大文研读书”第五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室举行,主题为“长城内外是家乡——《从大都到上都》研读会”。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罗新教授主持并作引言。文研院访问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刘未,文研院访问学者、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胡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张帆教授、郭润涛教授,国家博物馆王抒副研究员,文史学者刘昂出席并参与讨论。本次论坛主要围绕罗新教授著述的《从大都到上都》一书展开。

论坛伊始,罗新教授表示,有人认为若将《从大都到上都》定义为一本游记是埋没了这本书的成就。但其实上,它就是一本游记。之所以有人认为这会压低书的价值,是因为中国已有的游记写作存在一定的问题。按照西方的模式与惯例,这本书称得上是一部较为典型的游记。

罗新教授认为,游记范畴内也产有诸多学术性强的作品,且可在写成多年后仍具备参考价值。而他在创作本书时,也寄希望于学习这种写作方法,让游记的题材得到更多发挥。游记也可以成为一种严肃的非虚拟写作、非结构写作。我们可以不将它视作虚构写作、新闻报道或普通的旅



罗新教授

游攻略,而是一种因旅行而引发的某种写作。这也是罗新教授正在努力的一个方向。

随后,各位与会嘉宾逐一对书本内容表达了自己的见解,并进行讨论与交流。张帆教授表示,首先,这部书的价值在于题材广受欢迎,吸引了许多人的关注。其次,从大都到上都,距离不远却缺乏实地考察。大都与上都其实是元朝的两个都城,可以将它们想象为一根扁担,一头挑着中原汉族的农业区,一头挑着草原的游牧区——二者维持着二元帝国统治的重要功能。随着时代的推移、自然地貌和人群的巨大变化,书中很多涉及历史的部分不局限于元朝,包含许多明朝的内容。这就有了另外一层意义,即从大都到上都,也是两个政权对立族群冲突和交融的地区。最后,张帆教授表示,这本书在学术性和通俗性之

间寻求平衡的努力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

郭润涛教授认为,罗新教授的这本书让他回忆起曹聚仁先生的《万里行记》。二人通过实地旅行和大量阅读写出的好游记作品,并从中表达了自己的学术见解。在出发之前,作者可能就已经将书中的一些议论了然于胸,并借由见闻表述出来。再者,罗新教授曾两次参与旅行。第一次的旅行让他体验到背包负重的艰辛;第二次的路程长,但所经之地变化太快,留下许多遗憾。而在旅途中,罗新教授一直都在有意识地记录、写作,这点十分难得。

王抒副研究员接下来发言,他表示,能与导师(罗新教授)一起经历从大都到上都的旅程是十分幸运的。他曾去过很多次,但乘车与脚踏实地一步步走过的感受完全不同。走的时候,他会有一种心理暗示,那就是告诉自己正走在忽必烈当年走过的路。这种心理暗示会使他产生一种兴奋感,忘却体力的劳累,获得精神上的愉悦。而此次的徒步之旅和本书带给他的最重要收获便是发现普通人——在历史的夹缝中,或幸运或艰难生存的普通人。王抒副研究员表示,他一直认为,历史学最重要的就是追求事实判断。而本书还让他发现,历史学还应该具有人道主义精神,应该去关注社会最普通、最低层的人——正如罗新教授在地铁上和一位农民工的相遇。许多素昧平生的人,都在旅途中给予了他们难忘的回忆。而这次的徒步对他而言,坚持走完就是最大的意义。

刘未教授则对这条路线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从宋元时期的考古研究来看,这的确是一条很重要的路。如今已找不到

忽必烈等先人留下的遗迹,因此,按照能否找到物质遗存为目标的话,应选择另一条驿路。同时,他也对书中有关自己在龙门所未能看庙的一段描写进行澄清。他表示,这是偶然行为。而通常地,每到一座新城,他都会绕城一周,将留下的庙宇考察一遍。此外,他也对从大都到上都的旅程提出了另一种旅行设想,即精准的路线设定、老照片对比、遗迹确认等。这本书不仅为他提供了很多启示和参考,也让他意识到自己颇感兴趣的辽东路径还有一些遗漏的地方。

胡鸿副教授从读者角度出发分享了自己的看法。他表示,自己一直在思考历史学者们为什么要走路?大多数时候,历史学所做的是一个俯瞰式的观察——不仅针对某个路线,对整个历史也是一样。百年间发生的事情得以用几句话提炼、概括,并形成一种骨架式、俯瞰式历史。但或许还存在另一种理解方式,也就是人类学家常常采用的参与式。作者亲自去了解一个小社会或说一个岛屿:跟当地人一起生活,慢慢了解他们的亲属关系、生计形态等。普通人琐碎、细节的内容(如每天做什么、几点起床、几点喂马等)是不可能出现在《资治通鉴》里的。人类学家会进行细致的研究,有些人甚至会花费几十年的时间与普通人的生活在一起,再用生描的方式对他们进行描写——但这种方法在历史学中引用得很少。走路式的考察其实更接近后者。它用一种很慢的速度,一种无法跳跃、加速、快进的方式去经历一个时空。当人们以不同的尺度与数字去观察同一个东西时,会得出不同的感受,司马迁、玄奘、马可

波罗就是这样的例子。

胡鸿副教授还表示，历史是处在时间维度上的他者。从人类学角度出发，在时间的维度上，人们有可能理解同自己完全不在一个情境中的他者。但这主要建立在“同情”（相同的情）的基础上，而这里的“情”不仅包括感情，还包括情境。这就意味我们需要对古人的生活情境有所了解。情境包括很多方面，如自然环境、山川地貌、当时的风土人情等。此外，对于如何走，胡鸿副教授也有自己的思考。他认为，现在最常见的走法是现代式、挑选精准到点式的考察法，即通过开车在一天内考察很多的点。这样看似收获很大，但其实是将文物古迹孤立于周边环境，完全忽略了文物古迹在几百甚至是上千年间与周围人群的关联和交流。在本质上说，这种走法与在博物馆里看展品没有区别。胡鸿副教授还表示，《从大都到上都》所进行的是旅行式的考察，它以步行的慢速度来对抗现代时空中被极度压缩的现代世界，它将成为 21 世纪初年这条路线状况的代表。几百年后，当有人再走这条路时，会将它当成重要参考物。从这种意义出发，本书的写作不仅是从史料到史学的过程，还是从史学走到史料的过程，即制造了一个详细的史料。

刘昂老师认为，此书当作旅游手册也是非常不错的，对今后要走这条路的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指导。罗新教授非常关注人的描写，甚至还涉及了一些动物、植物，这点十分有趣。其次，对长城沿线有关明



听众踊跃提问

代的历史论述（例如马尾巴的功能）带给他很大的启发意义。此外，本书还引用了一些外国人之前的游记（如对意大利广济桥和阿富汗的描写），这点也令他印象深刻。

随后，论坛嘉宾们与在场听众就从大都到上都中普通人的旅行意义、罗新教授之后的写作计划及其在旅程中难忘的事件等进行了探讨。张帆教授表示，上都的城址早已毁坏，在空中依旧可见其较为清晰的轮廓，因此，其保存的完好程度还不如草原的城墙。上都不是一个旅游点，遗迹也很少，却申报了世界文化遗产。按照常理，作为一个农牧结合带的城市，它出现在了草原的边缘（而非农业区），这点意义重大。上都的地理面积只有区区几百公里，却维系着蒙元帝国上千平方公里的统治，并连接着草原和农业区。故此，其价值不只体现在遗物上，更在于本身的地址位置和空间意义。

罗新教授表示，他也不确定是否还会出下一本书，即便有，也不会是现在。接下来，他希望继续致力于北方民族史、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罗新教授还谈到罗

瑞·斯图尔特《寻路阿富汗》与自己的渊源。几年前翻到这本书时，他发现罗瑞不可思议地徒步穿越了阿富汗，并在之后写成这本书。罗瑞本人因此成为阿富汗专家，后来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都与阿富汗有关——无论是哈佛教授、绿松石基金会领导人，还是英国外交次长、国会一员。他现在的外交政策也与徒步阿富汗的经历有很大关系。

随后，罗新教授将自己与之进行对比。罗瑞行走阿富汗时未满 30 岁，这段经历带有规定性影响的——他今后的人生都离不开阿富汗经历。而自己行走在大都到上都之间时，已步入暮年，因此对自己的人生没有太大影响。他还补充说，自己每天都会花很长的时间阅读英文旅行书，这些书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作者很年轻，这也出乎他意料之外。这些书中，他最喜欢一本英国作家的游记。这位作者是学者、考古学家、旅行者。罗新教授觉得他的人生十分有趣，可惜自己无法复制——十八岁考入北大时

连自行车都不会骑。

罗新教授也分享了自己的阶段性困惑。他发现，人到了一定年龄就会发现学术创新很难，而年轻人正在创新。尽管他们自己意识不到，但这种创新意义是很大的。他并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但他希望借由这本书摆脱中年危机，突破学术创新瓶颈。罗新教授还告诫读者，做事要趁早。

郭润涛教授对此补充道，只有做事趁早才能给自己留出很大的余地。而他自己更倾向于不去面对年轻人学术创新这一面，而是老老实实“闭门造车”。尽管有些想法到现在都未能落实，但他认为，学术有很多的工作要做，要一步一步推演、一步一步论证。很多人早在五年前、十年前就已经有了很多想法，却一直未付诸实践。因此，凡事都要趁早做。这本书给他带来的启示则是，除了行走，实践也很重要。

（撰稿：熊晓晓）

06

全球史视野中的明清史研究——《火枪与账簿》研读书会

2017 年 12 月 18 日晚，“北大文研读书”第六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全球史视野中的明清史研究——

《火枪与账簿》研读书会”，此次会议主要围绕李伯重教授的《火枪与账簿》一书展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赵世瑜教授主持，北京大

学历史学系李伯重教授作引言。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北成、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赵现海、北京外国语大学校史馆馆长姚胜、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曹寅出席并参与讨论。

论坛伊始，赵世瑜教授简要介绍了研读会的主要内容。李伯重教授是经济史研究的资深学者，其作品《火枪与账簿》聚焦于全球视野下的明清史研究。

随后，李伯重教授发言。他首先介绍了写作此书的动因：上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很多学者进行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近年来，一些学者就明代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问题展开新的讨论。目前，“明代是中国向近代转型的开端”已成为明史界的主流观点。与诸多学者从中国内部视角进行分析不同的是，《火枪与账簿》一书是试图在全球史的视野下讨论晚明社会转型的外部环境。

讨论环节，刘北成教授首先发言。他认为，李伯重教授将徐光启等人在晚明时期对历法和军事改革所付出的努力与当今时代进行映射，进而提出“不可再错过一次历史的时机”的呼吁——这体现出他对国家命运的关怀。地缘政治是本书关注的重要内容。这种“地缘政治”不仅指涉国际关系，还包括文化格局，特别是“佛教长城”概念的建构。刘北成教授表示，以空间的角度出发考虑文化内涵是本书的创新点所在，因为文化格局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现代化乃至当今国际格局的背景。

曹寅副教授随后发言。他指出，目前国际全球史研究莫过于三种方法：一是网络法，强调不同族群、人群之间的交流；二是联系法，强调跨国或跨区域之间的联系；三是比较法，



李伯重教授作引言

对不同族群、人群进行比较。他认为，当前的很多全球史研究浮于方法及概念层面，而《火枪与账簿》使概念“落地”，以一个具体时期的史料进行深入探讨，深层次挖掘了互动背后的权益关系和资本运作。此外，曹寅副教授还指出，中国的全球史研究不应只从网络、联系、比较的路径进行分析，更应从批判西方中心论的角度探讨权益的分配。

姚胜馆长表达了自己的一点困惑：到底应研究全球史，还是以全球史的视野研究历史学？基于此，他引出了三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首先，全球史研究是什么？是一种研究方法，还是一种哲学关怀？进而，如果是一种哲学关怀，那么应以人类的视角出发，还是上帝的视角？反之，如果是一种研究方法，那么应是一种多元化的研究方法，还是一元化的研究方法？随后，姚胜馆长表示，《火枪与账簿》一书最精髓之处便在于抓住了晚明时期的时代特征——军事的近代化与经济的全球化。在此时代背景下，该书着重讨论

了明朝的内在需求，即如何改变境遇、突破危机。最后，姚胜馆长也分享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全球史的本质是交流史。16世纪以前，全球史不存在的重要原因在于匮乏史料：明清史料丰富而隋唐以至先秦的史料较少。此外，从全球史的研究方法和过程来看，跨学科研究以及团队合作非常重要。

赵现海副研究员则着重讨论早期经济全球化对明代中国的影响。首先，他认为这种影响的确存在，且作用很大。一方面，作为全球化蔓延瘟疫的一部分，华北地区瘟疫加剧了北方地区的社会动荡与民众贫困程度。另一方面，从投入战争经费的角度看，中缅战争、中日朝鲜战争、辽东战争、台海战争等一系列战争仅对中国构成了局部性威胁，对明代中国没有形成根本性冲击。其次，早期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财政收入包括官方和民间两个部分：官收入主要被用于建设长城沿线，而民间收入没有被纳入明代财政体系。对此，赵现海副研究员认为，早期经济全球化对于明代中国的财政冲击没有想象得那么大。与此同时，在文明的形成与扩张过程中，经济只起到了一部分推动作用，宗教和政治因素也占有重要的地位。最后，中国古代王朝政权普遍维持了三百年左右，这是一种周期律现象。明代中国的灭亡与全球化有直接关系，但其他朝代并没有全球化推动，生存周期却也类似。因此，赵现海副研究员表示，未来有待于将全球史观和中国中心观进行结合，开展进一步挖掘和讨论。

赵世瑜教授从书名（《火枪与账簿》）说起。“账簿”使得买卖信用制度得以确定，将时空距离拉近，从而实现时空间距化，如今的各类信用票据便是例证。“账簿”涉

及很多细微的技术问题，这对于进一步从宏观角度理解“账簿”有重要作用。关于全球史问题，他认为，全球史应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史，而不是讨论中国对全球史的影响——后者蕴含了一种西方中心论。同时，赵世瑜教授还指出，全球史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人口流动问题，而人口流动的频繁发生是则成为战争、疾病等历史事件爆发的初因。最后，他对“佛教长城”概念进行论述。伊斯兰教徒通过“火枪”与“账簿”这两种手段进行东扩，但中国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对这种东扩形成了制约。

据史料记载，自十三世纪开始，纺织品以印度为中心向全世界传播，成为了第一个全球化的商品。对此，刘北成教授提问道：为何《火枪与账簿》中只谈及丝织品，未涉及棉纺织品？李伯重教授回应道，棉布的确在十七世纪印度洋贸易中占有最大比重，但其对中国、日本、朝鲜等在内的东亚国家影响较小，因为这些国家自制的棉布足够本国需求。因此对中国来说，棉布更多地被算作国内贸易而非国际贸易。其次，在中国，棉布的官方性质很强，常用作军用物资。因此，该书没有将其作为重要的商品进行梳理。

姚胜馆长结合本书内容提出三点问题。首先，明末的白银问题究竟是怎样的？明末“白银危机”反映的是通货紧缩，但史料记载明朝在处理吐鲁番冲突问题时一次性投入粮银百万两，这反映的却是通货膨胀。其次，明代实行的是文人带兵制度，这种军事体制是否存在弊端？第三，作为明朝重要的军事冲突，安南问题对南方局势和政治压力造成多大影响？

李伯重教授回应了上述问题。首先，就



赵世瑜教授主持

明末白银问题，目前史学界存在争论，有待于进一步发掘西班牙的史料。其次，文人带兵制度存在诸多弊端，但其优势在于政治上比较可靠。赵现海副研究员补充道，文人带兵不是主动选择的结果，而是因为明代开国武将陆续被朱元璋清理后出现了严重的断层问题。明朝在北部边疆主要采取了防御的军事战略，而文人带兵的优势正在于此——既能降低战争成本，又能执行中央意志。此外，曹寅副教授还将明朝与乌尔帝国进行比较，他认为，明代文人带兵分权制使得中国避免了被殖民的命运。

随后，各位专家对观众提问进行解答。就如何在全球化视野下看待明清时期茶叶贸易，李伯重教授回应道，总有成功者和失败者。中国茶叶曾在中英贸易中占有重要分量，但是也面临生产质量不一、买卖程序繁琐等问题。后来，英国人在肯尼亚引种中国茶，采用大庄园生产，生产价格低、质量水平一致。于是，中国茶叶逐渐被排挤出西方市场。

关于宗教在经济全球化中所起到的作用，李伯重教授表示，宗教和经济相互关联，无法截然分开。传教士不是纯粹的思想传播者，还代表着扩张进程中具有商业推动力的基督教文化。赵世瑜教授认同这一观点，他补充道，在研究传教士问题时，应当注意历史材料的获取来源，不应只关注传教士的传教记录，还应关注其生活史和交流史。此外，他还指出，寺院经济在早期的佛教、伊斯兰教等宗教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关于明清两代皇帝整体素质存在明显差距的问题，李伯重教授指出，清朝皇帝在历代皇帝中应是整体素质最高的，宫廷教育对此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赵世瑜教授补充道，清朝破除了嫡长子继承制度，有能者得皇位。同时，他还表示这类问题反映了普通大众对皇帝的关注，而这种关注导向是史学研究努力避免的——历史学研究更应当关注的是所处时代下的社会生产、经济和文化等因素。

关于更好地理解文本背后所表达的内容，李伯重教授指出，阅读史料时，应关注材料由谁所写、在何种境遇中所写、为何而写、为谁而写、材料如何保留下来以及保留的过程是否经过加工等，这是考证史料的基本步骤。赵世瑜教授补充说，获取多元材料也十分重要，并从多种材料来源中相互印证。刘北成教授表示，客观的生产生活资料也可以作为主观描述性材料的辅助材料进行验证使用。

最后，赵世瑜教授对本次研读过进行了总结。李伯重教授对文研院、三联书店的支持以及诸位嘉宾的建议表示感谢。

（撰稿：王梦倩）

静园雅集

14

邓淑苹： 赏玉、识玉——谈玉品与玉质

2017年11月3日下午，“静园雅集”第十四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室举行，主题为“赏玉、识玉——谈玉品与玉质”。文研院访问教授、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邓淑苹主讲，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秦岭副教授主持。文研院访问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文研院第三期访学学者孙圣民、李楠、胡鸿等出席并参与讨论。

邓淑苹老师从玉器文物切入，解读中国寓意深远的玉文化；再通过汪精卫“翡翠”屏风的世纪大骗局，论述了玉商品的重重陷阱；最后对两种真玉和常见非真玉进行系统辨别，教会人们赏玉、识玉，了解玉品与玉质。

一、寓意深远的玉文化

邓淑苹老师首先指出，为美丽的玉石赋予特殊的文化意涵，是中国文化的特色之一，古代文献及考古发掘都充分证明中国具有寓意深远的玉文化。中文词汇里有许多带有美好、高贵、坚贞、永恒之意的“玉”字组合，如“玉人”、“玉颜”、“金



邓淑苹研究员

玉满堂”等。日常生活中，人们也常常买玉、戴玉、赠送玉器，甚至在欧美大都市华人聚居的小区里，珠宝店中最畅销的是翡翠等玉器，而非西方人爱好的钻石。国际人士来国观光，也常以玉器作为纪念品。陈设或随身佩戴具有象征意义的玉器，被认为能招致福慧财帛，这也是中国文化“感通哲理”在现实生活中的体现。昔日清宫里的翠玉白菜、今日流行的玉貔貅，都是很好的例证。

邓淑苹老师回忆起老专家那志良先生

的轶事。1925年，那先生参与点收活动时，翠玉白菜是种在珐琅盆中的，后出于美观的考虑被人们从盆子中取出。那志良先生对满族文化甚是了解，他凭借直觉判断，翠玉白菜应该是件嫁妆。随后，邓淑苹老师果然查出该玉器原本典藏于瑾妃住的永和宫，她也从原箱里找出了珐琅盆，复原了它初入宫时的样子。

邓淑苹老师认为，翠玉白菜的玉质不够好：绿的部分不十分翠，白的部分又不够白，且整体多“绺”（结晶不匀）又多“莹”（内部有小裂缝）。19世纪晚期，聪明的玉工发挥“文化创意”精神，利用绿、白分布，沿着绺裂分成几片菜叶，设计制作了这颗翠玉白菜，才让今天的人们奉若瑰宝。1974年，邓老师在故宫博物院工作时，日本人来拍摄古物照片时就问她：“我们日本人会觉得，菜上有虫很恶心，为什么中国人把一颗玉雕上有虫的白菜捧得这么火红？”她经过昆虫鉴定，上面雕刻的虫一只是螽斯，一只是蝗虫。螽斯在古代文化中象征“多子多孙”，而白菜则象征“清清白白”。因此，用美玉雕琢爬有螽斯的白菜作为女儿的嫁妆，代表了父母对女儿清清白白、多子多孙的期许。

一件美丽的玉雕隐含了人们对美好未来的祈求，对子女幸福的期盼。邓老师认为，这种形而上的意义增添了它的吸引力。今日大众未必了解翠玉白菜的创形寓意，却热衷于一睹火红名品的风采，也许正是因为隐然感受到它神奇的文化魅力。而当下流行的玉貔貅辟邪文化，也是因为貔貅凶猛威武、喜欢吸食魔怪的精血并转化为

财富，具有镇宅招财的文化寓意。

邓淑苹老师继续谈到，中国有悠久的尊爱美玉的传统，以及“同类感通”的特殊思维。据文献和考古资料印证，古人相信圆璧是“天”或“天道”的象征，所以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奥运奖牌的背面镶嵌代表中国文化的玉璧。当时，主办方宣称：奖牌尊贵典雅，中国特色浓郁，既体现了对获胜者的礼赞，也形象诠释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以“玉”比“德”的价值观，是中华文明与奥林匹克精神在北京奥运会形象景观工程的“中西合璧”。

圆璧的象征意义来自古人的观察与思维。据邓老师考证，古人观察太阳东升西落，意识到阳气在宇宙中循着圆形轨迹运动。因此，中国人的宇宙由黄图画与青图画合成，中孔中央是宇宙里唯一不动的“北极”。考古证明，从新石器时代至清代，玉璧有近八千年的历史，其中至少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文献记载玉璧用作祭天礼器。玉璧反应了中国文化中“制器尚象”、“同类感通”的哲理，一脉相承传至清代，仍被用作是最重要的礼器。

邓淑苹老师还发现，除了《皇朝礼器图式》记载清代皇帝用玉璧祭天之外，乾隆皇帝还在养心殿外面对皇帝座位的正面墙壁前，竖立了大玉璧。即使到了晚年，他还是对天道深信不疑，并为自己刻了一个“信天主人”的玉玺。北京故宫传统建筑中常见的正圆形门孔、窗户等，都具有特殊的文化象征意义。

1995年大英博物馆出版何东藏玉专书时，很多港台收藏家都疑惑不解，为何

作者舍弃许多高价位的精美古玉不选，偏偏看中一件普普通通、售价不太贵的圆璧作为专书封面呢？对此，邓教授表示，这是因为圆璧已是世界公认的一种中国文化象征与文化符码。尽管今天的中华文化面对很多冲击，但寓意深远的玉文化始终都深藏于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底蕴之中。

二、玉商品的重重陷阱

接下来，邓老师以一个世纪大骗局阐述了玉商品中的重重陷阱。1941年，汪精卫赴日本时，曾送给日本天皇一座“翡翠屏风”，送给皇后一对“碧玉花瓶”，以及皇太后一件白玉花瓶。战后日方归还，展示于台北故宫博物院。邓淑苹老师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工作后不久，一位自称从事玉雕工作的参观者告诉她，屏风的玉片色泽比较倾向草绿或者暗绿，又有明显的黑色包裹物，应该不是“翠玉”，而是与台湾玉相似的玉料。经她仔细观察后，认定他的判断正确，屏风由此修改为“碧玉屏风”。

碧玉屏风展出到2002年，配合正馆改建工程收入库房。2010年被再度展出时，因被柜内灯光照射，显得娇嫩艳丽，像极了俗称“白底青”的翠玉。后经科技专家进行光谱检测，确定其为闪玉（而翡翠属辉玉）。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汪精卫送给日本皇后的那一对绿色玉花瓶，因为颜色不够翠绿，反而曾被当作碧玉（即绿色闪玉）。2008年在进行古物盘点时，邓老师就发现这对账册上登记为“碧玉”的花瓶，虽然偏草绿色，却呈现连锁颗粒

结晶结构的质感，是辉玉的典型特征，之后的拉曼光谱也证明了这点。换句话说，“翡翠屏风”实则是闪玉，而被当成闪玉的“碧玉花瓶”却是实实在在上乘的辉玉（即翡翠）。

究竟是何处开采的碧玉冒充成了翡翠？邓老师推测是新疆天山北麓的玛纳斯。根据光绪十八年（1892）出版的萧雄《新疆杂述诗》：“玛纳斯河中搜寻亦可得玉，色白而有翠，类乎云南所产，嘉者朗润可观。”再据地质学家考证，玛纳斯玉料一直开采至二十世纪中叶。而当今产碧玉文明的矿区开始开采的年份却在1965年以后。

台北故宫的考证与相关出版引发了大众对新疆玛纳斯的关注，也促成了北京故宫博物院举办玛纳斯碧玉展。2014年，北京故宫展出110组件清宫碧玉器与26块玛纳斯碧玉料。随后，据清宫档案的资料证明，乾隆四十七年玛纳斯开始开采金矿后，金矿旁的碧玉矿就被私采。乾隆五十四年，皇帝下令严禁玛纳斯碧玉开采后，地方官追缴民间私藏碧玉运至北京，数量非常庞大，并由此制作了一大批仿古风格碧玉器——而汪精卫的碧玉屏风很可能就是其中之一。

若将天山北麓玛纳斯的碧玉与昆仑山碧玉相比较，可发现后者（和田闪玉）颜色均匀，较暗沉的是二价铁呈色；而前者颜色较鲜，深浅交杂，除了二价铁外，还含有铬离子。邓淑苹老师表示，她甚早开始关注14–16世纪中亚、西亚至东欧的帖木儿帝国、萨非王朝、奥斯曼帝国的碧

玉器，注意到的清代绿色碧玉（翠玉之外）有两种，并在2010年提出这个观点。邓淑苹老师对它们均匀细腻、深绿近乎墨色的色泽十分熟悉，而清代碧玉除了有这种产自昆仑山的碧玉器，还有一种深浅交杂、比较鲜艳的碧玉（很像台湾玉），即产自玛纳斯的碧玉。翠玉、碧玉虽然都是玉，但它们属于两个系统。汪精卫屏风上发现的铁矿只存在于碧玉中，不存在于翠玉中，因此清代故宫的玉器至少有两个矿源。

三、二种“真玉”是什么？

“玉，石之美者，有五德。”古人尊玉、爱玉，但对于玉的质地界定却是宽泛的。根据《说文》，举凡看起来温润，敲起来清脆悦耳，具有内外一致、不被折弯等物理特性的矿物，均可称之为“玉”。《说文》中有六十几个带“玉”偏旁的字，是各种不同等级的玉。当下，很多人都被以下问题困扰着：这块玉是不是真的？能不能算作翡翠？邓淑苹老师认为，这体现了爱玉的民族并非人人都了解它的现况。市面上的各种美玉商品，价格贵贱差距甚大。对此，人们又该如何赏玉，识玉呢？

邓老师表示，今日公认的二千多种矿物之中只有闪玉（Nephrite）与辉玉（Jadeite）被认定为真玉，这也是综合人类学与地质学的资料后达成的共识。它们虽外表相似，却属不同的矿物，并被环太平洋的几个古老用玉文化的居民采用（包括东亚的中国、新西兰的毛利、中美洲的奥梅克文化、玛雅文化）。而其中，东亚玉文化起始最早、分布最广，并以中国为最

久。

闪玉（Nephrite）属角闪石类（Amphibole group），是一种由钙和镁组成的硅酸盐，也是透闪石（tremolite）和阳起石（actinolite）的固溶体（solid solution）。早年，它日本人翻译为“软玉”，以别于辉石类中的所谓“硬玉”。而实际上，闪玉硬度也很高，且韧性强过硬玉。2003年国家质量监督局规定：主要由“透闪石”成分组成的玉石统称为“和田玉”。在邓老师看来，这虽引起争议，却一定有其缘由。

闪玉质地细腻，韧性好，纤维交织。其成因有两种：第一种是从超基性火成岩变质而成的，为碧绿色，常见包裹物为铬铁矿、磁铁矿，台湾花莲的丰田玉即是代表；第二种是从镁质大理岩接触交代变质而成的，有白、青白、黄、灰黑、黑、较匀的草绿至深绿多种颜色，包裹物多为石墨。

目前，就第一种成因来讲，市面上常见者按品质划分依次有俄罗斯碧玉、加拿大碧玉、新疆天山玛纳斯碧玉、澳洲碧玉、新西兰碧玉、美国怀俄明州碧玉、台湾丰田碧玉，和田碧玉的质量则参差不齐。至于清宫中深浅交杂并带有黑色包裹物的碧玉作品，邓淑苹老师怀疑其出于超基性火成岩，产自天山玛纳斯。

昆仑山系闪玉，俗称和田玉，原生时的颜色变化多样（有白、青、黄、褐、黑、绿等），其中以浅黄色为最少见者。和田玉曾供应帖木儿帝国以及清宫，自19世纪停采，目前已无法找到其原生矿，至于

其出自第一种还是第二种，则有待地质学界考究。

辉玉属辉石类（Pyroxene group），则是由钠和铝组成的硅酸盐，一种高压低温下的变质矿物。它比“闪玉”更为稀有，较重要的产地有七、八个，其中以缅甸北方的密支那所出产的最为美丽。台北故宫现拥有两块来自该地区的辉玉璞，为清宫旧藏。纯净的辉玉（西方称作樟脑玉）是无色的，因结晶呈连锁颗粒结构，内部常呈云雾状；若含有铬或三价铁等离子，会呈现翠绿或褐红；而若是铁与锰、镁、钛离子组合则会产生迷人的浅紫色。台北故宫藏辉玉，能确定属乾隆朝的为数不多。中国历史上基本都用闪玉，辉玉在中国十九世纪最盛，如翠玉白菜，而乾隆时翠玉还没有大量开采。

邓老师一再澄清，碧玉，是绿色的闪玉；翠玉，则是绿色的辉玉。让它们呈现绿色的主要因素是三价铬离子或二价的铁离子的存在（三价的铁离子会让玉呈现褐红色）。但是，二价铁离子所导致的绿色，偏向暗绿至草绿；而铬离子才是其呈现翠绿的主因。事实上，二价的镁离子以及三价铬离子既可单独存在，也可并存于闪玉与辉玉中。

四、常见的“非真玉”是什么？

邓淑苹继续谈到，虽然地质界根据人类资料界定闪玉、辉玉为真玉，但实际上还存在几类外观相似、磨光后色美质润的似玉美石。从考古发掘来看，蛇纹石、玉髓、大理岩等自古就被当作玉料制作玉器，

人们或可称之为“代用玉”。

蛇纹石透明度较高，其中以辽宁岫岩的蛇纹玉石市场占有率大，硬度最高为4度。山东泰安有名的“泰山玉”也是蛇纹石类，绿色鲜艳。“酒泉玉”（也称“祁连玉”）上市较早，常被制作成酒杯，硬度在4度以上，呈杂然的灰绿色。

玉髓与水晶、玛瑙同由二氧化硅组成，属石英家族（Quartz family），广泛存在于地表。其质地硬而脆，硬度在6.5–7度之间，呈玻璃光泽。云南省保山市龙陵县出产的黄龙玉含铁、锰、铝等金属矿物及其他微量元素，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颜色，尤以黄色最为常见。台北故宫博物院也有清宫藏黄玉髓三连章，宣称由一块玉料制成，故其早年被称为“黄玉三连章”。邓淑苹教授将一块玉印取下，测试比重，确知是玉髓，由此改名如今的名称。

接下来，秦岭副教授对本场讲座进行评议。他表示，邓淑苹老师从古器物角度研究上古史，提出了很多影响文化格局的观点。其提出的华西、华东玉器的两个系统概念，也对新石器历史研究有重大影响。而这种从古物研究上找到研究历史的思路，则对专业人士有很大的启发。

讨论环节，在座师生就北京故宫的田黄、玉的绿色渊源、玉的鉴别与玉的皮色和沁色等问题进行了热烈交流。邓淑苹老师回应道，西汉祭祀用的玉器之所以均为青色，很可能是因为战国时期发现了密集于荆州熊家冢的绿色玉矿。绿玉专门用做丧葬玉，并非因为材质不好，而是因其具有特别的功能——这与楚文化渊源颇

深。楚人相信动物精灵、相信璧，隐魂升天头上都要带绿玉。而整个汉家皇室起于楚，所以祭祀时以绿玉为尊。对于真假玉的鉴别，邓老师则表示，只要从信用商家购买即可。至于玉的皮色和沁色问题，邓

淑苹老师回应道，玉在干干湿湿的环境里会在表面沉积三氧化二铁，故皮色与沁色属于次生变化。

（撰稿：熊晓晓）

15

赵慧萍： 木版水印技艺与其当代价值

2017年11月17日下午，“静园雅集”第十五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木版水印技艺与其当代价值”。木版水印北京市传承人赵慧萍主讲，荣宝斋展览部负责人陈目主持。木版水印国家级传承人肖刚、荣宝斋木版水印雕版组负责人路民、荣宝斋木版水印中心主任陈铭出席活动。

本次讲座主要分为三部分：荣宝斋木版水印的发展与振兴、工艺流程及其当代价值。讲座伊始，赵慧萍老师简单介绍了荣宝斋与木版水印的源起。荣宝斋的前身“松竹斋”创始于清康熙十一年，光绪二十年开设分号荣宝斋，迄今已有345年的历史。木版水印是古代饴版拱花术的继承与发展。“木版水印”这一名称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荣宝斋根据这门技艺的生产方法和用料特点创造出来的。这种雕版印刷完全不同于现代印刷技术中的油墨印刷，通常采用梨木雕刻木版，用水调兑各种颜料，主要应用于印刷复制中



赵慧萍老师作现场演示

国绘画和书法作品。60多年来，荣宝斋对木版水印这一传统印刷技艺的定义得到了国内外的普遍认可并沿用至今。

在早期的发展历程中，荣宝斋以笺纸著称。早在光绪丙申年，荣宝斋成立“帖套作”，开始自产自销信笺、诗笺。笺纸是以传统雕版印刷方法在宣纸上印以精美、浅淡的图饰，作为文人雅士们传抄诗作或信件往来之用。

当时荣宝斋刻印的《七十二候笺》《仿怡王府拱花笺》名噪一时。

笺纸在明朝盛行一时，崇祯年间出版的《十竹斋笺谱》是我国制笺艺术的珍品，但在清朝，这项艺术逐渐衰颓。至20世纪30年代，鲁迅与郑振铎两位先生为抢救这项艺术，在1933年搜集、编辑了《北平笺谱》，并委托荣宝斋出版。第二年，又请荣宝斋翻刻了明代的《十竹斋笺谱》。

赵慧萍老师指出，这两套笺谱的印刷具有两重意义——传播与培养。如西谛先生所说，它可以使古代的艺术精品大量地传播出去，成为新生创作者的“借镜”和“参考”。而参加过这两部作品的勾、刻、印人员（如王仁山、王宗光、田永庆、孙树梅、孙连旺、王育德等）大都成为荣宝斋木版水印发展的中流砥柱，持续工作到80年代。新中国成立后的这几十年当中，荣宝斋将传统的古代版画“饴版”印刷术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并达到了忠实原作、再现原作感染力和艺术魅力的高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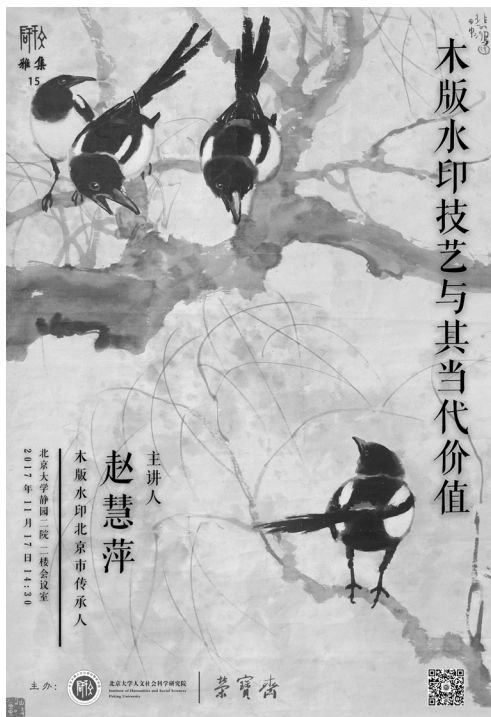
荣宝斋木版水印主要有三个特点：其一，复制水平逼真，再现原作艺术水平；其二，复制材料与原作相同，收藏保存寿命长；其三，不受尺寸大小限制，充分呈现艺术作品原貌。正因如此，许多著名书画家的作品都交由荣宝斋出版复制，从而得到广泛传播。上世纪50年代，徐悲鸿的《奔马》《芋叶双鸡》《鱼鹰》《漓江春雨》《风雨鸡鸣》等画作都是在荣宝斋印制完成的，几乎可以达到乱真的水平。而齐白石也曾多次造访荣宝斋，并亲自指导水墨画《虾》的印制工作。印制完成后，就连老人自己也分不清自己的真迹是哪幅。

在荣宝斋的木版水印史上，《韩熙载夜宴图》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1959年开始筹划至1979年最终完成，历时20年之久。共计勾描、刻版1667套，复制画作仅35幅。每幅需印刷8000余次，共计印刷近30万次。荣宝斋为了印制这幅画，特制了最好的画绢，动用了石青、石绿、朱砂、赤金等矿物颜料和金属色。韩熙载的胡髯细若游丝而又刚劲有力，需要四五块套版才能把胡髯繁简、虚实、浓淡的线条层次表现出来。仅仕女裙一处就需要56块套版加以印制。在这幅长达三米多的画卷上，共出现了46个人物。对他们的衣着、布置、神态等方面无一不要求精确至极。这些作品印制完成之后，更是直接被故宫博物馆定为“次真品”，并为国内外多家博物馆收藏。

至今，荣宝斋共印制出版的大小不同、品类繁多的古今书画5000多个品种，销往48个国家，并在30个国家举办过展览，多次作为国礼赠送，赢得世界各国赞誉。2006年5月，木版水印技艺正式被国务院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随后，赵慧萍老师介绍了木版水印的工艺流程。木版水印名画的原理其实与刻印笺纸相同，但比后者的工艺却要复杂得多。虽然它源于中国古代雕版印刷的“饴版”套印，但与笺纸等一般的套印有所不同。这种技术根据画稿笔迹的粗细曲直、圆润刚柔，设色的深浅浓淡、向背阴阳进行分版勾摹，并分别刻成若干块木版。然后对照原作，由浅入深，逐笔、逐色依次叠印，力求相近原作、精准无误。

随后，赵慧萍老师将工艺的流程分为勾描、雕版、印制三个部分依次介绍。木版水



印中的勾描是根据木版水印的特点需要将复杂画面分解开来的一道工艺过程。实际上就是根据画面线条、颜色的具体情况分择成若干套版样，并将画面上的一个个局部都移植到薄雁皮纸上，以适应雕刻版面的需要。这道工序决定了木版水印的全过程是省工还是费工，以及能否将复制品完成得与原画气韵一致。因此，勾描工序一般由具备绘画水平的画师担任。

雕刻版面是木版印刷中的重要环节，且技艺性强。画家以笔表现形物，刻者则要以刀代笔，来表现出原画的用笔，达到殊途同归的效果。所以，刻者需要熟悉画法，深刻理解画面。

勾描和雕刻完成之后，便是印刷这一工序了。印刷要用印版复制出原作形态和气韵。画作与印者的关系就像剧本与演员。印者不

能随意抒发自己的情感，但每个印者的风格也会不自觉地体现在作品之中。由于作品大小的不同，整个印刷过程很复杂，少到几十套版，多到上千套版，才能完成一幅作品。每一套版印制都蕴含技巧，需要印者考虑局部和整体的关系。而之前的所有环节都要通过印刷才得以呈现。

最后，赵慧萍老师分析了木版水印的当代价值。木版水印是一种集绘画、雕刻和印刷为一体的复制艺术。它根据水墨渗透原理显示笔触墨韵，既可用以创作体现自身特点的艺术作品，也可逼真地复制各类中国字画。木版水印延续了古代雕版印刷术这一重要传统技艺的生命，并被逐渐借鉴于现代版画创作之中。它弥补了现代印刷之缺憾，其水墨、色彩可以渗透纸背，木和水的采用使得其作品能够长久保存，这令油墨浮于表面、印刷网点不可消弭的机器印刷望尘莫及。

更难能可贵的一点是，手工作品所包含人的情感与温度，内蕴于严格的操作规程和对原作的深邃理解中，得以让机器复制品难以捕捉的原作神韵和国画作品水墨淋漓的酣畅质感得以灵动再现。木版水印通过最大限度接近真迹的品质，使古代艺术精品得以传播。这些作品可作为新生创作者的参考，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讲演结束之后，肖刚老师、路民老师与赵慧萍老师以齐白石的《牵牛花》为例，分别演示了勾描、雕版以及印刷这三项木版水印的基本流程，并耐心解答观众关于具体操作的提问。

（撰稿：张欢）

16

陆宗润、王辛敬： 书画装裱与修复

2017年11月24日下午，“静园雅集”第十六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书画装裱与修复”。本次雅集的两位主讲人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硕士生导师、文化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咨询专家、日本汉和堂金石书画修复研究所所长陆宗润以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装裱修复技艺传承人，中国文物学会会员，中国文物学会修复委员会委员、理事王辛敬。荣宝斋展览部负责人陈目主持，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出席本次活动。

讲座伊始，陆宗润老师带来了题为“技艺·科学·艺术——21世纪金石书画修复的理论与实践”的演讲。陆老师先后师从扬州流派修复名师徐茂康先生、苏州流派修复名师窦治荣先生，还曾赴日研习日本书画修复装裱技艺长达八年，他在总结创新、技术融合、大量实践的基础上探寻了一条适合中国书画作品的修复理论与修复技术之路。他认为，现代修复需要将科学技术、艺术审美及修复工艺结合起来。

他提到了意大利人布兰迪（Cesare Brandi）所写的《文物修复理论》，这一被奉为圭臬的著作深刻地影响了西方与中国现代的修复实践。布兰迪提出的可逆性修复原则、可识别原则、最小干预原则也已成为现代修复的基本共识。但陆老师认为，中国



陆宗润所长

的文人作画传统有别于西方的科学家作画传统，因此，中国应当有自己的修复方法和修复技术。所以，对于中国修复技术来说，与其说是走向世界，不如说是将世界引入中国。而中国要有自己的修复方法，首先需要继承传统。今天所谓的中国传统修复技术既包括大陆所继承的明清修复技术，也包括日本所流传的唐宋时期的修复技术，继承传统修复技术需要把两者结合起来。另一方面，中国的现代修复不仅需要继承传统，更需要吸收科学技术、借鉴西方的理论与实践以及艺术、历史等方面的知识，使中国的修复技术走向未来。

书画修复的意义在于发掘艺术品的艺术价值，不仅延长书画纸张的寿命，更是延长其艺术生命与艺术价值。正如布兰迪所说，艺术品兼具艺术性与历史性，修复者需要思



王辛敬老师（左一）为观众答疑解惑

考艺术品所传达的艺术信息，在物理与物质层面恢复艺术品价值。此外，修复更是为了使作品传承更长时间，考虑未来的保存和修复，避免进一步扩大艺术品美学信息漏洞。就此，陆老师提到中国修复界批判完美修复，主张维持现状修复其实并不一定适合艺术品的未来传承的观点，而这种观念也是对布兰迪的误解。虽然布兰迪的修复理论反对过多干预，但他本人在实践中也曾经把已经严重破缺的《圣母像》进行了完美修复——若无法辨认出画中的人物形象就失去了艺术品的艺术价值。所以，修复理论在实践中还需要进行种种的变通，完美修复理念并非追求完美无瑕，而是要恢复艺术品美的完整性。

随后，陆宗润老师对书画清洗中保存修复与艺术审美之间的冲突进行了讨论。对于书画来说，泛黄所体现出的古色古香的韵味其实是污染、纸张酸化的结果。从科学修复和保护的角度而言，应该对污染进行清洗；

但从历史和审美而言，这种古色本身就有一种历史价值感，而洗掉历史痕迹则违背了修复原则。对于中国画作而言，在传承过程中形成的题跋、收藏印记、古色、装潢等都不是原作本有的，但这些历史痕迹都应予以保留。故此，陆宗润老师认为，修复工作留下的是“旧”，洗掉的是“污和脏”。但由于“旧”本就是在“污和脏”中形成的，我们要以辩证的眼光看待二者的关系，并从中找到平衡点。

接下来，陆宗润老师仔细分析了修复中所默认为的“修旧如旧”理念。他认为，“旧”有两个含义：一是古色色彩的旧；二是回到画作初成的原样旧观。而每一幅画在刚完成时都是崭新的，由此一来，所谓的修旧如旧就生发出很大的模糊与歧义——既有可能是维持现在的古色，也有可能是恢复到画作初成时的状态。对此，陆宗润老师认为，修复画作不是为了回到几百年前的样子，而是为

了让画作再传承几百年。因此，我们要基于可以预见的美学价值进行修复。过于陈旧和古色的画作其实就是污染过于严重的画作，应当进行适当的清洗和修复，这样才能有利于未来的保存。所以，修复不仅是维持现状，也是要改善画作的状态。只要艺术品的整体意境和内涵得到了完整的保存，即使它在物质层面有所改变，但修复后的古画依然还是古画。

最后，陆宗润老师总结道，维持现状修复虽然尊重了艺术品的真实性，却导致了修复行为的不作为或画面艺术性的缺失；而复原性修复为了更理想的艺术效果，往往采取过度介入的手法从而影响作品的长久保存。每一幅画都是独一无二的，在修复过程中。修复者应根据画作的实际情况灵活采用适应的修复方法，并将两种修复方法融合借鉴，形成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部分复原”。

雅集的第二部分，荣宝斋的王辛敬老师介绍了荣宝斋装裱修复中心的发展情况和经典案例。他首先提到装裱的重要意义。在中国书画装裱技艺的悠久历史进程中形成有各种流派和风格，荣宝斋就集中体现了北方地区装裱的主要流派——京裱——的风格特点。荣宝斋装裱车间成立于1956年，云集了揭裱古旧书画、碑帖、手卷、册页、刺绣、屏风、中堂等各种人才，组成了书画装裱界的最强阵容。在张贵桐、王家瑞、李荫基、李世臣、刘焕章、危之昌、李振东、冯鹏生等老艺人的带领下，荣宝斋的装裱事业人才辈出，独树一帜。

装裱车间在成立后不仅承担着难以计数的新古书画的日常装裱工作，还在拯救抢修损毁严重的古代经典书画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如唐代绢本《女媧图》、辽代刻经本《大方广佛华严经随疏演义钞序卷第一上》及《通赞疏十》等等。在过去的六十多年中，荣宝斋不仅参与到了多幅历史性画作的装裱和修复中，还攻克了许多修复难题，并积累了许多经典案例。

诸多经典案例中，首屈一指的当属人民大会堂的《江山如此多娇》。这幅巨幅国画由著名画家傅抱石和关山月受命完成，荣宝斋负责物质保障和装裱等辅助性工作。为了保障创作的顺利进行，荣宝斋提供了珍藏的古墨、丈二匹宣纸以及最好的颜料。光是珍存多年的丈二匹宣纸，就使用了近百张。此外，荣宝斋还特制了杆长一米多的如椽巨笔。装裱方面，工作人员也密切配合。由装裱老艺人张贵桐和高级技工王家瑞率领的十几个装裱工人在现场工作，创造性地完成了这个巨幅画作的装裱重任。

而在荣宝斋参与修复的画作中，数“契丹藏”、《雪景山水》和《瓶梅图》最为典型。1974年，在山西应县木塔中发现的“契丹藏”由于年代久远，加之黄鼠狼破坏，残损非常严重。荣宝斋冯鹏生、张贵桐、王家瑞、李振东四位师傅，以极大的耐心和细致，经过两年半一丝不苟的不懈工作，从近千块残经画幅的碎片中拯救出了辽代碟装书籍六册、刻经五十多卷、写经七种、木板刻印后经着色《炽盛光九曜图》一幅及《药师琉璃光佛说法图》两幅，基本实现了整旧复原。此外，在上世纪80年代，张贵桐师傅修复明代钟钦礼《雪景山水》与陈老莲《瓶梅图》也震惊了当时的文博界。其时，两件原作均已破碎不堪，残缺大块绢地。张贵桐师傅运用高超的补绢技巧，使得揭裱修补完成后的

古画不仅未见破碎的痕迹，还使得新旧绢丝对接得天衣无缝。

本场雅集的最后，王辛敬老师以画作为实物，介绍了镜心、画轴、图片、手卷、册页等多种画作的装裱形式与修复中的“全色”

（撰稿：包垚含）

17

萧梅： 谁的呼麦——亚欧草原寻踪

2017年12月8日下午，“静园雅集”第十七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谁的呼麦——亚欧草原寻踪”。上海音乐学院教授萧梅主讲。

演讲开始，萧梅教授简单介绍何为呼麦。呼麦是一种由一位表演者同时运用嗓音发出多声部的歌唱风格，并以喉音发出的持续低音声部为特征。这种演唱方法目前在蒙古族群体中十分普遍，成为代表蒙古文化的核心元素之一。

随后，萧梅教授紧扣主题并讨论了呼麦颇具争议的归属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官方介绍中提到，“如今在各个国家的蒙古族群中，尤其是中国北部的内蒙古、西蒙古以及俄罗斯的图瓦共和国，呼麦十分普及”，其中虽然提到了图瓦，但总体是以蒙古族为代表。中国在“非遗”官方介绍中更突出了内蒙古的呼麦。而在范·通古伦（Mark Van Tongeren）所撰写的“已知亚洲地区

工序。在场师生就修复技艺、人才培养等问题同陆宗润、王辛敬二位老师进行充分的交流。



萧梅教授主讲

泛音歌唱地图”中，呼麦分布于阿尔泰山地与图瓦共和国——并未提及中国。从官方意义上讲，教科文组织在世界文化遗产中使用的字样是“中国呼麦”。正因如此，国际上产生了很多有关呼麦归属问题的争议。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呼麦学习热潮，萧梅教授结合这一现象提出问题：为何在申遗后，呼麦会突然在内蒙古地区显示出勃勃生机？这种演唱方式能够

提高演唱者的艺术威望吗？他们认同这一声音形态的乐感吗？

对此，萧梅教授从内、外两方面介绍呼麦研究。中国在九十年代初才开始发表学者研究呼麦的文章，更早之前是西方学者主导这一领域。西方学者在刚接触呼麦的时候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文化震撼，对他们而言泛音原来是基于歌词和乐谱的整体出现的，而不是分离出来的。他们从没想到可使基音与泛音分离开，一个人的嗓音同时发出两个频率。在西方的发声方法中，要么是声门震动要么是整体震动（真声），或者是声带边缘震动（假声），他们难以想象呼麦可以同时混合声门震动和整体震动。因此，他们对泛音歌唱特别关注，他们学习呼麦时也着重于控制泛音，而较少表演以挤压喉头为主的喉音。

随后，萧梅教授请麦拉苏老师示范了呼麦的三种最基本的形式，即哨音呼麦、平舌音呼麦以及低音呼麦。萧梅教授引入范通古伦所进行的东西方观念与实践比较，从声音技巧、传统、环境三个方面考察西方泛音歌唱与呼麦的区别。从声音形态上来讲，呼麦包含基音和泛音两个部分。从发声角度来讲，它强调喉部的多腔体共鸣——所以喉音、泛音、多腔体共鸣是认知呼麦的重要特点。从织体形态来看，呼麦是多声的，即有持续的低音加上泛音旋律。

萧梅教授表示，我们要以这一形态作为切入点理解中国呼麦。中国呼麦与蒙古族多声音乐存在着互为诠释的关系。新疆西部地区将呼麦称为浩林潮尔，翻译过来就是喉咙的潮尔。“潮尔”一词非常重要，意指声音的聚集，即共鸣。它也可以指向类的题材，比如说潮林道指的就是潮尔歌。因此，双声



麦拉苏老师现场示范

结构不仅存在着呼麦这一形式。作为更为重要的普遍的音乐形态，它也是草原上一种独特的文化。中国在申遗过程中也正是强调了这种自古以来就有的双声结构形态才得以成功。

萧梅教授列举了潮尔的多种形式。从音源角度讲，主要分为人声、器声以及两种声音结合这三种类型，如多人演唱的潮林道、器乐演奏的弓弦潮尔和冒顿潮尔等。麦拉苏老师在现场即兴演奏马头琴双声部长调，并演示弓弦潮尔。

由此，萧梅教授提出一个问题：作为音乐核心的“双声结构”如何与在地文化互动时形成了草原音乐文化的多样形态？思考这一问题的切入点应包括四个方面，即声态、生态、身态以及心态。作为共享结构，双声结构是蒙古文化的核心，但在不同地区产生的不同体裁又具有差异性。这种差异很好地解释了双声结构如何被文化化的过程，如呼麦在图瓦与西蒙古之间存在发声区别。

从自然生态角度讲，声音具有地方感，蒙古族人的喉音歌唱可与山脉湖泊互动形成景观。不同的山，声音不同；同一座山，在下雨时也会有所不同。空气可以蓄积声音。当风吹过时，声音开始流动，山河湖泊的“对

话”便从中而来。有对话就有共鸣，共鸣在声音感受之上。麦拉苏老师演示了潺潺流水般的呼麦，并补充道，呼麦的所有唱法都来自于自然。

萧梅老师指出，现在有很多歌手运用技巧飙高音，这一举动脱离了歌唱为自然、为自己的情感而生发的本意，并丧失了想象力。同时，呼麦的歌唱历史也离不开自然与社会语境。从呼麦是否被允许歌唱便可知，社会情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产生不同的变化。试举一例，根据潮林道的演唱礼仪，歌手在唱引子和主歌的时候是跪着，但歌曲进行到图日格勒（也可以把它看成副歌）的时候，不管是地位多高的王公贵族，都要一起站起来，融入歌唱。所以说它是宫廷或宴歌的代表。因此，如何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下创造不同的双声结构，是可以继续探讨的话题。

呼麦也好，潮尔也好，身体感特别重要。音乐基于人的身体，呼麦的发声方法与美声完全不同。不仅如此，若与当地歌手交流，他们会告知自己感受到的是怎样的场景，并将身体定位到某一个场景中去。因此，很多学习呼麦的人需要到山地和草原上感受自己。而乐感则成为协调、定位身体的重要基准。阿尔泰山地草原上的人往往对有共鸣的双声结构特别有感觉，这种乐感构成了他们的审美。泰德（Theodore Levin）的《山水何处歌》（*Where Rivers and Mountains Sing*）一书则显现出不同文化对声音的不同偏好。泰德发现，西方人是音高思维，而图瓦人则以音色为中心——泛音和共鸣是成为其审美核心。

同时，这种音乐审美也反映着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双声映射出天与地的关系。天上

的彩云在飘，飘忽不定；而草原厚实广袤，便是持续低音的象征。在阿尔泰地区，喉音与宇宙息息相关。在萨满眼中，身体由9—81根线连接的不同能力与关系组成，他在跟病人治疗时，运用声音的颤动与这些线的波动相匹配，方可治愈病人。因此，萨满强调在治病时强调人神共鸣，从而达到和谐的状态。可见，阿尔泰山地草原民族的文化相互联结，而音色则成为其中一个重要参数。

萧梅教授表示，双声结构作为文明的延伸，还有很多可供探讨深挖的内容。例如，可以继续探索维吾尔族及中亚突厥语等民族的弹拨及弓弦乐器群中的主辅结构双声，或探寻欧亚草原中更多具有双声结构音色偏好的文化实例。

最后，萧梅教授再思“谁的呼麦”。她表示，这种以复弦定音、主辅弦配置、泛音与声音密度为特质，以共鸣为多重感知（物理、生理、心理）的审美基础，是一种落实在音色偏好的欧亚草原双声结构。它可能有多种来源。双声结构在区域和跨区域之间的流动变化，也意味着我们的音乐文化存在着复合性与多中心。

最后，罗新教授从历史角度思考音乐。他表示，在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政权的资料里，很少有音乐相关资料（除非是争夺音乐人才的历史事件）。在这里，音乐成为高级与远方的象征。罗新教授认为，作为阿尔泰地区的音乐形式，呼麦是本地化的。而现在，在将音乐当作民族认同的标识之后，呼麦研究才逐渐成为主流。呼麦以怎样的方式被不同人群争夺，值得我们继续探究。

（撰稿：萧梅）

18

徐芄： 京剧的民国唱法及其现代性

2017年12月22日下午，“静园雅集”第十八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京剧的民国唱法及其现代性”。美国索思摩学院助理教授徐芄主讲，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鸣主持。

在报告中，徐芄教授以自己的演唱经历作为线索，结合京剧唱法和现场表演的例证，展示了京剧演唱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出现的独特审美观。她具体解释了两方面内容：其一，现代科技的介入以及演员对这些新鲜媒体的主动呼应，也就是老唱片在京剧演唱训练中的作用；其二，京剧革新改良的大环境下回归前现代精英传统的动向，尤其是这种动向在音韵学方面的表现。两方面以微妙的形式联系、互动，共同造成了京剧复杂的现代性特征——也就是徐芄教授所指的“民国唱法”。直到今天，这种唱法仍影响着京剧艺术。

徐芄教授回忆起自己师从刘曾复先生学习京剧的经历。刘曾复先生被称为“最后一位京剧鉴赏家”。他愿意热情无私地解决访客提出的任何问题，但在招收学生时却很严格。徐芄教授回忆自己唱《娘子不必太烈性》一节时，被先生批评为“比不会还不会”，并嘱咐她要将学过的东西全都忘掉。从此，她开始跟随先生学习新的唱法。

学习过程中首先要做的是“引发其声响”，也就是找到自己最好的声音。徐芄教



主讲人徐芄

授忆起初学时，要从同一句话不同音调的录音中慢慢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发声方法。湖心岛亭是她最喜欢的喊嗓子的地方。此外，水亭和山亭也很适合“吊”嗓子。和亭中不同的是，光绪年间的一幅画反映了清末民初商业剧场的光景。这里宾客众多，环境喧闹，声音需要新的效果，也需要锣鼓的配合。在现代的大剧院中，演唱者须依靠麦克风等现代科技产品才能让全场听见其声音。因此，唱法本身和它形成阶段的传声空间有很大的关系。

之后要学习的“辨别其字面”类似于音韵学的基本功。昆曲旦角袁安圃已经表现出了基于文本和发音的某种传统的审美风格。这种审美倾向认为，音乐的一切美感都来自语言、发音。通过对比俞粟庐曲谱与17世纪的曲谱，我们可以看到京剧表演者对语言

的重视。在曲谱中，用苏州语言标注的、特有的符号就表现出了与人工语言不尽相同的地方。而考据学也影响了曲谱的考校活动。徐芑教授表示，当代仍有人坚持这样的考据方法，即试图查明曲谱中每一个字的正确发音，以求“正声”——这在今天难得可贵。在中国传统的歌唱理论中，有“一字定腔”的说法，足见语音对音乐的重要性。

几年前，徐芑教授在美国讲解中国音乐中的唱法时，不仅使外国听众在一小时内学会《皂罗袍》，还让他们里了解了基于文本和发音的风格与现代演唱风格的不同。在本场报告中，徐芑教授展示了在那次讲座中运用的舞台发音与标准普通话发音在音调上的变化（这也是前文提及的“辨别其字面”）。在与人对活时，她会自觉地将标准声调转换成舞台声调。在此基础上，还需使唱词的音韵连贯起来。

接下来，徐芑教授重点讨论了唱片的问题。目前，唱片研究主要包含以下几类：一是唱片的物质文化研究，如唱片工业发展史；二是唱片版本学，包括对唱片曲谱的研究；三是唱片承载的艺术史，或说唱片中的声音研究（这也是徐芑教授正在进行的研究）。从外行人的角度看，研究唱片在于理解它所表现的声音的美感；而对于专业学唱的人来说，唱片的价值在于聆听并思考该以怎样的方式唱出有历史感的声音。反复聆听可训练耳朵辨识出细微的区别。以《娘子不必太烈性》为例，谭富英版本体现出的是“结仇恨”，孟小冬版本则是“有仇恨”。音韵上的细微差别形成了不同的美学效果，也表现出了音乐家对戏剧的理解。

听唱片的目的是“理正其腔调”，这也

是“引发其声响”、“辨别其字面”之后的第三步。在京剧中，同一个字可有千变万化的创作方法。听唱片便是为学习演唱者提供一个曲库，使其选择一种自己喜欢的唱法并延续下来，最终形成自己的音乐版本。中国戏曲传统中并无“作曲家”的概念——在没有作曲家的年代，自己就是自己的作曲家。徐芑教授说起《捉放曹》的学习经历，她将余叔岩、孟小冬两个版本反复听了两三百遍，再根据自己希望表达的效果做出选择。这样的经历让她意识到，自己可以在音乐上做主。演唱内容的表达方式会影响舞台上的技巧。例如，演唱者可根据内容安排换气的时机与动作，并于不同版本中体现出不同的处理方式。在美声领域，演唱者是否要在演唱时表现出自己的努力也是因人而异的。

讲座最后，徐芑教授介绍了《乌盆记》的片段。她跟随刘曾复先生学习这一唱段时，先学习孟小冬的版本，后又学习谭鑫培的版本——后者的演唱方式更能表现出“鬼”的感觉。谭鑫培的《乌盆记》是一个罕见的版本。徐芑教授在北京大学学习时，还缺乏琴师伴奏，一直未能表演。二十年后，当这场演出终于得以成行的时候，徐芑教授想起老师的教导，情难自己。

因此，徐芑教授鼓励演唱者用适合自己的方式认真学戏，打破固化的认知结构，通过表演贴近声音的事实。尤其在青春版园林戏曲正在推广的时代里，作为学者，需要知道这些活动中的“现代”到底体现在哪里，哪些才是“真”的东西。而作为学生，还是要向真正懂戏的老先生学习。

（撰稿：刘小雨）

菊生学术论坛

08

七至十六世纪信息沟通与国家秩序



与会嘉宾合影

2017年11月4日-5日，“菊生学术论坛”第八期“七至十六世纪信息沟通与国家秩序”学术工作坊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此次工作坊由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育部基地项目课题组在商务印书馆鼎力支持下承办，来自内地、港台、日本的近三十位学者出席并参与讨论。

传统中国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运作，

围绕着对信息沟通的控制展开。不同政权之间的往来、社会各阶层的信息沟通，一并参与塑造了中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家秩序。研究信息沟通在国家和社会秩序构建、维护、破坏、瓦解和重建当中的运作机制，不仅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于历史的理解，也有助于为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提供帮助。

文研院院长邓小南首先致辞。她表

示,“信息沟通与国家秩序”项目已于2017年11月被教育部立为重点研究项目,而信息沟通研究也已成为国际学术研究的热点之一,与之相关的研究工作会议为数不少。11月11、12日将于复旦大学召开的另一场信息渠道工作坊会议与本次会议南北呼应、相得益彰。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吴丽娱带来题为《唐代信息研究的特色与展望——以信息传递的介质、功能和途径为重点》的报告。吴丽娱研究员指出,信息渠道课题研究已经积累有年,如今进一步推进“信息沟通与国家秩序”项目,意在将相关研究带入更深、更广的层面。有关唐代信息问题的研究有两个方面的特色值得我们注意:一是围绕信息传递“介质”的研究,即文书及其体式、形态;二是围绕信息传递所发挥功能的研究,即将文书递达、信息传播同中央与地方机构的政务运行相结合,实际上,这也涉及了本课题中的“国家秩序”。

关于第一个方面,吴丽娱研究员指出,针对文书体式、类型的专题研究开始较早。《天圣令》等新资料发表后,有关某些官文书的讨论也更为深入。她以“状”的研究为例说明许多研究仍有继续深入的必要:一是论事之“状”何时产生、何时取代了奏抄的主体地位;二是奏抄与奏状的针对性及其区别问题;三是唐代官府机构下对上的申状是否存在、何时产生以及“申式文书”是否为“解文”的问题;四是牒、状的混用问题。关于第二个方面,吴丽娱研究员表示,“信息”二字本身就具有动态性,属于

研究过程和关系的“‘活’的制度史”范畴。她指出,目前学界的讨论比过去更加丰富、深入,研究的问题和层面也有新的开拓点。但相较于中央层面而言,有关结合信息对地方基层政务运行的研究尚显不足。目前,已有研究呈现出一些共同特点:第一,打通唐宋,唐宋结合;第二,对制度史、敦煌吐鲁番文书相当熟稔;第三,研究细致,对史料的推敲落实到字词意义,讨论问题从实际出发;第四,除关注新史料外,注重对旧史料的发掘和解读。此外,吴丽娱研究员认为应多关注一些公文形态以外的内容。以敦煌文书中的书仪为例,书仪的传播、信息的递达往往有着促成其实现的大背景,也有助其形成的主、客观因素。信息流通与国家政治秩序的构建息息相关,而这个秩序也有多方面的表现和统一的时代界限,可以说,这将是未来信息沟通研究中的一个努力方向。对此,邓小南教授在总结中指出,吴丽娱研究员回顾了唐史领域中有关信息课题的研究状况,可谓述、评兼备,既指出了已有的成就和问题,也提出了值得继续追踪和开拓的方向,体现了专家的学术眼光。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虞云国带来题为《宋代政治生态视野下台谏监察信息渠道的通塞》的报告。虞云国教授强调,应多以“政治生态”的视角观察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运行。“政治生态”这一概念更集中地关注中国古代专制集权政体下,政治系统、政治制度与君主权力在实际运作中强弱、贤否、明暗的复杂而微妙的关系,这也与邓小

南教授对“‘活’的制度史”的相关论述吻合。作为“宋代第一监察系统”的台谏,其在中枢权力机构中具有重要地位。宋代台谏监察渠道的制度建设,包括输入渠道和输出渠道两方面,其制度化成果既继承了前代规制,又完善了本朝建设,值得肯定。虞云国教授还指出,还须在变动的政治生态中考察制度化构建,这样才能达到“‘活’的制度史”的研究深度。虞云国教授认为宋代台谏系统运行的振衰曲线大体经历了从北宋前期的低谷上升至元丰时期的峰值,继而经过比较平稳的高原时期后又衰落的过程。随后,他具体分析了宋代各个时期政治生态与台谏监察信息通塞的关系。虞云国教授表示,在政治生态恶化时期,台谏系统与监察信息渠道几无制度条文的重要变动,而监察信息渠道却发生了明显异变。他以徽宗时期台谏官的“免责性筛选”和南宋权相直接干预监察信息的处理等事例,分析了政治生态对监察信息渠道的实质性影响。

通过考察宋代台谏制度的运行与宋代政治生态变动之间的关系,虞云国教授提出了两点需要反思的地方。第一,从系统的视域反思宋代台谏监察信息的通塞。台谏系统是从属于中国古代专制主义官僚制度整体系统下的一级子系统,监察信息渠道则是从属于台谏系统下的二级子系统。在宋代君主、宰执、台谏构成的“三极制衡”雏形中,君权自始至终处于自相矛盾的地位——既处于三极之一的位置上维持和调节制衡格局,又居于这一系统主宰与决策的终端地位。

一旦君主发生问题,台谏系统就会发生问题,其子系统也会随之发生问题。第二,专制集权系统不可能确保监察信息渠道的恒久畅通。在以君权独尊为实质的宋代君主官僚集权政体的大系统中,台谏系统及其信息渠道为权相把控的根源就在于君权的失误和让渡。君主个人因素或可使台谏系统与监察信息渠道相对正常与畅通,但君权的失误只可能避免一时,却不可能长久。因此,古代的台谏监察信息渠道也没有持久畅通的可能。

讨论环节中,中国国家图书馆副研究员高柯立和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方诚峰分别就各自感兴趣的问题与虞云国教授进行了交流。虞云国教授指出:第一,信息渠道的研究课题具有重要意义,除围绕中央机构外,对宋代信息渠道的研究还可以在其他层面上继续展开;第二,信息渠道与政治生态并非两个对立的主题,政治生态是一个可以在考察过程中凭借的视角。加入“政治生态”的视角是为了更深入地推进信息渠道项目的研究,使它拥有一个更加宏阔的背景;第三,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制度层面,要从“人”的层面继续深入。

邓小南教授认为,虞云国教授从更加宏阔的角度,特别是从政治生态、系统论的方法观察信息渠道的“通”和“塞”,而这也是学者一直在追踪的问题。她在总结时谈道,虞云国教授的报告内容对信息渠道项目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宋代有很多建设信息渠道的努力,而这些渠道按照其目标正常运行的时期却非常短暂。邓小南教授对“政治文化”和“政

治生态”进行了补充：“政治生态”包括一个时代的政治文化与制度文化，而这是由当时的士大夫与社会人群参与塑造的。所谓制度文化，指制度实施的氛围，是多种因素互动、积淀产生的综合状态，既包括制度规定本身，也包括制度的执行者、漠视者、扭曲者与抵制者的意识、态度、行为及其周旋互动。综观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几乎没有哪个制度是按照其设计模式原样施行的，调整、修正、变异、走形才是常态。

两场主题报告后，工作坊进入专场讨论的环节。第一场专场讨论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叶炜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吴丽娱、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张祎担任评议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闻以《 膀子在唐宋政务运行中的作用——从敦煌文书〈刺史书仪〉说起》为题，梳理了唐宋时期作为公文书的“膀子”的文体发展脉络及其在政务运行中的作用。雷闻根据相关材料推断膀子属于“奏状”的一种简化格式，并认为目前所见具有奏状性质的膀子最初出现在唐代陆贽担任翰林学士时期。雷闻指出，在唐代，膀子的使用者主要是宰相与翰林学士等近臣，晚唐时期皇帝也使用“内膀子”向近臣宣谕。雷闻进一步推测膀子的格式与适用范围发生变化的转折时期是后梁与后唐之际。他指出，宋代的膀子基本承袭后唐的制度，但也发展出问安、请假、报丧等新功能。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教授李雪梅从公文碑刻碑意图、

碑石功能、立碑时间、公文刻载形式、碑刻命名等角度分析汉唐时期的公文碑，在宏观层面上归纳、总结公文碑的发展轨迹。李雪梅认为，公文碑形制及刊刻模式的演变，标志着立碑目的和功能的变化。汉代公文碑的特色是以铭功体式载录公文，唐碑则更注重公文格式，宋代敕牒碑开始批量出现，公文碑的功能特色日益凸显。总的来说，公文碑自汉以来发展的趋势是从保留局部、关键公文体式到摹刻完整公文体式，从一事一刻到一事多文或数文累刻。这一转折在唐代已部分成型，宋代成为定制。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王孙盈政以《唐、五代时期“堂案”小考》为题，对唐、五代时期的“堂案”与“堂判”进行辨析。她指出堂案在三省制时期已经出现，应是宰相议论军国大政的相关表状在政事堂的存档；中书门下体制确立至五代末期，堂案则是宰相和其他官员对军国大政和常务发表议论的表状在中书门下的存档。在此基础上，她指出《唐国史补》中“宰相判四方之事有堂案”的记载有误，“堂案”当作“堂判”，中书门下体制下，宰相以堂判处理四方、百司之事。王孙盈政认为，堂案内容转变和堂判文书产生，是中书门下作为军国大政的决策机构和常务主要裁决机构的重要表现，反映了唐五代时期宰相机构明显的政务官化倾向。

吴丽娱研究员高度评价了三位报告人的研究，并从膀子礼仪性功能与公文性功能的区分、中书门下奏状运行程序、

个别史料解读等角度向雷闻提出修改意见。针对李雪梅的报告，吴丽娱研究员就《中常侍樊安碑》的性质、公文碑与墓志平阙格式等问题发表了相应看法。最后，她建议王孙盈政应从“案、帖、判”文书的背景下理解“堂案、堂帖、堂判”文书，还可继续探讨堂判结果下达形式、皇帝批复是否保留在奏议上等问题。

张祎建议雷闻应明确界定并分类讨论不同种类的膀子，并应从文书功能而非文书格式的角度来讨论政务运作，他呼吁学界警惕滥用文书研究领域常用理论框架的倾向，指出考虑文书的礼仪性、抽象性意义时首先不应忽略文书本身的实际功能。张祎认为，公文碑发展轨迹是放射性地从汉代功能较为集中的公文与纪功结合的碑演化为功能较为分化的若干种碑，目前采用的分期叙述方式有可能会带来公文碑线性发展的误解。他建议，出于方便学者利用史料的考虑，可以采用著录最早碑文年代的方式。张祎从材料和理论两方面对王孙盈政的报告进行了补充，建议王孙盈政应当根据文书相通的属性扩展材料，并呼吁学界应对相关概念进行更加明确的界定，建立更严密的体系。

第二场专场讨论由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方诚峰主持，台湾长庚大学讲座教授暨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兼任研究员黄宽重、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准教授饭山知保担任评议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余蔚报告的题目是《开禧北伐前的敌情侦测与战争决策》，他指出开禧北伐前夕宋廷侦测敌情主要有三个渠道：

边臣边民上言、赴金使节见闻、宋境流传的关于金国政局的文本。边臣的情报主要来自于被称为“跳河子”的边民以及在隆兴北伐期间南来的“归正人”群体。宋方赴金使节负有收集敌国情报的任务，随着北伐的筹划更是积极地探察金国局势。宋朝境内流传着不少与金国政局相关的说法，它们或多或少被当时的朝臣接受。本应倚重的间谍却由于金方的阻隔政策而无法探知金国北境的即时信息。余蔚指出开禧北伐的失利未必由于主持者一意孤行，而是因为囿于具体条件的限制致使“敌我力量”对比被错估。

四川大学文化科技协同创新研发中心助理研究员陈希丰以《南宋川陕与朝廷的讯息沟通——以吴玠病笃及蜀口选帅为例》为题作报告，他结合相关材料考察绍兴三十一年至乾道四年间，南宋朝廷与川陕高层之间围绕蜀口大将吴玠病笃的反应与措置，以及由此引发的蜀口选帅事等相关问题，分析南宋朝廷对于多种信息来源的甄别、处理、应对，以及对地方武将考察任用方式等关键议题，提供了一个观察南宋朝廷与川陕间讯息沟通的案例。陈希丰认为，总领所、制置使、宣抚使、宣谕使在南宋朝廷与川陕沟通的信息渠道中扮演了关键性角色。

黄宽重先生高度评价了余蔚的报告，称其在讨论范围广度、资料丰富性等方面处理得相当完备。他从边臣、使节、归正人、边民等群体的情报收集渠道在南宋时期的例行性、延续性角度进行了补充，并建议学界应通贯考虑开禧北伐

前战争准备的各个环节。黄宽重先生认为，陈希丰的讨论在资料和深度方面都已相当成熟，建议后者进一步追问吴家在四川势力强大的原因，探讨吴氏部将与吴家之间的纽带关系，并提示陈希丰注意利用同时代其他士人的文集材料。

饭山知保认可余蔚关于开禧北伐时机选择欠妥的判断，并简要介绍了十二世纪金朝北境的政治局势。他指出，开禧年间正好是十二世纪末、十三世纪初金朝北边最稳定的时期，金章宗决定全力反攻南宋，也因为其对北方的暂时稳定抱有信心。他认为余蔚的研究正可以为大蒙古国的兴起给周边国家政策带来影响这一课题提供例证，也期待能通过余蔚未来的研究进一步理解大蒙古国时期南宋的外交政策和生存策略。饭山知保肯定了陈希丰在史料搜集积累方面的力度，并提示应注意不同类型史料的史料性和政治性间的差异、朝廷在四川的代理人代表当地还是中央利益、川陕与朝廷间信息传递过程中的偏差等问题。

余蔚认为黄宽重先生的提示非常重要，同意开禧北伐还有许多敌情侦测以外的环节，表示未来将尽可能地浏览一遍南宋史料。陈希丰感谢黄宽重先生关于南宋敌情侦测例行性和延续性的提示，并回应了饭山知保提出的代理人问题。

自由讨论环节中，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兼职研究员古丽巍与陈希丰就如何理解宋孝宗初期试图取缔吴氏将门的政策进行了意见交换；四川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王化雨强调，对四川的研究应当超出中央、地方二元对立的思维，

中央和地方在这一区域不仅相互博弈，还存在互相渗透的现象；台湾辅仁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郑丞良就南宋朝廷如何核实情报并依据情报做出决策、金朝北境战争造成的社会混乱在开禧北伐时是否已经恢复元气等问题和余蔚进行了讨论。虞云国教授认为，韩侂胄的亲信示意属下不要向韩侂胄汇报金朝的真实情况，是以上级意志为准绳，先有决策、再有论证，屏蔽、堵塞了负面信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讲师杜宣莹提出对开禧北伐时期宋方情报系统和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英格兰情报系统在系统性上的比较问题。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林岩和余蔚对开禧北伐前的军方意见、军事动员、物资调用等问题进行了探讨。黄宽重教授指出资料的不完整性、资料主观性和客观性的评断、主事者的好恶都影响对开禧年间政局的完整判断，并提醒研究者注意加深对南宋军职武人的理解。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冬梅结合之前学者阐述的观点后指出，在前近代物质条件下国家控制能力有限，在一定范围外很难有效地搜集情报。

第三场讨论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李全德主持，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虞云国、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汤元宋担任评议。第一位报告人是台湾辅仁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郑丞良，他的报告题目为《试论朱熹眼中的“庆元党禁”——以庆元年间朱熹书信为主的观察》。郑丞良以朱熹自绍熙五年末离朝至庆元五年辞世这六年时间里将近六百封书信为着眼点，对朱

熹人生晚期的个人际遇进行了全面考察。通过解读不同时期、不同事件中的朱熹书信，郑丞良对“朱赵关系”、“辞职风波”、“伪学风暴”、“党禁阴影”、“落日余晖”等五个专题进行了细致阐述，勾勒出朱熹晚年在主观认识上发生的变化与情感的大致脉络，并以此为焦点透视“庆元党禁”的整体气氛，并指出应具体把握政治事件给每个人带来的主观感受和意义的差异性。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林岩以《南宋科场试策与士人的政治表达——以殿试对策为中心》为题做报告。在总结当下宋代试策研究主要路径的基础上，林岩指出了既往研究中并未得到充分认识的一些问题。通过具体考察，林岩表示，南宋朝野舆论整体上比较鼓励士子在廷对中积极表现，而且士子在殿试中拥有较为自由的言说空间，可以充分地表达政治见解或向皇帝进谏。林岩认为，不应忽视士子们试图通过殿试、廷对抒发见解的渴望。此外，殿试文本作为当时人评论当时事的政治性文件，不仅体现撰写者的政治立场，也多少反映朝堂政治争论的一些重大事件以及君主和士人共享的一些政治理念，可以作为透视南宋政治生态的一扇窗口和感知南宋政治文化的一种途径。

评议环节，虞云国教授首先强调了“庆元党禁”在南宋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郑丞良在全部利用朱熹近六百封书信的基础上，对主观书写与客观历史的互动关系做了比较全面的探索。他还指出，就赵汝愚、朱熹、韩侂胄三人的微

妙关系和“庆元党禁”在不同时间点的变化轨迹等细微之处，还应做更全面的考察、更细心的勾勒。对于林岩的报告，虞云国教授充分肯定了他对现存全部殿试对策文本的囊括性“发掘”，以及对“省试策”与“廷对策”的区分。虞云国教授表示，林岩对各阶层关于廷对策的态度以及权相与皇帝在廷对过程中的政治关系进行了很好梳理，对士子在廷对同时期其他文学作品的考察可以使此项研究更为全面。另外，在涉及南宋权相的评价问题上，他强调相关研究应着力推进到人物、事件的细微处应进行具体把握，不能总是采取大而化之的态度。

汤元宋主要针对郑丞良的报告发表看法。首先，他从朱熹文集的成书过程与朱熹书信的流传情况，对文集收录书信的原始性与完整性提出质疑；其次，汤元宋肯定了郑丞良以历史参与者的主观感受为切入点来考察，是对以往党禁研究范式与“道德美化式”朱熹研究的一种反思。同时，他也指出，朱熹主观感受与党禁客观形势的关系很复杂，需要在不同维度进行细致考察。最后，汤元宋表示书信是一种兼具“诱惑力”与“危险性”的文本材料，学者要小心书信研究中的“陷阱”，谨慎使用书信中的信息。

第四场讨论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讲师张亦冰主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党宝海、赵冬梅担任评议人。中国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高柯立以《政策、信息与历史：南宋平江府给复学田碑探微》为题做报告发言。高柯立以南宋平江府学田争讼案中最关键的三块公文碑

为着眼点，梳理了学田案始末。他指出，原有“茭荡”经围田开发后变成的“荡田”之归属权问题是案件的核心，并通过对府学和地方豪强在学田案中各自作为的考察，指出平江府学最终收回学田的关键在于府学教授汪泰亨的人际关系所勾连起的“非制度性信息渠道”。而府学在争讼取得胜利之后将官府牒文、省札刻石，使得这些石刻文字除了具有实际的法律和社会功能之外，也影响了当时和后人的历史记忆。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博士后罗玮报告的题目为《元明善〈寿国董忠烈公传〉考——兼论元代实录与民间家族文献间的“信息沟通”》。罗玮首先指出，传世的董俊传记中，元明善撰《藁城董氏家传》董俊部分，与其所撰《寿国董忠烈公传》（罗玮拟名）和李冶撰《董俊神道碑》内容差异极大，相抵牾处屡见不鲜。通过对两篇传记撰写时间、行文特点以及董俊生平进行细致考辨，罗玮表示，《寿国董忠烈公传》对《家传》中的董俊事迹进行有意识的改写，改写的依据是翰林国史院中的金史资料和元朝《太祖实录》。罗玮推断，可能是董俊第三子董文用在国家史书编修工作中拔高了董俊在《太祖实录》中的历史地位，从而影响到元明善《寿国董忠烈公传》的撰写。

评议环节，赵冬梅认为高柯立的报告内容既全面又丰富，具体章节中对于汪泰亨人际关系的钩沉、对陈氏兄弟豪强形象的塑造细致精彩。同时，赵冬梅也针对文章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她

认为，文中某些章节的叙述较为冗长，与主题略显疏离；文章内容反映了作者向会议主题靠拢的努力，但在信息理论的使用上尚显苍白；一些细节上的判断还有可商榷之处。赵冬梅将罗玮的报告归于史学史的研究，认为其很好地呈现了历史记录者、历史事实和历史叙述之间极为复杂的关系。同时，她也对文章细节提出两点疑问：一，董文用为何不直接影响董俊行状而选择难度更大的元朝国史？二，《寿国董忠烈公传》的“篡改”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事件的轮廓、董俊的形象并影响了“历史记忆”？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思考。

党宝海表示，高柯立报告中所讨论的事实部分并无太大争议，如将陈氏兄弟定性为“豪民”，以及陈氏兄弟三份用以证明荡田所有权的契据与争讼的府学学田没有关系。据此，党宝海指出，争讼案中各级部门的判决在事实上应无问题，有司的处理体现了公正性与行政程序的合理性。整体来看，这是一个比较审慎、负责的调查与判决。党宝海认为罗玮讨论的问题非常有价值，其对于董俊作为中下级军官在《太祖实录》中形象的反常提出了具有说服力的解释。但对《寿国董忠烈公传》成书过程的解释持不同意见，他认为元明善改写所依据的材料应该还是来自董家。《寿国董忠烈公传》里有大量的地方性、个人化且无法被证实的信息，党宝海认为这类信息一般不会出现在国史、实录中，更有可能存在于地方文献中。

第五场专场讨论由中国人民大学历

史学院兼职研究员古丽巍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包伟民、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黄春高担任评议。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张弢以《西欧中世纪官方文书之形制初揭——以中古德意志帝王的特许状为核心兼及教宗的特许令》为题做报告。张弢指出，中世纪欧洲的“官方”包含了世俗和教会两方面涵义。以君主为例，其发布的文书可以分为任命、特许令、回复等，但行文格式大同小异，形成了“程式书”的固定体式。掌握这些固定体式，有助于研究者从外部形制上辨别文书的真伪并作初步判断。通过现场展示德意志国王（皇帝）奥托三世与教皇维克托二世发布的文书复印件，张弢介绍了欧洲中世纪文书的书写载体、纸张大小、印章等文书形制方面的特点和君主签名、印玺加盖方式，以及文书的开头、正文、结尾各处体现文书程式性的固定符号和书写内容等。张弢指出，国内的欧洲上古、中古史研究面临的一大困境是缺乏实物收藏的史料。现在所见材料是经过编辑的副本，须综合运用文字学、文书学、印章学等独立学科的知识和方法，才能对史料进行初步辨别与分析。本次报告展示了一些文书复印件，他希望从直观上增进大家对中世纪文书的了解。

第二位报告人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讲师杜宣莹，她报告的题目为《英格兰都铎晚期的政务文书编撰与门客入侵》。透过都铎王朝晚期政务文书编撰的形制，她探讨幕僚、官员、君主三种势力如何通过介入信息网络进行权力博

弈。被誉为“英格兰近代早期情报之父”的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Francis Walsingham）遗留下来了一万多份档案有助于分析都铎王朝晚期的政务文书处理过程。通过解析档案中记录的内容，杜宣莹还原了英格兰政务文书运行的口述、书写、传抄、传递、批阅和归档六项程序；而文书流程的详尽分析，有助于进一步探知幕僚、官员、君主如何运用信息网络完成权力博弈，分别形成所谓“门客入侵”、“党争”、“弱势的女主统治”三种局面。以“门客入侵”为例，杜宣莹指出，弗朗西斯将国家的信息部门私有化，他和其他一些大臣将自己的幕僚通过国家升迁安插到下议院——这就是“门客入侵”的表现。这也证实了直到伊丽莎白时期，国会或者下议院并没有获得决策自主权。相反地，枢密院或君主将门客安置在下议院，强化了下议院对政权核心的服从。

第三位报告人是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王化雨，他的报告题目是《申状与宋代中枢政务运行》。王化雨指出，官文书研究的意义在于将原先一些经常讨论的如宋代政府权力运作、皇权相权关系等问题进行细化，通过对文书流转过程中若干环节上起作用的机构、人物进行观察，反过来对宋代政治体制和权力运作做探讨。王化雨首先介绍了申状的基本情况，其次分析了“申”与“奏”的关系，继而探讨宰辅机构对申状的处理环节，最后对“批状”进行了相关介绍。王化雨指出，很多人都认为宋代是制度规范性很强的时代，

其制度的刚性、细致程度与覆盖范围均高于前代。但与此同时，制度的弹性也在加强。宋廷在处理政务时始终面临两个问题，即提高效率和与防范弄权。宋代统治者也一直试图在这二者间寻求一个平衡点，但始终都未找到。从超脱于文书处理的更高角度来说，宋代集权程度的提高可能有着背后更深层的原因。

针对张昺的报告，黄春高表示，他对西欧中世纪文书形制的揭示，反映了当今世界史研究中史料领域的拓宽，其在史料学层面上的意义又超出了单一的世界史研究。对于杜宣莹的报告，黄春高首先肯定了她以信息为视角探究英格兰文书运作流程以及超越信息视角观察政治运作的努力。在讨论近代国家的形成时，从私人化（household）的官僚走向问责制（accountability）的官员（也就是“从私到公”）才是学界比较接受的观点，故而对杜宣莹研究中呈现出来的相反趋势表示了疑问。

包伟民教授认为张昺和杜宣莹的研究可以当作参照物来反思中国史研究。他生动地阐释了特定时代和政治环境下，文本中会出现的特定用语（即所谓“时代语”的现象），并思考在唐宋时代发现、解读这些具有时代特性的表述的可能。另外，包伟民教授结合民国时期的司法文书（如契约、诉状等实例）指出，如欧洲中世纪文书等第一手史料的真实性也同样值得怀疑，须对其进行理性的历史解构。关于杜宣莹的讨论，包伟民教授表示，对比都铎时期英格兰政务文书处理所体现的政治运作特点，宋代的

执政者主动搜集信息、占有信息的过程以及官员由非正常渠道获取信息、民众上诉访求的制度等都是值得考虑的问题。至于王化雨的研究，包伟民教授表示，还需通过进一步的横向、纵向比较判断两宋政务文书制度的发达度。他还指出，在探讨两宋间文书制度的运行关系时，除制度规定外，还需将皇帝、宰相的性格等因素考虑在内。结合“人”的因素综合来看，两宋的申状制度可能并非没有变化。

几位报告人对评议人的发言作了简单回应。针对中古时期文书的真实性，张昺谈道，在宗教虔诚的欧洲中古时代，假文书也曾大量出现，且该时期的文书发布与执行结果往往不相吻合。所以在执行层面上，文书的实效性也须仔细考察。杜宣莹回应了黄春高提出的疑问，她认为探究的过程是建立在对弗朗西斯所启用的秘书与前任国务大臣的对比之上，得出的结论虽显大胆，但值得进一步思考和讨论。针对包伟民教授的发言，杜宣莹提道，在英国伊丽莎白时代，官员透过女性眷属传递情报的“内廷政治”、“亲密政治”蓬勃发展，虽然并未得到良好经营，但不乏是一条信息流动、传播的渠道。针对包伟民教授的观点，王化雨认为，确实要在以后的研究中加强对君主、宰辅等个人因素的考察。进而他提出，“王朝史观”或以重要事件作为历史分界点的思维需要反思，在今后的研究中，也可以选取某一个时期的文书运行作为个案进行更细致的观察。

五场专场讨论全部结束后，邓小南

教授回顾并介绍了“七至十六世纪信息沟通与国家秩序”课题的缘起。她表示，该议题源于历史学界内部不同领域间的沟通与对话：1993年，在参加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宋代的家族与社会”项目时，通过接触文集、墓志、地方志等不同类型的史料和对朱长文、龚明之等个案的考察，她意识到制度史、政治史与社会史、地方家族的研究看似领域不同，实则有着沟通、对话的可能，而联结彼此的桥梁就是“信息”。联想到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创者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 North）的观点，“信息渠道（Information Channel）越多，成本越低”。这一认识与以往的观点不同，激起了她继续探究的兴趣。同时，启发源于现实生活。2003年“非典”爆发期间，媒体对于疫情信息的传布、控制，以及在诸如矿难等事件中人们对公共权力和公共信息知情权的追求，都体现了以信息为表现形式的国家制度的运作情形和公众对之的反馈。“信息沟通”是一个贯通古今的题目，这也是“信息沟通与国家秩序”选题的现实意义之一。启发还源于一些传统和现代研究中的核心议题。如制度史和政治史研究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宋代之法注重“上下相维，轻重相制”，中央和地方“相维相制”的基础、中央对权力的把握、对各级官员的掌控等都围绕信息展开。又如，近年来关于地方社会、士人网络的研究成为热点，而地方士人的交际活动内容，很多都是相互之间的信息交流。再如，白彬菊在《君主与大臣：清中期的军机处（1723—

1820）》一书中就强调，“文书制度的本质是信息流”，而信息乃是一切决策的基础。

接着，邓小南教授对课题核心概念——“信息”进行解读。她首先谈道，在唐宋语境中已明确出现了“信息”的概念，且与“通”、“塞”、“闻”、“不闻”等表述相联。这说明，信息在本质上是一个流通的概念，而信息的流通需要渠道。同时，信息还具有一定的社会性。对于信息的理解、传递，与制度和组织相互依托、互相作用，信息流通与不同的官僚部门、社会群体、人际网络之间的关系，都可以作为思考、观察以往问题的全新角度。有关信息沟通的问题，应该是“处处有材料，人人有话说”。

随后，邓小南教授介绍了课题涉及的主要议题。从宏观层面上讲，第一是关注王朝对于信息渠道的整体建设。君主专制政体虽然限制着信息沟通的通畅度，但中外历史上都存在着为维护王朝核心利益而建设信息渠道的努力。第二是关注信息渠道中处于“关节”地位的机构或个人，以及他们对于信息通塞的影响。第三是关注信息渠道的沟通与博弈。第四是关注信息沟通的延续性，从历史上不同时段的不同政权间的信息沟通问题。第六是关注同一政权内部不同机构之间、官方上下之间的信息沟通。在谈到当下一些具体的研究案例时，邓小南教授介绍了台湾学者刘欣宁利用居延汉简研究汉代文书和信息的口头传递、

秦汉地方官署的信息沟通与决策等课题。邓小南教授还介绍了黄宽重先生关注南宋地方士人的信息来源，以《可斋杂稿》所见宋、蒙广西战役为例探讨晚宋军情的搜集与传递等研究。这些研究都呈现出日常或非常时期信息沟通对国家秩序、社会秩序的重要影响。

接着，邓小南教授又以宋代为例，进一步介绍可供信息沟通课题深入研究的议题。首先，宋代的信息渠道具有多层多途的特点，以君臣之间的沟通而言，群臣奏事、御前进对、进呈章奏、台谏进言、经筵留身、诏求直言、外官辞归等环节均可从制度层面加以深入研究。从不同的事务性质出发，也可以拓展该课题的研究深度，宋代朝廷与诸司、地方之间的信息沟通，如朝廷的要闻发布、特派专使、外台监司、州郡专达等都是可以切入的角度。官文书或公文也是研究比较集中的领域，各式文书（如制、诰、诏、敕、牒、符、帖、关、刺、状、启、咨目、印纸等）的功能、类型、形制及其变化都可深入探讨。信息收集、处理渠道的实效性也是下一步研究中值得深入的问题。对于经过异化了的“空转”的制度，还需要探究其背后深层的原因，亦即为何一些“循规蹈矩的阳奉、显而易见的阴违”可以被允许长时间地存在。其次，时效性是信息传递的一个重要指标，而信息传递的路线与控制交通的机构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信息传递的时效性。对于国家在物质、技术能力上促进或维护信息沟通时效性所作的努力值得我们深入探讨。除此之外，还应关注

上下之间、官民之间的信息交互。碑铭、诉讼中体现的地方性活动和诸如历史书写、历史编纂中出现的“信息改造”或“再造”等议题，也都是信息沟通课题的应有之义。邓小南教授特别指出，信息渠道作为一种路径，本无所谓“通”或“塞”——真正对运作渠道起作用的仍是人为因素。朝廷对信息获得的“焦虑”态度是否可真正转化为对建设信息渠道的重视？在不同的政治生态和政治运行曲线中，这些制度该如何落定？哪些人关心收集的信息是否准确？这些问题，都是在研究中须予以瞩目的要点。

针对下一阶段的研究，邓小南教授表示，希望在时间跨度上打通断代，可以基于整个中古时段（middle period），即从唐代中期到明代中期进行长时段的考察。在地域辐射上，希望从过往关注较多的“中原”、“东南”区域延伸至周边政权甚至整个东亚地区。邓小南教授指出，希望这个课题能延揽至更多不同领域、不同时段的研究学者，彼此之间在碰撞、沟通中走向更深入的研究。

黄宽重教授在总结发言中首先谈到“信息渠道与国家秩序”对于中国历史学界的意义。他指出，这一议题主题性强、涵盖面宽、包容性好，有助于突破历史学界以往过度重视引进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做法。以往对政治史、制度史的研究往往只是从单一角度进行观察，若以“信息”新鲜视角切入，有助于对旧问题产生新看法。接下来，黄宽重教授谈到了宋代信息传递的两大特点：其一，作为军事上的弱国，宋廷在对外战争时

对信息的收集和掌握呈现了一定的特点；其二，与其他时代相比，宋代士人数量多、政治参与度高。透过对宋人文集、书信、笔记、小说等材料的分析，我们可以修正之前对宋代历史现象的一些简单化认识。黄宽重教授还表示，研究涉及的涵盖面还可以作进一步延展，如宋代士人对知识体系的建构、明代出版造假与信息造假等现象都是可探讨的话题。此外，研究的时间跨度也可进一步拉长，观察宋元与明清之间的联结，有助于更好梳理中国古代文化和学术的体系。尤其是南宋到元这一时段，目前的研究尚有许多开拓空间。

随后，与会学者就相关问题进行探讨。赵冬梅教授表示，2018年的春季工作坊可能会以论题探讨为主，而非论文探讨。包伟民教授谈道，印刷术的发展对于宋代的信息沟通、民间知识传播起到重大作用，可作为一个议题进行研究。虞云国教授指出，议题范围扩大与聚焦同样重要，“社会秩序”相较于“国家秩序”的包容面更大；时代跨度也可拉长至明清甚至近代，在拓宽研究面的同时选择几个能够引发与会学者兴趣的相对聚焦的课题会更有利于取得研究成果，进而对学界产生影响。林岩副教授从文学史的角度谈到苏轼的“乌台诗案”，他认为，印刷术的发展对当时的信息传播起了重大作用。李雪梅教授则从石刻碑铭的角度补充了官府的政令信息向地方传布时的形式、特点等内容。

最后，邓小南教授对参加讨论的与会学者表达了感谢。她指出，课题刚刚

启动，在可预见的时间内，有关“信息”的研究恐怕无法穷尽，关于“信息”的探究也难以毕其功于一役。更重要的是，在这个题目的统领下，有效沉潜下去，深入挖掘材料，不断深化议题，真正做出有聚焦性质的研究，以引领性的话题让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界真正获得应有的话语权。

（撰稿：董林、胡文杰、于志霖、郦文彬）



文研纪念·专题展览



01

纪念与传承： 涂尔干逝世一百周年纪念研讨会

2017年11月18日，“纪念与传承：涂尔干逝世一百周年纪念研讨会”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本次研讨会是“北大文研纪念”第一期，由文研院与商务印书馆共同主办，分为四场。第一场由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主持，主题为“纪念涂尔干讲话”；第二场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王铭铭教授主持，主题为“现代社会与政治”；第三场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杨善华教授主持，主题为“世界文明与法国传统”；第四场由文研院访问教授、上海大学社会学系肖瑛教授主持，主题为“自杀与现代社会”。参加本次研讨会的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苏国勋、研究员赵立玮、助理研究员陈涛，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孙飞宇、助理教授田耕，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赵丙祥教授、王楠副教授、杨清媚副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倪玉珍副教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讲师李英飞、魏文一，商务印书馆编审李霞、副编审白中林。

“纪念涂尔干讲话”部分，渠敬东教授谈到，本次会议是一个纪念性的研讨会，也是文研纪念活动的第一场。之所以在涂尔干逝世一百周年之际召开，是因为西方对于理解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传统构成了



研讨会现场

一个重要的维度。最近，法国、意大利等西方国家也在举行纪念涂尔干的活动，而我们具有自己的特点。参加本次研讨会的有中国社会学界研究涂尔干的前辈、中坚与第三代年轻力量，体现了良好的学术传承。在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下，国内的涂尔干研究积累了一批重要成果，涂尔干著作的中译本数量多于英译本就是一个体现，而与商务印书馆合作出版的涂尔干文集十卷本也即将面世。随后，商务印书馆李霞主任作为出版方的代表，介绍了新版涂尔干文集的出版情况，并对渠敬东教授带领的研究团队所给予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

苏国勋研究员表示非常高兴看到社会学的新生力量。作为中国社会学的前辈，他回顾了四十年前的求学生涯，说明了其选择马克斯·韦伯作为研究对象的过程。苏国勋研究员还阐述了他对当前理论研究

的三点看法：其一，涂尔干的思想是理性主义的，当前学术界将涂尔干定位为实证主义奠基人是有问题的；其二，社会理论研究方面，应该多一些古典理论的比较研究，以凸显经典理论家各自的特征以及他们之间的思想张力；其三，社会理论研究应该抛开门户之见，做到兼收并蓄、从善如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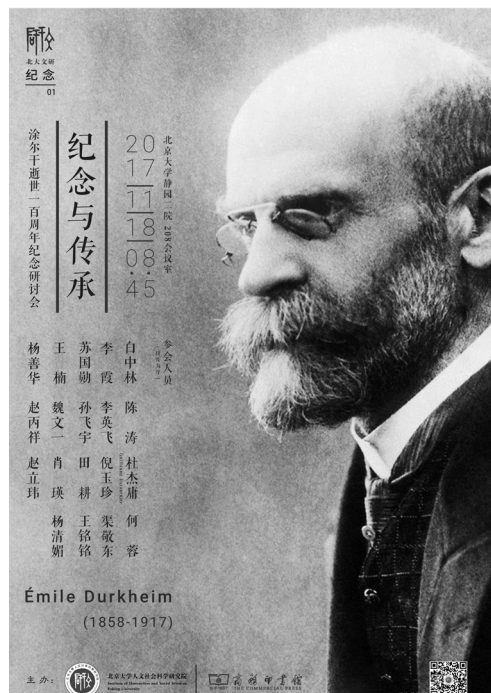
杨善华教授则回顾了从事社会学理论研究之初，老师们的谆谆教诲：要对理论抱一颗敬畏之心，要精通哲学，要掌握两门外语，要有随时会被颠覆的“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之感，要有将冷板凳坐到底的毅力……接着，杨教授指出了涂尔干在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学习的五个方面：首先，他在做人方面为我们树立榜样；其次，涂尔干是法国第一个学院式的社会学家，注重上课效果；第三，涂尔干能够仗义执言，为德雷福斯辩护，具有极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第四，涂尔干具有追求自己学术目标的执着精神；第五，涂尔干具有极强的反思精神。

王铭铭教授表示，以涂尔干为中心的社会学年鉴学派，对我们思考中国知识的系统化具有重要意义。葛兰言等法国年鉴学派的汉学研究产有许多重要成果，这也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王铭铭教授自80年代以来研究中国民族改革和土地改革进程。当今的社会问题，有很多是一种民间式社会的复兴，即民间在重塑道德环境。涂尔干的《宗教社会的基本形式》拓展了宗教的边界，对于我们理解以上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法国远东学院教授杜杰庸

（Dutournier Guillaume）因出差在外，委托渠敬东教授宣读了发言稿，主要阐释了重读涂尔干对法国当前社会危机以及涂尔干式中国研究的意义。杜杰庸教授首先梳理了涂尔干在和历史学、哲学的较量中确立社会学地位的社会及思想背景，并将其根本立场总结为：人类的思维从社会结构中脱胎而来。涂尔干强调宗教的必然性，并批判了现代社会的主观主义。当前法国出现的恐怖袭击以及中国近年来的宗教回归等现象，都能在涂尔干的思想中得到重要的理论分析依据。

第二场“现代社会与政治”部分，渠敬东教授以《追寻神圣社会——纪念涂尔干逝世一百周年》为主题进行发言。他认为，涂尔干对法兰西的贡献是从牺牲开始的，他将自己的弟子、独子送上了战场，而这一切都源于他的爱国心。涂尔干对当时整个西方世界危机的判断是，自法国大革命以降，整个西方社会处于一种崩溃的状态。这种状态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自然权利和自我保存学说带来了极端个人主义，而《自杀论》作为一套人性论学对这一问题作了回应；第二，由极端个人主义带来的纯粹抽象的政治；第三，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面对危机，我们不能只在形而上学的构想中去生活，必须回到社会生活本身。而社会事实不是物理事实，社会学必须处理整体问题。涂尔干试图找到将人结合在一起的历史规范，其历史研究在社会范畴史几乎涉猎了所有的领域：法团、国家、财产、契约。涂尔干为契约寻找神圣性的起源时找到了宗教——不是形态学和分类学意义上的宗教，而是所有政治体、



共同体和人性的本质。整个现代世界危机最核心的部分便是世俗化，我们遗忘了所有的归属感与敬畏感。因此，必须通过教育将神圣性移植到每一个现代人的心里。西方在进入 19 世纪后有一种世纪末的悲情，而当代中国也很容易陷入到这个腔调里。我们纪念涂尔干，并不在于我们找到了答案，而在于它们就是生活本身。

魏文一老师则讨论了涂尔干论政治社会的两个面向——国家与祖国。他以法国于 1905 年颁布的国家与教会分离法案为线索，讨论其由此确立的世俗性质。但是，此法案也内含潜在的危机，即良知自由与世俗国家之间的紧张。一方面，在崇拜自由的总原则下，共和体制为良知自由转化为个人政治权利提供了合法途径，进而挑战了国家权威。另一方面，个人与共和国

之间的感情越来越疏远。涂尔干进而判断，危机根植于法国的政治传统，特别是“1789 年原则”。不同于契约论和教权主义的主张，涂尔干提出国家与祖国是政治社会的两个面向，个人主义和爱国主义是相对应的两种伦理，符合有机团结与机械团结的特征。人格崇拜为国家和个人所共享，国家保障个人自由的同时，也拥有相对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国家是社会的大脑。祖国是现存的最大的实体，爱国主义则提供集体意识、共同情感。人们不能为了理念上的无形的祖国而与邻人、同胞为敌。

李英飞老师的发言题目为《现代社会的理论基础——涂尔干论政治社会的历史与现实》。他以涂尔干独特的社会观作为起点，梳理了涂尔干作品中对现代政治的思考。李英飞认为，涂尔干所构建的社会体系（法团与家庭、氏族、村落等）是现代国家必然选择，而法团和社会的概念也能帮助我们透视西方文明的实质性意涵，在表面的古今之变下寻找延续的本质。

第三场的讨论主题为“世界文明与法国传统”，王铭铭教授以《关于文明概念的札记》一文展开。该文由涂尔干与莫斯合写，并于 1913 年发表在《社会学年鉴》上。王教授首先概括了文章的主要内容：在年鉴学派以往关注的政治地理边界清晰的社会之外，存在着一种超国族（社会）现象，广泛出现在器物、工艺风格、语言、制度等领域。涂尔干和莫斯基于该现象所具有的时间、空间特性以及介于世界和社会之间的特征，用“文明”一词来概括这个既富有民族性又富有超民族性的事实系统。而这里的文明概念与孔德式的、人类

普遍历史进程意义上的文明概念有所不同，是复数的、具有道德含义的。它既可“栖居”在国族疆域内部，还可“游动”在国族之间的——打开了涉及作为超国族“道德环境”及与之相关的文明因素扩散条件的研究视野。最后，王铭铭教授总结道，涂尔干和莫斯实际上展望了一种世界性的文明研究，启发了其后的研究路径。

第二位发言的是赵丙祥教授。他通过阐释杨堃和弗里德曼对“法人团体”的运用来梳理涂尔干传统在宗族研究方面的传承方式。赵教授首先指出，杨堃的宗族研究继承并推进了涂尔干传统。他将家族和家庭看作社会的缩影，虽然家族仍然保留着“机械团结”的色彩，但“有机团结”越发成为其主导原则。在另一条线索上，我们如今对于弗里德曼的理解是将其思考问题的范围缩小了。围绕《新加坡华人的家庭与婚姻》等文本，赵教授指出，在弗里德曼讨论的主题中除了集权政治与单系亲属组织之间的博弈关系外，还隐藏着一条涂尔干的命题主线，即环节社会与劳动分工。现代社会中的亲属制度、模拟亲属制度甚至是非亲属制度的法团正是它的表现。

接下来发言的陈涛老师通过讨论涂尔干和列维－布留尔对伦理学的两点批评来触及社会学的基本主张。不同于传统伦理学，涂尔干强调对道德事实的实证研究，并以社会功能界定道德。社会的“神圣”从集体欢腾中再造出来，可被用以解释道德理想的创造与道德的变迁。宗教生活的神圣性相当于道德理想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陈涛老师认为，这种分析延续了涂尔



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

干一贯采用的将功能分析和因果分析相结合的思路，但其对社会的实体化或神化的倾向是值得讨论的。陈涛老师还表示，对新道德和新制度的诉求应放在社会关系中去理解，并关注社会关系中人的真实需要。

倪玉珍老师从圣西门所处的历史语境入手对其宗教思想加以评析。倪老师指出，圣西门完成了对宗教理解的双重转化：一是将宗教去神圣化为人类的发明；二是将它神圣化为维持社会必不可少的世俗制度。从圣西门到涂尔干，重视宗教的社会整合功能是一脉相承的。涂尔干在前者的基础上提出了重建职业群体以维护社会团结的理论。

第四场主题为“自杀与现代社会”，在场学者们围绕涂尔干的《自杀论》进行更加贴近文本的讨论。孙飞宇认为，根据涂尔干的定义，自杀意味着有意识地选择死亡，其对立面即自我保全。涂尔干将不同类型的自杀视为不同道德的极端表达，就其文本关联来说，他对于自杀类型的界定与他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之中对于社会学的界定有内在实质性的关联。作为一名道德科学者，涂尔干在《准则》一书

中对于社会学的界定与在《自杀论》中所呼吁的某种道德状态异曲同工，甚至社会学本身即是某种现代道德人格的表达。

赵立玮研究员讨论与检视了《自杀论》中类型学的一些关键方面和存在的问题（包括自杀论与道德统计学之间的关联），结合涂尔干的人性论进行辨析。他十分强调涂尔干社会理论的人性基础，认为他实际上提供了一种作为历史哲学的个体发生学。涂尔干通过对“自杀潮”进行社会病理学分析，深刻揭示了现代人的生存境况。《自杀论》的“经典”意义之一便是其将理论图式与时代问题紧密结合的研究范式，这充分体现了古典社会理论的本质特征。

王楠副教授认为，《自杀论》的四种自杀类型背后呈现出现代社会完整的病理学分析。要克服因现代社会潮流的极端化

发展而导致的社会病态问题，不应采取集体欢腾式的革命方式，而应回到历史去考察其源起和演进，以便在新时代接续传统，重建人心与道德秩序。

本次研讨会的最后，渠敬东教授进行总结发言。他表示，中国人阅读涂尔干会生发出强烈的亲近感，其学说包容着很多具有平衡感的经验性内容，与中国人的智慧非常贴合。对于中国文明的理解，不应是原教旨主义式的，而应在各种立场间取中，进而理解自己、理解世界。此外，对于西方而言，自杀是最核心的文明问题，而这一点在中国并不适用。我们要结合不同文明的历史和现实融会贯通，要深入地进行跨文明比较研究。

（撰稿：宋淑敏、牟思浩）

02

张政烺先生纪念座谈会

2017年11月22日，“张政烺先生纪念座谈会”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召开。本次活动是“北大文研纪念”第二期，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华书局三家单位联合举办。座谈会分上下两场，上半场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

授邓小南主持，北京大学副校长王博、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任张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孙华、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卜宪群先后致辞，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严文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马克垚、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曾瑜、故宫博物院研究

员林小安作主题发言。下半场自由发言，由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李零主持，参与发言者有：中华书局资深编辑崔文印、刘宗汉，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陈绍棣、齐文心、萧良琼、常玉芝、胡振宇、黄正建、栾成显，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研究员陈平、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超，以及逯钦立先生哲嗣逯弘捷、张政烺先生哲嗣张极人和张极井等。

座谈会伊始，邓小南教授介绍了张政烺先生的学术生平。今年是张政烺先生诞辰105周年，张先生1932年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1936年毕业后为傅斯年先生所援引，在中研院史语所工作十年，抗战胜利之后以教授身份回母校任教，1960年调中华书局任副总编辑；曾经参与筹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并且长期担任历史所学术委员和研究员。当年张先生虽然被迫调离北大，但是他内心对于北京大学的情感始终非常的真挚、深沉，他的珍贵藏书最后都捐献给了北京大学的考古文博学院，成为今天“张政烺文库”。邓小南教授赞扬张先生在古文字学、古文献学以及中国通俗小说等等方面、

各个领域都有极深的造诣、极高的成就，对我国古代社会性质的认识，对甲骨文、青铜器等一些铭文考证，无论是长篇论文还是短篇陈述均内容严谨充实，在他所涉猎的各个领域都做出了引人瞩目的成绩，是学界里程碑之作。她回忆张先生曾经给她女儿题词，写下“童心”两个字，说这也是张先生一生的写照，充满童真、童趣。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精神值得后辈敬仰。“今天在北京大学缅怀张政烺先生，一方面是‘迎先生回家’，



王博副校长致辞

另一方面也寄托了后辈的怀念和追思。”

北京大学副校长王博致辞，首先代表学校感谢和欢迎与会者的到来，也对北大文研院、考古文博学院、中华书局以及邓小南、渠敬东等对活动的支持表示感谢。王博副校长讲到了张政烺先生与学术传统的关系，称在张政烺先生的学术里面，一方面有北大所积淀的深厚的学术传统，另一方面张先生本身也奠定了另外一个传统：张先生是北大的老师，他又培育出了非常多优秀的学生，这就是传承。此外，王博副校长还谈到张先生在古文字、古文献等领域的贡献，而他自己以前研究《周易》时读张政烺先生论文也启发良多。最后，王博引用了李大钊在北大二十五周年时的几句话作为结语：“只有学术上发展值得做大家的纪念，只有学术上的建树值得北大万万岁的欢呼”。他期待文研院从张政烺先生学术展开始，通过展览、座谈会、口述史等形式纪念北大老先生，传承前辈学人的学术，同时也传承他们的一种生命，为后来者树立一种典范。

张帆教授则从张政烺先生与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渊源谈起，称张先生曾经在北大历



院长邓小南主持

史学系读书，也曾任历史学系助教。至今，历史学系的各种评估、宣传等材料都要列出任教过的名师，张先生和邓广铭先生，包括更早的向达等多位著名学者，总会名列其中。历史学系因行政事务繁忙，最近几年对于已过世和已退休的老先生做的事情比较少，张帆教授对此表示惭愧。因求学时间和研究领域原因，张帆教授跟张先生接触的机会较少，但对张先生低调的为人和声望则有所耳闻，称一位与他认识的、在内蒙古工作、年近 90 岁的学者说，现在很多人号称大师或加上国学大师头衔，张政烺先生是最当得起这个头衔的。

孙华教授主要讲述了张政烺先生与北大考古文博学院的密切关系。称张先生的藏书现在在考古文博学院的资料室，宿白先生曾评价张先生藏书非常之好，张先生藏书不在于版本，不追求版本，但是对历史学系和考古学系的师生都非常有用。称张先生关心考古，曾在林小安先生陪同下到山西曲沃天马一曲村考古工地呆过一段时间，工地条件非常之差，经常停电，张先生则天天和学生邹衡先生一起讨论青铜器铭文和中国早期历史的一些事情。三星堆要建博物馆时，张先

生亲自为华西考古题“大有可为”四个大字，托林小安先生交给自己，再由自己转给三星堆博物馆，现在还在博物馆陈列室里。孙华教授最后追述张先生知识非常广博，不仅在先秦史、古文字方面，同时也写过《宋四川安抚制置副使知重庆府彭大雅事辑》之类的文章，称那时候是抗日战争时期，张先生写这篇文章说明他当时也心系国家大事。

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曾先后参与并筹办过《张政烺文史论集》和张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时《张政烺文集》（全五册）的两次座谈会，一次是 2004 年，一次是 2012 年。徐先生主要讲述了张政烺先生与中华书局的三重因缘：第一因缘，称自己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入职中华书局，就常听到大家谈起张先生，知道 1960 年代张先生曾调任中华书局，但没有到任。十年前，中华书局开始启动二十四史点校本修订工作，对档案进行清理。李零先生对徐俊说，希望能找到张先生调任中华书局的档案。他记得，当时只看到一份北大历史系派人到书局洽商张先生调任中华的介绍信。这次中华书局又做了查找搜集，找到了张先生调任的介绍信，由北大人事处开具，时间是 1960 年 9 月 4 日。介绍信只有一段格式条文：“兹介绍我校张政烺同志等一名到你局工作，请接洽。”记录张先生原工作部门：北京大学历史系，职务：教授，级别：教学二级。《中华书局百年大事记》1962 年下记载：7 月 30 日，文化部任命张政烺为中华书局副总编辑。所附历届领导名录，张先生名下注明：未就职。自己前几年所作关于张先生的笔记：1960—1963，在中华；1963.2.5 副总编辑，1966 年历史所研究员。张先生 1960—1966 年，

实际在历史所。第二重因缘，是 1971—1975 年《金史》点校，张先生是在 1971 年接手原由傅乐焕先生未完成的《金史》点校工作。徐先生言，“我觉得张先生那一代学者在二十四史点校上所做的学术贡献、人生奉献，怎么表彰都不为过。”第三重因缘，是张先生几乎全部的著作，都由中华书局出版，包括张永山先生编的《张政烺先生学行录》。徐先生最后说：“大家对张先生的怀念，学术的意义要远远大于纪念的意义。纪念他缅怀他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张先生的学术，至今仍然鲜活地融入在了当下和未来的学术发展中，这是张先生学术生命的伟大之处和价值所在，也是我们出版的价值所在。”

卜宪群教授回顾了与张政烺先生的个人接触，并谈论了张先生的学术精神。称他博士论文答辩时答辩委员会主席即是张先生，也去过张先生家一两次。其中一次，张先生问他是哪里人，他回答说是安徽南陵，张先生马上说你们老家有老虎。张先生晚年去医院看病不方便，自己曾拿着先生的病历到协和医院去帮助询问大夫。张先生学术方面，卜宪群教授说，首先还是要学习张先生刻苦读书、追求创新的精神，张先生解决了古代史、古文字、古文献学等方面重要问题。其次，应该学习张先生淡泊名利、安于清贫的人生，一辈子最高级别是中华书局副总编辑，张先生以及家属几乎没有对单位提出过任何要求。之外，他的高尚人格，乐于助人也值得学习，只要有求于张先生，他都会去帮助。张先生甚至将他一些没有发表的文章也拿出来供大家参考学习。

主题发言，序齿不序爵，首先发言的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严文明先生。严先

生称张政烺先生是他从事学术研究的启蒙老师，他在大学里的第一堂课就是张先生教的。严先生回忆了张先生课堂趣事，同时也介绍了张先生广阔的研究视野。说张先生讲课不善言词，但板书非常之好，有时写字找不到板擦，就拿自己袖子去擦；有时候讲及考古材料，想不起来，就拿粉笔在自己脑袋上敲，敲来敲去，整个脑袋就是一个白脑袋，身子是一个白身子。对于张先生的印象，严先生记忆是没有什么架子，平易近人，回忆张先生曾经给历史系的年轻教师和研究生开过商周史研究课，先讲文献，如文献的编纂和考证；再讲文字，如甲骨文、金文等；第三讲考古资料，比如安阳的发掘。称张先生讲甲骨文，不是讲文字，而是讲甲骨文里面的内容。如讲甲骨文里的“众”字，甲骨文哪些地方出现了这个字，这个字前后是什么，彼此关系是什么，从前后的行文里推测“众”是什么意思、什么身份，接着从这身份进一步讲到在商代的社会组织、军队组织。对于张先生的学术关注范围，严先生则以张先生对 1959 年历史博物馆开馆时把大汶口遗址第十号材料作为夏遗物的质疑、1994 年去台湾九族文化村参观访问以及对《满江红》作者是否为岳飞等生动事例娓娓道来。

张政烺先生在北大历史学系任教授十四年，他教过的学生分布在后来的考古文博界、历史学界，也有虽在历史学界，但并不从事中国文史研究者，马克垚先生就是其中之一。马先生 1952 年入北大历史学系，当时他们两大通史——中国通史、世界通史是主要学习内容，张先生讲授先秦史，后来四年级时，他又选修过张先生的“殷周制度研究”，均令他受益匪浅，后一门课和当时



李零教授师从张政烺先生

汪钱先生的“均田制研究”，将他引进了学问之门。马先生称张先生上课讲话不多，时常背过身去在黑板上写字，密密麻麻的写了一大片，他们也就跟着奋力抄写。“他的讲课给我印象不深，我曾经说起过，那时的通史课，都是老师们开始学习历史唯物主义编写的新内容，不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今天从《张政烺文集》的《古史讲义》中重新学习他 1952 年给我们讲课的内容，感到十分亲切，也感到当时自己年幼无知，实际上对那么丰富、还有些艰深的课文是不能完全了解的。”通过与张先生断断续续的接触和学术探讨，马先生认为张先生是真有学问。当时他们学生中流传一个口号，“张先生无所不知，你不管问他什么问题都可以马上回答。”马先生最后说，“张先生的学问、人品，是我们后人学习的榜样。今天我们纪念他，就是要发扬他的为人为学之道，在当下的学术环境中树立正气，对抗各种歪风邪气。我系还有许多我们敬仰的老先生，如向达、邵循正、齐思和、杨人梗先生等，他们和张先生一样，都是一代宗师。希望文研院联合历史

系，在适当的时候举行他们的纪念活动，以发扬光大他们的学术，展示他们的品格，传承我们历史系的传统。”

张政烺先生当年有三项遗愿没有完成，分别是《中国古代历史图谱》、《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校读》、《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如今这三项遗愿都已有人帮助完成。《中国历史图谱》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王曾瑜在张先生病床前受命，重新组织班底整理出版；《马王堆周易经传校注》由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先生带领学生整理出版，《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由北大历史系教授朱凤瀚先生带领学生整理出版。作为主持并参与整理《中国古代历史图谱》工作者之一的王曾瑜先生，主要讲述了他对张先生的三点印象：一是张先生神人也，但不赞成将张先生学问神化，说如此反而不敬；第二，一个人学问不可能百分之百形成文字流传后世，张先生很多宝贵时间都是在“为他人做嫁衣裳”，只要有人求教于他，他都会不问亲疏，绝不会自己留一手；第三，母校的校训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应是每一个北大人立身行事的底线。科学的对立面是伪科学和愚昧，张先生的科学精神即使在严酷的政治环境下，在学问上也绝不说违心话，看风使舵，见利忘义，这几个字在张先生的词典里面是绝对没有的。古人讲道德文章连成一起，是很有道理的。“我们在学问上赶不上张先生，在道德上应该永远以张先生为楷模。”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林小安先生长期担任张政烺先生的学术助手，他也讲述了三个故事，以谈“真诚求实”是张先生一生的为人为学之本。第一个故事，1980 年代陕西

考古所考古队发掘了若干所谓“黄帝时期的甲骨文”，张政烺先生认为这批甲骨文不可信。后文物局专门召开了专家评论会，张先生拒绝参加。会上胡先生第一个发言，说“这个发现很重要，希望继续做工作”，之后不再多说一个字。高明先生第二个发言，接着张亚初、李先登表态，认可高明先生的意见，都说这批甲骨文是中国最早的甲骨文。黄盛璋先生发言很激动，说古埃及文字比中国早太多，这批是中国最早甲骨文。李学勤先生发言没有说假还是真，他列举了殷墟甲骨文有五个特点。严文明列举了大汶口大口尊陶文例子，认为陕西考古所发掘的“甲骨文”的状况难以理解，难以解释。第二个故事，关于山东省邹平县出土的残陶片上字，当时社科院考古所举办了笔谈，邀请各部门各单位的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对此表态。胡厚宣和张政烺是被邀请参加笔谈者，但两位先生都拒绝参加笔谈，没有发表一个字。林先生称，不参加本身就是不表态的表态，“如果是重大发现的话，不会没话可说”。第三个故事，从 1977 年开始，在甲骨学界有一场关于甲骨分期的大讨论，至今已经有四十年整。有中国学者提出原来殷墟甲骨文分为第四期的武乙文丁的卜辞“应该”提前至殷墟甲骨文分期的第一期至第二期亦即武丁祖庚卜辞。这不是相邻两期期末与期首之间的微调的差别，而是把整个第四期卜辞提升到第一期。为了判断是否应该提前，张先生从头到尾反复多次认真细致的研读了《甲骨文合集》十三巨册，从头到尾研究了甲骨分期的论述，翻来覆去的研究。1980 年代中期，文物出版社要为裘锡圭先生出版论文集，在审查所报的论文后，提出把关于历组卜辞的

论文删掉，不收在论文集里。裘锡圭先生对此意见很大，认为这是他论文里最得意最重要的一篇。而拿下这篇论文，其实是张先生的意见，是张先生为了爱护裘先生，不让他甲骨分期这么重大的问题上失误，从而避免在甲骨学史上留下永久的遗憾。林先生最后说，他希望借张先生 105 周年纪念座谈会之机，希望学术界不要忽略张先生和胡先生的意见，应该对历组卜辞问题慎之又慎。

下半场自由发言，先后发言者有中华书局前辈编辑崔文印、刘宗汉，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陈绍棣、齐文心、萧良琼、常玉芝、胡振宇、黄正建、栾成显，及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研究员陈平、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赵超、逯钦立先生哲嗣逯弘捷等。大家追述了张先生的为人为学、提携后学及点校《金史》、编纂《中国古代历史图谱》的往事，其中萧良琼研究员谈及张先生被调离北大的原因，谈了她自己的认识和看法。张先生哲嗣张极人、张极井最后发言，对各位学者和亲朋好友的到来表示感谢，张极人引用了老子《道德经》中一句话来概括，“死而不亡者寿”。张极井对于父亲张政烺能得到学生、后人的爱戴表示心情激动，说他父亲一生，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勤奋，二是厚道。在张极井的印象中，直到父亲去世之前，都一直在读书，几乎没有别的爱好。1977 年恢复高考，张极井考大学时，父亲对他只说过一句话，“你得努力”。而做人厚道，张极井言，这不仅是他父亲一生的写照，也是他一直激励自己的做人原则。

（撰稿：陈彬彬、孟繁之）

“张政烺先生学行展”专题展览精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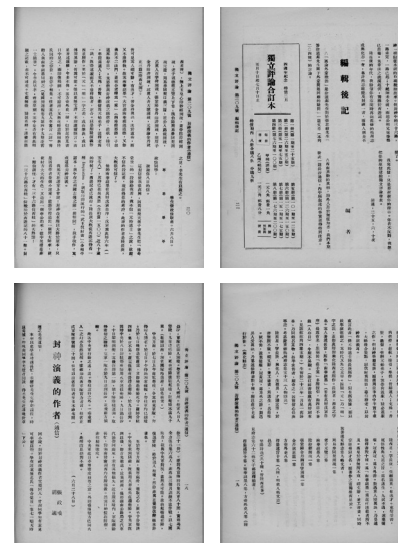
愿做学问。他的墓碑上刻着他手书的座右铭‘真诚求实是为人为学之本’。他这一辈子，没有官职，没有头衔，没有门户，也没有子弟兵，但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却赢得了北大师生和学界所有人的爱戴。什么叫老师？这是最好的答案。57年前，张先生离开北京大学，成为一生之痛。今天，我们接他回家。”

张政烺，字苑烽，山东荣成人，生于1912年4月15日。193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历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华书局副总编辑，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历史博物馆学术委员会委员。先生在中国古代史、古文字学和古文献学等领域享有极高的造诣，是现代中国古典文献研究的集大成者。其在中国古代史、考古学、古文字学、古器物学、版本目录学乃至通俗小说诸多领域有着开拓性研究，发表论文六十余篇，出版有《张政烺文史论集》（中华书局，2004）、《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校读》（中华书局，2008）、《张政烺文集》（中华书局，2012）等。其中，《邵王之諱鼎及簠铭考证》、《六书古义》、《讲史与咏史诗》、《读〈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论易丛稿》等均为相关领域开创性、奠基性或里程碑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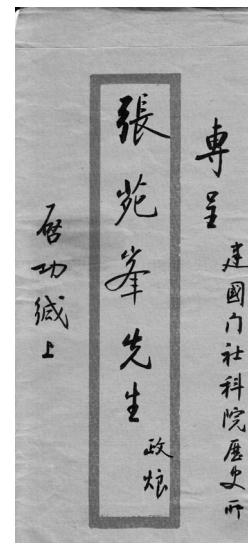
本次展览是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

2017年11月23日至12月22日，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研究院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华书局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举办了“张政烺先生学行展”。此次展览共分四个部分——“同学少年”、“东海苑风”、“独上高楼”、“桃李无言”。内容包括文献、照片、书法、书籍实物等六十余件展品，从不同侧面、不同时期展示了张政烺先生的学术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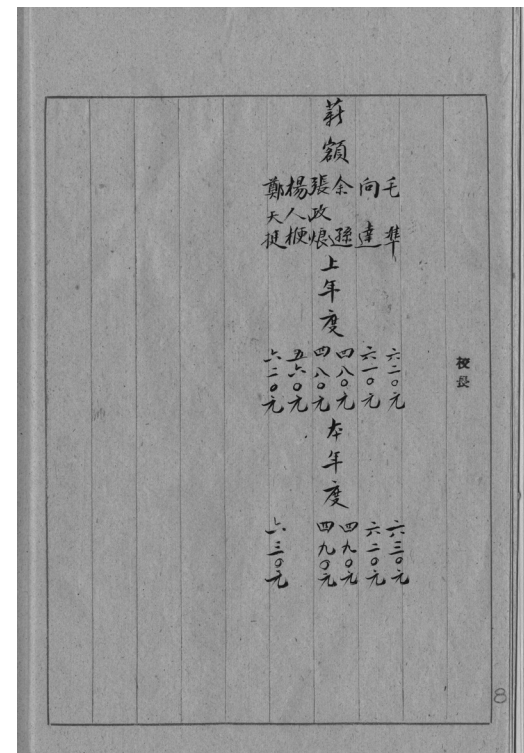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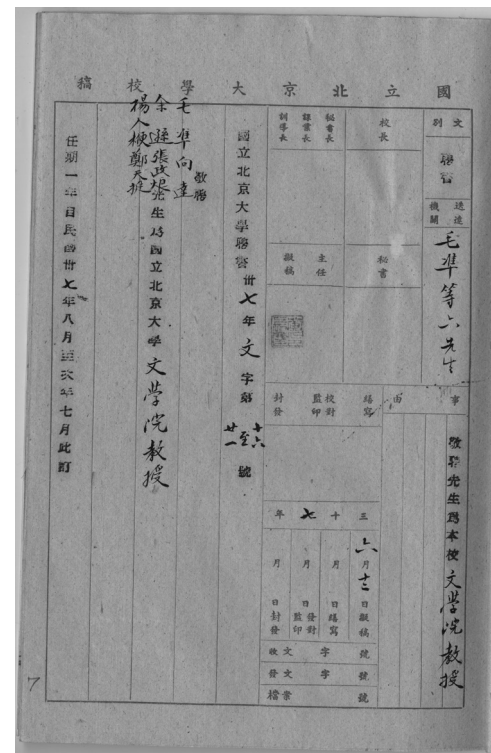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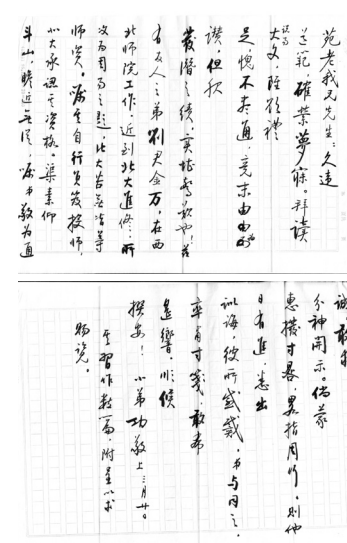
正如策展人在前言里所说的那样：“张政烺，一个生于海阔天空之地的人，一个温柔敦厚、襟怀坦荡、学识极为渊博的人。他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也是北京大学的老师，是北京大学很多老师的老师，我们大家的老师。他一辈子老老实实做人，一辈子勤勤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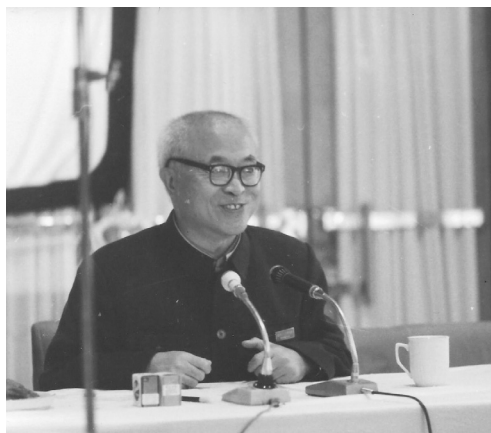
胡适与张政烺通信



启功致张政烺的信



国立北京大学聘张政烺等先生为本校文学院教授聘书及相关材料（1948年）



1981年9月，张政烺于某次会议上发言

究院纪念前辈学人系列第一展。希冀通过专题展览，彰显前辈学人的学术人生、学术发展与时代变迁的关系，并为后来者树立学行典范。此次展览，精粹者多，具体见如下六个方面：

一、老档案里的珍贵材料

此次展览展出有张政烺先生于1932—1936年在北京大学史学系读书时的成绩册，及1946年自中研院史语所返回北京大学史学系任教授时的聘书资料。这些材料是弥足珍贵的，可看到大师当年的学习情况、“大师是如何炼成的”，及1948年时北大教授的薪酬待遇情况，都历史史料。

二、张政烺先生的书法

此次展览展出有张政烺先生书法作品共计六件（甲、金、篆、隶、楷、行兼备），分赠予亲属、学生及国际友人。先生曾不止一次对人说：“我去当个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还是够的。”胡振宇先生（胡厚宣先生哲嗣）亦曾回忆：“张伯伯的书法，是他自认为得意的，他也同我说过，认定‘书法家’，

启功可以给出证明的话语。”陈绍棣先生则在《张政烺先生年谱》里谈到：“先生六岁人家塾，学习篆书，以《说文解字》为启蒙课本；十二岁师从族伯张俊采（字瑞三，号艺芸），受文字训诂之学，兼学篆书，凡读过的书都能背诵。”由此可见，先生的篆书最见功底，而其余字体不乏俊品。

三、张政烺先生与《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

先生于1943年冬在四川南溪李庄写成《读〈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然而发表时间却拖到了48年后的1991年。该文在20世纪中国古文献研究及古籍版本研究界意义非凡。据考定，《相台本九经三传》并非明万历（1573—1620）以来大家公认的宋代岳飞之孙岳珂家塾所刻，而是元代初年义兴岳氏根据廖莹中世彩堂本校正重刊。该文指出其所附《沿革例》与岳珂亦无关涉，乃廖氏之《九经总例》，还准确考证了岳飞的后人情况。先生此篇文章不仅使一批宋版书恢复了元代传刻的真相，还使得亡佚三百多年的《九经总例》在人世重现。这一重要发现冲击和震动了版本目录学界，且在文章还未正式发表时，被人传颂、引用。

四、张政烺先生与《周易》研究

1998年，经先生口述，朱凤瀚先生整理，完成有《我与古文字学》。该篇与《我在史语所十年》是阅读《张政烺文集》的总提纲。先生治古文字、古代史时主要致力于四个方面，即甲骨文、西周金文、东周金文和商周数字卦（用古文字材料治《周易》）。张政烺先生对《周易》精熟，其研究往往能



古籍



张政烺在红楼整理组



信札



马王堆帛书周易手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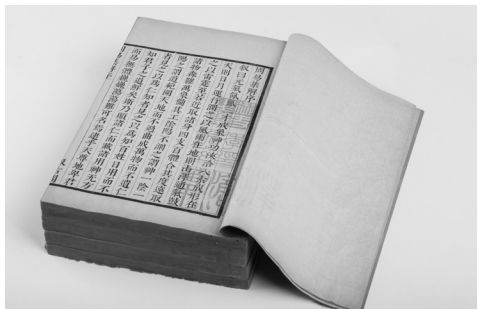
观展



展厅



张政烺做学术报告



张政烺藏周易集解

解决大家已注意到但不能解决的学术问题。1978年11月29日至12月8日，中国古文字学会第一次年会在长春吉林大学召开。会上，当徐锡台先生就周原甲骨上的“奇字”向与会学者征询意见时，张先生于第二天发表有题为“古代筮法与文王演周易”的学术报告。据当日与会的张忠培教授回忆：“他讲得很流畅，有理有据，条理清晰，语言平缓，听他讲话的人，都屏住了呼吸，他越讲，会场愈益平静到掉一枚针，也能听出声音来，他通过这个讲话，将徐锡台称之为‘奇字’的‘字’，释为易卦符号。他讲完后，会场平静片刻之后，忽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这掌声，是这次会议最热烈、最持久的掌声。接着张颌、洪家义等先生先后发言，均支持张先生的认识，认为张先生是做大学问的。张政烺先生的这个学术报告，是这次古文字学术讨论会的最大也是最灿烂的亮点，是这次会议的一个最大的收获。”

五、胡适、张政烺关于《封神演义》作者问题的通信

中国史学界有一美谈：胡适当年讲文学史时，不知道《封神演义》的作者是谁，向学生征询时，张政烺先生当场站起来告诉他是明代的陆西星，胡适大为佩服。1992年，张政烺先生在接受采访时专门谈及此事，并纠正传说之误：自己当日并未在课堂上，听好友李光璧谈及，才写信给胡适的。先生此信，不但指出无名氏《传奇汇考》中所说《封神传》“系元时道士陆长庚所作”，“元”是“明”之误；还征引嘉庆《扬州府志》、咸丰《兴化县志》，证明陆长庚就是万历年间兴化的陆西星。胡适收到信的次日就给张



张政烺行书作品

先生回信说：“这封信使我很高兴，因为前几天孙子书先生把《传奇汇考》的一段抄给我看，我不信‘元时道士’之说，故颇不信此段记载，现在得你的考证，此书的作者是陆长庚，大概很可信了。……我写此信，只是要谢谢你的指示。你若不反对，我想把你的原信送给《独立评论》发表。”这就是后来刊登在1936年7月12日《独立评论》209号上胡适、张政烺《关于〈封神演义〉作者的通信》。张先生回忆说：“《独立评论》是没有稿费的。通信发表后，送了我几张书券，可以领几期《独立评论》。书券的背面还印着‘秀才人情’四个大字。”

六、张政烺先生与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研究

此是张政烺先生整理马王堆帛书《周易》的手稿，主要据王弼本校经、韩康伯本校传，并参考了汉唐石经，以及《经典释文》、《周易集解》等书所引的各种古本。张先生指出，帛书《周易》只有六十四卦，卦序排列与今本不同，不附《彖》、《象》、《文言》，不分上下经；《易传》的《系辞》不分上下篇，也没有“大衍之数”章。他怀疑，今本经的部分，卦序也好，分篇也好，都是汉代的改造，很晚才形成；传的部分，也与孔子无关，肯定在汉初以后，《系辞》和《说卦》都是后起。张先生曾自谦说：“我幼年讨厌《周易》，曾经认识懂《周易》的人而没想学《周易》。老来整理帛书《周易》，脑力已衰退，不能有所发明，只求无大过而已。随着考古数据的不断发现，对古代筮法产生不少新的想法，坦率的发表一些肤浅的意见，希望得到大家的指教。”（《易辨——近几年根据

考古资料探讨〈周易〉问题的综述》）此文稿后由李零先生带头整理并被正式刊印，即《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校读》（中华书局，2008年）。李零先生在前言里说：“张先生参加红楼整理组，对银雀山汉简，对马王堆帛书，从头到尾，方方面面，贡献很大，其中下力最多是《马王堆汉墓帛书》（貳），即帛书《周易》经传部分的整理。这一部分的合作者是于豪亮先生。……张先生的七篇遗稿，没有准确年代可考。但这部遗稿的开头，有用铅笔标注‘存底’的一段话，是讲如何修改于豪亮先生的稿子。显然他在考虑，将来如何统稿。”

诚如策展人所言，此次展览所展出的张先生遗著、文稿、随手批记只是张先生学术梦想的一鳞半爪，后学难以窥其堂奥。张先生有三个遗愿：第一，编一部《中国历史图谱》第二，编一部商周铜器铭文的考释之作；第三，把他在红楼整理组整理的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整理发表。这三件事，只有第三件事，留下遗稿，令人扼腕。张先生一生为人木讷寡言，不与人争，不与人辩，但从不随波逐流，只要自己觉得对，决不轻言放弃，柔中有刚。其著述涉猎广泛，“其最大贡献，国际国内学术界公认的贡献，是他对商周‘数字卦’的研究。尽管有人诋毁这一研究，但古人云：‘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最新发表的清华楚简《筮法》、《别卦》再次证明，还是张先生站的高，看的远，说的对。”

（撰稿：孟繁之）



03

回顾与展望——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 90 周年纪念论坛

1927 年，以北京大学为核心的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呼吁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中外科学工作者平等合作的“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首批 10 位中方团员，北京大学参加者多达 8 人。他们从红楼发轫西行，开启了北京大学丝路考察与研究的征程。长达八年的考察，为中国现代学科建设积累了丰富的资源。

时值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成立 90 周年，以及北京大学即将迎来的建校 120 周年，为纪念近代中国学术史上的这一重要事件，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于 2017 年 12 月 23 日在北大静园二院举办“回顾与展望——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 90 周年”纪念论坛。纪念论坛由“回顾篇”与“展望篇”组成，分别由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教授和北大中古史中心朱玉麒教授主持。校内外学人、相关研究代表以及西北科考团成员家属代表近百人参加了论坛。

在回顾篇环节，北大中古史中心副主任罗新、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常务副馆长黄乔生教授分别作为主办方代表发表致辞。罗新指出，从北大历史学科的传统来说，无论是历史学系，还是中古史中心所做的工作，都持续不断地继承了西北科考团时期的精神与传统，人才的培养，以及学术的创造，与科考团前贤可说是血脉相连。黄乔生常务副馆长



荣新江教授

指出，科考团中，来自北大的成员占绝大多数，可见北京大学在引领中国学术潮流方面的重要作用。考察团在自然科学领域和人文科学领域均有重大创获，堪称北大校史上的一页辉煌篇章。

2017 年 8 月，在内蒙古阿拉善盟的支持下，文研院曾组织专家学者赴盟内额济纳旗居延遗址进行考察。在论坛上，阿拉善盟文物局局长景学义致辞表示，近 90 年前，西北科考团成员们在阿拉善高原的考察，揭开了阿拉善地区的古老面纱，使其成为举世瞩目的考古学术圣地。今天居延遗址已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居延汉简为对象之一的汉简研究成为一门显学，这离不开当年学者们作出的历史性贡献。阿拉善文物工作者将秉承先贤精神，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始终守护着这片土地。

讨论会上，西北科学考查团成员、著名地球物理学家陈宗器先生的女儿，画家陈雅丹女士；西北科学考查团成员、著名考古学家黄文弼先生的孙子，学者黄纪苏先生也先后发言。他们有感而发，再次感谢了北大组织这次纪念活动，也追忆了九十年前那场壮烈而又令人回肠荡气的科学考察活动，抒发了对先祖们深深的思念。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当年西北科学考查团中方团长徐炳昶（旭生）的女儿，离休干部王忱，在谈论会上专门以“西北科学考查团里中方团员所取得的成绩和所作出的贡献”为题，进行了长篇发言。王忱老人年届九秩，仍精神矍铄。她以详实的史料，亲身的访谈，具体的数字，摆事实，讲道理，令人信服地论证了西北科学考查团里所有中方团员所取得的成就。她在结尾时强调：“九十年后，值此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被定为国策之时，我们不能不缅怀八九十年前的那批中国科学家对祖国大西北所做出的扎实的开创性、奠基性的工作，缅怀他们浓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忘我的牺牲精神。八九十年过去了，他们当年的工作仍在影响着今天许多学科的发展。他们成了中国科学发展的一批强有力的奠基人，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

在展望篇环节，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主任荣新江教授首先发言。他表示，在中国现代或者北京大学的学术史上，中国西北科考团的确引领了当时学术的新潮流，开辟了新领域。这不仅包括王忱女士总结的自然科学领域，也包括史学领域的新课题。比如西北史地，虽然自道光年间就有学者在做这方面的研究，但是中国人真正

采用科学手段与方法进行研究，与西北科考团有密切的关系。北京大学在后来的岁月里，很好地继承和发扬了西北科考团的传统，如向达先生开辟了将石窟、考古、简牍以及文献综合在一起的敦煌学的新传统。多年来，北大发挥综合学科优势，培养了段晴、王一丹、林梅村等一大批丝绸之路研究的顶尖专家。今后，北大应该依托自身优势，打破学科间的限制，进行综合研究和区域研究。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所长韩琦教授在致辞中表示，他长期关注明清中西交流视野下的科学史，特别是耶稣会士在中国近代科学发展中的作用。如果说西北科考团是一次高水平的中外学术工作者的合作行动，那么应该注意到在此前后，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探险家斯文·赫定等在华的外籍学者，就与在京的中国学人之间保持着频繁的交流 and 接触。对于西北科考团的研究，应该重视当时的中外学人网络以及学者之间的往来书信。

北大人文讲席教授、文研院学术委员会主席李零曾参加文研院组织的居延考察。他表示，我们现在的研究应该拓宽视野，“入山出塞”。因为我们的考古工作虽然很辛苦，但是经常是沿着铁路线，真正深入荒无人烟之地进行考古发掘的毕竟比较少。特别是我们中国的史学传统容易忽略周边的研究，所以提出“入山出塞”：入山是因为很多祭祀遗址并不是在城里，出塞是要放宽眼界。上世纪法国汉学之所以繁荣，是因为他们从西往东看、从外往里看，所以我们也应该像当年的西北科考团一样，从里往外看、从东往西看。

北大历史学系李孝聪教授也参加了文研院组织的居延考察。他回顾了这次考察的经过，认为此次考察继承了西北考查团的精神，每走一步都是踩着前人的脚印，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的。他强调，在外出考察中，不能因为自己是北大老师就觉得自己知道的比别人多，比别人了不起，应该深入当地，向当地的基层文物工作者请教。



朱玉麒教授

甘肃简牍博物馆馆长张德芳提出两点愿望，今后应该更多关注档案资料，以及应该拍相关纪录片，传播当年的事迹。新疆师范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刘学堂教授表示，新师大黄文弼中心已成为学校对外的窗口。他曾考虑写一本有关黄文弼的传记——《一个人的考古队》，为此刘老师翻阅了黄文弼先生的日记，发现黄先生的日记要比斯文·赫定等人的深刻的多，这是一份珍贵的遗产。刘老师也谈到如今的综合研究问题。

各位嘉宾结束发言后，屋外已是一片灯火，但屋内却还一派欢声笑语。朱玉麒教授向全体与会者介绍了当天参加会议的西北科学考查团先辈的后人家属们，并让全场来宾再一次向他们表示了敬意，他们是：徐炳昶教授的女儿王忱，孙子徐十周，外孙女王安洪；袁复礼教授的女儿袁扬、袁钢，外孙刘卫东；黄文弼教授的孙子黄纪苏，孙女黄晓洪；陈宗器教授的儿子陈斯文、女儿陈雅丹；李宪之教授的儿子李曾中；刘衍淮教授的女儿刘安妮。朱玉麒还介绍了两位特别来宾，刘悦与刘非，他

们的祖父是新文化运动先驱、北京大学教授刘半农。当年，刘半农曾力促西北科学考查团成行，并亲身为西北科学考查团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最后不幸因此而去世。

本次论坛的成功举办，也标志着由文研院联合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和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北京大学与丝绸之路——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90周年纪念展”正式开展。本次展览展出了九十年前西北科学考查团的大量实物、图片和书画等。展柜中陈列着考察团员们在工作现场的照片，当年使用的相机，穿戴的衣物，大量珍贵的手稿，来往信件，考察团员获得的奖章，让人重返历史现场。这是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2017年举办的第四场专题展览，文研院也希望借此展向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献礼。

（撰稿：韩笑）



“北京大学与丝绸之路——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九十周年纪念展”专题展览精选



2017年12月23日至2018年3月16日，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地下一层举办了“北京大学与丝绸之路——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九十周年纪念展”。展览分为四个部分：“群星璀璨”、“沙漠驼峰”、“荒原车队”、“北京大学与丝绸之路”，展品包括照片、书信、纪念物、考察报告和出版成果等，展示了中国西北考查团的主要活动和成果，展现了北京大学与丝绸之路的深厚渊源。

1927年，“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中外科学工作者平等合作成立的考察团。在它的首批成员中，中方团员有十人，其中八人来自北京大学。九十年前，西北科考团大部队进入甘肃新疆交界的无人区开始了长达八年的考察。考察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27年5月至1933年秋，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以骆驼为主要交通工具在我国西北地区进行科学考察；第二个阶段是1933年10月至1935年2月，由中华民国政府铁道部组织和出资、斯文·赫定带领“绥新公路查勘队”，以汽车为交通工具勘察内地到新疆的公路路线，在沿线也进行科学考察。考察涉及气象、地理、地质、古生物、民族、考古等诸多学科，地域范围包括今天的内蒙古、甘肃、新疆、青海、西藏等多个省份，为中国的现代学科建设积累了宝贵的资源，在世界范围内享有盛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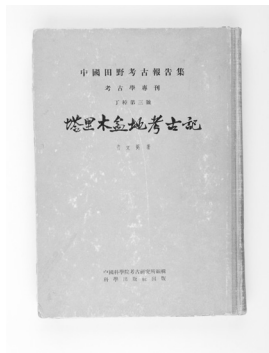
袁复礼、斯文·赫定、徐炳昶一起研究工作

一、“且通西域，近有龙堆，远则葱岭”

1926年11月，斯文·赫定与中国政府接洽，提出组织一次对中国西北地区的航空探险和科考活动。1927年2月，经北洋政府批准，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与斯文·赫定签订协议，同意活动人员以西方队员为主，并将采集物送交瑞典进行研究。协议引起了一批中国学者的不满。3月，北京各学术团体在北京大学成立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发表《反对外国随意采取中国古物之宣言》。4月26日，经过重新谈判，协会与斯文·赫定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签订合作协议，组成西北科学考查团理事会，推举李四光、袁同礼、徐鸿宝、周肇祥、刘半农、梅贻琦等九名理事，随后成立西北科学考查团，其中外方团员十八人，中方团员十人，北京大学教



《东亚寒潮侵袭的研究》
李宪之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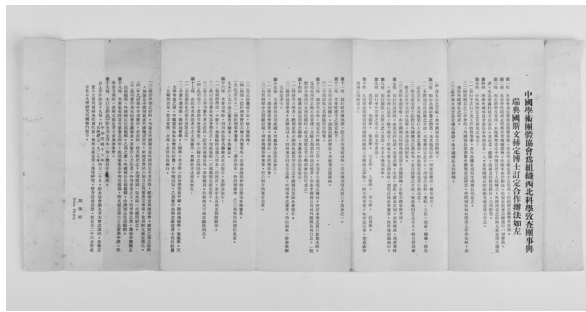
《塔里木盆地考古记》
黄文弼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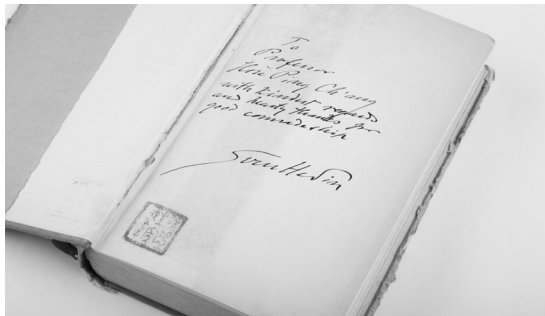
仿照斯坦因来中国采集文物的箱子而定制的西北科学考查团采集箱



丁道衡画白云鄂博铁矿图



1927 年签署的中瑞考察协议原件



斯文·赫定赠给徐炳昶的《穿过戈壁沙漠》



《吐鲁番考古记》，黄文弼著



李伯冷在考察过程中拍摄的照片制成的幻灯片



德国团员送给李宪之一块怀表，李宪之回赠一枚银元

授徐炳昶和瑞典探险家、地理学家斯文·赫定分别担任中国西北考查团的中方和西方团长，共同决定考察行动及团员的工作分配；考察获得的考古资料统交与中国团员运归，由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保存。5月9日，考查团团员从北京西直门火车站乘专车前往包头开始考察。

考查团的第一个阶段的活动经过多次延期，最终达到六年之久。1928年，考查团大部队从哈密开始进行对新疆地区的考察，中西双方团长于12月向南京政府申请延长考察期限及支持。次年1月理事会决定延长两年考察时间，并增派团员，2月获得政府批准。1929年起，考察的范围继续扩大，黄文弼进入塔克拉玛干沙漠沿和田河考察，丁道衡经天山南麓进入帕米尔高原，第二批团员布林、陈宗器等前往内蒙古。1930年3月，赫默尔与郝景盛等人前往甘肃、青海，黄文弼和霍涅尔、陈宗器先后进入罗布泊。12月，理事会决定再次延期两年，次年3月经行政院批准，至1933年5月8日结束考察。

1933年8月，斯文·赫定受聘组建绥新公路查勘队考察通往新疆的道路，查勘队成员有原考查团团员陈宗器、贝格曼、赫默尔、生瑞恒等，黄文弼作为教育部特派员随行考察新疆教育及考古。查勘队经吐鲁番至喀什噶尔、后至罗布泊一带考察，于1935年2月返回终点西安。3月28日，斯文·赫定回国，两个阶段的考察正式结束。

二、“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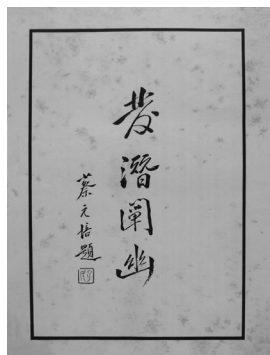
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收获了令人瞩目的考察成果。在额济纳发现大批汉简、在罗

布泊发现小河遗址、霍涅尔和陈宗器对罗布泊的考察，都是轰动世界的重大成果。1927年，黄文弼发现元代赵王城遗址和明代阿勒坦汗碑。1930年，黄文弼又在吐鲁番地区进行古墓挖掘，获得大量陶器、墓表，同年4月在罗布泊发现土垠遗址。7月，贝格曼在额济纳旗黑城附近发掘出土大量汉简，次年七月又在多处遗址先后获得汉简一万余枚，称“居延汉简”。

此外，白云鄂博大铁矿的发现和考查团收集的气象地理资料，对开发我国西部地区、复兴丝绸之路有重大作用。1927年6月以来，考查团在内蒙古、甘肃一带进行考察，丁道衡发现白云鄂博铁矿。9月，考查团到达额济纳河。在一个多月的重点考察期间，钱默满、马叶谦等人在此建立葱都尔气象台。1928年，考查团先后进入新疆，气象组在乌鲁木齐、若羌、库车和青海的铁木里克设立气象台，李宪之在铁木里克气象台观测到特大寒潮。

考查团还采集了许多生物标本，拍摄了大量山川、河湖等自然景观的照片，经过环境变迁，这些资料已经独一无二。1928年9、10月期间，袁复礼在北疆首次发现恐龙化石，次年5、6月又在阜康挖掘到二叠纪、三叠纪时代的动物化石。1930年1月，贝歇尔在内蒙古乌托亥发现大批恐龙化石。1931年8月，刘慎谔加入考查团，在天山、南疆、藏北地区历时一年收集四千五百余件植物标本。1932年3月，袁复礼在宁夏、内蒙古交界处的栅栏呼都克发现白垩纪恐龙化石。

这次考察也为中国的青年学者提供了野外实践的机会，为中国现代科学发展培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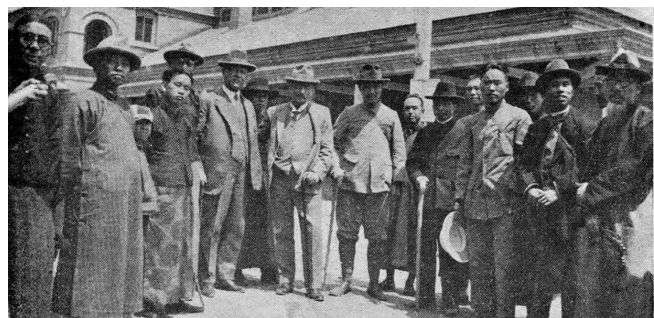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为西北科考团的著作题辞



中方队员和采集员在包头的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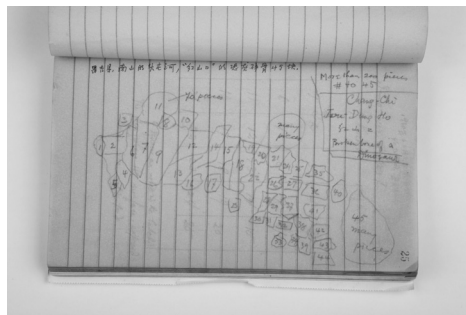
黄文弼于天山留影（马衡题词）



西直门出发前合影留念



中外部分团员在葱都尔气象观测站合影



袁复礼当年野外工作用的笔记本



袁复礼和陈宗器被授予“瑞典皇家北极星骑士勋章”



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徽章



观展



展厅

了专业人才。中方团员的考察成果已经成为研究西北地区的重要文献，外方团员的著作也被引进、翻译、出版。本次展览中就有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刘衍淮《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之经过与考察成果》、《西北科学考查团中之气象工作》，李宪之《东亚寒潮侵袭的研究》，斯文·赫定赠给徐炳昶的《穿过戈壁沙漠》等文件。考查团本身的学术史也成为研究的热点，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出版了考查

团的专题著作，一批以考查团为主题的博士硕士论文在高校诞生。

三、“发潜阐幽”

九十年来，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的影响还在继续。在包头竖立起丁道衡的雕像，以纪念他发现白云鄂博铁矿；在乌鲁木齐建立了黄文弼特藏馆，以纪念他作为“中国新疆考古第一人”的业绩。考查团的成果至今仍然是对西北地区进行科学研究的基础文献，也是建设西部地区的重要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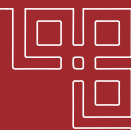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学继承了西北地区考察和研究的光荣传统。1941年，向达参与并领队中研院西北史地考查团，开创了丝绸之路实地考察与研究并重的新局面。新中国成立后，王炳华、穆舜英自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后分配到新疆工作，1960年代先后成为新疆考古所所长，是新中国第一代新疆考古学家，对于新疆的考古事业贡献巨大。张广达先生致力于唐史、西域史、敦煌吐鲁番学、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1980年代以来考察古丝绸之路，对古代欧亚内陆交通的研究达到了会通的境界。2017年，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组织考察团前往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对居延遗址进行科学考察。北京大学的多学科团队在丝绸之路的考察与研究上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撰稿：刘小雨）





静园学术



“共和主义与现代政治”学术圆桌会议

2017年11月8日上午，“共和主义与现代政治”圆桌会议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荣休教授毛里奇奥·维罗里（Maurizio Viroli）主讲，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强主持。文研院访问学者、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罗祎楠，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副教授康子兴，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张新刚，中国传媒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葛耘娜出席并参与讨论。

维罗里教授首先从学习政治理论的方法与动机说起。在他看来，至少存在两种学习政治理论的方式，即出于纯粹智识动机的学习与带有政治热情的学习——而他本人的学术生涯则更倾向于后者。政治热情意味着对国家的自由与尊严有所期望。政治同战争和平、自由奴役、认同与记忆等重大议题息息相关，政治热情因而在对某些永恒价值的追求中与现代社会对财富或交流的重视区分开来。维罗里教授援引马基雅维利在《李维史论》中关于自身写作的叙述进一步阐明了这一立场：“所谓做善事者，无非就是把因时运不济而做不到的事情传授与人，以待众人具备能力时，由他们中间最受上天垂爱的人完成”。

随后，维罗里教授扼要地介绍了他对于共和主义的理解及其与自由主义及民主



维罗里教授

的关系。作为一种在历史上先于自由主义出现的思想传统，“共和主义”在语义上以公共事务（res publica）和共同善为核心，强调行使政治权力的目的以及公民对主权的分有。与此相对，“民主”则强调权力的归属问题，即多数人的统治。因此，尽管二者在概念上存在重叠与共存的可能，但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对政治的关注有所不同。就历史例证而言，反对民主政治的共和主义者与反对共同善的自由主义者并不罕见。而就内在理路而言，共和主义关注公民德性并将其视作实现共同善、抵抗暴政的必要力量，而自由主义则以权利为其核心语汇，并将其作为个人最重要的所

有物与共和主义理论中关于获取和配享的自由概念区分开来。因此，当今西方的自由民主实践仍需要吸收借鉴共和主义理论，或在某些深谙共和主义价值的政治精英的领导下应对潜在的冷漠、区隔与腐化。

讨论环节，张新刚老师表示，在区分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的同时，后者的思想内部也存在古代与现代之分。张新刚老师还就如何在古今不同历史、社会条件下界定“共同善”概念提问。维罗里教授认为，共同善是一种修辞（而非科学）的概念，因而即使在相似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也必然存在对于共同善及其实现方式的不同理解。尽管人们不可能提供一种数学式的说明，但领土与人口的历史变化使得共同善成为对于古代希腊城邦与当代欧美国家来说同等重要的存在，共同善的语言依旧活跃于西方世界的政治生活中。维罗里教授进一步指出，古代与现代的区分是西方政治思想中的一个重要主题：邦雅曼·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明确区分了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并将二者分别界定为在城邦政治中对公共事务的直接参与和对个人生活方式的自由选择；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在《两种自由概念》中对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区分也具有古今对立的意涵。然而在维罗里教授看来，贡斯当与伯林都忽视了作为“第三种自由”的共和主义式自由，从而使得他们对古代与现代的理解存在缺陷。

康子兴副教授就共和主义在商业社会中的存续与发展提问。维罗里教授回应道，将政治参与与公共事务视作追求财富的工具显然是一种腐化的表现，而部分关于商

业社会的经典研究也认为共和主义式的公民德性与商业活动中的自利行为难以共存。但值得注意的是，共和主义思想曾在佛罗伦萨、锡耶那、威尼斯等具有发达的金融业与商业活动的城市国家中流行并得到发展，这也使得共和主义与商业社会不可兼容的论断在历史上站不住脚。而在理论层面上，共和主义对法治（rule of law）的推崇也为商业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制度条件。尽管共和主义政体并非建立、维持商业社会的唯一条件，但自由政体中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要求政治精英对公共善加以认知和把握。自由主义思想也在自身的发展中不断吸收共和主义的概念，如约翰·洛克在《政府论》中就给自由下了一种共和主义式的定义。

李强教授认为，维罗里教授对共和主义的理解使得自由主义式的底层制度结构能够与共和主义式的政治精英和德性语言同时存在并相互支持。维罗里教授认同这一基本观点，并指出共和主义对精英的理解重点在于美德与灵魂上的卓越而非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实际状况，而财富的积聚与灵魂的高贵往往并不一致。共和主义思想对精英的重视与教育问题息息相关，精英的重要性在于其追求卓越的德行及其对共同体其他成员的示范与教化作用。普通公民愿意效仿这种德性并采纳一种更有意义的生活方式，从而使整个共同体远离腐化。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徐晓红注意到共和主义对共同善与单一共同体的推崇与当代西方的多元文化主义浪潮之间的潜在张力，并就共和主义对多元文化主义语境下移民、整合等议题间的影响提问。维罗

里教授对此回应道，美国无疑是当今世界最具共和主义精神并同时体现出多元文化主义特征的国家，美国公民能够保持自身独特的文化身份与族群认同；瑞士也在异质文化共存条件下实现了高度的公民参与。与此相对，意大利在当代文化、宗教、语言上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其政治却不具有任何共和主义的特征。罗伯特·帕特南在《独自打保龄》中对同质性文化团体与政治参与间正向关系的观察并不能被无限推广。因此，文化上的同质性并非是当代世界实践共和主义价值的必要条件，而尽管不同的文化团体间存在冲突的可能，但这并不妨碍共和主义价值在一个多元文化社会中存在。

至于共和主义与移民、文化整合等多元文化主义议题间的关系，维罗里教授指出，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存在至少两种共和主义实践模式，即相对集中的法国模式与更加多元的美国模式——这两种模式都不会导致共和主义价值与多元文化主义间对立。政治精英将推动不同文化之间的共存与整合。

葛耘娜老师指出，马基雅维利和孟德斯鸠远离了古典学说，在德性概念上将其同某种扩张与对立条件下对共和国的热爱相联结，但外部的征服行为与内部的派系矛盾似乎不能使共和国免于腐化。维罗里教授提示大家注意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对公民德性的阐释，即将公民德性等同于对国家的爱，并将对国家的爱等同于对平等的爱，从而在实质上追随了马基雅维利的脚步。但在孟德斯鸠看来，现代人对自身利益的关注使得对国家的爱为古

代人所专有，从而拒绝了马基雅维利关于在现代共和国中复兴公民德性的乐观估计。

会议最后，罗祎楠助理教授注意到维罗里教授在《从善的政治到国家理由》(*From Politics to Reason of State*) 一书中对“国家理性”的出现以及相应的政治转型的论述，并基于中国的历史经验对这一存在某种决定论色彩的研究范式的启示提问。维罗里教授赞同政治观念出现的社会、历史情境并不支持“语境决定思想”的结论，这与在特定语境中研究政治思想并不矛盾。“国家理性”这一观念最初于16世纪在意大利出现，然而这并不妨碍其在19、20世纪及当代政治的全新语境中发挥作用。这一观念也标识出现代政治与作为追求共同善之技艺的古典政治之间的距离。

(撰稿：王溪鑫)



“仙道与鬼道”学术工作坊

2017年12月30日下午，“仙道与鬼道”学术工作坊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刘后滨以“宦途八骏：唐代新型精英群体生成的制度路径与文化认同”作主题演讲；文研院工作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陆扬以“白居易：一位文学青年的官僚生成史”作主题演讲。日本中央大学文学部教授妹尾达彦，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叶炜，文研院访问学者、复旦大学汉唐文献工作室研究员唐雯，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孙正军，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唐宋史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员古丽巍出席并参与讨论。

陆扬教授首先指出，在较为传统的国内隋唐史研究中，政治史与制度史占据着中心地位，但目前这种中心已经面临很多挑战，基于这一前提，本次工作坊聚焦于“宦途八骏”与“文青官僚白居易”两大主题，兼具文学性和制度史特色，试图探讨制度史和政治史在当前研究中的结合路径。

刘后滨教授带来“宦途八骏：唐代新型精英群体生成的制度路径和文化认同”的主题报告，并从四方面解读：一是“宦途八骏”、“八骏群体”概念；二是“八骏”作为精英生成制度的路径构建过程；三是“八骏群体”文化认同的构建过程；四是“八骏群体”的身份属性与社会等级再编制。

刘后滨教授认为，陆扬教授提出的“清流文化”对理解唐后期的整体变化有重大意义，他的研究和陆扬教授提出的“清流文化”



刘后滨教授

也有很大关系，引出“宦途八骏”和“八骏群体”两个概念正是为了作出呼应。“宦途八骏”出自唐代封演《封氏闻见记》卷三《制科》，反映了封演本人所概括的一条做官升迁途径，包括进士、校书、畿尉、监察御史、拾遗、员外、中书舍人、中书侍郎这八个步骤。“宦途八骏”是特定精英群体的生成路径，也是身份认同的基准体系。“八骏群体”指的是以“八骏”为认同基准的精英群体，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内、外部双重认同而构建起来的。这个群体是流动而开放的，更多体现在文化和价值的认同层面。

在这两个概念基础之上，刘后滨教授进而引出四个问题启发思考：其一，作为精英生成理想路径的完整表述及实际运用，“宦途八骏”最终出现在何时何种背景下？其二，

这条路径构建的次序是从最高级环节开始还是从进士出身开始，是否相向而行？其三，“八骏”之间是否完全衔接，是否还需要其他环节（例如大理评事）链接？其四，若说“八骏群体”的核心认同取向是陆扬教授所指出的“文”，那么每个台阶在这个体系中的意义又是什么？

关于精英生成制度路径的构建过程，刘后滨教授通过白居易的《大官乏人、由不慎选小官也》，张九龄开元三年上疏，天宝九载三月十二、十三日赦，宣宗大中元年正月赦节文等史料进行分析。在唐代制度和政治演进过程中，关键的变化节点发生在武则天开元之际，并最终逐渐形成了白居易在《大官乏人、由不慎选小官也》中反复申说的一套路径。

刘后滨教授还列举了薛逢、卢生（《枕中记》黄粱梦境人物）、杨筹（检校户部尚书杨汉公之子）的仕途经历以及张九龄阻止牛仙客担任尚书的事件。通过分析以上材料，他指出，“宦途八骏”不是制度规定的精英生成路径，而是社会对官员升迁现象的归纳——这种归纳意味着社会对这些官职的认知及对路径的认同。进一步地，刘后滨教授在引出《新唐书·韦湊传》中有关韦湊的记载后指出，对官职的社会认同与任官者个人的背景和流品有关。通过分析《封氏见闻记》卷三《铨曹》，他表示，某个群体反对的声音也可能促成某种认同，文士之间以文学创作为中心的交友及文学作品的传播本身就是构建这种认同。例如，沈既济对卢生理想仕途的描述，既是对精英生成路径的提炼总结，也反过来促进了政治精英的自我认同。

最后，刘后滨教授就“八骏群体”的身

份属性和社会等级的再编制制度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值得探讨的问题：唐代的旧门和新贵如何利用当时的选举制度和官僚体制？如何塑造了当时的政治文化，并使其反过来影响了选举制度和官僚体制的发展进程？对此，刘后滨教授解答道：贞元元年及以后，进士及第成为新贵和旧门跻身精英群体的不二选择，且基本遵从“宦途八骏”的制度路径。为了尽量贴合这条路径，各种社会资源（如婚姻策略）都被调动起来。

讨论环节，陆扬教授首先对刘后滨教授的报告进行了总结。他认为，报告内容丰富，涉及唐代前期至后期的职官制度变迁，进而延伸出精英自我认同以及与制度之间的关系。叶炜表示，“宦途八骏”是士人当官的理想，这种理想从北朝后期到唐代中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北朝后期士人的理想是“功名马上取”。他还指出，目前，对“八骏”作为精英生成制度路径的构建过程还不够清晰，只勾勒了大致的变化。

唐雯认为，转官在唐代前期并无特别明确的路径，在安史之乱之后才逐渐清晰起来。“八骏”是一种理想化状态，士人实际的升迁路径与“八骏”的前几个步骤可能比较符合，但到后期普遍出现分化现象。

孙正军的主要研究方向是秦汉魏晋南北朝史，他指出，秦汉和魏晋南北朝虽然没有“宦途八骏”的相关文献，但从零碎的史料中可以发现，魏晋南北朝形成了一些受到广泛认可的官职，如太常卿。此外，魏晋南北朝和唐代的官职存在很大的重复性，但官职地位却有很大差别。因此，他表示，“宦途八骏”这一路径是历经多朝长时积累形成的，非唐代一朝的沉淀结果。

古丽巍认为，从理想化的“八骏”升迁路径到具体落实的制度规定，是有趣又值得探讨的主题。此外，她将唐宋选官制度进行比较后指出，在宋代的升迁标准中，门阀的因素在减弱，而科举、亲民资历起到了较大的作用。

妹尾达彦以“仙道和鬼道：唐代士人仕宦情结的再考察”为主题进行评议。他提出一个问题：唐代新型精英的虚实是仙道还是鬼道？科举作为制度定型的时期在九世纪，此后，唐代进入科举社会。而科举社会的最明显特征便是能力主义社会。其原理可分为两种：一是依靠家族属性，二是依靠业绩。通过科举这样的业绩考试，合格者们创造了“科举合格者阶层”这一全新阶层。

接下来，陆扬教授以“白居易：一位文学青年的官僚成长史”为题作了报告。他先对刘后滨教授的报告作了引申式的评论，认为唐代职官体系有几个特点。首先，帝制时代的职官体系本身具有延续性和惯性，很多官职其实早已出现了，虽然这些官职具体性质不断变化，在官僚体系中的位置也在变，但其本身具有的那种历史延续性和职位性质上的某些惯性仍不容忽视，唐代的“八骏”也不例外。第二，中古时代新官职的产生有两大特点：一是出于统治的某种特殊需要；二是重新确立与权力核心的关系，以及以何种方式建立这种关系，比如唐代的词臣是对文的掌握建立起与权力核心的密切关系。第三，唐代仕途对于士人而言有特殊的重要性。八骏固然是当时的理想型职位组合，唐代人如此看重这一模式的仕途，从权力和地位体现的角度其实是难以充分解释的，说明官僚生涯是他们赖以获取自我身份的最重要



陆扬教授

途径，也是获得社会认可的前提。这种追求其实是基于完全不同的人生理念，或者说是一种特殊的政治想象，即围绕朝廷权威展开、唯有通过这种途径才能实现的体国经野的理想。所以才会出现“八骏”这样的现象。从时间上说，陆扬教授认为“八骏”更多体现在武后到玄宗时代以清要官为核心的清流官僚的确立，后一过程高度依赖前一过程，但必须作必要的区分。

陆扬教授说他的报告以白居易作为个案分析的对象，不仅因为白乐天本身地位的重要，也是因为对唐后期政治和制度史的任何研究，都难以绕开《白氏文集》中的各类章奏制敕乃至诗文等撰写，尤其是白居易担任翰林学士期间撰写的文字。这些写作提供了唐代在九世纪前期的政治与制度的种种细节。但此前似乎没有学者探讨过那位在科举中大获成功的“文青”白居易和早期官僚生涯中的白居易之间的紧张关系，对这一层关系的探究恰恰有助于我们窥见九世纪特定时期

空下的白居易，也有利于了解九世纪政治体制转型中个体与制度之间的意识错位。这是一种新的“以诗证史”的努力，和陈寅恪的“以诗证史”的方法和目的有较大差别，考察的既是白居易的“心史”，也是历史转变时期参与者的主体意识和客体角色之间的关系。陆扬教授的讨论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白居易对于进入到作为唐代政治核心的翰林学士院的反应；二是从中如何观察以翰林学士院为核心的新文学官僚体制在九世纪的转型。

唐代重要文人大多有仕途经历，可以通过文学书写来考察其仕途轨迹，白居易尤其如此。白居易在他晚年成为广受唐代社会乃至东亚世界尊敬的耆宿文臣，作品广被仿效，这种地位其实和他生涯前期拥有的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等词臣带来的光环有关。然而以往的白居易研究，很少把他放在这种制度史的框架下考察，即使分析白居易在翰林学士任职期间写作，也常常想当然地从一些错误的前提出发。比如作为翰林学士的白居易提交给唐宪宗不少意见措辞相当激烈的谏议，以往研究者往往视为理所当然而不加探究，就因为白居易曾担任过左拾遗这样的谏官，未能意识到这只是他任职翰林学士时的一个作为阶官的职衔。又比如在讨论九世纪初翰林学士的重要性的时候，往往拿白居易的撰作作为依据，却没注意到白居易对他的这种身份的清贵似乎缺乏认同，他在担任学士期间的诸多诗文并没有体现出那种身处权力核心、仕途清贵无比的荣耀感。恰恰相反，在他笔下不断出现的是一种疏离感和孤独感，和他在那一时期积极参与议政，提供大量讽谏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那么这种疏离感和孤独感究竟是一种自我塑造还是对这种身份地

位的真正发自内心的缺乏认同，正是陆扬教授的报告着重分析的。以上这些方面都涉及如何解读白居易的这些诗文作品的问题。陆扬教授认为，白居易的诗作固然有对古代隐逸诗人如陶渊明等的强烈模仿意识，他在翰林学士院撰写的那些诗文却不单纯是一种自我标榜，而的确是一种格格不入感的折射。比如他在《夏日独直寄萧侍御》中写道：“形委有事牵，心与无事期”；在《松斋自题》中说：“夜直入君门，晚归卧吾庐。形骸委顺动，方寸付空虚。持此将过日，自然多晏如。昏昏复默默，非智亦非愚”；《赠吴丹》：“顾我愚且昧，劳生殊为休。一入金门直，星霜三四周。主恩信难报，近地徒久留。终当乞闲官，退与夫子游”。这些反复出现的意念具有高度一致性。要判断这些诗作的意涵，我们既要把它们放在中晚唐对翰林学士身份和工作的诗作群体中加以考察，也要对白居易进入学士院时的个人背景和身份，以及那段历史时期翰林学士院本身与权力核心的关系变化等方面加以考察。对于前者，陆扬教授特别举出与白居易有类似背景和生涯的莫逆之交元稹作为一个例子，认为白居易的诗作和生涯的关系也需要将元稹的诗作和生涯的关系作为参照体。元稹在担任翰林学士期间撰作的《酬乐天待漏入阁见赠》就表达了与当年作为学士院学士的白居易截然不同的自我陶醉的荣耀感。

陆扬教授指出，九世纪初的翰林学士院已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重要官僚机构，而是体现一种新的政治文化理念的核心权力机构。白居易对于这一权力核心的疏离感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而且他在学士院期间对自己的生涯规划也体现出他对如

何利用这一机缘迈向仕途巅峰的轨迹缺乏敏感，比如他在翰林学士的职衔升迁中，选择了薪水较多的京兆府户曹参军而非更符合类似于“八骏”的一些朝官位子，这些现象只有放在从八世纪晚期到九世纪初期翰林学士院的转型这一制度史框架中才能获得更充分、完整的理解。陆扬教授表示，翰林学士在开元时期出现，到贞元、元和年间逐渐成为最高文官的储备。他结合具体史料分析了翰林学士院入院模式在这三个时间段中的特点：贞元以前，入院职官有高有低，缺乏规律，说明学士院的临时性特点强；从贞元前期开始，入院职官变得极有规律，明显以下层文官入院为多，升迁速度缓慢，这是配合唐德宗特殊的统治理念；从元和初年开始，翰林学士院有全新的调整，一个明显特点是入院官职相较于贞元期间越来越高，且升迁速度大大加快，出院前的最高职衔也从中书舍人提升到户部侍郎。元和的这一模式一直维持到唐末。白居易的入院正处于这两种模式交替的那一刻，他个人的出身和对官僚文化的认知显然造成他对这一趋势缺乏把握，使他始终像个身处局内的局外人。但随着时光转移，到了九世纪中期，这一词臣文化造成的辐射力却最终将白居易置于聚光灯下，使他成为时代膜拜的对象。这正是历史变化下主体意识和客体意识之间的错位。

讨论环节，刘后滨教授回应了关于元稹和白居易的区别。他指出，白居易的特点是通达和乐天，而元稹满足于自身权位且爱炫耀。此外，刘后滨教授还指出，文学声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转化为政治资源，“清流文化”便可以作为一种解释路径。但是，白居易不属于这条路径，相较而言，钱辉、沈既

济等人更加符合。

唐雯指出，翰林学士院从入院职官无规律到有规律的变化，与德宗的个人政治因素有关。制度史的背后是政治史，制度的变化与当时的政治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孙正军首先将南朝的情况与唐代进行比较。相较唐代翰林学士院中的官职，南朝出现知制造这一官职，任此官者可能会升迁，但不会有上限或者瓶颈。此外，关于白居易的诗作，他表示，历史研究以文艺作品为史料时，准确把握其所表达的含义是比较困难的，因此更重要的是呈现“猜谜”的过程，他认为陆扬教授关于白居易的个案研究正体现出了这种过程。

随后，几位学者就白居易的仕途经历进行了讨论。刘后滨教授提出一个问题——白居易的前半段履历某种程度上符合“八骏”的路径，但为何没有官至宰相？唐雯认为，原因在于白居易在选择做户曹这一节点上脱离了“八骏”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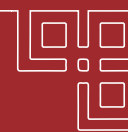
最后，各位学者回答了观众的提问。就如何理解白居易《夏日独直寄萧侍御》一诗中“地贵身不觉”这一句，陆扬教授认为，白居易诗歌稳定性非常强，采用另一套诗歌语言来描述身份，表现出他始终有着格格不入的想法。关于大理评事这一官职在唐代中后期被高梁子弟争夺的原因，刘后滨教授认为，受到重视是因为隔品升迁的机会越来越少，而升迁台阶越来越密。

（撰稿：王梦倩）





文研回望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召开“张政烺先生纪念座谈会”

2017 年是张政烺先生诞辰 105 周年。为纪念这位 20 世纪中国文史研究领域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校史上杰出校友，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文研院”）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华书局于近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举办“张政烺先生学行”专题展。

张政烺，字苑烽，山东荣成人，生于 1912 年 4 月 15 日。1936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历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华书局副总编辑，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历史博物馆学术委员会委员。

为配合此次专题展览，“张政烺先生纪念座谈会”于 2017 年 11 月 22 日下午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上半场为主题发言阶段，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担任主持；下半场为自由发言阶段，文研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李零担任主持。

在开场致辞中，邓小南回顾了张政烺先生的生平事迹、治学特点、高尚风骨以及与北京大学的渊源。邓小南表示，先生崇尚实学，在中国古代史、考古学、古文字学等诸多学术领域都进行了开拓性研究，写下奠基性的里程碑之作。治学之外，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教导学生从未有门户之见。此次文研院举办张政烺先生纪念座谈

会，既为缅怀先生，迎先生回家，又以此寄托后辈的回忆与追思。

北京大学副校长王博对与会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表示，张政烺先生与北大的渊源是学校的宝贵财富，张政烺先生培养的众多优秀教师将其学术传统与精神代代相传。文研院通过展览、座谈、研讨等方式，追怀北大学术史上的杰出人物，意义深远，学校将继续提供大力支持。王博指出，文研院自成立以来，为学者们提供了自由包容的平台，其宗旨（涵育学术、激活思想）更是囊括了北大的核心竞争力与价值观——这也是北大文科乃至整个学校的未来所在。

历史学系主任张帆回顾了张政烺先生与北大历史学系结下的不解之缘。考古文博学院孙华教授感激张政烺先生捐赠给考古文博学院的藏书，并追忆其对考古事业的关心。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重点回溯了张政烺先生与中华书局的渊源，认为张先生的学术至今仍融入于当下和未来的学术发展中，这既是先生学术生命的价值所在，也是出版的价值所在。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卜宪群则表示，纪念张政烺先生也是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当代学者需要传承先生追求创新、淡薄名利、乐于助人的高尚品质和学术精神。

接下来，四位学者作主题发言，回顾了先生治学乃至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张政烺的学生，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资深

教授严文明生动地描述了先生讲课时的情形，并对其宽阔的视野印象深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资深教授马克垚在详细论述先生的治学与授课方法后表示，自身收获最大的地方是习得了学问的内涵与方法。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曾瑜感念先生知识广博、热心助人，表示自己将永远追随他，视他为楷模。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林小安在代读郭沫若之女郭平安的一封信后谈及部分先生未曾发表的学术观点，他认为，张政烺先生在许多重大的学术问题上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着笔或不着笔，先生都不苟放过。

座谈会下半场为自由发言阶段，气氛热烈，感情真挚。与会嘉宾或追忆张政烺先生的渊博学问，或感怀先生的高尚人格，一言一语中拼凑出先生的点点滴滴。

中华书局编辑崔文印在《金史》典校工作中与张政烺先生熟识，先生说话坦诚，为人热忱，提携青年。编辑刘宗汉则将先生为人处世概括为“学问是通，做人是诚”。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陈绍棣是张政烺先生的研究生，他汇报了自己编订的《张政烺先生年谱》，并表示希望能有一部张政烺先生大传传世。萧良琼研究员回顾了张政烺先生离开北大的时刻，并认为他的离开是北大的一大损失。齐文心研究员则动情地回忆起当年在马路边请教先生问题的情境。胡振宇研究员追忆起父亲（胡厚宣，张在北大历史学系的同学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同事）与先生多年来的友情。黄正建老师追忆了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在历史所参与张政烺先生领导的《历史文物图谱》编辑工作，并谈

及自己对《历史文物图谱》一书的期许与反思。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研究员陈平回忆张政烺先生帮他查找卷书中难字的事情，并感动于先生没有架子，坦诚治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赵超表示，张政烺先生真正做到了“有容乃大，无欲则刚”。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栾成显指出，先生的三大遗愿现在基本都已完成，足见其人格魅力。逯钦立先生哲嗣逯弘捷带来的资料与照片，展现了张政烺、逯弘捷、胡厚宣三位先生当年在史语所的工作经历。张政烺先生哲嗣张极井回忆起父亲治学勤奋与为人厚道的品质，并以此激励自己。张政烺先生哲嗣张极人见此情此景，联想到《道德经》中的一句话，“死而不亡者寿”。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最后总结道，传承是学术之本，也是本场座谈会的意义所在。

至此，本次座谈会在庄重而温馨的氛围中落下帷幕，与会学者们纷纷步入展厅，参观“张政烺先生学行”专题展。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韩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罗琨、常玉芝，中华书局总编辑助理张继海，文学编辑室主任俞国林，历史编辑室主任李静、编辑石玉等出席活动。

（本文于 2017 年 11 月 28 日载于北京大学主页“北大要闻”）
（撰稿：周诗雨）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举办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 90 周年纪念论坛

具体内容参见文研纪念·专题展览“回顾与展望——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 90 周年”。
(本文于 2017 年 12 月 28 日载于北京大学主页“北大要闻”)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邀请学者项目第三期圆满结束

随着北京大学 2017 年秋季学期期末的到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文研院”）第三期邀请学者项目也圆满结束。第三期邀请项目自 2017 年 9 月开始，至当年 12 月末结束，为期 4 个月，共邀请了 17 位国内外专家学者前来北大访问、访学，覆盖了历史学、考古学、文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哲学、人类学等各大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及相关领域。

邀请学者项目是文研院学术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特邀访问教授、访问教授和访问学者三部分。本学期，文研院先后邀请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葛兆光、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教授罗兰（Michael John Rowlands）、英国伦敦经济学院荣休教授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荣休教授毛里奇奥·维罗里（Maurizio Viroli）等国际知名的学者担任特邀访问教授，莅临二院做短期讲学，发表系列讲座。此外，文研院与国际合作部合作，邀请到法国巴黎第十大学社会学荣休教授阿兰·迦耶（Alain Caillé）作

为“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访问学者来访北大，举行了一系列高端学术讲座和丰富的学术交流活动。

除特邀教授外，文研院每年设立若干驻访名额，海内外学者可经由自主申请并通过遴选的方式成为文研院的访问教授、学者，驻访时间一般为 4 个月。文研院根据学者提出的学术研究计划提供“量身定制”的学术支持和行政服务，打造良好的研究环境，使学者能够有充分的空间和时间沉淀思想，能够砥砺学问专心写作；同时组织不同形式的学术活动，使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学者增进交流，碰撞思想，推动学术研究的开展。本学期共有 12 位邀请学者在文研院开展驻院研究。驻访期间，大家一方面静心从事各自的研究工作、发表学术报告，一方面也参与、组织文研讲座、文研论坛、读书班等各类学术活动，彼此间从陌生到熟悉，相互切磋问道，结下深厚友谊的同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此外，他们还广泛地参加北大相关院系的课程建设和学生培养，为北大整体学术发展作出了贡献。

访问教授



张邦炜，曾任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四川省政协常委，现任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兼任首都师大历史学院特聘教授。驻访期间，张邦炜教授以“钱穆论著中的一些疑问——从宋代‘平民社会’论说起”为题发表学术报告，主讲了“北大文研讲座”第六十一期“浅谈宋史研究中的片面性问题——从钱大昕考论宋史说起”。此外，张教授先后于 9 月 25 日、10 月 23 日、10 月 27 日在文研院 111 会议室开设读书班，指导北大历史学系、考古文博学院部分研究生研读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十驾斋养新录》《廿二史考异》中与宋代历史以及《宋史》编纂等内容相关的部分条目。

邓淑苹，台湾大学历史系硕士，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上古史，中国玉器史。1974 年起服务于台北的故宫博物院器物处至 2013 年退休。在文研院驻访期间，邓淑苹教授以“何以‘万国玉帛’——探龙山、二里头时期玉文化的形成与意义”为题发表学术报告，主讲了静园雅集第十四期“赏玉、识玉——谈玉品与玉质”。此外，邓教授还于每周六上午 9-12 时在静园二院 211 会议室为北大考古文博学院研究生上课，课程名称为“中国考古玉器史”；在考古文博学院主讲题为“考古所见黄土高原史前先民的玉器文化”学术讲座；应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之邀，作题为“‘万国玉帛’场景下的再思”的学术讲座；参加由北大考古文博学院与艺术学院联合举办的“考古·艺术·设计”交流平台“源流运动”沙龙，担任发言人。



李楠，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长期经济增长与发展、历史经济分析、历史计量方法与应用、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经济、艺术品拍卖等。驻访期间，李楠教授以“为何中国成为以汉族为主的国家——基于地理因素与政治整合的考察”为题发表学术报告，并参加了“北大文研论坛”第五十八期“交叉学科视角下的经济史学”，担任与谈人。



孙圣民，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新经济史学、经济哲学。驻访期间，孙圣民教授以“对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哲学思考”为题发表学术报告，参加了“北大文研论坛”第五十八期“交叉学科视角下的经济史学”，担任与谈人。此外，孙教授还受邀主讲了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社会经济史研究所举办的“经济史学名家系列讲座”。

肖瑛，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理论、风险社会、政治哲学。驻访期间，肖瑛教授以“家国关系论述的中希之别”为题发表学术报告，参加了“北大文研纪念”第一期“纪念与传承——涂尔干逝世一百周年纪念研讨会”，担任发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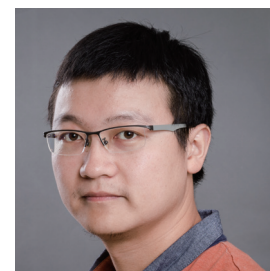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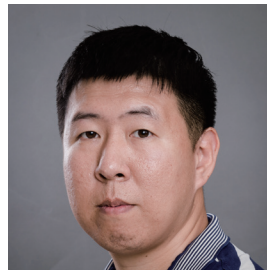


访问学者



陈波，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藏学研究所副教授、四川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领域是藏学人类学，涉及亲属关系、历史人类学和学术史等。驻访期间，陈波副教授以“家屋社会与中国研究”为题发表学术报告，参加了文研周年系列活动——“北大文研论坛”第五十一期“文明研究中的跨学科视角：方法及反思”，担任发言人；参加“北大文研论坛”第五十三期“今天我们为什么讨论‘何为中国？’”，担任与谈人；参加“北大文研论坛”第五十四期“时间性与文明（Temporalities and Civilisations）”，担任与谈人。此外，陈波组织并召集了“北大文研论坛”第五十六期“文明的共处与汇通”，担任发言人；参加“北大文研讲座”第十六期“欧洲与中国的现代国家形塑与文化计划”，担任评议人；参加“菊生学术论坛”第七期“科际合作：藏学与人类学领域间关系”，担任发言人。此外，他还受邀担任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北京大学中国传统社会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边疆与民族”青年学者讲座主讲人，发表演讲，主题为“从民族关系史到关系史——以卫藏为例”。

陈志远，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六朝佛教史、中古时期佛教文献学、儒佛交涉，最近关注中古佛教法灭思想、佛教与孝道等话题。驻访期间，陈志远老师以“从佛诞年代推算看中古佛教经院主义学术”为题发表学术报告；应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之邀，作“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的学术渊源、贡献与局限”学术报告。



胡鸿，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魏晋南北朝史，尤其关注其中的族群问题。驻访期间，胡鸿副教授以“林间自在啼——在物质环境中理解文本”为题发表学术报告；参加了“北大文研论坛”第五十六期“文明的共处与汇通”、“北大文研读书”第五期“长城内外是家乡——《从大都到上都》研读会”，担任发言人；此外，胡鸿还受邀主讲了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北京大学中国传统社会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边疆与民族”青年学者讲座，发表演讲，主题为“中国古代经学史学中四夷说的形成”。驻访期间，胡鸿获得由浙江大学颁发、旨在奖掖青年学者的“普隐人文学术奖”。

华喆，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经学史、三礼学等。驻访期间，华喆副教授以“图像·文本·理论——礼图与礼学研究”为题发表学术报告，并于每月双周周五在文研院 201 会议室开设读书班，与北大历史学系、哲学系及北京师范大学古籍院的研究生共同研读贾公彦著作《仪礼注疏》。



刘未，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宋元考古、陶瓷考古、城市考古。驻访期间，刘未教授以“考古学视野下的晋东南宋元村落”为题发表学术报告，主持召集“北大文研论坛”第五十五期“读城：考古、历史与地理”并担任发言人、参加“北大文研读书”第五期“长城内外是家乡——《从大都到上都》研读会”，担任发言人。

林晓光，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魏晋南北朝文学，目前主要关注课题为中世贵族社会及贵族文学研究、汉魏六朝文学文献生成研究，兼及日本汉学、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驻访期间，林晓光副教授以“文本扭曲镜像中的汉魏六朝文学”为题发表学术报告；应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之邀，作题为“六朝‘素’观念语境与现实指向——从齐高帝遗诏‘布衣素族’公案说起”的学术报告。驻访期间，林晓光获得由浙江大学颁发、旨在奖掖青年学者的“普隐人文学术奖”。



唐雯，复旦大学汉唐文献工作室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古籍整理、唐代文献与历史研究。驻访期间，唐雯老师以“从新出元载墓志看德宗的太子地位”为题发表学术报告，并参加“仙道与鬼道：唐代士人仕宦情结的再考察”工作坊。受北大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之邀，作有关唐五代三史修订的讲座；受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邀请，作题为“从修订本两《五代史》《旧唐书》说新时代的校勘方法与原则”的讲座。

2017年12月26日下午，文研院举办了第三期邀访学者欢送会暨总结会。欢送会上，诸位邀访学者回顾起文研院的学术生活，纷纷表示，文研院和谐的研究氛围，为学者提供了潜心读书和集中写作的难得时光，使他们得以从科研压力、事务工作中抽离开来，完成了既定的写作计划，并得以重新构思未来的学术发展道路。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教授孙圣民表示，这4个月自己专注于学术，很少受到其他事情的打扰，从而完成了25万字的著作初稿，如此高效的工作成果的取得，离不开文研院

所提供的良好的后勤服务和学术保障。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副教授刘未表示，科研工作的节奏时常让学者难以自己支配时间，静下心来从容的思考。在文研院的4个月里，自己终于能够回归久违的舒缓节奏，对近年来感到困惑的理论方法问题尽可能做一番清理，并寻找新的前进方向。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副教授华喆表示，文研院给予他可以心无旁骛做自己研究的时间，让之前搁置的研究计划得以执行，在此期间他也开启新的阅读和思考。

此外，文研院激发邀访学者在高密度的学术探讨与交流中，碰撞出火花。文研讲座、文研论坛、读书会、静园雅集等高水平的学术活动给予了学者们充分交流的机会。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肖瑛表示，文研院精心安排各种学科、论题、形式的讲座、会议和展览，对驻访学者的遴选亦不拘一格，在交流和学习中，常常能感受到获得新养分的兴奋，特别是当自己脑海中盘旋的某个无解的问题，突然获得一个意想不到的答案或者思路时，那种激动难以言表。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楠表示，文研院提供了一个多学科交叉和多学科交流的平台，对一个学者来讲，在自己学科的研究领域和研究问题上能开阔更多的视野，是他在这4个月当中收获最多的。四川大学副教授陈波表示，文研院继承了“兼容并包”的思想，在这样的氛围下，他参加了诸多学术活动，也担任“文明的共处与汇通”论坛的召集人，4个月的时间忙碌而充实，而他所从事的家屋理论的研究也在此期间得到扎实推进。

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邓淑苹很高兴能够借此驻访机会结识多位活跃在学术前沿的同仁。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林晓光表示，这4个月是潜心读书、集中思考的难得时光。优秀学者云集于此，彼此对话、交锋，可以随时就陌生学科的前沿问题请教专家，获益匪浅。复旦大学汉唐文献工作室研究员唐雯表示，这一批学者多来自于和自己研究领域密切相关，但平时交流并不算特别多的学科，文研院的驻访生活给予他们交流与碰撞的机会，也时刻刺激着自己去思考所从事的研究领域的走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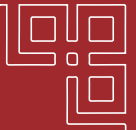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胡鸿表示，此次驻访机会让他与同批驻访的学者们结下了深厚友谊，同时也对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思考方式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志远表达了对驻访生活的不舍，他表示，能够来到文研院与诸位学者学习、探讨学术是很宝贵的机会，希望以后能够以学术成绩回馈这份包容。

目前，第四期邀访学者遴选工作已进行完毕，文研院已为迎接2018年春季学期邀访项目做好了准备。文研院将继续倡导“清新风气、一流标准”，努力汇集国内外资深学者与优秀年轻学者，为知识积累和思想创新提供学术支撑。

（本文于2018年1月3日载于北京大学主页“北大要闻”）
（撰稿：崔璨）



文研纪事





文研纪事

01

2017-11

上海《文汇报》、《上海书评》总编陆灏先生访问文研院，与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商讨未来合作事宜。

上海《文汇报》执行主编李纯一访问文研院，与院长助理韩笑商谈《文汇报·文研学术》合作细节与流程。

03

2017-11

由北京大学、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联合主办的第十四届北京论坛在钓鱼台国宾馆与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隆重举行。其中，“历史和全球视野中的社会转型”分论坛由文研院承办，涵括“社会转型的历史视角：理论与方法”与“社会转型的历史视角：内容与过程”两场学术交流会，来自海内外的18位学者应邀作学术报告。

“静园雅集”第十四期在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赏玉、识玉——谈玉品与玉质”。文研院访问教授、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邓淑苹主讲，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秦岭主持。

“北大文研讲座”第六十二期第一场在第二体育馆B101报告厅举行，主题为“共和自治的理念——安布罗乔·洛伦泽蒂的‘好政府’壁画”。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荣休教授毛里奇奥·维罗里（Maurizio Viroli）主讲，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强主持。

04

2017-11

“北大文研讲座”第六十三期在第二体育馆B101报告厅举行，主题为“清代中后期中国的领土与人民之新定义”。芝加哥大学校级杰出教授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伯重主持，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田耕评议。

11月4日、5日，“菊生学术论坛”第八期“七至十六世纪信息沟通与国家秩序”学术工作坊在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此次工作坊由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育部基地项目课题组在商务印书馆鼎力支持下承办，来自内地、港台、日本的近三十位学者出席并参与讨论。

06

2017-11

“北大文研讲座”第六十二期第二场在第二体育馆B102报告厅举行，主题为“马基雅维利的共和式自由理论”。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普林斯顿大学荣休教授毛里奇奥·维罗里（Maurizio Viroli）主讲，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段德敏主持。

“北大文研讲座”第六十四期在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中国与西方长期发展中的趋同与趋异”。剑桥大学耶稣学院中国中心主任、崇华中国发展荣休教授、发展研究中心创始主任彼得·诺兰（Peter Nolan）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伯重主持，剑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研究员张静出席讲座。

07

2017-11

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EPHE）院长于贝尔·博斯特（Hubert Bost）一行到访问文研院并进行调研，与北京大学相关院系学者就Scripta项目的合作可能性与研究路径进行深入交流。参与会谈的学者有：文研院学术委员会主席李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林梅村、历史学系副教授咎涛、艺术学院助理教授贾妍，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出席。

文研院第三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七次）在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访问学者、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林晓光作主题报告，题目为“文本扭曲镜像中的汉魏六朝文学”。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访问教授邓淑苹、李楠、孙圣民、肖瑛，访问学者陈波、陈志远、华喆、胡鸿、唐雯，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高峰枫教授参与讨论。

由文研院主办、兴全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二十四期在第二体育馆B102报告厅举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李力行作题为“关于中国国有企业下放的研究”的演讲。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董志勇评议，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

08

2017-11

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张亚光主持。

“共和主义与现代政治”圆桌会议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荣休教授毛里奇奥·维罗里（Maurizio Viroli）主讲，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强主持。文研院邀请学者、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罗祎楠，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副教授康子兴，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张新刚，中国传媒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葛耘娜出席并参与讨论。

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伯重的陪同下，剑桥大学周绍明教授、法兰西学院魏丕信教授到访文研院，与院长邓小南探讨学术规划事宜。

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系列讲座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从马塞尔·莫斯到‘社会科学中的反功利主义运动’与共生主义”。“大学堂”访问计划特邀学者、巴黎第十大学教授阿兰·迦耶（Alain Caillé）主讲，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铭铭主持。本次讲座是阿兰·迦耶教授系列讲座第一场。

“北大文研讲座”第六十二期第三场在第二体育馆 B102 报告厅举行，主题为“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国家救赎的演说”。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荣休教授毛里奇奥·维罗里（Maurizio Viroli）主讲，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主持。

10

2017-11

“北大文研讲座”第六十五期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佛教研究的意义与方法——基于华严思想研究的思考”。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日本印度学佛教学会前理事长木村清孝主讲，北京大学佛教研究中心主任姚卫群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魏道儒评议，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张文良翻译。

文研院第三期邀请学者茶叙（第二次）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文研院副院长杨弘博、院长助理韩笑，第三期邀请学者孙圣民、肖瑛、陈波、陈志远、刘未、华喆、林晓光、唐雯出席。本次茶叙，刘未副教授同与会学者分享了中亚考察的见闻并交流相关经验。

应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邀请，文研院第三期访问教授、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邓淑苹以“考古所见黄土高原史前先民的玉器文化”为题作学术报告。

“北大文研讲座”第六十二期第四场在第二体育馆 B102 报告厅举行，主题为“现代政治思想中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普林斯顿大学政治

11

2017-11

学荣休教授毛里奇奥·维罗里（Maurizio Viroli）主讲，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强主持。

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系列讲座在静园二院 208 室举行，主题为“笛卡尔——感受之思”。“大学堂”访问计划特邀学者、当代著名哲学家、法兰西学术院院士让-吕克·马里翁（Jean-Luc Marion）主讲，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靳希平主持。

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系列讲座在静园二院 208 室举行，主题为“礼物范式——解析、应用和拓展”。“大学堂”访问计划特邀学者、巴黎第十大学教授阿兰·迦耶（Alain Caillé）主讲，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主持。本次讲座是阿兰·迦耶教授系列讲座的第二场。

“北大文研讲座”第六十六期在第二体育馆 B102 报告厅举行，主题为“时间之魔轮与佛之涅槃”。美国哈佛大学西藏与喜马拉雅研究教授范德康（Leonard W. J. van der Kuip）主讲，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教授王邦维主持。

12

2017-11

文研院第三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八次）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文研院访问学者、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副教授华喆作主题报告，题目为“图像·文本·理论：礼图与礼学研究”。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访问教授邓淑苹、李楠、孙圣民、肖瑛，访问学者陈波、陈志远、胡鸿、林晓光、唐雯参与讨论。

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系列讲座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迈向更广泛的社会科学”。“大学堂”访问计划特邀学者、巴黎第十大学教授阿兰·迦耶（Alain Caillé）主讲，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李洋主持。本次讲座是阿兰·迦耶教授系列讲座的第三场。

14

2017-11

15

2017-11

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系列讲座在静园二院 208 室举行，主题为“共生主义：迈向多元——普世主义视野下的文明政治”。“大学堂”访问计划特邀学者、巴黎第十大学教授阿兰·迦耶（Alain Caillé）主讲，北京大学外语学院教授董强主持，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铭铭出席并参与讨论。本次讲座是阿兰·迦耶教授系列讲座的第四场。

16

2017-11

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应邀参加由博古睿研究院组织的人工智能阅读会。

马克斯·韦伯基金会中国代表处马勃思（Max J. Fölster）访问文研院，与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就2018年马克斯·韦伯讨论会的举办等议题进行讨论。

“北大文研讲座”第六十七期在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语文学、东方主义和未来语文学”。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教授沈卫荣主讲，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陆建德主持，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出席并参与讨论。

17

2017-11

“静园雅集”第十五期在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木版水印技艺与其当代价值”。木版水印北京市传承人赵慧萍主讲，荣宝斋展览部负责人陈目主持。

18

2017-11

“北大文研纪念”第一期在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纪念与传承：涂尔干逝世一百周年纪念研讨会”。参加本次研讨会的有：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文研院访问教授、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肖瑛，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铭铭、教授杨善华、副教授孙飞宇、助理教授田耕，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苏国勋、研究员赵立玮、中国助理研究员陈涛，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赵丙祥教授、王楠副教授、杨清媚副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倪玉珍副教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讲师李英飞、魏文一，商务印书馆编审李霞、副编审白中林。

“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成立十周年庆典暨第三届中国高校高研院联盟会议”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举办。院长助理韩笑参加活动并分享了文研院在国际化方面的初步探索。

20

2017-11

“北大文研论坛”第五十五期在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读城——考古、历史与地理”。文研院访问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刘未作引言。

21

2017-11

美国华盛顿大学荣休教授康达维（David Knechtges）与夫人张泰平女士到访文研院，并与邓小南院长交流讨论。

文研院第三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九次）在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

22

2017-11

访问学者、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副教授胡鸿作主题报告，题目为“林间自在啼——在物质环境中理解文本”。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邀请学者邓淑苹、陈波、孙圣民、李楠、肖瑛、华喆、刘未、陈志远、林晓光、唐雯参与讨论。

“北大文研讲座”第六十八期在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何谓早期中国的历史”。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金鹏程（Paul R. Goldin）主讲，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陆扬主持。

由文研院主办、兴全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二十五期在第二体育馆B102报告厅举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西方古典学中心助理教授张新刚作了题为“修昔底德论城邦内乱”的演讲。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吴增定评议，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彭小瑜主持并作引言。

“北大文研纪念”第二期在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张政烺先生纪念座谈会”。参加本次研讨会的有：北京大学副校长王博；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资深教授马克垚、主任张帆、副教授韩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资深教授严文明、学术委员会主任孙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卜宪群、研究员王曾瑜、陈绍棣、齐文心、罗琨、常玉芝、胡振宇、萧良琼、栾成显与黄正建，考古所研究员赵超；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林小安；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总编辑助理张继海，文学编辑室主任俞国林，历史编辑室主任李静，编辑崔文印、刘宗汉与石玉；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研究员陈平；张政烺先生哲嗣张极人、张极井；逯钦立先生哲嗣逯弘捷；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

博古睿研究院中国中心主任宋冰、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安乐哲来访文研院并与院务会成员商讨合作事宜。

23

2017-11

24

2017-11

巴黎科研人文大学（PSL）国际事务主管副校长齐鹏思（Christopher Cripps）、亚洲合作总监王婧访问北京大学，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参加会面。

“静园雅集”第十六期在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书画装裱与修复”。本次雅集的两位主讲人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硕士生导师、文化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修研习培训计划咨询专家、日本汉和堂金石书画修

27

2017-11

复研究所所长陆宗润以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装裱修复技艺传承人，中国文物学会会员，中国文物学会修复委员会委员、理事王辛敬。荣宝斋展览部负责人陈目主持，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出席本次活动。

“北大文研讲座”第六十九期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由圣人凡 以人胜天——《天演论》与近代中国知识转型”。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特聘研究员黄克武博士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欧阳哲生教授主持。

28

2017-11

“北大文研讲座”第七十期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根本恶 伪善 平庸恶”。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赵敦华主讲，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黄裕生主持并作评议。

由文研院主办、兴全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二十六期在第二体育馆 B102 报告厅举行。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吴天岳作题为“西方哲学中的人文主义传统？——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哲学史反思”的演讲。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辉主持，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沛评议。

29

2017-11

文研院第三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十次）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文研院访问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刘未作主题报告，题目为“考古学视野下的晋东南宋元村落”。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世瑜，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访问教授邓淑苹、李楠、孙圣民、肖瑛，访问学者陈波、陈志远、胡鸿、华喆、林晓光、唐雯参与讨论。

30

2017-11

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办的“边疆与民族”青年学者系列讲座第一期在理科五号楼 201 室举行。文研院第三期访问学者、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胡鸿作主题报告，题目为“中国古代经学史中四夷说的形成”。文研院工作委员、社会学系教授周飞舟，文研院访问学者陈波，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出席本场讲座，并就相关内容与主讲人进行热烈讨论。

01

2017-12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朱玉麒到访文研院，并与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

04

2017-12

就“北京大学与丝绸之路”展览事宜进行讨论。

文研院工作委员会月度会议在静园二院 B106 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就第四期邀请学者遴选结果、第五期邀请学者推荐、国际交流项目进展、兄弟高研院经验交流及行政团队分工情况等事宜进行商讨。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副院长杨弘博、院长助理韩笑，工作委员高枫峰、李猛、刘云杉、孙庆伟、邢滔滔、叶炜、张辉出席本次会议。

文研院第三期邀请学者茶叙（第三次）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办。文研院副院长杨弘博、院长助理韩笑，第三期邀请学者邓淑苹、肖瑛、孙圣民、陈波、陈志远、刘未出席。本次茶叙，陈志远老师分享暑期西藏考察见闻，陈波老师分享尼泊尔驻访经历。

12 月 1 日、9 日，北京大学人文学部“古典学”项目师生、人文学部和社科学部“思想与社会”项目师生参观“张政烺先生学行展”，孟繁之做现场解说。

12 月 4 日至 8 日，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随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郝平、副校长王博访问英国，参访牛津大学并出席第二届中英高等教育人文对话专题讨论与工作会议。同行出访的还有国际合作部部长夏红卫、国际合作部交流项目办公室主任李昀。

“北大文研读书”第四期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民国北京的城市书写与历史记忆——《重写旧京》研读会”。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化所研究员季剑青担任引言并作主持。

文研院第三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十一次）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文研院访问学者、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陈波作主题报告，题目为“家屋社会与中国研究”。文研院院长邓小南、院长助理韩笑，访问教授邓淑苹、孙圣民、李楠、肖瑛，访问学者华喆、胡鸿、刘未、唐雯参与讨论。

由文研院主办、兴全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二十七期在第二体育馆 B012 报告厅举行。北京大学英语系副教授刘淳作题为“图像中的叙事——会讲故事的古希腊陶瓶画”的演讲。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高峰枫主持，北京大学古典学中心助理教授程炜评议。

05

2017-12

07
2017-12

“北大文研论坛”第五十六期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文明的共处与汇通”。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马戎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张志强评议。

08
2017-12

“静园雅集”第十七期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谁的呼麦——亚欧草原寻踪”。上海音乐学院教授萧梅主讲，内蒙古艺术学院教师麦拉苏进行现场示范，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罗新出席并点评。

11
2017-12

“北大文研读书”第五期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长城内外是家乡——《从大都到上都》研读会”。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罗新教授担任引言并作主持。

12
2017-12

文研院第三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十二次）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文研院访问教授、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孙圣民教授作主题报告，题目为“对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哲学思考”。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访问教授邓淑苹、李楠、肖瑛，访问学者陈波、陈志远、胡鸿、华喆、刘未、林晓光、唐雯参与讨论。

由文研院主办、兴全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二十七期在第二体育馆 B102 报告厅举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秦岭作题为“资源、技术与早期信仰——由良渚谈中国史前文明形成的基础”的演讲。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评议，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邢滔滔主持并作引言。

13
2017-12

柏林自由大学副校长余凯思（Klaus M ü hlhahn）、北京代表处主任罗佩特（Beate Rogler）在北京大学副校长王博的陪同下到访文研院，并与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就未来合作事宜沟通交流。

14
2017-12

“北大文研论坛”第五十七期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东周时代经济考古的一些问题”。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罗泰引言，文研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主持。

“边疆与民族”青年学者系列讲座第二期在北京大学理科五号楼 201 室举行。文研院第三期访问学者、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陈波作主题报告，题目为“从民

15
2017-12

族关系史到关系史——以卫藏为例”。文研院工作委员、社会学系教授周飞舟出席讲座，并就相关内容与主讲人进行热烈讨论。

文研院第三期邀请学者茶叙（第四次）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办。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第三期邀请学者唐雯、肖瑛、孙圣民、胡鸿、华喆出席。本次茶叙，唐雯研究员分享独乐寺等古迹走访经历，肖瑛分享广西调查心得。

16
2017-12

文研院院长邓小南与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科大卫签署《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与香港中文大学－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合作备忘录》，以期推动双方在华北研究、亚洲比较研究、面向全球史的中国史研究等重点领域的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的合作。

“北大文研讲座”第七十一期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皇天后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秦汉研究室主任、研究员田亚岐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庆伟主讲，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田天主持。

18
2017-12

“北大文研读书”第六期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全球史视野中的明清史研究——《火枪与账簿》研读会”。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赵世瑜教授主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李伯重教授作引言。

20
2017-12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组织部内党员和教师到访文研院，参观“张政烺先生学行展”并留言。

“北大文研论坛”第五十八期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交叉学科视角下的经济史学”。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张亚光主持。

21
2017-12

北大经济史学名家系列讲座第六十八讲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举办，文研院第三期访

22

2017-12

问教授、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教授孙圣民作主题报告，题目为“经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经济思想史和方法论考察”。文研院工作委员、经济学院副教授张亚光出席并评议。

“静园雅集”第十八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京剧的民国唱法及其现代性”。美国索思摩学院助理教授徐芄主讲，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鸣主持。

23

2017-12

“北大文研纪念”第三期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回顾与展望——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 90 周年纪念论坛”。参与本次研讨会的有：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荣新江主任、罗新副主任、朱玉麒教授、李孝聪教授，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常务副馆长黄乔生，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所长韩琦，北京阿拉善盟文物局局长景学义，甘肃简牍博物馆馆长张德芳，新疆师范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刘学堂教授，文研院学术委员会主席李零、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副院长杨弘博、院长助理韩笑等近百人。

26

2017-12

文研院 2017 年度总结会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文研院全体工作人员出席，从各自的角度出发总结工作并述职，交流这一年的工作经验与心得体会。

第三期邀请学者欢送会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副院长杨弘博、院长助理韩笑，第三期邀请学者邓淑苹、陈波、陈志远、胡鸿、华喆、李楠、林晓光、刘未、孙圣民、肖瑛、唐雯参加。

文研院新年联谊会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文研院访问学者刘未主持，院长邓小南致新年贺词。文研院全体工作人员、邀请学者、工作委员、未名学者、学生助理等近百人参加。

27

2017-12

文研院与博古睿研究院联合主办的“人文的机器，硅基的人类？”主题讲座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中国社科院者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赵汀阳、中科大教授陈小平主讲，文研院副院长杨弘博出席并致辞。

博古睿中国中心主任宋冰、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安乐哲来访文研院，与院务会成员商讨合作事宜。

30

2017-12

“仙道与鬼道”学术工作坊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陆扬以“白居易：一位文学青年的官僚生成史”作主题演讲；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刘后滨以“宦途八骏：唐代新型精英生成的制度路径与文化认同”作主题演讲。日本中央大学文学部教授妹尾达彦，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叶炜，文研院访问学者、复旦大学汉唐文献工作室研究员唐雯，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孙正军，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唐宋史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员古丽巍出席并参与讨论。

04

2017-01

北京大学青年干部座谈会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党委副书记安钰峰、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主任龚文东、政策法规研究室主任任羽中出席，与学校各职能部门优秀青年代表座谈。座谈会后，与会嘉宾参观文研院举办的“北京大学丝绸之路”展览。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主任荣新江与中古史中心教授朱玉麒解说，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副院长杨弘博全程陪同。

05

2017-01

北京大学青年学者座谈会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副校长王博、人事部部长刘波、政策法规研究室主任任羽中出席，与人文社科领域青年学者代表座谈。

由文研院主办的“青年学者工作会”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与青年学者探讨文研院下一阶段的工作和学术活动规划，从青年学者的学术成长需要组织开展活动。参加本次会议的有：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咎涛、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员陈侃理，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陆胤、副教授程苏东，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孙飞宇，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助理教授贾妍，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王洪喆，第一期访问学者、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罗祎楠，第三期访问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刘未，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副院长杨弘博、院长助理韩笑。

“大科学时代的学术民主”专题研讨会在静园一院 201 会议室举办。本次研讨会由文研院、北京大学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合办。全国政协副主席、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院长韩启德，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王春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政策局局长郑永和等三十余位嘉宾出席并参与讨论。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参加会议。

06

2017-01

“民族史研究的理论、视野与史料批判学术工作坊——刘浦江教授逝世三周年追思”在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学术报告厅举行。文研院院长邓小南，第二期访问学者、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副教授吕博，第三期访问学者、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副教授胡鸿，第三期访问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副教授刘未出席并参与讨论。

11

2017-01

“文研院 2018 战略规划研讨会”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副院长杨弘博、院长助理韩笑及全体工作人员参加。
北京大学校友办主任李文胜到访文研院，并参观“北京大学与丝绸之路”展览。

15

2017-01

博古睿研究院院长克雷格·卡尔霍恩（Craig Calhoun）访问北京大学并与校领导进行会面，商讨北大博古睿中国中心捐赠与合作方案。参与此次会面的有：博古睿研究院中国中心主任宋冰，博古睿代表、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安乐哲，北京大学副校长王博，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部长夏红卫、副部长周曼丽，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秘书长李宇宁、拓展部部长赵琳，北京大学房地产管理部副部长吴军，北京大学基建工程部副部长王苏颖，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副院长杨弘博。

剑桥大学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北大文研讲座”第六十四期主讲人彼得·诺兰（Peter Nolan）在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王桢陪同下到访文研院，与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陈洪捷商讨在剑桥大学举办以蔡元培为主题的学术会议等相关事宜。文研院院长助理韩笑全程陪同并参与讨论。

16

2017-01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建设研讨会”在英杰交流中心第八会议室举办。北京大学副校长王博主持，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出席。

25

2017-01

台湾中研院院士朱云汉、燕京学堂院长袁明访问文研院。

29

2017-01

三联书店编辑冯金红、孙晓林到访文研院，并与院长邓小南探讨出版合作事宜。

